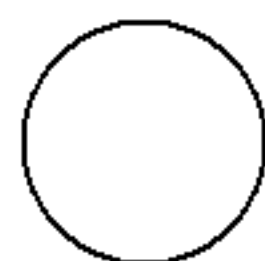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9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九期 ★

目 录

短 論	美国統治集团在古巴問題上的 爭吵說明了什么?.....郭济洲 (1)
	加強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虞挺英 (5)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后备 問題.....許 毅 戴园晨 (8)
	批判資產階級社会学在階級 和階級斗争問題上的謬論.....庄福齡 (1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資料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 斗争 (續).....郑言实編 (21)

☆ 五月一日出版 ☆



美国统治集团

在古巴问题上的争吵说明了什么？

郭济洲

美国统治集团在去年十月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失败以后，对下一步怎样侵略古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甚至把这场争吵渲染成为一场国内的“政治风暴”。

美国参议员基廷、戈德华特和史坦尼斯等人，多次发表演说，攻击肯尼迪政府在古巴问题上表现得“虚弱和混乱”，主张对古巴执行更加“强硬坚定的政策”，直到武装入侵，“一劳永逸地”把革命的古巴消灭掉。美国垄断资本的巨头、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也指责肯尼迪政府“反复无常和优柔寡断”，表示不满。肯尼迪在回答基廷之流的“激动的指责”的时候，强调他从来都希望把革命的古巴“铲除掉”，但怎样“铲除”，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并且把这办法称作“最明智的政策”。肯尼迪的一些谋士如参议员富布赖特、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等人，也都出来为肯尼迪帮腔，指责基廷之流的叫嚷是“不负责任”，是“大吹大擂招摇过市”，是“大唱高调”而不想作“忍辱负重的工作”，是企图让肯尼迪政府作出“非常不明智的事情”。美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也大为肯尼迪政府捧场喝采，竭力想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把这个双手沾满古巴人民鲜血的帝国主

义头子塑造成一副“明智”的形象。

肯尼迪所无耻吹嘘的这套“最明智的政策”究竟是什么货色呢？用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说法就是：一方面，对古巴采取“慢慢扼杀”的办法，另一方面，对拉丁美洲各国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欺瞒“双管齐下”的手段。

肯尼迪政府在去年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古巴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它不仅派遣间谍飞机继续在古巴上空肆无忌惮地进行“侦察”，组织大批武装特务潜入古巴，发动反革命的“游击战”，而且搜罗了三千多名古巴反革命分子，把他们直接编入美国部队，进行特种训练，准备“有朝一日”发动入侵，打回古巴。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还操纵“美洲国家组织”强迫拉丁美洲各国集体干涉古巴，指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反动当局，向巴西、墨西哥等国施加压力，逼迫这些国家与古巴绝交，并且纠合中美洲国家的反动派建立包围和孤立古巴的“围墙”，推行它的“外交和政治隔离”计划。肯尼迪政府还向它的西欧伙伴施加压力，阻止它们的船只为古巴运送货物，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不仅如此。肯尼迪还叫嚷美国对整个拉丁美洲“负有责任”，必须对这个地区“予以



注意”和“关切”。他的这种叫嚷，固然是企图利用所谓古巴的“威胁”作烟幕，进一步控制拉丁美洲各国；同时，也是为了“稳定”住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以便更放手地侵略古巴。正是在这个阴险的反革命目标下，肯尼迪政府在加紧干涉古巴的同时，还狡猾地运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加紧破坏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在军事镇压方面，美国国防部已经把巴拿马运河区作为镇压拉丁美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美国“特种部队”的基地和“反游击部队”的训练中心，在那里成立了“特种部队”第五支队，其中的一千二百名“反游击队”士兵已分别被派到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直接参加镇压当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美国在拉丁美洲训练的反动军官人数，也将过去三年的二千五百人，增加到今年的五千七百人。在政治欺骗方面，肯尼迪政府正在拉丁美洲加紧推销什么“争取进步联盟”，伪装出一副“关心”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贫困落后的样子，从美国垄断资本在这个地区掠夺来的巨额利润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搞什么“社会福利”，妄想以这种小恩小惠来缓和拉丁美洲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尖锐矛盾，阻止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通过这种办法，在“援助”的幌子下，使美国资本更进一步地渗入拉丁美洲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加紧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压榨。

所有这一切，正如肯尼迪和腊斯克他们自己所招供的：美国对古巴除了大规模武装入侵以外，“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想像得到的行动”。当然，肯尼迪政府并不以这些行动为

满足。去年十二月一日，经常为美国政府现行政策辩护的《纽约时报》，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毫不隐讳地说，“我们对卡斯特罗政府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要摧毁它。肯尼迪政府拒绝在拉丁美洲容有一个共产党政府”。今年四月中旬，肯尼迪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上回顾两年前那场“失败的入侵”时，也曾杀气腾腾地叫嚷说，他的政府在需要的时候，将像两年前那样，“毫不犹豫地在西半球采取主动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很明显，在反对古巴人民的革命和“铲除”古巴的革命政权这一方面，肯尼迪和基廷之流是没有半点分歧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进行侵略，两者之间有些不同看法：基廷之流叫嚷要立即对古巴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肯尼迪则更加阴险恶毒地主张“慢慢扼杀”。这就是肯尼迪所谓的“最明智的政策”。

为什么肯尼迪在侵略古巴的作法上同基廷之流会有不同呢？原来，一九六一年美国雇佣军在吉隆滩遭到的惨败，以及后来许多侵略活动的继续失败，使肯尼迪“从中获得了许多教训”，他不得不考虑在今后对古巴采取入侵行动时，怎样才不会再一次“处于丢脸的地位”。用肯尼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采取这种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必须考虑到这一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自己处境的影响”；“在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上，应当把我们治病的药方（应读作侵略古巴的作法）开得更精确些”。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谋士李普曼，今年三月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美国直接“入



侵古巴，占领它，统治它”，这样做“代价将会是很高的，不仅人力财力所费不资，而且在全世界各地的影响上将会付出很高代价”。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手下的人都是骁勇善战的游击战士”，他们必然会回击美国的入侵，这样美国就“将陷入一场类似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经受的那种讨厌的战争”。同一个时候，肯尼迪政府的拉丁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马丁，在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拉丁美洲小组委员会报告时，给肯尼迪的所谓对美国的“处境的影响”也作了一个注脚。他说，如果美国对古巴实行军事入侵，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肯尼迪和他的谋士们清楚地知道，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美国的军队和基地遍布于世界各地，它的这种侵略行动，正在遭到世界各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反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决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各国人民，都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向古巴人民发动的任何侵略行动，决不会袖手旁观。特别是，长期遭受美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他们同古巴人民一样有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

自由的强烈愿望，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任何侵略，必然首先要激起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应。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担心它们入侵古巴之后，不但捞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自己淹死在古巴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汪洋



刽子手的“明智”

英 籍

- 快，动手！
- 傻瓜，我自有妙法！



洋大海之中，遭到老殖民主义者同样可悲的下场。因此，肯尼迪力图避免做出那种他认为“非常不明智的事情”，而居心险毒地策划更加毒辣、狡猾、更有欺骗性的所谓“明智的政策”。

如此看来，肯尼迪等人和基廷之流相互间的“分歧”，只不过是紧敲侵略古巴的锣鼓声中，发生了节拍不合的矛盾而已。他们的阶级本性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忠实奴僕，在加紧奴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一基本目标上，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根本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只不过是一伙帝国主义杀人强盗之间关于如何杀人的争论。一些强盗心急如火，主张马上就动手杀人，而一些强盗则认为，杀人肯定是要杀的，但要杀得巧妙、有把握。这场强盗之间的争吵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在策划如何奴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问题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争吵，以便寻求最大限度地符合它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明智的政策”。但是，这场争吵却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肯尼迪所自诩的、并且为富布赖特之流所吹捧的对古巴的所谓“最明智的政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肯尼迪之流叫喊的所谓“明智的政策”，实质上就是一种更狡猾、更毒辣、更阴险、更凶恶的反革命手段，就是要向古巴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进行更疯狂的进攻。

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明智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明智”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明智只能有利于无

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任何一个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最能代表本阶级利益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愈是能忠实而周到地为本阶级服务，他就愈能得到本阶级的赞赏，并被视为本阶级的明智的人物。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的明智，是对一切事物作出科学的阶级分析和判断，最深刻、最完满地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反动的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所谓明智，只不过是更恶毒、更狡猾地掠夺人民和奴役人民，更无耻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世界上决不可能有代表互相对立的两个不同阶级利益的“明智政策”，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明智”是根本不存在的。肯尼迪硬把他的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明智政策”，吹嘘成为不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符合西半球的“总的利益”，这完全是一种无耻的欺骗。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揭露帝国主义的这种欺骗伎俩，教育人民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鼓吹、宣扬帝国主义的这种“明智”，实际上就是帮助帝国主义欺骗人民。

日益觉醒的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决不会为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欺骗所迷惑。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得好，对于肯尼迪之类的帝国主义者“是永远不能信任的”。帝国主义终究是帝国主义，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们必然要违背历史的潮流，顽固地抗拒人民的意志，反动到底，至死不悟。觉悟了的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决不抱有任何幻想。在觉悟了的人民面前，肯尼迪之流对古巴革命所采取的这种所谓“明智的政策”，肯定是要失败的。



加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虞挺英

我们的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始终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永远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为了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我们要进行许多工作，其中首先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在学校教师和家长中，有许多人对于这一点是有认识的。他们懂得，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地在我们的青少年的头脑里成长起来，因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十分重要。但是，也有一些教师和家长，往往有这样的想法：在社会主义环境里长大起来的青少年，不用操心也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青少年单纯，不必特别加强政治教育，他们也可以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想法，常常使他们忽视和放松了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们的青少年处在社会主义的好环境中，大量的新人新事，对他们有鼓舞、示范和启迪的作用；许多传播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艺术活动和出版物，对他们有积极的影响；健康的社会风气，对他们有很好的熏陶。这一切，使他们在耳濡目染当中，可以接受革命思想的感染，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头脑里成长起来。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与旧社会相比，是“换了人间”。这种新的、好的社会环

境，对于青少年的接受真理，无疑是极其优越的。但是，好的环境影响还要加上人们自觉的教育工作，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收到更大的成效。环境的影响，毕竟不能代替有意识的教育工作。正像人们要成为高明的歌手，不能只靠音乐环境的熏陶，而必须经过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一样，人们要成为坚强的真正具有革命觉悟的人，也不能只靠革命环境的影响，而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切实的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的青少年总的说来，是有觉悟的，是朝气蓬勃、天天向上的，这正是生长在这个优越的社会环境中，受到好的影响，同时受到革命教育的结果。

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是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环境，是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环境。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仍然存在。现在社会上还有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有坏分子，还有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有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等等。也就是说，还有不好的东西。所有这些虽然不占主流，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孔道，侵袭、勾引和腐蚀我们的青少年，对青少年发生极坏的影响。

为了说明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旧习惯



可以通过各种孔道影响青少年，这里举一个例。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回忆他的保姆长妈妈，说长妈妈懂得许多莫名其妙的道理，还有许多规矩，例如人死了，不说死掉，而说“老掉了”；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屋里，不应该走进去；晒裤子的竹竿底下，万万不可钻过去；等等。这位长妈妈所讲的，当然并不是一点合理的因素也没有，她也并不是有意地要向幼年的鲁迅灌输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意识，但她本人的头脑里确有不少旧意识，而且认为这些都是很对的，她就很自然地成了这些旧意识的传播人。这些旧思想、旧意识，也就经过“长妈妈”这样的“媒介”，对孩子们发生着影响。类似“长妈妈”这样的“媒介”，还可以是小说、戏文，或者是别的什么，它们可以在无形中影响青少年的思想意识。这种情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可以经常看到。生长在社会主义环境里的青少年，既可以大量地受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受到旧思想、旧习惯的侵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妄图复辟，不仅梦想着自己卷土重来，而且图谋在青少年中少数品质不好、思想堕落的人的身上，找到他们的未来的代理人。阶级敌人和我们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往往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如果我们放松了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就难以保证他们中有些人不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严重侵蚀，也难以保证他们中有些人不会由此走向政治上的堕落。

美帝国主义者早就透露出他们的一个阴谋，是妄图“和平演变”我们的后代。杜勒斯认为他们“鼓励”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演变”

的工作，“将在今后一、二代之后才产生效果”。纽约协和神学院教务长约翰·贝奈特露骨地说：“未来的希望不在于战胜俄国或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是在于共产主义的演变，这种演变将随着关心他们本身的建设更甚于思想意识或世界革命的新的一代而到来。”美帝国主义者不仅是这样地“希望”，而且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活动，运用他们的邪恶的思想武器，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以图实现他们的“希望”。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这个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我们对于青少年既不能让他们在温室中生长，变成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弱花嫩草；也不能不加引导，不加帮助，采取所谓任他们到生活中去“撞一撞”的态度。我们应当让他们多接触好的东西，接受好的影响，同时，给予他们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使他们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辨是非，善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反动思想的侵袭，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我们要帮助他们努力提高觉悟，使他们沿着革命的轨道，通过知识的增长，经验的积累，实际斗争的锻炼，合乎规律地逐步由单纯走向成熟。

青少年单纯，较少沾染旧思想，热情活泼，对新鲜事物敏感，这对于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来说，当然是一个良好的条件。但是，由于青少年单纯，生活经验少，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阶级观念薄弱，分析和批判能力差，又往往难免幼稚；当着各种坏思想以比较复杂、隐蔽、狡猾的方式袭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不善于识别和抵制，而容易受到迷惑，容易上当。因此，从青少年单纯这个前提出发，所能得出的正确结



論，应当是要更好地关怀他們，从政治思想上保护他們和滋养他們，而决不能是相反。

实际上，由于认为青少年单纯，因而就忽略对于他們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关怀，是常常容易发生的事情。有些家长和教师有了这种思想，往往就对青少年馬馬虎虎，漫不经心，要求不严，不注意使新的健康的东西在他們身上巩固和发展起来，不注意克服他們身上的某些不良倾向的萌芽，不注意自己要用优良的思想作风給他們一个好的榜样，对他們采取了放纵的、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发展是很不利的。

当然，针对着青少年单纯的特点，对他們进行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应当具有一些特点。例如，在政治思想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上，应当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适合青少年的各方面的状况，适合他們的理解水平，多多注意采用具体形象的方式，坚持正面教育，积极诱导启发，防止单调枯燥，等等。但是，这决不等于說，由于青少年单纯，就可以放棄或放松对他們的政治思想工作。

有些人盲目推崇青少年的单纯。认为人在幼年时期，是单纯的和天真的，这非常宝贵；后来，人长大了，就不单纯了，不天真了，变复杂了，这非常不好。为了保持那“非常可贵”的东西而排除那“非常不好”的东西，就要始终保持幼年时期的单纯。这种观点离开了阶级分析，籠统地认为“单纯”就好，“复杂”就坏，这是不正确的。

童稚时期的单纯，只是人們在一定时期的一种客观状态，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人們往后变得复杂起来了，如果这种复杂不是剝削阶级的那种思想复杂，而是知識和經驗丰富了，更善于以无产阶级的立場、观点和

方法思考和分析問題了，更有革命觉悟了，在革命斗争中更老练、更成熟了，那就不仅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却是很好的、应当努力追求的事情。

在我們看来，思想意识的单纯，同思想意识的纯洁，是有区别的。思想意识的纯洁，是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武装头脑，不断地克服和清洗头脑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积极成果。这种纯洁，是一种觉悟性的状态。例如我們說，我們的思想意识还不很纯洁，那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头脑里还残留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杂质。我們要始终保持自己思想意识的纯洁，那意思就是說，我們要不断地清除自己思想意识中一切与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的东西，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品质。而思想意识的单纯，虽然是人們在一定时期所具有的一种状态，但它是一种多少不觉悟的状态。我們不应当盲目地推崇它，也不应当幻想永远保持它。我們要保持的，是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革命品质，而决不是什么童稚时期的思想单纯。如果一味赞赏那种不觉悟的单纯的状态，实际上就是阻止人們的革命觉悟、經驗和知識的成熟，使人們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面前处于不设防的地位，以至由于这种侵蚀而造成思想混乱、思想混杂，直到思想上政治上的墮落。

总之，帮助我們的青少年在社会主义的斗争环境中健康地成长，使他們长大起来能够具有明辨是非的革命头脑，善于識別和抵抗一切反动思想的侵蚀，使他們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永远革命，永不变质，这是做教师的、做父母的所应当担负的重大任务。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后备問題

許 毅 戴 园 晨

后备的必要性和作用

有备方能无患，儲存可应急需。人們在再生产过程中，要从剩余产品中提留一部分产品儲存起来，作为后备。毛澤东同志早就說过：“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預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綫”^①。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备，是保证国民經济平衡发展和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的必要条件。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了生产資料的公有制，消灭了生产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使国民經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但是，人們的计划要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并不容易。毛澤东同志說：“……一般地說来，不論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②这就是說，计划的預期并不等于实际的发展。在执行国民經济计划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平衡現象。为了弥补计划的不足，应当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組織实现平衡。建立

和运用后备，正是組織实现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指出，固定資本的价值逐步轉移到新产品上，固定資本的补偿基金不断积累，而固定資本实物形态的替换更新，却是在一定时期以后才进行。这就会产生当年形成的补偿基金，大于或者小于当年固定資本更新所需基金的不平衡現象。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形态一旦廢止，……这个情形，只能由不断的相对的过剩生产来救治；那就是，一方面必須有一定量的固定資本，比直接需要的更多；別一方面，并且特别是原料等物品的儲存，也要比直接的常年的需要更大。（这一点，对生活資料方面說，是尤其适合的。）这种过剩生产，等于是社会对于它自己的再生产所需各种物质資料的控制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这种过剩是一个无政府的要素。”^③馬克思的这段話告訴我們，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把儲存后备作为“控制器”，多余則有计划地收儲，不足則有计划地动用，以解决再生

① 轉引自邓小平：《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預算草案的报告（摘要）》，1954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②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2頁。

③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586頁。



产过程中固定資產替換更新所必然出現的不平衡現象。

在国民經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不平衡的因素。例如，作为国民經济基础的农业，在沒有实现现代化以前，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够强大，風調雨順能获丰收，水旱風雹則遭災歉。一旦农业歉收，就可能影响生产建設和人民生活。在工业和国民經济其他部門，也不可能完全保证不发生意外。山洪可能冲毀铁路，瓦斯爆炸会使矿山生产暫時停頓。在經济活动中，企业之間和部門之間也难免发生或大或小的脫节。由于社会主义計划經济环环相扣、紧密相联，局部的意外和脫节，都会影响国民經济的平衡发展。对外貿易是社会主义經济活动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之間要进行經济上的互助合作，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国家也要做生意。对外貿易的发展变化，并不完全取决于我們，別国的政治經济形势的变动，会引起貿易关系的建立或中断，会导致交易活跃或购銷呆滯。这种情况，也会对国民經济的平衡有所影响。以上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国民經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計划地来組織实现平衡，而后备，正是組織实现平衡的物质力量。

后备，不仅是保证国民經济平衡发展和再生产順利进行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力量，而且是应付战争这种突然事变所必需的。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沒有消灭帝国主义制度以前，战争危險总是存在的。美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陣营周圍到处建立軍事基地，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

我国的領土台灣，并且不时地向我国进行軍事挑衅。所以，我們不能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也就不能不建立后备，儲备必要的战略物資。

需要建立哪些后备

为了調节国民經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应付某些重大的意外事件的需要，我們要从多方面来建立后备。既要有物資后备、財政后备，还要有矿山資源和生产能力的后备；既要有全国性的后备，还要有地方性的后备，以及集体所有制經济单位的后备。这样，就可以在不同方面适应不同的需要，并且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后备防綫。

关于物資后备。保证国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后备力量，在于儲存各种必要的物資。所以，人們談論后备，通常总是指物資后备。为了应付天災和其他重大意外事故，我們需要有粮食和主要的日用消費品等生活資料的后备；为了保持生产建設发展过程中的平衡，我們需要有各种器材和原料、材料等生产資料的后备；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我們需要有战略物資的后备。只有儲备了这些后备物資，才能使再生产的持續进行和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人說，后备的作用在于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有人說，后备的作用在于保障再生产的持續进行，从而认为只需要生活資料的后备，或者只需要生产資料的后备。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只有使再生产持續进行，人民生活的需要才能得到保障；只有人民生活的需



要得到保障，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因此，既要有生活资料的后备，又要有生产资料的后备，两者不能偏废。

后备，通常是指长期后备。因为，一旦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很难以当年积贮的资源来弥补，这就需要有计划地逐步地积累一定数量的长期后备。同时，为了调剂盈亏，应付某些局部的自然灾害，保证年度、季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及时弥补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局部脱节，在年度计划中往往要留下一定数量的物资。比如，年度物资技术分配计划中就列有当年准备，它是长期后备的缓冲力量，使长期后备不致被局部的偶然事件所冲击，不致被周转调度的需要所挪用，从而巩固和增强长期后备所能起的作用。

我国的物资后备，主要由国家来储备，并且指定不同部门采取不同的办法来管理。国家物资储备部门是执行长期储备任务的机构，它根据国家计划规定的品种、数量，收储各种重要物资。国家储备，必须经过国家批准，才能动用。至于国家计划规定的钢铁等生产资料的当年储备，以及国家允许的超产收储等，由物资供应部门来收储和管理，并且根据国家计划动用。另外，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的储备、工业用的经济作物的储备，则由国营商业和粮食部门担负。

在我国，不仅要有全国性的物资后备，而且在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下，地方也要有一定的物资后备，以便及时弥补局部性的不平衡，保证地区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执行。同时，不仅要有全民所有制的后备，而且要有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的后备。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要注意节约，逐步积累起粮食等

物资后备，这是逐步富裕之道，也是应付灾祸和意外的力量。我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基础薄弱，充分动员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建立起必要的后备。

关于财政后备。资金是物资的货币表现，财政后备是物资后备的资金来源。建立物资后备，必须有相应的财政后备，财政后备通常又表现为相应的物资后备。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所建立的粮食等物资后备，是自己生产的果实，不需要财政后备作为资金来源。在国家的财政后备中，往往有一部分是国家银行储存的外汇，以及黄金这种特殊的财政物资，这又是独立的财政后备。一定数量的黄金和外汇后备，是我们对外贸易支付结算的机动力量。黄金和外汇后备，同其他各种用财政后备建立起来的物资后备一样，也是极其重要的。

在我国，有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财政后备。由于财政后备和物资后备密不可分，有计划地建立国家的物资后备，必须通过国家财政有计划地分配后备资金。国家的长期物资后备，就是通过分配国家预算的储备资金和安排国家预算的结余资金来建立的。国家预算的储备资金，是国家预算分配用于建立国家储备的资金，是国家的主要后备力量。国家预算的结余资金，是以上年度预算执行中由于增产节约，收入超过支出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它作为金库存款存放在国家银行，是国家财政后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备还不充足的情况下，增产节约而结余的资金，应该是补充后备的资金来源，一般不宜再动用。至于国家预算的预备费和周转金，则存放在国家银行，通过银行信贷，成为年度物资技术



分配計劃中当年准备等的资金来源。这些不同形式的财政后备，既各自适应不同的需要，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都是国家财政后备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财政后备同物资后备一样，也应该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地方性的。地方預算需要有預备費和周轉金，而地方預算的結余資金，也是地方性财政后备的一个方面。地方性的财政后备，为地方建立物资后备提供相应的资金来源。

除了物资后备和财政后备以外，还要有矿山資源和生产能力的后备。在再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设备难免不因意外事故而遭受損失；矿山資源的普查勘探、矿山建設、生产能力的建設，又需要較长的時間。因此，就要在事先作出安排，建立相应的后备，特别是对某些牵涉面广的企业和部門更加必要。这种后备并不采取生活資料和鋼铁等原料、材料的形态，而是經過普查勘探和矿山、企业的基本建設等过程，把生活資料和各种原料、材料轉化为矿山資源和生产能力的后备。这种后备所需要的資金，来自国家財政的基本建設投资和經濟建設事业費，而不是来自国家財政的后备資金。所以，我們通过資金分配来有计划地安排后备力量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建設資金中用于建立矿山資源和生产能力的后备的比例，做到瞻前顾后，留有余地，为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組織国民經濟的平衡，創造有利条件。

后备同周轉、积压的区分

組織后备力量，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区分

后备物资同周轉、积压物资的差別，划清后备資金和流动資金的界綫。

后备物资和周轉物资，都是生产物的儲存；后备資金和流动資金，都是生产物儲存的货币表現。但是，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后备物资和后备資金是为再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有所准备，周轉物资和流动資金則是正常的生产和流通所必需。工业企业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要有一定数量的原料、材料和燃料等物资儲备；商业企业为了保证商品流轉和商品供应，要有一定数量的商品儲备；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也要有經營活动所必需的儲备。这些企业的周轉物资和相应的流动資金，是企业进行經營活动、实现国家計劃所不可缺少的。我們不能把流动資金当作后备資金来使用，否則，就会影响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的流轉。

后备和积压，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工业企业盲目采购原料、材料，或者盲目生产了一些社会所不需要的产品，商业企业盲目收购了一些不适銷的物资，这些都是积压，而不能視為后备。因为盲目采购或者盲目生产所积压的物资，通常是品种过时、质量低劣，为社会所不需，或者是数量远远超过社会的正常需要。所以，积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物资和資金的浪費，我們不能把不合理的积压当作后备来看待。工业企业在生产中，必須按照国家計劃采购原料、材料，生产产品，重視产品的质量，关心产品的規格、品种，防止积压；企业必須加强經濟核算，合理地使用流动資金。承担儲存后备任务的部門，在收儲产品、积累后备的时候，也不能把盲



目生产的积压物资，当作后备收储起来。否则，不仅不能起积累后备的作用，反而会掩盖工作中的缺点。

后备资金不是流动资金，更不是因积压而多占了的流动资金，我们必须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除了国家储备之外，后备资金和流动资金又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国营商业、粮食和物资供应部门，担负着商品流转和商品供应的任务，它们需要有一定的周转物资储备和相应的流动资金。同时，物资供应部门和国营商业、粮食部门的采购供应单位，又有储存后备的任务，有相应的后备资金。两者是统一管理的。在物资储备中，为了不致因储存而使物资变质，品种过时，就必须在控制库存量的条件下，推陈储新，进行有计划的替换。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对周转物资和后备物资是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的，具体到一件物资，则不易区分它是用于后备还是用于周转。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便混淆了后备和周转的界限，以致把后备当作周转中的积压，或者把周转中的积压当成后备。

流动资金和后备资金的联系，还有一个内容，那就是两者都是储存的物资及相应的资金。由于社会储存的物资总有一定的数量，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供应的资金也相应地有一定的数量，因此，流动资金数量的增减，就会影响到用于后备资金数量的增减。企业经营不善，积压多，占用了超过正常周转需要的流动资金，就会减少国营商业、粮食等部门用于后备的资金；如果企业精打细算，在保证正常生产和正常流通的条件下，节约了流动资金，则有可能把节省下来的资

金，通过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的资金再分配，用于建立国营商业、粮食等部门的后备。周转储备是否合理，流动资金占用多寡，同企业经营的好坏密切相关。所以，改善企业经营，节约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后备力量。而针对企业经营不善，盲目积压增多的情况，采取清理仓库、核定资金和处理积压等挖掘潜力的措施，能够取得增加后备的效果。

正确建立和运用后备

正确建立后备和运用后备，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积累必要的资金，来积极支持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只有生产建设事业发展了，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积累更多的资金，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正因为这样，就必须正确处理当前生产建设同积累后备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当前生产建设的资金需要，而忽视后备的积累。因为，后备归根到底也是发展生产建设所必需的物资和资金。从较长的时期来看，保留适量的后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不是阻滞而是加速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当然，也不能以为后备愈多愈好。不必要地保留过多的后备，使资金和物资不能充分利用，那就会影响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对后备要留之有度，对建设事业支出要用之有节，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正确处理留有后备同当前生产建设之间的关系，主要在于合理安排后备的数量界限。我们可以从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连续遭灾的可能性等方面，来考虑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储备数量；我们可以从工业生产计划管理的水平和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来考虑器材、原料、材料和各种工业品的储备数量；我们也可以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来考虑战略物资的储备数量。但是，由于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各方面都迫切需要资金，因此，作为长远目标的后备的建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积累。这样，各个年度保留后备的数量多大，就更加紧密地关系到年度用于发展生产建设事业的物资和资金的数额。由于各个年度年景不同，生产发展速度不同，财政资金收入多寡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后备和用于当前生产建设资金的比例和数量。我们要在农业丰收、生产增长和财源充裕的时候，适当地多留一些后备，做到“丰年不奢”。我国国家大、底子薄，积累后备的出路在于勤俭。勤足以开源，俭足以节流。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事业、勤俭办社、勤俭持家，是我们国家和人民逐步富裕起来的根本之道，也是我国积累后备的根本之道。

动用后备，要有计划，要有控制。为当年计划的执行而准备的物资和资金，也具有后备的意义。在预算执行中发生了追加支出的需要，便要动用预备费；在物资技术分配计划执行中，由于预算的追加支出，或者由于计划安排不足，由于新技术的采用，由于增产，发生了追加分配的需要，便动用物资的当年准备。而后备通常是防备重大事变、为年度间的调剂而准备的，它必须同当年准备有所区分，严加控制。它的动用应当

是以丰补歉，而不是以歉补丰。农业生产发生重大灾歉，工业生产受到某些不利因素影响而减产，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协调现象的时候，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才需要动用后备。在需要动用后备的时候，仍旧一味积累后备，固然不适宜；在物资丰裕和财源充沛的时候，不注意后备的积累甚至动用后备，也是不适宜的。所以，动用后备应该有计划、有节制，动用以后，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有计划地补足。同时，后备的作用在于保障生产的顺利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的物资，则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能采取动用后备、减少库存的办法来解决。

动用后备，在于动用后备的物资来满足需要。由于物资后备和财政后备密不可分，建立物资后备，要有财政后备提供资金来源；物资后备的动用，也要以相应的财政后备资金的分配使用为前提。所以，动用后备还必须根据动用的目的，通过国家预算作相应的安排，并且要组织国家预算、银行贷款和物资供需的平衡。如果动用的是国家物资储备部门的物资，必须有计划地收回这部分物资所占用的国家预算的储备资金；如果动用的是国营商业和粮食等部门的物资后备，那末，由于国营商业和粮食等部门的后备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就要通过对国家预算结余资金的安排使用，减少金库存款，压缩银行对这些部门的贷款。这样，把后备物资的动用，和用于这些物资储备的资金再分配结合起来，有计划地组织资金和物资的平衡，就能够消除运用后备的盲目性，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在階級 和階級鬥爭問題上的謬論

· 庄 福 齡 ·

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上，歷來就表現了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對立。資產階級從來沒有正確地說清楚社會上為什麼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當它由上升走向反動的時候，就竭力掩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作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社會學，集中地反映了這種觀點，而成為現代資產階級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種思想武器。

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孔德（1798—1857）創立了資產階級社會學。當時，一方面，西歐資產階級開始走向反動，資本主義的危機日益迫近；另一方面，工人運動迅速地發展起來，新興的革命無產階級要求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社會學的使命就是力圖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反對革命，敵視真理，用偽科學欺騙人民。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後，資產階級社會學一直同馬克思主義處於根本對立的地位，正如馬克思所說：“我身為黨員，是同孔德主義勢不兩立的，而作為一個學者，我對它的評價也很低。”^①

資產階級社會學歷來就集中力量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宣揚階級合作。由於社會上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事實，任何人要想抹殺也抹殺不

掉。因此，資產階級社會學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的攻擊，常常不是直接地否認社會上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事實，而是在劃分階級的标准問題上製造混亂，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狀況作種種歪曲的描述。

有些資產階級社會學家片面地從分配關係方面對社會階級妄加解釋，他們把收入來源和收入多少的不同作為劃分階級的标准。按照這種論調，同一階級的人是因為有着相同的收入來源，工人階級所以是工人階級，是因為他們領取工資，資產階級所以是資產階級，是因為他們獲取利潤；或者同等數量收入的人就是同一階級，收入多的是一種階級，收入少的又是一種階級。“分配論”就是把分配上的差別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把它作為劃分階級的标准。

馬克思主義指出，人們在分配領域中的差異，是從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及其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不同而產生的，階級劃分的根本原因不是產品的分配方式，而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列寧說：“從收入來源尋找社會不同階級的基本特徵，這就是把分配關

^① 《馬克思致愛·斯·比斯利》，《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91頁。



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結果。”^① 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的区别，不仅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間，而且也存在于同一阶级内部。用这种方法来划分阶级，并没有揭示阶级的本质，不能把不同的阶级区分开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只好出卖劳动力，依靠微薄的工资收入，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只不过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轉化形态，它掩盖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之間的对立，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剝削。资本家所以能获取利潤，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占有了生产资料，剝削工人阶级而得来的。这种利潤实际上是工人阶级所創造的剩余价值的轉化的具体形态，是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出来的血汗。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硬把划分阶级的标准說成是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的不同，无非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剝削和被剝削的关系。

“分配論”力图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的道路，不去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不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仅仅去进行经济上的斗争，争取分配方面的某些改良。馬克思早就揭露了“分配論”对于工人阶级革命意志的腐蝕作用，他指出，工人阶级“不应当忘記：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反对着后果，而不是反对着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它不过是阻撓着这种恶化其生活状况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它只是在采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鏟除病根。”^②

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还大肆宣揚所謂

“組織論”。这种論調就是把人們在社会生产組織中职能上的差异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种不同的阶级，一种是生产的組織者，另一种是生产的执行者。在他们看来，资本家在生产中起着“組織者”的作用，应该居于統治的地位；而工人阶级在生产中則起着“执行者”的作用，应该处于被統治的地位。“組織論”者认为，社会上要进行生产，一定要有不同的阶级在生产中执行不同的职能，就像动物軀体有各种不同的器官一样。因此，他们认为社会上阶级的存在和保持不平等的分工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戴維斯和穆尔說：“社会不平等是无意識地一代一代地傳下来的手段，借着这种手段，社会才能保障最有能力的人忠誠地占据最重要的地位。”^③ 西德的资产阶级学者海因利希·馮·斯塔克尔堡甚至无耻地說：“在我們的经济制度下，如果没有资本家，一切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就要餓死和冻死。”^④

这种赤裸裸地为资本主义剝削制度辯护的謬論，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在阶级社会，不同阶级在生产組織中的作用确实有所不同。资本家在生产中能起組織作用，在经济上占据統治地位，是因为他们占有生产资料。

① 《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3頁。

② 《工資、价格和利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426頁。

③ 戴維斯、穆尔：《阶层若干原則》。

④ 海因利希·馮·斯塔克尔堡：《国民经济学理論基础》。



正如馬克思指出：“資本家是資本家，不是因为他是在产业上的指导者；乃因为他已經是在产业上的命令者。在封建时代，軍事上訴訟上的裁決权，是土地所有权的屬性；同样，产业上的命令权，也成了資本的屬性。”^①工人階級由于不占有生产資料，就不可能在生产上居于統治地位，發揮組織者的作用。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不同作用，是由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并不是如有些資產階級社会学家所說的是一种“天賦的职能”，这种不同作用是可以改变的。随着資本主义制度的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工人階級掌握了生产資料，他們就能在生产中起领导和組織的作用，而資本家在資本主义社会的那种作用也就完結了。

现实生活也表明，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股份公司广泛的发展，資本家日益脱离生产組織和管理，他們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不断增长，依靠“剪息票”和債券收入为生的食利者阶层愈来愈多。据統計，一九六〇年美国食利者的收入总共为四百零八亿美元，超过了拥有四亿多人口的印度的全部国民收入。現在資本家在生产中逐漸失去作用，已經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物。

此外，有些資產階級社会学家还把文化程度的高低作为划分階級的根据，认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們組成了不同的階級，說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属于社会的“高等階級”，而沒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則属于社会的“下层階級”。他們认为劳动人民只要提高文化就可以改变階級地位。还有些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竟荒謬地把許多毫不相干的因素，例如职

业种类、收入来源、家庭經濟的类型和住宅等，折衷地拼湊在一起，构成所謂划分階級的“社会地位特征指数”，通过計算“指数”的高低来确定人們的階級地位。

資產階級社会学家不但矢口否认划分階級的客观标准，歪曲社会上产生階級的原因，而且大肆宣揚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关系已經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階級之間的界限在日益消失。联合国科学、文化及教育組織社会科学部主任特·恩·馬歇爾說：“社会階級”一詞已經“过时”了，因为“現在已經不存在具有共同經濟利益的集团”^②。另一个資產階級社会学家捷西·貝尔納德說：階級是“貧穷的时代”所特有的，而現代資本主义是处于“富裕的时代”，報酬、教育与就业等方面的差別消失了，它正在向“平等”的和“无階級”的社会方向发展，因此，“資產階級”与“无產階級”的概念已經沒有什么用处了^③。他們还編造了許多謊言，提出什么“技术决定論”、“社会流动論”、“中間階級論”等等，妄图粉飾資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掩盖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斗争日益尖銳化的事实。

“技术决定論”认为，由于現代技术的发展，資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資本家不再起决定作用了，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知識分子和技术专家。資本主义社会将变成“管理者社会”、“經理社会”。美国“技术决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8頁。

② 見特·恩·馬歇爾《二十世紀中社会成层的变化概况》。

③ 參見捷西·貝尔納德《在富裕的时代中的階級組織：階級組織的新原則》。



定論”者伯恩汉說：“由于生产技术的变化，管理职能在全部生产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了，因而就使得执行这些职能的人成了社会的领导集团或阶级”^①。美国社会学家埃列斯柯并赋予这个社会以“理性的资本主义”的称号。他說，在这样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理性”成为資本，“理性”的所有者就是掌握技术的管理者、工程师等。某些“技术决定論”者有时也提到资本主义社会有“弊病”，这就是資本家在技术和組織方面的不学无术，不善于管理企业。他們說，只要資本家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給技术知識分子，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就可以消除。

其实，技术是人們在从事物质資料生产的过程中創造出来的，并为人們所掌握和支配，离开了人，技术便是死东西。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有着巨大的作用，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的发展。但是，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出現，决不能根本改变社会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改变，都是由于阶级斗争发展的結果，而不是技术发展的結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資本家掌握着生产資料的所有权，整个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技术在資本家手里，只能是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列宁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②这种进步絲毫不会触及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礎，当然更談不到消灭资本主义的剝削和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結構了。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归結为資本家不懂得技术，这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胡謔。资本主义的弊病根源

于资本主义剝削制度。这种弊病只有推翻了資本家統治，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到根除。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即使資本家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給了技术知識分子，这不过是由資本家的一只手里轉到另一只手里，即資本家代理人的手里。資本家仍然掌握着实际权力。技术知識分子是以資本家的意志为轉移的，决不能独立行事。正如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程师、生产組織者并不是按照自己所願望的那样去工作，而是按照別人所命令他的、按照主人的利益所指令的那样去工作。”^③

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社会学学会議上，許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提出了所謂“社会流动論”。他們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們在社会阶级、阶层之間是經常流动的，特别是从低的阶层向高的阶层、从一些社会集团向另一些社会集团流动。他們认为，高度的流动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特点。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庫尔特·梅耶尔說：“在美国这个大国里一切有才干的人和野心家不論他們是什么社会出身都有充分的机会‘飞黄騰达’。”^④他們把资本主义社会說成是“阶级开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对每一个人都平等地提供向上层阶级流动的机会。他們还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經濟机构、政治机构、教育制度和婚姻制

① 伯恩汉：《管理革命論》。

② 《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4—595頁。

③ 《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頁。

④ 庫尔特·梅耶尔：《最近美国阶级結構的变化》。



度等等，說成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姆·李普希特等說，社会所需要的官吏的总数“久而久之是要增加的”，“上层阶级”的人口常常不能保证“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下层阶级”就可能向“上层阶级”流动，而“填满空缺”^①。他们还說什么劳动人民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的經济机构购买股票、获取利潤、参与企业管理，从而逐步地登上百万富翁的宝座；也可以通过議会选举而获得高官厚爵；还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跃入社会的上层；甚至可以通过同百万富翁或百万富孀結婚的机会而接受优厚的遗产；等等。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描繪的一幅“社会流动”及其种种“渠道”的美妙的图画。

“社会流动論”企图在劳动群众面前臆造一个“海市蜃楼”式的幻境，仿佛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对任何人的发财致富設置障碍，今天一无所有的貧民，明天可以成为百万富翁，阶级矛盾和阶级界限都会在这种“高度流动”的社会里自行消失。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早已拆穿了这种騙人的謊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宣揚的那样的“社会流动”；恰恰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經济規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不断地发生阶级分化，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在广大小生产者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人爬上了剝削阶级的地位，变成了资产阶级；而絕大多数人則日益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排挤，陷于饥饿和破产的境地，不断地补充着无产阶级的队伍。据今年二月十四日美国《国民前衛》周报的一篇文章說，美国由于大批小农場遭到排挤和吞并，近十年来，每年平均有一百

万农民被迫离开农业，流入城市。无产阶级由于遭受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工資的比重不断下降，生活日益貧苦，而且常常要遭到失业的灾难；而資本家的剩余价值的比重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愈益集中到少数資本家手中。例如，在西德，工业生产中的工資在新創造的价值中的比重，从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七下降到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三；而剩余价值率一九三六年为百分之一百四十八，一九五〇年为百分之一百八十七，一九五五年則高达百分之二百零四。在这种“人吃人”的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地走向饥寒交迫的境地，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下层阶级”向“上层阶级”流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机构和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經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是剝削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是套在劳动人民頸上的枷鎖。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持有股票只是极少数，而且往往是被强迫购买的，这种情况并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資本家强迫工人购买股票是为了麻痹工人阶级意識，模糊阶级界限，使他們丧失革命斗志。资产阶级的議会是統治和欺騙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的选举，只不过是几年一次地解决統治阶级内部誰来执政的問題，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是被剝夺了的。至于资产阶级的教育，也不过是培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奴才。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机构和制度都是根据資本家利益需要而設置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对于劳动人民

① 參見斯·姆·李普希特、格·澤捷尔別尔格《社会流动理論》。



說来，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带来极其悲惨的后果。

同上述“社会流动論”相呼应，资产阶级社会学还虚构了所謂“中間階級論”，他們几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階級和阶层都划入了“中間階級”。在他們看来，“中間階級”既包括企业主、农場主、銀行家、官僚、經理，也包括教員、職員、售貨員、技师、医生、小店主、熟练工人等等。他們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中間階級”不断扩大的过程。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庫尔特·梅耶尔說：“如果这种趋势保存下去，那末美国社会就其階級結構而言，将在最近重新变成一个中产階級占优势的社会。”^①

资本主义社会真是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說的是“中間階級”占优势的社会嗎？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階級結構表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基本階級，与基本階級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非基本階級，这些階級都具有各自的特点，絕不是一个統一的“中間階級”。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农場主、企业主、銀行家、官僚、經理等等，有些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有些則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們共同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有一批人数众多的小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職員、技术人員、知識分子等，由于經濟上和政治上各不相同，他們并不是属于同一階級，更不是什么統一的“中間階級”，而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中間地位。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还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知識分子有所增加的情况，为他們的“中間

階級”不断增加、階級矛盾日益泯灭的論点作論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識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階級，他們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例如，生产部門的管理人員和技术人員不仅执行了工艺过程的领导职能，而且执行了监督工人的职能；其他部門的知識分子也都是从不同的方面为资产阶级統治服务的。怎么能够說，资本主义社会知識分子的增长会引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断减少、階級矛盾的逐步泯灭呢？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捏造了上述騙人的謬論，来攻击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階級和階級斗争的事实，企图从精神上毒化劳动人民，抵制革命思想的影响，使他們不要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资产阶级社会学很得到帝国主义的賞識。美帝国主义就曾积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推行资产阶级社会学，借以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窒息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解放前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那时由美帝国主义培植起来一批文化奴僕，就曾大力販卖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破烂貨色，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有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公然认为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階級的标准是主观捏造的。他說：“近来有許多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往往把一两个單純的抽象观念来做标准，而分社会做种种階級，以为人們在社会上的冲突实在因为这种階級观念而生的。有的社会科学家以生产方法为

^① 庫尔特·梅耶尔：《最近美国階級結構的变化》。



标准而分社会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殊不知这些标准都是抽象的，都是分类的人的主观的见解，不是社会里面实在是这样分的。”^①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也宣扬所谓“阶级流动论”，认为资产阶级可以变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可以变为资产阶级。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种种谎言。可是，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影响在中国就绝迹了。我们看到，在一九五七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向中国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就曾企图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作为帝国主义思想武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不放松对中国人民的进攻，企图夺回它失去的理论阵地，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我们还要特别指出，历来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就从资产阶级社会学那里抄袭了许多东西，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当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股份公司的时候，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就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他说：“在工业中到处都发生着同样的过程，非个人的所有制形式逐步增加了。就是在那些最初是由一个人创办的企业中，就是在那些企业中，所有权也是一代比一代更加分散，最初是在创业人的家庭内部分割，但是以后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也把股份转让给外人。”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说不上有什么鸿沟”^②。叛徒考茨基曾散布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日益缓和的思想，他说：“工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得

到的福利越增长，他们就越安于并容忍资本主义制度，就越放弃一切不可靠的冒险企图。阶级矛盾的日益缓和正是随着无产阶级越强大而把社会主义推向越遥远的未来。”^③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更为明显。他们编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公然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说，这种阶级关系更加改变了”。这本书说：工人由于参与因生产率提高而增加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的分配，“本质上已经不再是当作劳动力价格的工资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再是旧的、对资本主义具有典型意义的雇佣劳动关系。”^④现代修正主义者还把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矛盾说成是人类与核武器的矛盾，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各阶级之间已没有利害冲突了，它们的利益趋于一致了。可见，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原则区别的。

从上述可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谬论，揭露它的反科学、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对于提高劳动人民的识别能力，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 郭任远：《社会科学概论》。

② 见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

③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

④ 见米尔科·贝洛维奇《政治经济学》第4篇。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编

八 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反动派驱使各国工人互相厮杀

酝酿已久的世界大战，终于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底爆发了。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为重新分割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

战争是帝国主义矛盾的总爆发，又使这些矛盾更加尖锐化。战争同时也揭破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脓疮，撕去了隐藏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叛徒的假面具。各交战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在战争一开始就背叛了斯图加特大会、哥本哈根大会的决议和巴塞尔宣言，公然投向资产阶级怀抱，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狂热地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叫嚷“俄国入侵”，宣称“在危险时刻我们不会抛弃祖国”。党的右派领袖谢德曼说：“我们有责任保卫社会民主主义最发达的这个国家，使它免遭俄国的奴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因为我们参加了社会党国际而不再成为德国人了。”工会总委员会宣布“国内和平”，号召工人在战争中支持政府。议会党团领袖哈阿兹说，战争对德国来说是防御性的，因此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保卫祖国，同时，德国在这次战争中还要为俄罗斯人民“争取自由”。社会民主党不但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而且还派人到前线去“激励”士气。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发表全力支持政府的声明，号召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反对沙皇俄国和半野蛮的塞尔维亚”。

在法国，社会党声明必须保卫法兰西，抗击德国人的侵略，并到处宣传法国进行的战争是防御性的、正义的。议会党团同样也投票赞成本国的军事预算。党的两个代表盖得和桑巴加入了帝国主义政府，以保证工人和资产阶级在战争中的“合作”。



英国社会党右翼，俄国孟什维克，比利时社会党领袖（包括身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的王德威尔得），都支持本国政府对德国作战。

有些社会党人不仅在国内散布沙文主义，而且在国外到处游说。德国社会党人谢德曼、列金等受政府委托，到瑞士、瑞典、丹麦等中立国家，劝说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和社会舆论赞助德国。英、法的社会党人跑到俄国，鼓动俄国工人为保护沙皇制度和它的盟国而战。

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既然已经公开背叛了社会主义，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个国际就完全破产了。在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促使第二国际破产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罪魁。列宁说：“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最有威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负玷污社会主义的责任。”①

维护巴塞尔宣言，揭穿“保卫祖国”口号的反动实质

在历史发展的这个紧要关头，在各国社会党陷于深刻危机、工人运动领袖纷纷叛变的情况下，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毫不犹豫地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团结革命的社会党人，领导劳动群众，坚定地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前进。

战争爆发后，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列宁从奥地利移居到中立国瑞士。列宁一到达瑞士的伯尔尼，立即起草了一个关于战争的提纲，即《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回答了当时最迫切的基本问题，向全世界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的道路。在得到俄国国内党组织的赞同以后，列宁把这个提纲改写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题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大战期间，这个宣言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彻底揭露了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尖锐地谴责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社会党领袖的叛变行为，并且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当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斗争路线。宣言说：“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② 宣言号召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并指出：“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示，由巴塞尔决议（一九一二年）所规定，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中产生出来的。”③

①②③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10、16页。



一九一五年二月，英、法、比等協約国的社会党人在倫敦召开了代表會議，同年四月，德、奧等同盟国的社会党人在維也納召开了代表會議。双方都假惺惺地呼吁各国政府建立和平，帮助資产階級安撫群众，并为自己的沙文主义立場辯护。布尔什維克派李維諾夫出席了倫敦的會議，在会上宣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宣言。會議主席采取卑劣的手段，几次打断李維諾夫的发言，李維諾夫就退出了會議。列宁說，“对于倫敦代表會議上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人來說，任务很清楚，就是退出这个會議以捍卫鮮明的反沙文主义的原則，同时不陷入亲德主义。”^①因为亲德主义者也反对倫敦會議。

列宁斥責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巴塞尔宣言的背叛，指出他們“不敢否认巴塞尔宣言，也不敢拿这个宣言提出的要求同各国社会党在战时的行为相对照”。“有人竟完全避开巴塞尔宣言或避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援引領袖們的言論或个别党的決議，这种伪善态度是极其令人憤慨的，因为第一、这些言論是在巴塞尔大会以前发表的；第二、这些決議并不是由世界各国党共同通过的決議；第三、这都是針對各种可能的战争，而不是針對当前这场战争說的。”^②

列宁說，巴塞尔宣言“既沒有一个字談到保卫祖国，也沒有一个字談到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區別，……宣言十分明确地认为这次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保卫祖国的思想成了理論上毫无意思的、实践上荒謬怪誕的东西”^③。列宁同时也指出，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保卫祖国”的口号，它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保卫祖国”或“防御”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正义性。他說：假如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等等，那末“不管誰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一切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屬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希望它們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④。但是，社会沙文主义者主張“保卫祖国”，决不是为反对異族压迫，而是为了捍卫这些或者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或压迫異族人民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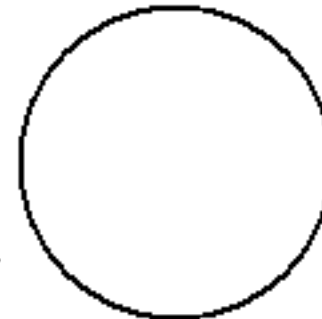
社会沙文主义是社会党内熟透了的資产階級膿疮

在《第二国际的破产》、《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等著作中，列宁对社会沙文主义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机会主义怎样在几十年間逐渐从各国社会民主党內成熟起来，并且轉为社会沙文主义。

① 《談倫敦代表會議》。《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6頁。

②③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99、101、99—100頁。

④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0—281頁。



列宁写道：“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在当前帝国主义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次战争中同‘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联合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①

列宁指出：社会沙文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它们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内容，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战争使这个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把它的一系列特别的因素和刺激附加到一般的因素和刺激之中，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平庸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这种情况自然使拥护机会主义的人日益增多，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许多昨天的激进派投入这个阵营。”^②

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一个，“那就是很小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捍卫从‘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靠掠夺异族、靠大国优越地位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一点油水的‘权利’”^③。

因此，列宁得出结论说：“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④“社会沙文主义是米勒兰主义、伯恩斯坦主义、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直接继续和完成，是它们的总和，它们的总结，它们的结果。”^⑤

九 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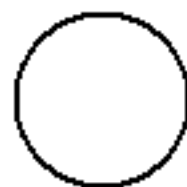
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中间，除了公开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之外，还有一个所谓“中派”，即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的主要代表考茨基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一九一四年八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⑥。但是，他在第二国际中负有很高声望；同时，他的伪善面目又有很大欺骗作用。因此，同考茨基作斗争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当时一个关系全局的根本的问题。为了把各国革命的社会党人和广大群众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用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在大战期间，用很大的力量来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一九一四年十月列宁在一封信中写道：“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独立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他想蒙蔽一切和掩盖一切，想用诡辩和似乎是博学

^{①②④}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8—219、219、220页。

^③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9页。

^⑤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2页。

^⑥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54页。



的廢話来平息工人的已經覺醒了的心。”^①

在批判考茨基主義的時候，列寧深刻地論證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策略。

庸夫俗子不懂得“戰爭是政策的繼續”

列寧指出，“社會黨人一向斥責各民族之間的戰爭，認為這是一種野蠻的和殘酷的行為。但是我們對戰爭的態度，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和平的擁護者和鼓吹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有原則的區別。我們跟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不同，我們懂得戰爭和國內階級鬥爭有必然的聯繫，懂得不消滅階級和建立社會主義就不能消滅戰爭，完全承認國內戰爭即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的戰爭，奴隸反對奴隸主、農奴反對地主、僱傭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的合理性、進步性和必要性。”^②

列寧引述了“戰爭是政策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句名言，指出要找出戰爭的真正實質，就應當研究戰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導致和已經導致戰爭的政策。英、法、德、意、奧、俄等國的統治階級，在戰前實行了掠奪殖民地、壓迫異族、鎮壓工人運動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這種帝國主義政策的繼續，是帝國主義戰爭。“庸夫俗子不懂得戰爭是‘政策的繼續’，因此他們只會喊什麼‘敵人侵犯’，‘敵人侵入我國’，而不去分析戰爭是由於什麼打起來的，是什麼階級為了什麼政治目的進行的。”^③

在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瘋狂地叫囂“保衛祖國”和互相責罵對方的時候，考茨基煞費苦心來掩蓋他們的可恥叛變。他說：“大家都有權利和義務保衛自己的祖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在於承認各國社會黨人（其中包括同我國交戰國家的社會黨人）有這種權利”^④。

列寧憤怒地寫道：“這種絕妙的議論是對社會主義的極端庸俗的嘲弄，回答這種嘲弄的最好辦法就是定制一個獎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請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是為這種行為作辯護；為了‘保衛祖國’而讓法國工人向德國工人開槍，讓德國工人向法國工人開槍！”^⑤

考茨基之流為了辯護他們的背叛行為，還胡亂地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見解，說什麼在

① 《給亞·施略普尼柯夫》。《列寧全集》第35卷，第152頁。

② 《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全集》第21卷，第279頁。

③ 《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列寧全集》第23卷，第24頁。

④ 轉引自《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21卷，第195頁。

⑤ 《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21卷，第196頁。



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五五年間，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間，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間，战争一旦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者那方。列宁揭穿了这种诡辩手法，指出：“把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策的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①列宁说，考茨基所引证的以往的战争，有下面这些基本特点：“（一）以往的战争是解决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推翻专制制度或异族压迫的问题；（二）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在战前，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者能够像斯图加特决议（一九〇七年）和巴塞尔决议（一九一二年）那样，谈到利用战争‘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的问题；（三）当时在交战双方的国家内，都没有比较强大的、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简单地说来，在所有交战的国家里都谈不上无产阶级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总运动的时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只判断什么样的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害处较少（或者更有益处），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②

考茨基还诡辩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它还带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虽然有帝国主义的趋势，而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有“民族的”要求。列宁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具有民族因素的只有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但是，这种民族因素对全欧的战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人，那就是愚蠢透顶的学究或滑头和骗子。”^③

考茨基附和普列汉诺夫之流说，“实际问题只有一个：是本国胜利还是本国失败。”^④列宁说：“是的，如果忘掉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忘掉社会主义，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还有另一个实际问题。是做一个盲从的懦弱的奴隶，在奴隶主之间的战争中死去呢，还是为了举行奴隶之间的‘联欢’以推翻奴隶制而死去呢？”“事实上这才是‘实际’问题。”^⑤

在整个战争期间，列宁都始终不渝地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斗争。他在《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一文中指出，“战时的革命就是

①③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7、212—213页。

②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列宁全集》第21卷，第162—163页。

④ 转引自《一幅说明国内战争口号的插图》，《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9页。

⑤ 《一幅说明国内战争口号的插图》，《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9页。



国内战争；一方面，政府在军事上失利（‘失败’），就容易使政府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另一方面，竭力实现这种转变而又不促使政府失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①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财政资本“心甘情愿”所采取的一种政策，是“工业”国企图吞并“农业”国的一种趋向。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在理论上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产业资本的统治，而在于财政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而且还要吞并一切国家。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分开，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分开，来为他的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废除武装’、‘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②

在批判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巨著，总结了《资本论》出版以后资本主义在半个世纪的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律和矛盾。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③“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可分三方面来谈：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二、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④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了，革命爆发的条件日益成熟；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分割世界所进行的斗争更加尖锐了，斗争双方扼杀对手的愿望更加强烈。

从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中，列宁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⑤的结论。

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这种不平衡发展是跳跃式的，原来走在后面的国家跳到前面去了，而原来走在前面的国家落到后面去了。正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4页。

②③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5、103页。

④⑤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9、186页。



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也正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地方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获得胜利。

早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列宁就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①。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②。

“超帝国主义”论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机会主义“理论”

列宁揭穿了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论，认为这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伪装起来的一种机会主义理论。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个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财政资本共同剥削全世界来代替各国财政资本的相互斗争。”^③战争的结局“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可能加速在和平时期要等很久才能达到的那种发展。如果事情弄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裁减军备和实现持久和平的地步，那末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德日益衰落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这个“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可能在资本主义领域中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④。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矛盾会大大和缓。列宁指出，在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附属国，资本的积聚还很薄弱，垄断企业还没有产生，这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是可能的和必然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但是并没有消灭竞争，而是更加剧了竞争，迫使资产阶级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战争来重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列宁说：“资本家分割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现在的集中已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5页。

③ 转引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6—287页。

④ 转引自《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00页。



經发展到这种地步,使他們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去获取利潤;而且他們分割世界,是‘按資本’、‘按實力’来分割的,在商品生产和資本主义制度下也只有按这种标准来分割。實力是随經濟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必須知道哪些問題的解决是取决于實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純粹’經濟上的变更,还是經濟范围以外的(例如軍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資本主义最新阶段的基本观点。”①“‘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結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間的‘暂时休战’。和平的同盟准备着战争,同时也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两者互相制約,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帝国主义联系、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不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②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論的真正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轉移群众視綫,使他們不去注意現代的尖銳矛盾和尖銳問題,而去注意将来所謂新的‘超帝国主义’的虛假的前途,用这种极为反动的办法来安慰群众,使他們抱着在資本主义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③。

考茨基还扮演着牧师的角色,說什么許多資本家真正关心世界和平和裁減軍备,不傾心于帝国主义,因为他們从战争和增加軍备中所得到的利益,并不比他們所遭受的損害大。他劝导資本家說,实现資本扩張的最好办法,“不是通过帝国主义強力,而是通过和平民主”④。列宁說,“当爭夺强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就来劝导資本家和小资产階級說,战争是可怕的东西,裁減軍备才是好事。这样做和这样做的結果完全像基督教的牧师从讲台上劝导資本家說,博爱是上帝的教誨,是灵魂的所向,是文明的道德规范。考茨基称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經濟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階級希望金融資本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劝告。”⑤

列宁指出,“考茨基主义”这个国际上的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腐化解体的結果,另一方面是被资产階級偏見所俘虏的小资产者思想的必然产物。“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整个无产階級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論錯誤。必須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的‘民主主义’在世界上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一点也不想冒充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之流一样,也在掩飾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⑥

①②③⑥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5—246、289、287、184頁。

④ 轉引自《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1頁。

⑤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05頁。



十 反对社会和平主义

宣傳和平而不同时宣傳革命，就是愚弄群众

列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时也坚决反对否认革命的社会和平主义。大战爆发后不久，列宁就批判了社会和平主义，他说：“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傳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积极意义，这种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像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七一年为了推翻民族压迫、为了把封建割据的国家建成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或是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而可能进行的战争。”“在今天，宣傳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这只能散布幻想，使无产阶级相信资产阶级的仁慈，使他们成为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具。在这方面，认为不经过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谓民主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①

当大战打了将近一年的时候，有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再发表議論，表示希望和平，机会主义者也提出了所谓“民主和平”的口号。列宁指出，百万富翁之所以“同情”和平，是因为他们害怕革命；同时，他们也清醒地知道，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剥夺，所谓“民主的”和平（不割地、限制军备等）不过是空想。而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的拥护者和这一类悲叹和平的社会党人，却在鼓吹这种庸俗的空想。列宁把那些用社会主义的詞句宣揚和平主义的人称做社会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提出和平问题呢？列宁写道，“和平口号可以同一定的和平条件联系起来，也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即不为一定的和平而斗争，而是为一般的和平而斗争。显然，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根本是一个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口号。一般的和平无疑谁都赞成，甚至基特切涅尔、霞飞、兴登堡和暴君尼古拉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每个人都要提出对‘本’民族有利的帝国主义的（即掠夺性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和平条件。我们提出口号的目的，是要在宣传鼓动中向群众说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区别，而不是要用一个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字眼来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②列宁着重指出，“我们的理想就是结束战争，实现国际和平，停止掠夺和暴行，但是只有资产阶级詭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0—141页。

② 《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8—269页。



辯家才会用这种理想来迷惑群众，把它同立即直接鼓吹革命行动割裂开来。”①

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

一九一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一七年初，世界政治形势中开始出现由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转变的迹象。交战国双方都已疲惫不堪，后备枯竭；财政资本通过军事利润已经从人民身上剥了几层皮，再剥就很困难了；人民的不满和愤恨愈来愈强烈，革命情绪日益增长。于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签订和约，以便“和平地”分赃，“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用小小的让步来掩盖他们继续掠夺殖民地和扼杀弱小民族的勾当。和帝国主义政策的转变相适应，社会和平主义大大流行起来。

列宁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原则上的一致性在于，他们客观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不过一部分人为帝国主义效劳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另一部分人为同一个帝国主义效劳，是用空谈“民主”和约，大谈“人道主义、博爱精神、非人间所能有的慈善心（和大智大慧）来粉饰未来的帝国主义和约”②。

列宁说，社会和平主义者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这个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就已经执行的那一政策。和约也是那一政策的继续，它记下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敌对力量之间的一些变化。战争本身并不改变战前政策发展的方向，只是加速这一发展。”③帝国主义所能实现的和平，只能是继续准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平。对帝国主义说来，“战争就是一个像造林业一样的‘工业部门’：要生长起相当高大的树木……即相当丰富的年轻力壮的‘炮灰’，需要几十年的功夫。”④列宁科学地预言：“如果革命不能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成长起来，人类还会经受（在最坏的情况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⑤

阶级压迫还存在的时候，要求“废除武装”，就等于放弃一切革命

在帝国主义战争灾难深重、群众普遍厌战的气氛中，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警制”或“人民武装”的条文。他们的主要论

① 《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1页。

②④ 《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2、275页。

③ 《论“和平纲领”》，《列宁全集》第22卷，第157页。

⑤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第81页。



据是：要求廢除武装，就是最明显、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軍事化和任何战争。

列宁在《无产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論“廢除武装”的口号》等著作中彻底批判了这种幻想，他說：“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①在帝国主义时代，有三种革命战争：第一、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第二、被压迫被剝削階級反对压迫階級、剝削階級的国内战争；第三、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况下，还会有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資本帝国主义国家干涉的自卫战争。“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而且也不可能反对革命战争。”^②

列宁斬釘截铁地写道：

“被压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喚。我們如果不想作資產階級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記，我們是生活在階級社会里，除了进行階級斗争和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权以外，我們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

“在任何一個階級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現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階級总是拥有武装的。不仅現在的常备軍，而且現在的民警——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国，例如在瑞士——也是資產階級反对无产階級的武器。这个道理很簡單，几乎用不着作特別的說明。这里只要指出所有資本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使用軍隊（包括民主共和国的民警在內）镇压罢工者的現象就够了。資產階級用武装镇压无产階級，这是現代資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③

“无产階級只有把資產階級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棄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銷毀一切武器。无产階級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④

列宁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資本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提出“廢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棄階級斗争的观点，放棄一切革命的思想”，“沒有一点馬克思主义的气味”，是“最庸俗的机会主义和資產階級和平主义”^⑤。

同机会主义者的口号相反，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是：“武装无产階級，以便战胜和剝夺資產階級，解除这个階級的武装。这是革命階級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資本主义軍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⑥

十一 反对民族問題和民族殖民地問題上的机会主义

帝国主义意味着資本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条

①②③ 《无产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宁全集》第23卷，第78、74、77頁。

④⑤ 《論“廢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3卷，第94、95、94—95、93、94頁。



件下的扩大和加剧。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掠夺和压迫，激起了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反抗，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大的地区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通常把民族问题看成是欧洲“文明”国家的内部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越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变成了影响全局的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性问题。只有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才能加强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保证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纲领和政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和大战期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等著作中，对党在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纲领和政策作了全面的论证，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民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

机会主义者一方面抹杀各国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同时也抹杀国际上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列宁指出：同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可以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庸俗的机会主义的乌托邦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纲应当提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问题：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①。“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从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或小市民的空想主义（即认为各独立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和平竞争）的观点看来，这种区分是不重要的，但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看来，它却是重要的。”^②列宁还说：“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③

列宁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他说：“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

①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1页。

②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8页。

③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58页。



的国际统一的形成。”^①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指出：“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吞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②

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

列宁反复说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目的是使各民族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主张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全力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列宁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不能不加剧和扩大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它是从帝国主义的后方打击帝国主义、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基础的伟大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同盟军。列宁说：“作为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的弱小民族，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③

列宁非常关注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热情歌颂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英勇斗争。他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写道：“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④ 列宁认为，中国的革命，表明“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⑤。他还在《落后的欧洲和

①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8页。

③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2页。

④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

⑤ 《新生的中国》。《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页。



先进的亚洲》一文中写道：“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①

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同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才能打败共同的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的时候，被压迫民族决不会袖手等待，它们一定会利用这个时机来发动起义。他又说：为了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力量的削弱、它们的战争、它们的对抗性矛盾等等，无力进行干涉）特别有利的配合，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这后一种情况，从无产阶级胜利所期望的和对之有利的观点来看，是最主要的）。”^②“亚洲数亿劳动者，有各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同解放出来。”^③

列宁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马克思鉴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分子，帮助他们举行起义，如果情况许可，还应当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④他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又说：“如果我们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就是兼并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⑤

①③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全集》第19卷，第82—83、83页。

②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30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5页。

⑤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7页。



列宁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只支持民族运动中进步的东西。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争取人民和民族的自主权利，这是进步的，是应当坚决支持的。如果超过这个界限去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正是忘记了这个界限。

列宁教导各国无产阶级要“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①。他指出：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要求冒充全民族的要求并把它提到第一位，他们最关心的是保证自己的利益，“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②“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是空谈民族起义，实际上却同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暗中的反对本国人民的反动勾结”^③。列宁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④

批判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谬论

机会主义者大举攻击列宁所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取消派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借口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联系的加强有进步作用而赞成帝国主义的兼并政策，极力反对实行民族自决。考茨基主义者则仅仅在口头上虚伪地宣称拥护民族自决，实际上完全附和前一类人，认为要求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是“过分的”。托洛茨基站在折衷主义立场，对于到底应当怎样对待被压迫民族的实际问题避而不答，客观上支持了社会沙文主义。俄国的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跟在资产阶级后面，还用“民族文化自治”这一类民族改良主义的口号来同列宁所提出的关于民族自决的革命纲领相对抗。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把所有‘大’国变成了许多民族的压迫者，所以帝国主义的发展也必然会使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思潮划分得更加清楚。”^⑤他斥责了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说：如果压迫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们国家的统治者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

①②④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411、410、412页。

③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55页。

⑤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4页。



手段)，那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列宁揭露了“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反动实质，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工具。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一些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机会主义者主张“民族文化自治”，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是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有利于地主、神甫、资产阶级利用自己在文化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去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

列宁指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实际上就是要使文化教育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领域中分割出来。他说：“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阶级斗争都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学校部门从这领域分出来，第一、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使学校（以及一般‘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第二、处处迫使打破荒谬的和陈腐的民族壁垒和偏见的，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而把学校等等事业分开恰恰是保存、加剧和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①

有些左派社会党人，在民族问题上也曾经有过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再也不会再有民族战争，任何战争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列宁指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显然错误的，而且在政治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人们会从这得出‘解除武装’的荒谬宣传，因为除了反动战争以外，仿佛再也不会有任何战争；人们从这还可以得出对民族运动更荒谬的和简直是反动的漠视态度”。列宁肯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②。

列宁说，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③

列宁坚决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思潮，表现了无比鲜明、无比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革命者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指南。

十二 团结左派，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都形成了三个派别：一、右派，即社会沙文主义者；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即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三、左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①③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9页。

②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页。



当时，各国党内的左派人数很少，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团结成有组织的力量。这种情况，给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困难。因此，当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尽管他们起初为数很少)，用他们的名义向人们提示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面来”^①。显然，能够担当这项任务的，只有列宁。

列宁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这项工作的。当时不仅通讯联络十分困难，就是活动的经费都常常没有着落，甚至连日常生活都不能维持。但是任何困难也难不倒列宁。他不但成功地领导了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和各国革命的左派建立了联系。列宁用极大的力量在瑞士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大战爆发不久(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复刊了，列宁的关于战争的著名宣言即《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就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面。通过这个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列宁的思想冲破重重障碍和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广大群众见面了。在列宁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各国的左派逐渐发展起来，并且从一九一五年起，开始向新的国际团结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国际妇女会议和青年会议

一九一五年三月，在伯尔尼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所属的妇女组织倡议、在国际妇女运动活动家蔡特金主持下召开的。列宁直接领导了俄国代表团的工作，并为俄国代表团起草了提交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但是由于德国代表团的调和态度，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草案没有被通过。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虽然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指责了“保卫祖国”的口号，但只是号召无产阶级“为和平而斗争”，对机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不置一词。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和会上通过的决议草案有原则的差别。他说：“大会上发生冲突的是两种宇宙观，两种对战争和第二国际任务的想法，两种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一种观点认为，第二国际并没有破产，机会主义这种强大的“内部敌人”并不存在，于是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要斥责任何人。另一种观点完全相反，认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来说，再没有比继续与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玩弄党内外交手腕更有害、更危险的了”^②。

在妇女代表会议以后不久，又在伯尔尼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局，创办了《青年国际》杂志。列宁曾经参加这个杂志的工作。

①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7页。

② 《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179页。



列宁谈到这两次会议时说：这些会议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没有制定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团结革命派的重大成就

这个期间，列宁通过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或者用通信的方式，和各国党中的左派革命家取得密切联系，准备召开左派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会议举行之前，列宁写成了《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用俄、德、法等国文字出版，同时还制定了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送给各国党内的左派讨论，帮助欧洲工人了解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态度和国际无产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应当采取的革命策略。

一九一五年九月，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齐美尔瓦尔得召开。出席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中，考茨基主义者和准考茨基主义者实际上占了多数，左派只有八名。列宁出席了会议，组织并领导左派同考茨基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真正的左派占少数，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被接受。经过列宁的斗争，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体现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宣布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保卫祖国”的口号，谴责机会主义者违背斯图加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的决议。

列宁在评论这次大会时指出，会议通过的宣言，在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划清界限方面迈进了一步。同时，宣言也表现了不坚决、不彻底和畏首畏尾，没有说出全部真理，没有直接说到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叛变，没有指出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其原因，也没有向工人阶级直接地、公开地、明确地说明革命斗争的手段。

在表决宣言的时候，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了宣言的缺点，但是他们在宣言上签了字。列宁说：“我们中央委员会是否应当签署这个不彻底的和畏首畏尾的宣言呢？我们认为应当签署。至于我们的不同意见，即不仅是中央委员会的也是代表会议全体左翼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意见，无论在专门决议中，在专门宣言草案中，或在表决妥协性宣言时所作的专门声明中，都直率地提到了。我们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口号和策略。代表会议散发了德文版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我们过去传播，现在传播，将来也要传播我们的观点”。“我们如果拒绝同少数德国人、法国人、瑞典人、挪威人和瑞士人一道迈进这一步，我们就会犯宗派主义错误。”^①

^① 《第一步》。《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6页。



列宁对出席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左派以及他们在会上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在代表会议上，团结一致的国际主义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构成会议右翼的、摇摆不定的准考茨基主义者展开了思想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是代表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代表会议的一个最大的成就。”^①

同时，列宁还指出：由于“齐美尔瓦尔得国际一开始就站在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②。

同考茨基派可以实行某种妥协，但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决不停止斗争

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以后，团结起来的左派，组织了自己的常务局，出版了自己的杂志《先驱》。列宁把反对考茨基派斗争的重心，移到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参加者内部，并为召开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开始进行工作。

一九一六年二月，列宁参加了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给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提案和《关于召开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中的许多条文。

第二次代表会议前夕，列宁指示国外各布尔什维克支部动员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一切力量，选举左派参加会议。

为了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义分子的“民主”和平纲领，给左派一个行动方针，列宁写了《论“和平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认为：“社会党人在争取持久和民主的和平的斗争中的主要和基本任务是：第一、应当向群众阐明群众革命斗争的必要性，经常地宣传这一思想和成立相应的组织；第二、必须揭露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特别是考茨基主义者关于和平问题和关于第二国际在‘和平纲领’问题上‘意见一致’等等虚伪的和骗人的空洞词句。”^③

一九一六年四月，在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代表会议，主要讨论了争取结束战争、无产阶级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左派的力量有了发展。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名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虽然遭到否决，但是，经过列宁的斗争，会议通过了谴责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决议。决议斥责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

① 《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8页。

②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58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ISK（伯尔尼）召开的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全集》第36卷，第393页。



不可能建立持久和平”，“爭取持久和平的斗争，只能包括在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之内”^①，并且警告工人不要相信和平主义的谎言，不管这些谎言披着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外衣。

但是，昆塔尔会议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基本原则。布尔什维克在投票支持宣言和决议的同时，采取了保留的态度。

后来列宁指出：“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如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或放松反对‘考茨基派’、反对马尔托夫辈和切尔诺夫辈……的斗争。”^②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

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以列宁为首的国际革命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只有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才是社会主义的整个将来”^③。

列宁在一封信里写道：“真正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在数量上当真很少吗？请你说说吧！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七八〇年法国和一九〇〇年俄国的例子。觉悟的和坚定的革命者在一七八〇年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在一九〇〇年则是当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当时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只是少数人，顶多只占本阶级万分之一，甚至只占十万分之一。但是过了几年以后，这些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却使群众，使几百万几千万人跟着他们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少数人真正代表这些群众的利益，他们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们准备全心全意为革命服务。”

列宁问道：“人数很少吗？但是从什么时候起，革命者要根据他们的多少来提出自己的政策呢？”^④

事实证明，列宁这个期间的辛勤劳动没有落空。齐美尔瓦尔得派后来虽然被考茨基派破坏而陷于瓦解，但是团结在列宁周围的左派毕竟成长起来了。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正是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成为各国革命群众的真正领袖，成为冲击资产阶级统治的先鋒，成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骨干和核心。

（未完待續）

① 《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的决议》。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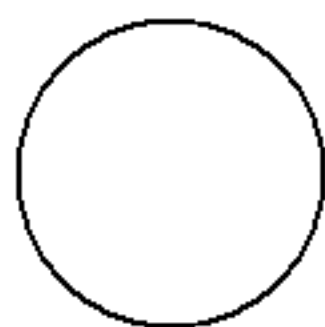
③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60、57页。

④ 《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2页。



红旗

HONGQI



10-11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十一期合刊 ★

目 录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熊 复 (1)

——庆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党四十三周年

充分发挥铁路运输业支援农业的作用 ... 吴 众 (19)

可贵的革命干劲 中共湘潭地方委员会 (24)

物理学研究中的理论和实验 周光召 何祚庥 (29)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

斗争 (续完) 郑言实编 (37)

☆ 五月二十日出版 ☆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庆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党四十三周年

熊 复

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保卫民主自由的斗争，十多年来有了迅速的发展。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粉碎了荷兰殖民主义者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企图重新把印度尼西亚变为殖民地的梦想，击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扶植的国内反动势力对人民革命事业的猖狂进攻。在这一斗争中，印度尼西亚人民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创造了丰富的有益的经验。印度尼西亚反帝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有力地鼓舞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对挫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人民富有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光荣传统。自十五世纪末以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殖民者先后侵入印度尼西亚。从十七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三百多年中，荷兰殖民者逐步蚕食和侵占印度尼西亚。在那黑暗的漫长的岁月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望，从未停止过对外国殖民者的反抗。一九二〇年五

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的历史里程碑。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二六年印度尼西亚人民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给荷兰殖民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所谓荷兰殖民统治千秋万世的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殖民者，仅仅在八天内，就把印度尼西亚交给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法西斯军事占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不顾日本法西斯的残酷迫害，为驱逐日本法西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直到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印度尼西亚人民开始了以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八月革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成立了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是美、英帝国主义和在它们支持下的荷兰殖民者，互



相勾結，一意要扼杀印度尼西亚人民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斗争。当时，英帝国主义者以接受日本投降为名，向印度尼西亚派遣军队，并利用日本法西斯军队，为荷兰殖民者“重新征服”印度尼西亚开辟道路。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调遣军队到印度尼西亚，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动军事进攻，妄图重新恢复它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美帝国主义者则以大批武器和金钱供给英、荷殖民者，极力支持它们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军事进攻。荷兰殖民者一方面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加紧军事进攻，实行经济封锁，一方面在“和平谈判”的幌子下，采取分裂印度尼西亚抗荷阵线的团结的手段，拉拢和收买印度尼西亚的妥协派和投降派，企图内外夹攻，颠覆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荷兰殖民者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叛徒先后建立了东印度尼西亚等十五个傀儡邦，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相对抗。

为了保卫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以苏加诺为代表的其他爱国民主力量一起，在“一旦独立，永远独立”等战斗口号下，发动人民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侵略的武装斗争。这一斗争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和进步舆论的支持。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打击下，英、荷帝国主义用军事手段扼杀共和国的阴谋遭到失败。但是，当时以右翼社会党人沙里尔为首的政府执行妥协和投降的政策，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同荷兰殖民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林牙椰蒂协定”。沙里尔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印度尼

西亚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人民的压力下，一九四七年六月沙里尔政府被迫倒台，共产党人沙利佛丁领导组成了新的政府。

荷兰殖民者没有达到迫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就范的目的，并不就此罢休。沙利佛丁政府成立不久，荷兰殖民者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印度尼西亚发动了全面性的殖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帝国主义除了继续供给荷兰殖民者以大量的武器、贷款外，还派遣军事人员为荷兰殖民者修建机场，直接帮助荷兰殖民者完成各种军事部署。美帝国主义还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定，成立了美、比、澳三国“斡旋委员会”，公然干预印度尼西亚内政，拉拢印度尼西亚的反动派，策划颠覆沙利佛丁政府。当时，沙利佛丁政府曾领导共和国军队和游击队对荷兰殖民者的武装进攻进行了坚决抵抗。不幸的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压力下，沙利佛丁政府在一九四八年一月解体，政权落入了反动的哈达内阁的手里。

哈达政府执行亲帝国主义、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政策，同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这个政府一成立，就遭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坚决反对。广大的人民群众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他们提出了改组政府、坚持印度尼西亚完全独立和改善生活的要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党派、团体，反映广大人民的愿望，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召开会议，制定了“民族纲领”，要求改组哈达政府。

为了更有力地领导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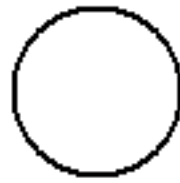
和国内反动派作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结了八月革命以来党的活动的经验，通过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决议。艾地同志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发展》一书中指出，“《新道路》的决议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更好地进行工作奠定了基础。”“《新道路》的决议是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的重要的第一步。”“《新道路》决议中所阐明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新政策有力地重新唤起了群众的斗争，因此也就有可能促使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

哈达政府为了阻止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继续发展，破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团结，在荷、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制造了血腥的“茉莉芬事件”。哈达政府捏造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茉莉芬“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国家”的谎言，并以此为借口到处追捕和杀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对猖狂的白色恐怖。在这一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表现了高度的英雄气概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为维护民族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许多著名领袖和重要干部壮烈牺牲，约一万名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

其他阶层群众及其领导人惨遭杀害。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革命暴行，并没有能扑灭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的怒火，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发展。

荷兰殖民者为了把印度尼西亚人民完全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实现它早就提出的妄图全部吞并印度尼西亚的所谓“联邦政府”的罪恶计划，在紧接着“茉莉芬事件”之后不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又悍然向印度尼西亚发动了大规模的殖民战争，企图用武力逼迫印度尼西亚人民投降。荷兰殖民者的武装侵略，再一次激起了印度尼西亚爱国军民奋起抗战。许多被关在集中营中的共产党员，得知荷兰军队进攻以后，千方百计地逃出集中营，奔赴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前线。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荷兰殖民者展开的广泛的游击战争，给了荷兰殖民者以新的沉重的打击。当时，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在东南亚的侵略利益，继续操纵联合国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干涉，胁迫印度尼西亚政府接受荷兰殖民者的无理要求。代表印度尼西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哈达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背叛民族利益，在美帝国主义以联合国名义的导演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同荷兰殖民者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的“圆桌会议协定”。

关于“茉莉芬事件”和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发动的第二次殖民战争，艾地同志一九五三年在《走向新的印度尼西亚》一文中做了这样的论述，他说：“茉莉芬挑衅事件的目的



的，就是企图粉碎工人运动及其领导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而使独立运动脱离它的革命的领导以至全部瘫痪。以后的事实证明，茉莉芬挑畔事件也是发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第二次殖民战争的一种准备。这次殖民战争是为了施加压力，强迫印度尼西亚人民接受卖国的协定，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印度尼西亚方面的哈达、苏丹·阿卜杜尔·哈密同荷兰王国方面的馬塞芬在美帝国主义代表美尔勒·柯契兰监督之下在荷兰签订的圆桌会议协定。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就是这样背叛了民族利益；他们宁愿将印度尼西亚奉献给荷、美帝国主义，自己充当其忠实的奴僕，却不愿同共产党人和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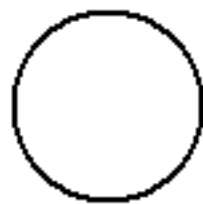
上述事实表明，从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开始，到一九四九年签订“圆桌会议协定”这一历史时期中，印度尼西亚出现了极为曲折复杂的政治局面，交织着严重的民族的、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帝国主义发动血腥的殖民战争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制造分裂、国内反动派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分裂、反对投降的斗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绞杀革命力量、制造白色恐怖的反革命战争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反白色恐怖的自卫战争；等等。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印度尼西亚人民高举着八月革命的光荣旗帜，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为完成八月革命的任务而英勇

奋战。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帝斗争的革命精神，受到世界人民的敬佩和赞扬。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暂时遭到了挫折，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有益的經驗教训。

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发展》一书中，总结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一段时期中的經驗教训时指出：

“八月革命（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已经遭到失败，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面临这次革命时还没有总结出它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經驗，而且在武装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没有經驗。”

“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但是它已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了统一战线的經驗。这次革命给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重要的經驗，即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的經驗；在一定情况下，它能够参加革命及采取坚决的态度，站在革命方面；但是，在别种情况下，它会动摇和叛变。因此，无产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一贯地不断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到革命方面来，但也必须防备他们背叛革命的可能性。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大大地影响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党的进展或后退以及革命的进展或后退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相反地，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党的进展或后退以及革命的进展或后退。”



“在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过程中，党不可以放棄其独立性，并且不可忽視最可靠的、为数最多的同盟者，即农民。

“这个革命也已經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关于党的建設問題的經驗，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更了解印度尼西亚社会情况、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特点和規律，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有可能来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并学习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實踐結合起来。

“在革命中，武装斗争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这也是一个經驗。党的发展除了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統一战綫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进展与后退对統一战綫和党的进展与后退是很有影响的。”

二

一九四九年“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以后，印度尼西亚人民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形势。

“圓桌會議协定”的簽訂，使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变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虽然荷兰殖民者表面上承认印度尼西亚享有所謂“自治的权利”，但事实上，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政权，完全为帝国主义首先是荷兰殖民者所操纵。印度尼西亚变成了所謂“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的一个成員。荷兰殖民者的民政和軍事官員繼續控制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机构与军队。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被荷兰殖民者所控制。重要的經濟资源仍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掌握。占印度尼西亚国土百分

之二十、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有着丰富矿产尤其是有着鋤矿的西伊里安，仍完全为荷兰殖民者頑固地霸占着。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圓桌會議协定”为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侵入印度尼西亚大开方便之門。在“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以后，美帝国主义利用印度尼西亚反动政府，把一系列掠夺和奴役性的协定强加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头上，擴張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經濟势力。美帝国主义更加蛮横无理地干涉印度尼西亚內政，并以武器、金錢援助印度尼西亚反动势力，鎮压印度尼西亚革命力量。事实清楚地表明，美帝国主义愈来愈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最危险的敌人。

代表印度尼西亚封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社会党和馬斯友美党，控制着中央政权和武装部队。它們对外倒向帝国主义，忠实地履行“圓桌會議协定”，对内坚决维护封建土地制度，执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印度尼西亚，进步的爱国民主力量和反动的民族投降主义力量之間、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間的矛盾和斗争，在更加尖锐地发展着。

在这种形势下，廢除“圓桌會議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成为印度尼西亚全民族的要求。在“圓桌會議协定”簽訂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随即发表声明，揭露“圓桌會議协定”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应当动员一切力量，爭取印度尼西亚的完全独立。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廢除屈辱的、



不平等的“圆桌会议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印度尼西亚临时议会就收到了要求废除“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等提案或决议共一百六十三件，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提案或决议共三百九十四件。印度尼西亚大多数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都把对于上述两个重大政治事件的主张列入自己的纲领中。印度尼西亚爱国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决议、声明或宣言，坚决表示为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而斗争，而且这种呼声一年比一年强烈。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以政治性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展开了斗争。在革命工会和革命农会的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在外国（主要是荷兰）企业中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和占地运动。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领导了七十万外国（主要是荷兰）农园企业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领导下的农民占地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根据一九五四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一项法令中的统计材料，在印度尼西亚有十五万以上农户（七十五万多人）参加了占用外国农场土地的斗争，农民占用外国（主要是荷兰）农园的土地，仅在爪哇岛，就占该地农场企业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荷兰殖民者被迫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宣布取消“印度尼西亚荷兰联邦”，废除“圆桌会议协定”中关于强迫印度尼西亚同荷兰殖民者进行军事、

外交和文化“合作”等协定。这一切说明，围绕着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印度尼西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圆桌会议协定”签订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新的形势看到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恢复党的合法地位的可能性。党在这个时期一开始，就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一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形成了以艾地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组成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章，这就加强了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百倍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完全民族独立的斗争开始了新的高涨，由于党在这个时期一开始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同进行党的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因而使民主力量日益发展，反动力量日益孤立。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一起，同印度尼西亚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粉碎了苏基曼政府“八月大逮捕”的阴谋，并推翻了 this 政府。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印度尼西亚组成了没有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参加的、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总理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反帝爱国方面采取了某些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愿望的措施。

一九五四年三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这次代表大会解决了印度尼西亚革命一切基本的和重大的问题。代表大会的总结指出，印度尼西亚要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出路在于改变帝国主义者、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一方同人民另一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出路在于唤醒、动员和组织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群众。代表大会规定两项紧迫任务：第一，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封建主义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第二，继续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这次代表大会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飞跃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实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任务方面进行了艰巨卓越的努力。它继续为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收复西伊里安而进行斗争，增强自己同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团结。印度尼西亚爱国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革命反人民阴谋不断受到打击，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一九五五年，根据苏加诺总统提出的“以团结全民族力量来收复西伊里安”的号召，在雅加达举行了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出席大会的包括七百多名由各地区选举出来的代表，各党派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以及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大会通过了为争取解放西伊里安而斗争

的纲领和宣言。纲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调整人民力量的四项决议。其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是：成立西伊里安省政府；断绝同荷兰的外交关系；废除“圆桌会议协定”；没收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所有财产；削弱并扫除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势力；加强民族经济；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一切危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人民利益的协定；等等。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的纲领和宣言，反映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基本愿望，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一九五六年，第二届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单方面宣布全部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并且取消对荷兰数达三十六亿六千一百万荷盾的“债务”。“圆桌会议协定”的废除，使得印度尼西亚除西伊里安外的全部国土基本上取得政治独立。这一斗争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进一步为清除荷兰殖民主义势力、收复西伊里安而斗争。

一九五七年，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一九五七年十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全国成立了解放西伊里安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军政当局代表外，还包括群众团体的代表。在解放西伊里安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千百万群众立即在全国各地连续不断地掀起了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十月二十八日，雅加达有十万名青年举行了火炬游行。十一月十日以后，印度尼西亚各地人民纷纷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单是十一月十八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就有一百多万人参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底，在美、荷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大会否决了关于西伊里安問題的提案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苏加諾总统领导下，采取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在全世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支持下，鏟除荷兰殖民者侵略势力的“另一条道路”的斗争方針，展开了接管荷兰企业的运动，使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一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起着先锋作用。斗争一开始，所有在荷兰企业工作的工人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工人群众同其他阶层的爱国人民在接管荷兰企业的斗争中，克服了荷兰殖民者的各种反抗和破坏，接管了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种植园、工矿企业、銀行和保險公司等。现在荷兰資本除少数与其他外国合营的企业外，都已被印度尼西亚政府收归国有。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印度尼西亚反帝爱国力量的团结日益巩固和增强，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及其走狗陷入了愈加孤立的境地。荷兰殖民者为了保住它在印度尼西亚殘存的殖民利益，顽固地拒絕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美帝国主义者把西伊里安当作它和东南亚条约組織在西南太平洋的重要軍事基地，当作它对印度尼西亚进行軍事威胁、顛复活动的跳板。它一直通过各种阴谋手段，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

新老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勾当，激起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举国一致的愤怒，他们愈来愈坚决地要求解放西伊里安。一九六一年十

二月十九日，苏加諾总统頒布了解放西伊里安的各项命令，宣告同荷兰殖民者进行坚决的、全面的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和全体武装部队准备解放西伊里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民主、团结和动员”的战斗口号，号召全体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鋤”，大力支持并贯彻执行各项命令。印度尼西亚人民热烈响应了苏加諾总统的号召，各地报名参加解放西伊里安的人数达到五百万人，两千名志願軍远征西伊里安，同西伊里安人民游击队配合作战，先后占领了西伊里安的一些城镇。

印度尼西亚人民武装力量的英勇作战，連續給荷兰殖民者以打击，使荷兰殖民者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荷兰殖民者终于被迫同印度尼西亚进行談判，并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关于西伊里安問題的协定。根据会谈协定的規定，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以前，作为荷兰把西伊里安行政权移交給联合国临时执行机构管理的第一阶段，在这以后，这个机构的行政长官将有权在任何时候把全部和一部分行政权移交給印度尼西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西伊里安将降下荷兰国旗，升起印度尼西亚国旗。

在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关于西伊里安問題的协定签订后，艾地同志指出：这个协定是一项艰巨工作的开端，“經驗提供了許多教訓。联合国的管理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管埋”。艾地同志強調說：“当帝国主义签订协定的时候，它們并不心甘情愿，它們当时已有



了破坏这项协定的全面计划。人民对帝国主义存戒心是永远正确的。”他号召人民继续执行苏加诺总统的三项命令，为完全解决西伊里安问题而斗争，避免使西伊里安重蹈刚果的覆辙。

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继续坚持斗争，今年五月一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接管了西伊里安的全部行政权。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在收复西伊里安、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正如苏加诺总统指出，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的胜利，是印度尼西亚采取全面对抗政策和执行三项命令的结果。他说，我们的口号是：“我们爱和平，但是我们更爱独立”，对帝国主义必须进行斗争。他还说，虽然西伊里安已经解放，但是，完成革命还要走很长的路，只要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还存在，就必须继续斗争。

三

印度尼西亚人民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是同新老殖民主义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外交上的严重斗争，同时又是一场反叛乱、反颠覆的残酷的军事斗争。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妄图重新奴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侵略活动，接二连三地遭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沉重打击，依附于它们的沙里尔、哈达、纳席尔、苏基曼等几届反动内阁，在人民的压力下都先后倒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处于连续失败的困境下，就以公开发动军事叛乱和颠覆活动的手段，妄图

扑灭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豢养和指挥着印度尼西亚十几种武装匪帮集团进行叛乱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国运动”（在爪哇）、“南摩鹿加共和国”（在摩鹿加群岛）和“全亚齐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在苏门答腊北部）等叛乱集团。一九五六年，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更先后策动、支持卢比斯、侯赛尼、西姆波朗等反动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和武装叛乱。一九五七年，美帝国主义支持“全面斗争约章”集团在北苏拉威西发动叛乱。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唆使右翼社会党和马斯友美党在中苏门答腊和北苏拉威西等地区进行武装叛乱。

铁的事实证明，美、荷、英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印度尼西亚各种叛乱活动的罪魁祸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直为印度尼西亚叛乱集团运送大批军火、粮食，提供活动经费，派遣军事教官，指使叛乱集团破坏国内经济，杀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等等。不仅如此，美国第七舰队还曾试图在北干巴鲁登陆。美国甚至还派军事人员驾驶飞机在印度尼西亚东部若干地区滥肆轰炸，直接参加叛乱。美帝国主义者大肆叫嚣，诬蔑印度尼西亚人民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威胁着“西方在太平洋的防卫线”，宣称美国“可能不得不再为争夺这个缺口而战”，并且说什么“印度尼西亚的分裂活动将使收复西伊里安的计划不可能实现”。

美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者所制造的连续不断的叛乱，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遭到严重



的困难。可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低估人民的力量，錯誤地估計形势。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对帝国主义策动的武装叛乱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艾地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发表声明，全力支持苏加諾总统采取的坚决镇压叛乱分子的方針，主張进一步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支持中央政府粉碎叛乱分子的阴谋。在保卫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事业的召唤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地投入了平息叛乱的战斗，許多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此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印度尼西亚人民终于赢得了平息叛乱的重大胜利。策动叛乱的右翼社会党和馬斯友美党自食恶果，在一九六〇年八月被宣布解散。

印度尼西亚人民虽然已经取得了平息叛乱的重大胜利，但是，反革命叛乱的社会根源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势力并没有被消灭，它們顛复和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活动也絕沒有停止。美帝国主义者还在印度尼西亚极力扶植它的政治代理人，并利用当前印度尼西亚国内存在的經濟困难，加紧破坏活动。在經濟方面，美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大力进行渗透活动，美国壟断資本今天已經占外国在印度尼西亚投資的第一位。此外，它还向印度尼西亚人民散布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文化。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在印度尼西亚推行的新殖民主义，决不会放松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破坏活动。美帝国主义現在已經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危險的头号敌人。印度尼西亚人民面临着反对美帝国主

义的更加复杂尖銳的斗争。

四

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叛乱斗争的同时，展开了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的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向主張，为了組織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完成民族革命任务，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竭盡全力解决人民衣食問題。党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农民为摆脱封建土地制度束縛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土地归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等基本口号，认为革命的农民运动当前是以展开“六好运动”（包括减租、减息、提高雇工費、提高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文化和政治水平）为中心内容。广大农民群众首先是雇农和貧农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包括反对外國地主夺占农民的土地；要求贯彻执行苏加諾总统頒布的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法令，争取实现六四分配（地主最多得四成，农民至少得六成）的要求；沒收那些支持或参加叛乱集团的地主的土地，滿足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的需要；要求实行乡村政权民主化；等等。通过这些斗争，成功地把农民动员起来結成了反对地主的广泛的陣綫。

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为维护工会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斗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工会运动中的最大成就是，革命的中央职工会組織——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更加壮大起来了，有势力集团瓦解革命的中央职工会組織的活动已經遭到失敗。在实现解放西伊里安的人民的三項命令的範圍內，中央职工会組織也取得了建立合作联合書記处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全国不少城市的工人和其他的劳动人民，通过罢工等斗争方式，提出了增加工資、改善待遇、防止物价高漲、反对无理解雇等要求，这些斗争获得广大社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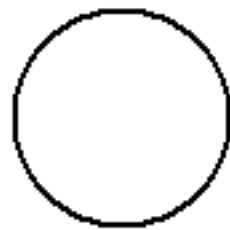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二月，苏加諾总统宣布了他的以建立包括宗教信仰徒、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三种力量的互助合作內閣为内容的方案，一般称为“苏加諾总统方案”。这个方案公布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立即表示贊同，并且号召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方案和为实现該方案而努力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指出，“苏加諾总统方案”要求成立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互助合作內閣，这个方案要求有更健全的民主，它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完成民族革命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完全实施，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在彻底完成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方面跃进一大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断揭露和批判印度尼西亚反动派破坏“苏加諾总统方案”的企图，认为要实施“苏加諾总统方案”，就必须不断宣傳这个方案，不断地把人民力量組織起来，去改变力量的对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指出，成立互助合作內閣，已經成为日益强烈的要求。艾地同志在今年二

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說：“从一九六二年末到一九六三年初，成立‘納沙貢’* 內閣的要求是很强烈的。在这段时期內，成立‘納沙貢’內閣的要求第一次得到‘納沙貢’的支持。在此之前，只有共产党人、进步的群众和加諾兄談到这个問題（加諾兄在总统方案中用了‘互助合作內閣’一詞）。現在，成立互助合作內閣或‘納沙貢’內閣的要求也得到民族主义政党（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印度尼西亚党，等等）、宗教政党（白尔蒂伊斯兰教党以及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联盟党的地方领导人，等等）的支持。印度尼西亚新聞工作者协会也支持这一要求。所有这一切表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表现了我国的政治局势的新发展，表现了人們对国家大事、人民的事业以及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的認真負責的态度。”艾地同志說：“要求成立‘納沙貢’內閣呼声的高漲使得反动派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也說明了中間力量向左发展，进步力量更加壮大和巩固。这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团结更加强大了。”

五

多年来，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結果表明，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不管新

* “納沙貢”是印度尼西亚文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主义者的縮写。



老殖民主义者及其扶植的反动势力对人民的革命怎样进行镇压和反抗，或者采取什么样的阴谋手段，最终必然要归于失败。革命的人民的力量尽管在斗争中会遭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但是，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敢于胜利，就一定能够战胜和必将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现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正在继续为完成八月革命的任务而斗争。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所取得的胜利只是初步胜利，当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还面临着下列三项最紧迫最实际的任务：

第一，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这就是要毫不懈怠地加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西伊里安的力量，使西伊里安不致于重新变成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地区，不致于被帝国主义者变为自由进行投资的场所，不致使帝国主义一旦认为有必要时就能借口“保护他们在该地区的财产”而派遣军队到那里去。在巩固治安成就方面，进步人士，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把治安问题当作是自己的问题，因此必须和负责治安的有关方面进行良好的合作。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同时必须给人民以自由，使人民无论在提高生产方面或者在打击反革命方面能够发扬战斗精神。必须成立有“纳沙贡”参加的协助革命领导协商机构，以协助苏加诺总统在没有战时戒严状态的情况下行使最高职权，以完成现阶段的革命；同时，还必须巩固民

族阵线，反对反动分子破坏民族阵线的企图。维护民族阵线同维护政党制度不能分开。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民族阵线中团结起来，是为了在执行共同纲领，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治宣言》时团结起来，并不是要把不能溶化在一起的东西溶成一体。现在在印度尼西亚有十个政党，应当由哪一个党来当先锋，这要由人民来决定。只有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为人民的斗争的忠心耿耿的党，才能取得这种先锋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主观愿望，也不是根据什么法律或条例所能决定的。民族阵线已经而且将要起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生活中将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克服经济困难。在整个经济建设方面，必须实行以农业和农场为基础、以工业为骨干的原则。只有实行这一原则，印度尼西亚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粮食和衣着的问题，工业化的基础才能奠定，对外国的依赖状态才能消除。克服印度尼西亚经济困难的真正出路，并不是向外国乞求借款，或者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变成投在印度尼西亚的外国资本的佣人，而是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这就是说，必须敢于通过牺牲城乡少数大剥削者即官僚资本家、买办和地主的利益，而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改变国内的社会制度。在克服目前经济困难的问题上，在印度尼西亚存在的三种力量对解决经济困难有着三种方案。顽固势力或反动势力认为，只有引入外国资本和实行以帝国主义贷款为基础的“稳



定經濟計劃”，才能克服經濟困難。進步力量認為，只有通過動員印度尼西亞所有人民的力量和天然資源，才能克服經濟困難。這個方案已經被正式採納為國家的指導方針。進步人士認為，真正的經濟援助只能從同我們一起進行反帝鬥爭的那些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那裡取得。這只不過是援助而已，不是決定性的。中間勢力承認動員全國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害怕這條路充滿困難，需要很長時間，因此他們願意謀求“沒有危險”的外國援助和投資。這個方案看起來同頑固勢力的方案不同，但是，實際上這兩個方案沒有什麼不同，因為他們中間有些人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取得外援，而不區別什麼樣的外援，對帝國主義的所謂“援助”沒有警惕性。現在中間勢力的左翼有了新的覺悟。他們認識到，只有成立“納沙貢”三種力量的互助合作內閣，才能有力地實施克服經濟困難、發展民族經濟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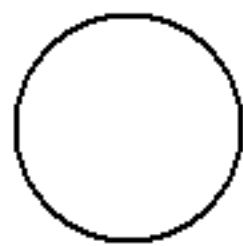
第三，反對新殖民主義。這就是在反對荷蘭帝國主義這個敵人的同時，要特別注意反對美帝國主義這個最危險的頭號敵人。荷蘭帝國主義仍然是印度尼西亞人民危險的敵人，因為它仍然擁有為數相當大的投資，因為它還要就已被接管和收歸國有的企業的問題提出無理的要求，因為它還保有舊的政治關係，並力圖改頭換面重新建立這些關係。最近，英帝國主義出來推行它的馬來西亞計劃，西德和日本帝國主義也出來實行他們的經濟滲入，這一切已經引起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警惕。但是，現在在印度尼西亞進行活

動的所有的帝國主義當中，印度尼西亞人民最危險的頭號敵人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目前正千方百計地擴大和鞏固它在印度尼西亞已有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影響。美帝國主義正在利用“穩定經濟計劃”的名目，企圖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變相的“爭取進步聯盟”。美帝國主義還在向印度尼西亞兜售所謂“和平隊”。從美帝國主義在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影響，從它的投資，從它的軍事和文化滲入來看，它都超過其他帝國主義。因此，反對新殖民主義危險的鬥爭，首先就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

艾地同志指出，對於以上三項任務，它的核心應當是克服經濟困難。他說，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決經濟的困難，就不可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勝利，同時，頑固派，首先是右翼社會黨人和官僚資本家，就有可能更加容易地通過一些重要官員向政府提出他們的新殖民主義的經濟方案，而中間派也會很容易圓圖吞棗地接受那種新殖民主義經濟方案。

六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印度尼西亞人民一起，經歷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成立以來長期革命鬥爭的考驗。印度尼西亞人民同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進行了反復的較量和鬥爭，黨也就從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黨科學地分析了印度尼西亞的階級關係，指出，在印度尼西亞存在着三種力量和三種方案。“第一種力量，頑固力量，也就是反動力量；他們



的方案要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仅仅在形式上独立，而在实际上则向帝国主义屈服，并且维护外国大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的国家。他们说这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目的。第二种力量，进步力量，也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他们的方案要求从印度尼西亚土地上清除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同时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坚决贯彻‘土地归农民’的口号。第三种力量，中间力量，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方案是反帝反封建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要求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变革，使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从这种基本分析出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尽力和不倦地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力量”的政治路线。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是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行这一正确的政治路线分不开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强调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党非常重视农民工作，它认为，农民是重要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固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人民斗争的基础，是全体人民反对外国敌人斗争的基石。在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向革命人民发动了法西斯的恐怖镇压，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当时党在农民中又没有强大的依靠，致使革命力量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鉴于这种历史经验，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经常向自己的干部阐明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使他们懂得，印度尼西亚的人民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土地革命，没有占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农民的积极参加，不建立起强大的和巩固的工农联盟，就谈不上人民的胜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树立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进行有效的领导。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说：“我们仍然坚持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结论，即‘当我党还不能组织和领导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时候，就不可能谈到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族统一战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制定了革命的土地纲领、农村工作的阶级路线和政策，并派遣党的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培养农民干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农民组织，在农民中间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经过这样的艰苦努力，印度尼西亚革命农民的组织力量空前壮大，党在农民中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并同农民建立了共呼吸同命运的血肉联系。

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地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有过合作和分裂的经历，有了正面和反面的丰富经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强调指出，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阶段中，“党必须大力地反对过



高估計与民族資產階級的联合而过低估計工人階級的領導与过低估計工农聯盟的右的偏向”，防止“拋棄党的獨立性的危險”和“把自己与資產階級溶化在一起的危險”；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左’的偏向，防止宗派主义”。根据这种精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处理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关系时，支持并推动民族資產階級采取进步的措施，批評它的动摇态度，必要时反对它的反动措施。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民族資產階級統一戰綫关系中的一个现实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参与資產階級政府和議會的活动。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并根据这样的主張进行工作和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中这样写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目的是把印度尼西亚人民團結在一个民族統一戰綫之内，并通过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不把它在議會中的工作看作是最主要工作，而且也不把議會工作看作是唯一的斗争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忽視議會选举和議會斗争，也不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今后在人民民主政府組成以前的各届政府都采取同一的态度。完全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馬克思主义对于具体情况和力量对比的分析。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經参加并将繼續最积极地参加議會选举和議會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充分了解它的政治責任，它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議會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每一届政府并不是

采取一視同仁的态度。在一定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政府并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它，在別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政府，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参加政府。”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社会和印度尼西亚革命》一书中也明确地指出：“由于人民的敌人使用所有的斗争形式，因此，我們同样必須善于利用所有的斗争形式。我們必須善于利用公开和合法的、为宪法、法律和条例以及社会風俗习惯所允許的一切活动形式”。“当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工作不仅仅是議會工作，而且首先是包括在群众中的工作，即在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和劳动群众及其他民主群众中的工作。所有这些工作，無論是在議會內和議會外，都是为了改变以帝国主义者、地主階級和买办資產階級为一方和以人民力量为另一方的力量对比。在利用这个斗争形式的时候，为了达到党的目标，我們必須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成就的取得，是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党的建設工作分不开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为了使党的政治路綫变为现实，“最中心的问题是党本身的问题，是党的建設問題。”十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直为建設一个全国性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完全巩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了艰巨的努力，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十分重視在自己队伍



中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強調把党的建設工作重点放在思想建設方面。它对党员提出的学习和工作的口号是：“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熟悉情况。”它善于激发党员和干部学习政治理論的热情，善于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党员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它善于总结本国革命經驗，也善于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批判性地吸取思想力量，以提高全党的理論、政治思想水平。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理論和实际相結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进行自我批評的工作作風，确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把轰轰烈烈的工作同埋头苦干的工作結合起来，把鼓动工作同在組織、教育、政治和意識形态方面进行实际的、深入的和細致的日常工作結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方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依靠这种群众路綫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使党的綱領和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从而把广大的群众紧紧地团結在自己的周圍。

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长期重視党的建設，由于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批評和自我批評等項原則，全党形成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团結一致，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已經得到巩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組織建設同思想建設的发展是相适应的。現在，它的党员人数已經从一九五一年不到一万人增加到二百多万人，党的組織已經遍布全国各地。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印度尼西亚共产

党不愧为一个始終保持着革命朝气的无产阶级先鋒队。正如艾地同志所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像一棵根多而深深扎入土中的枝壮叶茂的榕树一样茂盛地生长着”。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同时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党。艾地同志說：“自党建立那天起，直到今天，而且还可以断然地說在将来，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給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生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将继续不懈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一致和崇高威望而斗争，成为这个强大的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言論和实际行动中贯彻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为它们相信，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主、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运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既是爱国者，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作为爱国者将继续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条件中去而斗争，換句話說，我們說这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并且我們在这个基础上創造性的确定我們的党的政策、策略、斗争形式和組織形式。这是党同群众和全国人民日益团結的基本保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向根据这种精神，在指导国内革命的同时，积极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始終坚持和坚决維護莫斯科宣



言和莫斯科声明。它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它指出，宣言和声明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普遍斗争方面，必须忠实地遵守和执行的共同指南和纲领，在实践中忠于宣言和声明是衡量一个共产党的纯洁性的主要尺码。艾地同志在今年以来的几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着反对修正主义的光荣传统，从它建立的时候起就反对修正主义。他说：“我们的党作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将继续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停止反对修正主义就意味着不再走革命的道路，意味着不去认真的对帝国主义和其他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而这样行动的党在它自己还没有发现它已经背弃人民以前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他还强调，不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活动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必须不断地揭露和斗争；击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就是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热爱和平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决揭露和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把大笔美元花在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身上，以使他们能够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和团结，阉割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因此，必须“对它展开积极的斗争”。不久以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雅加达委员会和棉兰委员会分别举办的群众大会上，重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决心。他说：我们对南斯拉夫的批评不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的范围。全世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强调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并规定这样做是一种义务。假定莫斯科声明中没有规定这个义务，印度尼西亚革命者也还是要批判他们。为什么？因为如艾地同志所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南斯拉夫的批评决不是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具体地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正在破坏亚非工人的团结。具体地说，他们曾企图破坏“科伦坡会议”。具体地说，他们正在鼓励马来西亚。具体地说，他们正在同印度尼西亚的右翼社会党分子进行合作。这种证据还能举出一些来。

为了使全体党员坚持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优良传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再用它的长期斗争的经验向党员强调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并且明确指出，要坚持这一原则，党就必须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不断地进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教训》一书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必须结合起来。这证明了下面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没有



革命的理論，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沒有实践，理論就沒有用。为了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須永远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具体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艾地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又說：“长期以来，即自从我們的党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重建以来，我們就一直对古典教条主义展开斗争，因此今天我們的同志們已經了解，要硬搬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上的‘現成’公式，而不考虑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情况，那是錯誤的。在最近这段时期，我們成功地同現代教条主义，即对各兄弟党現在的經驗、結論和綱領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的作法进行了斗争。当然，我們必須研究各兄弟党最近的經驗、結論和綱領，但是其目的并不是要 不加批判地、愚蠢地和不負責任地把它們变成我們自己的党的东西。这样一种态度，即这种現代教条主义的态度，会很容易地使我們的党同群众和民族脫离，并且使我們的党不可能成为保卫群众和民族利益的战士。”艾地同志还強調說：“古典的和現代的修正主义与古典的和現代的教条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对这两者都必須不断地加以反对。这两者都是危險的，但是最大的危險就是我們不去反对它。”

四十三年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經歷了一條漫長的、曲折的和光榮的斗争道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路綫正确、團結一致、密切联系群众、富于战斗力和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堅強地站在印度尼西亚

人民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并显示出偉大的、模範的先鋒作用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它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中的威信和影响日益增长，并且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支堅強队伍，它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具体革命实践成功地結合起来，为丰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論宝庫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現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成为資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共产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党之一，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威望正在与日俱增。

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我国人民解放台湾和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主張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我們两国人民有着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经历。我們两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和万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基础上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亚非团结的共同事业中，两国人民的互相支持和合作日益加强。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起。



充分发挥铁路运输业支援农业的作用

· 吳 众 ·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联系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纽带。铁路一方面把农村提供的农产品运往城市，一方面把工业部门提供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运往农村。它通过旅客和货物的运输，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其他行业面向农村的时候，铁路部门的工作，也必须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大力支援农业，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一，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全面安排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业必须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我国农村是一个由五亿多农民组成的、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的广阔的国内市场。随着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贯彻执行，随着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工作的广泛开展，我国农业必将有更大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也必将出现新的高涨。在这种新形势下，农业为工业和城市提供的商品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劳动力将愈来愈多，农村所需要的工业品也将

愈来愈多，城乡物资交流将日益活跃。这样，就必然对铁路运输提出新的要求，铁路部门支援农业的作用也会愈来愈显著。

大力支援农业，也是铁路运输业本身发展所必需。从我国铁路货运量历年来的变化情况中，大体可以看出，上一年农业收成较好，农业产值增长较快，第二年铁路货运量就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不仅因为农业丰收直接带来了农产品运量的增多，而且还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的活跃，从而带来了铁路货运量的增长。

不仅铁路运输，而且铁路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同农业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铁路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的发展，要求相应地扩大铁路网，不断地用新技术改造原有铁路；同时，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发展，这就给铁路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铁路部门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坚决地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积极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是铁路部



門的光荣任务，也是铁路建設蓬勃发展的自由之路。

铁路运输业必須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但是，并不是說就可以忽視工业运输的需要。铁路部門必須对铁路运输进行全面安排，恰当地处理农业运输同工业运输的关系。铁路是为整个国民經济服务的，強調铁路运输大力支援农业，正是为了更好地为整个国民經济服务。随着工业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以后，支援农业的工业品就会大大增加，铁路部門应当把这些工业品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对于其他工业品的运输，也要进行合理的安排，否則，就会影响工业生产的发展，其結果就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所以，当铁路运输业把支援农业的运输放在重要地位的同时，仍然要十分重視其他工业品的运输。

第二，恰当地处理成批的、大宗的、长途的貨物运输同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的关系。

铁路部門要恰当地处理成批的、大宗的、长途的貨物运输同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的关系。铁路运输是整个社会运输的一个环节，它同其他运输有合理的分工，一般地說来，铁路部門担負的是成批的、大宗的、长途的貨物运输任务；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任务，主要是由其他运输部門担負的。但是，铁路部門也要适当地担負起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任务。这是农业对铁路运输业的要求。因为铁

路絕大部分处于农村，农业为城市和工业提供的农产品，多半是分散的、零星的物资，运程較短。因此，铁路部門对于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应当予以适当的重視。

物资运输的过程，就是物资从分散到集中、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所謂大宗物资，大都是由零星的物资集中起来的；零星的物资，又大都是由大宗的物资分散开来的。比如，农业提供給城市和工业的农产品，要从广闊的、分散的农村集中起来，集零为整；工业为农业提供的工业品，要从城市分散到农村，化整为零。尽管铁路运输同其他运输有分工，但是，在铁路运输中，把成批的、大宗的、长途的貨物运输同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截然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铁路部門既要重視整車运输，也要重視零担运输；既要办好长途运输，也要办好短途运输。在客运方面，为了铁路沿綫农民乘車的方便，不仅要重視长途的直通旅客运输，也要重視短途旅客运输和市郊旅客运输。

至于用铁路来运输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是否符合經济原則，这要看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目前，我国农村的汽車和輪船等現代化运输工具很少，主要运输工具是人力車、畜力車和木帆船等。这些运输工具运力較低，远不能滿足短途运输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铁路担負一部分分散的、零星的、短途的貨物运输任务，就能够更好地滿足农业生产的运输需要，促进农业的发展，这样，就可以減輕农村短途运输的



負担，把节省下来的运输力投入农业生产。此外，铁路的运输速度较快，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加速物资周转。从这个意义来说，是符合经济原则的。

第三，正确地掌握计划运输和合理运输的原则。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铁路运输是计划运输。我们必须坚持计划运输的原则。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生产不够稳定，常常会出现许多预料不到的情况。同时，我国农业在现阶段主要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它同全民所有制的工业相比，计划性要差些。这些，都给实行计划运输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片面地强调铁路的计划运输，而不考虑农业生产的特点，对农业物资的运输计划要求过高，对计划外的农业物资的运输控制得过严过死；也不能认为只有工业物资才能实行计划运输，农业物资就不可能实行计划运输，因而，也就可以不要农业物资的运输计划。应当看到，尽管农产品不像工业品那样集中，但是，通过国家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它是可以纳入铁路运输计划的。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对农业物资的运输还缺乏经验，更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农业物资的计划运输问题。一方面要积极地进行货源的调查工作，摸索农业物资的运输规律，积累经验，尽可能地把农业物资的运输纳入计划；另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对农业物资的运输计划放得宽一些。

合理运输也是铁路运输业必须坚持的一

个重要原则。根据国家的经济布局和各种时期的物资运输政策，把产、运、销更好地结合起来，克服物资运输中的不合理现象，是铁路部门必须经常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遵守合理运输的原则，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有些物资的流向，从局部地区的情况来看，是不合理的，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则又是合理的。有些有传统供销关系的物资和自产自销的物资的流向，往往同一般规定的物资流向不一致；有些农村需要的物资，在运到省、专区、县以后，还要进行再运输。如果把一切不完全符合物资流向规定的运输，通通看成不合理的运输，加以严格限制，那末，对于支援农业显然是不利的。为了坚持合理运输的原则，而又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就应当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结合具体情况，对于物资流向的规定，实事求是地不断地加以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性的物资流向和地区性的物资流向，在铁路运输中得到合理的安排。

第四，正确地对待铁路运输效率问题。

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和满足工农业生产的运输需要是一致的。努力加速机车车辆的周转，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物资的运量增长以后，铁路中间小站的工作就会忙碌起来。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就要多开一些在沿途装卸的零担列车和混合列车，适当地延长列车在中间小站的停车时间。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同提高铁路运输效率是矛盾的，要支援农业，就不能提高铁路运输效率，要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就会



影响对农业的支援。我们认为，把运输需要同提高铁路本身的运输效率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离开了运输需要，孤立地追求铁路运输效率，是没有意义的。铁路部门既要大力支援农业，又要努力提高运输效率。不能说支援农业就一定会降低运输效率；也不能认为只要服从农业的运输需要，就可以不讲求铁路本身的运输效率。因此，铁路部门在满足工农业生产运输需要的前提下，应当改进运输组织工作，节约铁路运输力。不能不顾实际需要，片面地追求铁路的技术经济指标，也不应当借口支援农业，不注意提高铁路运输效率。

第五，重视中间小站的工作。

过去，铁路运输的业务量大部分集中在大的客货车站，大多数中间小站的业务量很少，有的甚至不办理客运和货运业务。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以后，中间小站的客运和货运量必将显著上升。沿线中间小站同农村的联系很密切，农业物资的运输大部分要通过中间小站。在支援农业的运输工作中，中间小站起着重要作用。这些车站工作的好坏，对铁路运输业支援农业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除了继续重视大站的工作以外，当前，十分需要重视中间小站的工作，尤其是要重视靠近农牧业高产区、经济作物产区和农业技术改革的重点区的中间小站的工作。铁路部门领导机关要派得力干部帮助中间小站工作，积极地提高中间小站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逐步建立和健全客运、货运和行车等方面的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同时，要

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地逐步地给中间小站增添必要的运输设备，以适应支援农业的运输需要。

第六，铁路网的建设，既要适应工业、国防和城市的建设需要，又要适应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的需要。

铁路部门在选择新建线路时，既要考虑通过城市和工矿区，也要考虑靠近粮棉高产区和畜牧产区。设置车站的地点，既要照顾到各区间通过能力的均衡，还要在可能条件下尽量靠近居民集中点。铁路同地方水陆交通的衔接，既要便利工矿物资的搬运，也要便利农业物资的集散。车站客运和货运设备的设置，既要考虑大站和工矿车站的需要，还应当考虑中间小站的需要。在勘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应当注意节约农田和劳动力，照顾农业的水利排灌和农村交通。线路、站场和工厂的建设，都应当注意节约用地，尽量少占用农田和好地。分期修建的工程，要分期征用土地，避免过早占用土地。线路穿过农村交通要道的地方，要根据地形来设置行人、车辆和牲畜通行的交道口。总之，在铁路建设工作中，一方面要考虑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力求技术合理，讲求投资效果，考虑施工方便，妥善地处理铁路同农业的关系，尽量照顾农业生产、农业技术改革的需要和农民的利益。

在铁路建设方面，还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修建一些地方简易铁路。简易铁路造价低，用材少，施工易，修建快，运输能力比汽车和马车大，运输成本比汽车和马车低。



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短途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有计划地修建一些地方简易铁路，对于支援农业是有好处的。

第七，适当地制造一些适宜运输农业物资的机车车辆。

铁路机车车辆的类型，应当同客运、货运任务和货物的品种相适应。在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以后，不但铁路运量会增加，而且铁路承运的货物品种、特别是农副产品的品种也会增多。根据这种新的情况，应当对铁路运输的牵引动力和主要运输工具进行技术改革。例如，在机车生产方面，除了要改造现有蒸汽机车，试制生产大马力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以外，还可以考虑设计制造一些适宜短途行驶的小马力内燃机车和内燃摩托车组，以适应零担列车和短途客运、货运列车的需要。在车辆生产方面，也要设计试制和改造一批适合于农业物资运输需要的货车，以及适宜于旅客短途乘坐、上下方便的客车。

第八，进一步扩大协作范围。

运输过程的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它要求产、运、销各个环节全面协作。铁路运输业在大力支援农业以后，协作的范围也就更加广阔了。为了加强农业物资运输的计划性，为了使铁路运输同其他运输更好地衔接起来，及时地运输和集散工农业物资，铁路部门在继续加强同矿山、工厂、港口运输协作的同时，还有必要同农村人民公社、国营商业部门、供销合作社以及地方交通部门加强联系，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和发展新的运输协作关

系。此外，铁路部门还可以派遣技术人员到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培养技术人材等等。

第九，把支援农业和全面提高铁路的企业管理水平结合起来。

铁路企业应当根据铁路运输的需要和支援农业的要求，相应地加强和改进计划管理、技术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并且整顿有关的规章制度。这是铁路部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把铁路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铁路部门应当积极地进行技术革新，改善劳动组织，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力，大力支援农业。

总之，铁路部门应当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革，有利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事，铁路部门就应当做，而且要坚决地做。

铁路是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面对着广大的、正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农村，如何更好地发挥支援农业的作用，对铁路部门来说是个新的课题。以上意见，也还需要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和充实。这就要求铁路部门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农业技术改革的情况，农业的产、运、销的情况，货物和旅客的流向以及地方交通运输的情况等，逐步总结一套符合支援农业要求的铁路工作经验，以便把支援农业的工作做得更好。



可贵的革命干劲

中共湘潭地方委员会

毛田*，解放前叫作“茅田”。它在湖南省岳阳县东部的大云、相思、铜鼓三座大山之间，是一个极为穷僻的山区。境内荒山秃岭连绵起伏，在总面积二十万亩山地中，解放时只有五万亩残林，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全区有耕地五万多亩，大多数是在山傍上，丘块小，很多田是“人下田，牛上塍，蓑衣斗笠盖丘半”。水利条件和土质都很差，许多田靠天下雨，半数以上的田被称为“夜干丘”，“米筛田”。解放前，在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剥削下，大多数农民过着极贫苦的生活。即使是丰收年成，也是以红薯当主粮。

解放以后，毛田的面貌一天天地在变化。特别是自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以来，这种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大。正如这里社员们所说的，“生产年年好，生活步步高”。一九六二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已达三千二百万斤，平均亩产六百九十斤，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九五八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八。过去这个地方没有种植棉花的习惯，经过近年来的种植试验，社员已经逐步取得种植棉花的经验，打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这样一种说法：“茅田山内莫种花，十家种花误九家，种了花来不结果，结了果儿不炸花”。到一九六二年，全区已经种棉花达一千八百九十亩，收获皮棉近六万斤。油料、生猪等生产

也相应地得到发展。一九六二年，产油十万零五千斤。田塍上种的大豆收了一百二十多万斤。生猪，发展到一万八千头，年底存栏一万三千多头，每户平均一点二头。全区林业生产也很出色。几年来，造油茶林一万二千多亩，杉树一万零一百亩，茶树一百二十四亩，楠竹二十五亩。栽种梨、桃、橘、苹果等果树十四万一千株。南冲人民公社八斗、水圳两个大队，在一九五九年移栽的二千八百株梨树，去年已经开花结果。同时，对五万亩残林，实行了封山育林，禁止随便砍伐。山区交通，也有了改善，修筑了五十华里的公路。此外，还建成了一所水力发电站，使南冲一带四个大队的五百户社员，有了电灯照明。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变，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集体经济日益巩固。社员们称赞“人民公社是铁桶江山，集体经济是金边饭碗”。

立志不作自然的奴隶

毛田区面貌的改变，决不是偶然的。最主要的是由于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

- * 毛田区现有四个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以后，这个地方曾一度撤销区的建制。



面紅旗，鼓足革命干劲，立志不作自然的奴隶，建設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个地方怕暴雨，更怕干旱。正如社員所說的“一場大雨一层沙，一月无雨干死蛇”。那些沙田沙土，像米篩一样，即使灌一点水，或者下一点雨，不到一个隔晚就漏干了。虽然有些塘壩，但数量少，面积小，蓄水不多。解放前，也有人想多修塘壩，改善水利，可是那时候地主只管收租，农民衣不遮身，食不糊口，无力多办水利。碰到干旱，常开坛立醮，求神拜佛，把希望寄托于“天老爷”。

解放以后，农民翻了身，組織起来，依靠集体力量 and 国家的支援，陸續修整了一些小塘小壩。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干部和群众改变山区面貌的願望更加强烈，建設山区的条件也比以前更为有利。公社党委根据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公社党委的领导干部都分头深入到干旱严重的地方，帶領群众兴修水利。在龙形寺的一个地方，有二十多亩田，沒有水源，三年两不收。多少年来，群众把这个地方喊成“和尚嘴”。大队党支部和在这里工作的公社干部，同群众一道想办法，找水源。有的老农說：“水源是有，但隔了一座石山，不能过来。”公社干部随即同大队党支部书记、社員一同去察看。經過反复商量比較，一致认为，要解决“和尚嘴”的水利，只有穿山凿石，引水过山。这个消息傳开以后，大多数人积极贊成，也有少数人說，“凿石穿山，是蛤蟆想吃天鵝肉，根本做不到”。公社干部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方面启发教育群众，一方面亲自帶領四个积极分子，挖山凿石。干

了几天，鋤头挖卷了口，手上打起了泡。一些好心腸的人就来劝阻，原来一些不同意的人，就說起風凉話来了。党支部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們坚信石山可以凿穿；但是，工具需要改进。于是，請来了铁匠，在山上架起了紅炉，为凿石穿山整修鋼钎。他們頑强地挖凿石头，鋼钎磨钝了，又回炉。广大社員被他們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自动找来輪流换班，先后参加凿石穿山的有一百多人。經過二十天的艰苦劳动，终于把难办的事情办成了，凿开了一条十丈多长的石渠，引来了隔山的溪水。“和尚嘴”的二十多亩田，从此变成了自流灌溉田。

几年来，全区的干部和群众，就是以这种飽滿的革命干劲和“要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战斗精神，新建了二十多个小型水庫，整修扩建了四千多处塘壩，使全区二万六千多亩“夜干丘”、“米篩田”，变成了水旱无忧的好田。另外，还使一万多亩田，增强了抗旱能力。有人編了这样一首歌謠，来歌頌水利建設的胜利：“旧社会里逢旱年，农民心內似油煎；既求蒼天又拜佛，求神不雨泪漣漣。如今遇到干旱年，不求神佛不靠天；凿石穿山修水利，农民自己作神仙。”

毛田区在抓治水的同时，又抓改良土壤，全面开展了改造低产田的群众运动。南冲的高家坳到黄土庄一带，共有三百七十亩低产田，一般都是两三丈高的陡壩，荆棘丛生，遮了大半边田。这些田又大多是青夹泥、死黄泥、澄沙田，犁不深，耙不烂，总是长不起好禾来。有人称它为“十里荒”。一九五九年冬天，当时的公社党委經過討論之后，决定发动社員把这些坏田改造成为好田。于



是，由公社党委书记带头，同干部、社员一起，来改造“十里荒”。他们锄光了杂草，挖掉了菟根，在青夹泥、死黄泥田内，掺淤沙，下肥土，施家肥；在澄沙田内，放塘泥，掺黑土。经过艰苦的努力，“十里荒”变了样。公社党委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十里荒”变样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不少人来现场参观学习，推动了全区改造低产田的群众运动。在自然条件很差的寸家山，有一个老年社员刘月凡，原来一提到改造低产田，就摇头摆手地说：“生成的瘦田改不好，生成的矮子长不长。”他参观了“十里荒”以后，得到了启发，后来，成为改造低产田的积极分子，主动向队干部建议改造大沙坡的四点五亩低产田。队干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发动全队社员把田面上的一层粗沙搬走，又从塘内挑来了塘泥，铺上了两三寸厚的泥土。同时，整修好了一口废塘，彻底改变了大沙坡的面貌，种上的双季稻，获得了亩产八百多斤的丰产。经过三年多来的艰苦斗争，全区共改造了低产田五千一百多亩。同时，全区还进行了水土保持，控制了水土流失，减轻了沙灾的危害。

满腔热情 脚踏实地

毛田区田少人多，如何增产粮食，是摆在干部和群众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区委多次研究，认为除了改良水利条件和土质，以及适当地扩大耕地面积以外，还可以种植双季稻。可是，这里没有种植双季稻的习惯。在一九五五年，区委根据群众增产粮食的要求，最初提出种植双季稻的时候，在

干部和群众中，有的赞成，有的主张试试看，有的怀疑或反对。怀疑或反对的人说：“山高水冷，五月栽禾九月扮，能种双季稻吗？”“山里搞一季稻，是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改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区委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从种试验田作起，摸索经验，作出样子，再逐步推广。于是，区委书记便到水庙坳串连发动了几个积极分子，选择了一丘土质、水利、阳光较好的坡上丘的一亩一分田作试验。他们下了八十担肥料，犁耙了五次，自己栽插秧苗，细心培育。秋后，每亩收获稻谷八百多斤，比邻近的单季稻多收了三百多斤。这一年，在区委领导干部的影响下，全区的各级干部也多多少少种了一些双季稻的试验田，一般都获得成功。第二年，区委就提倡社员在有条件的地方种植一些双季稻。但是，有少数干部忽视自然条件，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商量，在一些不适合种植双季稻的地方，也种上了双季稻，秋后有一部分晚稻失收。区委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群众的意见，强调种植双季稻必须因地制宜，绝对不能“一刀切”、一律化。种植双季稻必须考虑全年平均温度、无霜期、雨量、日照、土质等自然条件是否适宜，还必须考虑水利、肥料、劳动力等条件是否具备，同时，对于实际经济效益也要全面考虑，作出具体的安排。在不具备以上这些条件、不适合种植双季稻的地方，就不种植不推广。

经过几年来的试验和推广，到一九六一年，全区已经因地制宜地种植了一万九千三百亩双季稻。双季稻种得多的生产队，粮食产量都有较大的增加。那些条件大体相同的



生产队，看到多种双季稻能够多增产粮食的事实，都表示要在来年再适当地扩种双季稻；有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生产队，更感到少种双季稻是个损失。一九六二年春天，全区根据可能，在有条件的地区，又增加了种植双季稻的面积。经过区委和各公社的干部，分头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同社员商量，逐丘调查，逐丘规划，由下至上制订了扩种计划。一九六二年全区插上的二万四千一百亩双季稻，获得了平均亩产六百五十九斤的丰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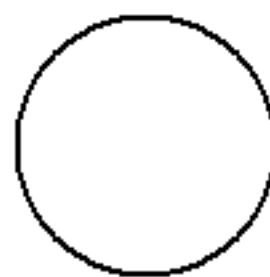
毛田区的干部就是这样满腔热情地对待新鲜事物，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经过试验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广，脚踏实地前进，使双季稻在毛田区落脚生根。

取经学艺 四上云山

毛田区荒山秃岭多，森林竹木少。解放以前，人们也曾有过改变穷山的愿望。但是当时只能是愿望。只有解放了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无限的创造力。根据这个地区的特点和群众的愿望，要全面发展生产，有计划地改善人民生活，在大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必须向荒山进军，把比耕地面积大三倍的荒山开发出来，把毛田地区变为一个新型的林区。一九五九年冬天，经过当时的公社党委研究，由党委书记等带领了一批社员，到冷山作造林试点。他们在冷山开了誓师大会，立誓要把冷山变为林海，为全区改造荒山秃岭树立榜样。他们冒着严寒，披荆斩棘，开垦了几百亩荒山，播种了油茶。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原来所想像

的那么顺利。由于缺乏在荒山造林的经验，冷山造林暂时失败了。这不仅使当地造林工作受到了影响，而且给全区造林运动增加了阻力。

在开发荒山受到挫折的时候，是放弃建设山区的理想，向困难低头呢，还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呢？公社党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要关心群众的利益，要有长远打算，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于是，公社党委委员一齐上冷山，仔细地研究了土质情况，还专门召开了老农会，总结了冷山造林失败的原因：不是土质不行，主要是人们还没有荒山造林的经验。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真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又要组织干部向外地学习。一九六一年春天，公社党委书记带领了大队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第一次爬上了大云山，到本县的国营大云山林场参观学习。经过分析和比较，他们认识到大云山的土质和冷山差不多，地势比冷山高，气温比冷山低，而栽培的杉树和果木，却生长得很好。大家扩展了眼界，初步学到了一些荒山造林经验，增强了造林的信心。原来抱怀疑态度的人，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看法错了，一致表示要好好发动群众造林。这批干部回去以后，普遍召开了社员会议，介绍了大云山的造林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冷山造林失败的原因，分清了是非，大大地调动了社员造林的积极性。他们说：“干吧！草鞋没有样，边打边像”，“学徒不费力气，哪能学得好手艺”。一个群众性的开发荒山的造林运动，就在全区开展起来了。但到了冬天，有的人因感到造林与农业有矛盾，对造林又不大积极了。全区再一次组织干部上云山参



观学习，把毛田区的情况与大云山林场作了对比，学习了农业与林业结合的經驗。这样一来，冬季造林规划由五千亩扩大到了一万亩，实际种植了一万二千亩。可是不久，新的問題又出来了。有些地方，由于社員缺少撫育幼苗的技术和管理山林的經驗，栽下的树苗枯死了不少。针对这个情况，必須迅速帮助群众解决林木撫育的問題。一九六二年春天，便又一次組織干部，三上云山学习管理經驗。此后，全区新造的林木，都普遍进行了培育，加强了管理，大大地提高了幼苗的成活率。为了进一步給扩大造林作好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全区又組織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分成两批，四上云山学习經驗。

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在开发荒山的造林运动中，虽然碰到过很多困难，經過許多挫折，但是他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不屈不撓地战胜了困难；失敗沒有使他們灰心，而是认真地总结經驗教訓，并研究和學習別人的經驗，繼續前进。

高瞻远瞩 不断前进

貧穷的毛田山区，現在已經成了比較富裕的山区。最近，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經濟，改变全区的面貌，又制訂了建設新毛田的远景规划。

为了保证这个远景规划的彻底实现，毛田区委在干部中进行了教育，要求他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建設社会主义新山区

的雄心壮志，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辜负群众的期望，领导群众不断前进，做出更加出色的成績。目前，全区各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群众，正在为爭取实现一九六三年农业生产全面丰收而积极努力。全区的两万亩冬闲田，在去年年底就犁耙过两次；有的水田是一道犁耙一层粪，有的水田漚了粪迹；进行了治虫；加高培厚了田塍；春收作物也普遍加工培育了几次。去冬今春，又造林二万一千八百亩，其中果树二千一百多亩，仅梨树就近四万株。

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是战无不胜的。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鼓足革命干劲，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就是許許多多事例中的一个。他們可贵的地方，在于有雄心壮志，有远大理想，而又脚踏实地地去干。他們对于需要办而又能够办到的事情，总是以饱满的热情，依靠集体力量，积极去办。他們在前进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畏难而退，灰心丧气，而是认真总结自己的經驗教訓，研究和學習別人的經驗，坚持真理，修正錯誤，頑强地战斗，繼續前进。他們在工作中，坚持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坚持党的調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綫的傳統作風，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結合起来，把一般号召和典型示范結合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的自觉进行工作。他們艰苦奋斗所获得的成績，使人相信：毛田区的干部和群众，在为实现远景规划而奋斗的过程中，将会作出更大的成績。



物理學研究中的理論和實驗

周光召

何祚庥

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是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在自然科學研究中，也必須遵循這條基本原則。實踐是認識的泉源，是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基礎，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社會實踐包括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等。人們在參加這些鬥爭中，不斷地改造客觀世界，同時也不斷地提高了自己。科學實驗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科學研究工作應當重視和認真參加科學實踐。在參加科學實踐中，不斷擴展知識領域，提高思想認識，學會用科學的方法去從事工作，促進生產的發展。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各個方面的幹部，在各項工作中，都應當用嚴格的科學態度，經過試驗，解決問題。如果我們在各項工作

中保持嚴格的科學態度，就能大大提高我們的思想水平，使我們的工作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進行得更有效。所謂嚴格的科學態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理論和實驗的緊密結合，就是理論聯繫實際這一原則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體現。如果說在早期的科學研究中，人們主要是凭借原始的經驗和簡單的猜想來摸索自然規律，那末，在科學發達的今天，沒有深刻的理論研究和先進的實驗技術的緊密結合，就不可能有效地進行科學研究。特別在現代物理學的研究中，這方面的問題更為突出。現代物理學的實驗是和理論活動分不開的，而科學理論的形成，是在實驗的基礎上實現的。因此，加強理論和實驗之間的聯繫，對於物理學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這裡，我們以物理學的理論工作者的體會，談談物理學研究中實驗和理論的相互關係問題。

一

科學實驗是人們的一種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它借助於儀器和設備，可以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研究自然現象，可以人工地改變或模擬自然現象。科學實驗的要求，一方面力求改進實驗裝備、採用先進的實驗技術，另一方面又和當時先進的理論活動有緊密的聯繫。這就是說，從事實驗工作，既需要掌握高度精細的實驗技術，又需要以科學理論為指導。

新儀器和新技術的發明和採用，常常給



实验工作的面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有时甚至开辟出某些科学研究的领域。有了新仪器，过去观察不到的现象显示出来了，过去分辨不清的东西变得清晰了，人的认识因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由于发明了乳胶，就从宇宙射线中发现了 π 介子和一系列奇異粒子；发明了能量巨大的加速器和气泡室以后，人们就可以在实验室的条件下人工产生各种基本粒子，观察它们的相互作用和衰亡过程，这就开辟了一门发展得異常迅速的学科——基本粒子物理学。在其他科学部门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多得不可胜数，像天文学中引进望远镜、射电望远镜和行星际站等，在无线电工程中引进微波波导管、量子放大器，在生物学、医学中引进放射性示踪原子、电子显微镜等，都极大地扩展了各门知识领域，提高了人的认识水平。因此，科学工作者在实验工作中总是十分重视改良仪器和发展新技术的工作。

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科学研究的成果，只有在先进的科学理论的配合和指导下才能获得。实际上，在现代科学实验的活动过程中，不论是实验题目的选择，实验的构思和设计，实验方法和技术的确定，实验数据的处理，以及由实验结果而作出的科学的结论，都始终是同理论工作密切联系的。

实验题目的选择，要遵循一定的理论。科学工作是一种认识活动，它总是由不知到知，由片面到全面，由表面深入事物的本质。在认识发展过程的每一阶段上都有它的

中心环节。在科学工作中，只有遵循着一定发展线索而又确实抓住了中心问题的那些实验工作，才能真正地推动科学前进。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已发展成为规模巨大、设备复杂的集体事业，它所研究的问题也愈益深入物质构造的深处，这就要求实验研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当然，一个科学实验，只要是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它总能提供某些实际材料、某些数据。但是，如果科学实验脱离了理论指导，那末，它所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就不一定能说明什么问题。在现代条件下，科学实验工作是在一定的理论的指导下，按照一定的目的和任务来进行的。科学工作的进展总是通过一批实验，发现一些具有原则意义的新的现象，提出并解决理论上的某些问题，随之又通过另一批实验，发现另一些现象，提出并解决理论上的另一些问题，一步一步地深入事物的本质。假如一个实验证实了某一理论，这当然意味着人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假如推翻了某一理论，就将使人们从错误中纠正过来，这也是认识上的一种进步，有时还是一种重大的进步。这样，每当实验工作有新的成功，人的认识就有新的提高。因此，优秀的实验工作者总是抓住那些刚刚萌芽，但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新事物、新现象，十分敏锐地对待现代科学发展的理论问题，并慎重地确定研究题目。

科学实验的构思和设计，也是和一定的理论分析相联系的。恩格斯指出，在一个科学实验中，已经包含着对未知对象的分析



綜合。^①具体說来，在实验安排上往往要設法突出某一因素的影响，排除另一些因素的干扰，这样才能保证实验工作的准确进行。举例來說，在原子核的 β 衰变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曾經怀疑能量守恒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遭到了破坏。为了要解释这种现象，必須假設一种中性的、靜止质量极小(或为零)的中微子的存在。可是中微子既不带电，和物质的相互作用又极为微弱，要想直接观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如果希望通过反冲的原子核和衰变出的电子来研究能量和动量間的平衡，却又因为这是包括三个粒子的衰变过程，从而将使得它們之間的动量和能量关系变得极其复杂。为了消除这方面的困难，实验工作者便巧妙地挑选了铍原子核的K电子俘获的过程。因为在铍的K—俘获过程中，它的末态只包括铍原子核和中微子二个粒子。如果能量和动量是守恒的話，那末反冲铍原子核便具有确定的动量和能量；并且，由于铍是一个质量較輕的原子核，它的反冲动量和能量还應該較大，較便于进行实验的观察和測量。这就大大簡化了实验工作，使得这个实验研究成为切实可行。进一步的实验表明铍原子在經過K俘获的过程以后，具有和理論預測相符的确定的反冲动量和能量。这就表明在这类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动量和能量是守恒的，中微子也是存在的。不难看出，上面这个实验之所以成功，就在于K电子俘获过程較 β 衰变过程更为簡單，更为純粹，因而就能够做出确切的理論結論。

由实验数据做出科学結論，是实验工作

取得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实验結果进行理論分析，常常能发掘出它的深刻的含义。历史上曾經有若干例子，表明在科学工作中有时会由于缺乏寬广的眼界，因而错过了重要的发现的机会。例如，在中子发现以前，已經有一些科学工作者測量到在中子碰撞下的质子有異乎寻常、十分大的反冲动量，并且还指出假如这个质子的反冲动量是由高能光子所引起的話，那末这种光子将具有几十个以至于上百个百万电子伏特的能量，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是不可能获得的。可是由于他們缺乏物质世界中可能存在有中子这种“預想”，因而也就不能做出“这就是中子”的結論。在科学工作中，上述漏失重要科学結論的事例并不是罕見的。

在实验工作的其他环节上，如实验方法的选择，实验技术的改进，实验数据的处理等等，也都在很多方面受到理論研究的影响。总之，实验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和理論研究有密切的联系。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比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更容易深入。所以在各种科学部門內，只要有可能使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話，都应当用实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

二

在物理学的理論研究中，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由实验材料、实验数据出发而抽引出

^① 参看《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頁。



理論的一般規律，另一种是着重于数学演算或邏輯证明的研究。这两种研究是相互結合的。但是，不論是哪一种理論研究，都必須密切結合实验。

为什么在理論工作中，首先要強調密切結合实验呢？因为实验材料是理論概括的基础。离开了实验材料，理論的加工就失去了对象和基础，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流”的东西。实验事实是理論研究的“空气”，离开了“空气”，理論就不能生存。任何理論只要同客观事实发生矛盾，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理論。在科学史上，有些科学家热衷于形成某些理論观念，却不重視实验事实，結果新的证据一出，就推翻了这种“理論观念”。因此，理論工作者首先必須注意实验事实，必須使自己的工作牢固地建立在实验事实的基础上。

在理論研究中常常使用邏輯推理。邏輯推理是形成正确理論的一个必要手段。在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論中，不容許在邏輯上有前提之間的矛盾、思想上不一貫的地方。理論如果存在着这种矛盾和思想上不一貫，就意味着理論还没有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即使这种理論能多方面地說明实验現象，但它終将为进一步的实践所充实或修正。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在門德列也夫早期的周期律中，化学元素是按照原子量递增的順序排列起来的，这样就可以发现一族一族的化学元素具有彼此相像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可是，如果将所有的化学元素严格地按照这种原子量递增的順序来排列，那

末就会出现氫和鉀等元素次序顛倒的情况，而为了使周期律的排列更能和科学实验事实相符合，于是就只好違背原来出发点，把氫和鉀等元素顛倒过来排列。显然，在这个理論中存在着邏輯前提之間的矛盾，这是正确科学理論所不能允許的。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发现原来真正决定化学元素周期性质的并不是原子量，而是原子的核电荷。化学元素周期律是應該按照核电荷递增的次序来排列的。

邏輯推理是由已知的事实和原理来探求未知的事实和原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恩格斯曾指出，“可是甚至形式邏輯首先也是寻找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辯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罢了”^①。运用形式邏輯也可能帮助发现重要的真理。在古代的希腊，亚里士多德就一直认为质量較重的物体，将比质量較輕的物体先落到地面，并认为即使去掉了空气的阻碍作用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这个观点占居統治的地位。直到伽利略在比沙斜塔上做了一个实验，才推翻了 this 观点，并在邏輯上駁斥了亚里士多德。伽利略指出，如果把下落較快的物体和下落較慢的物体綁在一起，那末就会由于相互牵引而使得下落較快的物体变得稍慢一些，下落較慢的物体变得稍快一些。可是如果把輕重不同的物体縛在一起的話，就意味着它們是一个新形成的更重的物体了，这将下降得更快一些。这是一个矛盾。因此，对于輕重不同的物体就只能认为它們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頁。



是以同样的速度落到地面。^① 我們不清楚伽利略究竟是先从邏輯上推出这个結果，还是先从实验上证明这个結論的，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邏輯推理确为发现真理提供綫索。所以，在物理学的理論研究中，总是把对实验材料的分析和綜合，数学的演算和邏輯的推理統一起来。

邏輯推理在理論研究中虽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真正推动理論发展的却仍然是实践。历史上有不少“言之成理”、“自圓其說”的理論，却常常为科学实践所拋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論是和实践不符的。形成科学理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邏輯上的无矛盾性、思想上的一貫性等等。但是这些并不是形成一个科学理論的决定性的条件。只有实践才能判明理論是否正确，只有实践才是形成正确理論最根本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有时一种理論和大量的实验事实相符合，但是在某些个别的地方仍然包含若干邏輯上的矛盾。这种理論不仅是允許的，而且在科学上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理論在邏輯上的缺陷是局部的，而它的主要内容却是正确的。当然，在理論中包含有邏輯上的矛盾总是意味着理論不能全面地符合实验，理論还不是十分完善的。作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論必須是全面地符合实验，邏輯上无矛盾的。

在理論研究中，不能单纯凭借邏輯推理。邏輯推理只能以一定的实验材料为对象，对一定的实验材料进行加工。它不能凭空“創造”出科学事实。当人們掌握的实验資料十

分有限的时候，邏輯推理所能活动的范围也就十分有限。尽管牛顿力学已形成了严密的体系，但是，单凭邏輯推理仍然推不出电子和原子运动的規律。只有依靠大量的原子物理的实验，才能总结反映出电子、原子运动規律的量子力学。在科学上比較成熟的部門，如流体力学中，当雷諾数增长到一定限度以上，流体的运动就发生突变，由层流变成湍流。湍流带有随机的性质，它遵循力学的和統計的規律。单纯凭借牛顿力学进行邏輯推理是不能得到湍流的規律的。事实上，层流向湍流的过渡以及湍流的規律就不是从理論上首先預見的。

由此可見，在科学理論研究工作中，必須十分重視掌握实验材料，单纯使用邏輯推理来从事科学研究，总带有較大的局限性。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重大理論的发现，都是密切地結合实验研究的結果。

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多数有成就的理論物理学家，总是用相当大的精力来从事对于实验資料的分析、綜合的工作，以相当多的力量来解决实验工作中的一些問題。理論工作者只有在长期和实验材料打交道的过程中，吸取新的营养，新的智慧，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論。

理論工作者还应当承担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运用某些基本的理論去解决实际問題。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对每一門新的尖端学科的基本原理的探索到实际应用，并没

^① 参看伽利略：《关于两个新科学的對話》，麦克米倫公司1914年英文版，第62—63頁。



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往往在发现了一种新的现象，掌握了它的基本规律以后，也就很快地找到了它的应用价值。对一门学科来说，当人们发现它具有应用价值时，它便能获得新的生命力，从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一九三二年发现中子，一九三九年发现铀的裂变现象，而在一九四二年第一个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从而开辟了原子能的新时代。因此，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基本问题的同时，应当努力探索科学成果的应用价值。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他们都是既从事本门科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又多方面地涉及实际问题的研究。像原子能这种尖端科学技术，就是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工作者参加实际工作，不仅对实际工作有很大帮助，而且还能促进理论工作的发展，开辟新的理论领域。像控制理论发展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

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对象是共同的，它们的任务也是一致的。但是，它们所采用的研究工具，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不同的。因此，理论和实验还有相互独立，有时甚至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在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必须加强理论和实验之间的联系，同时又必须正确地解决理论和实验之间的矛盾。我们既不能为了强调理论和实验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而削弱甚至取消它们之间的联系；又不能因为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忽视它们各自具

有的特点。理论工作者只有具备先进的思想观点，严密的推理和准确可靠的计算方法，才有可能提出和解决关键性的问题。而实验工作者只有掌握精确可靠的实验技术，巧妙的实验构思和设计，才有可能发现关键性的新的现象，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才有可能检验和修改理论的前提和假设，提出新的理论问题，促进理论工作的发展。在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几乎是每一个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都是在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密切配合，互相促进的情况下取得的。只有实验才能发现新的现象，帮助发现这些现象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只有依靠理论才能发掘现象间的本质联系，预测新事物的出现。这两者总是互相补充的。当然，在不同的问题中，有一些问题的解决，理论工作起着主要的作用，另一些问题的解决，却由实验工作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如果彼此不密切配合，就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

举例来说，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现有形式下的“微观因果条件”是否成立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研究由“微观因果条件”引伸出的逻辑的推论，导出了所谓“色散关系”。“色散关系”是基本粒子相互碰撞截面所满足的一个积分关系式，它的正确性是可以由实验来直接检验的。我们说实验证实了“微观因果条件”，实际上只是说实验测量出的截面满足“色散关系”的要求，而由“微观因果条件”到“色散关系”，却是一个纯粹逻辑推理的过程。这个推理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它应用了泛函分析、多元复变函数这



样复杂的数学工具。如果理論上不发展一整套极为抽象的数学方法，不能严格证明“色散关系”是“微观因果条件”的必然推論，那末就无从用实验来檢驗“微观因果条件”是否正确。应该說，在这个問題上理論是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如果在实验工作上不发展一套测量截面的技术，也无从最終地配合解决这个問題。

又例如，理論在分析 μ 介子的輻射衰变現象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迹象表明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微子。理論上看来有可能存在，但不一定存在。这只能由实验来加以判明。但是，要从实验上证明这一点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只有在能量特別高、粒子束流特別强的高能加速器上，采用特殊設計的探测仪器——火花室，才能从实验上证明两种中微子的存在。显然，在这个問題上，实验技术的发展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理論上的指引，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实验上的任务。

在現代物理学研究中，必須把实验装备革新的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在科学先进的国家的实验室中，十分重视发展新的实验方法，設計新的实验仪器。这将投入較多的人力、物力，而实际上将更快地促进科学的发展。世界各国优秀的实验工作者总是积极从事实验基地的建設工作。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实验基地，就不可能期望在实验上和理論上取得多方面的成就。

現代的科学实验常常是一种規模大、耗資多、費时长的工作。这种科学实验的規模

之大、耗資之多，已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所謂实验室規模了。这种科学实验設備的建立就是一个現代的工程技术問題，而有些甚至是只有用国家力量才能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实验题目选择得正确与否成为十分重要的問題。只有那种实际意义和科学价值較大，原則意义較强的题目才值得消耗这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了能够从实验結果中得到科学結論，必須大力开展理論研究工作，以便事先从理論上探討各种实验方案的优劣，比較各种理論模型和图像，找出为进一步的認識所必需解决的关键性問題，圍繞这些問題建議恰当的实验研究課題。由于开展这种理論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人力、物力都較少，而获得的結果却可能很大，因而提倡理論研究，使事先的理論分析做得透彻一些，也是有利于科学实验的。

共同的对象和共同的任务是理論工作和实验工作互相联系的基础。互相联系的形式应当有利于共同任务的完成。一般說来，理論工作应当綜合实验的結果。分析实验的条件，对实验工作的方向提出意見，并建議重大的实验課題；实验工作应当檢驗假說和理論的前提，发现重要的現象，由此提出新的理論課題等等。可是，理論和实验还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理論研究常常要撇开許多次要的因素，要在理想的条件下把握和发掘一些基本的更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它是从实验材料出发，但又不是只从个别的实验材料出发，而是要从大量的实验材料出发。在研究方法上，它要由具体到抽象，經過抽象这一环节，再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实验总是以具体事物为对象，它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进行工作，受到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实验所研究的是各种具体事物在不同条件下的运动和变化，因而由实验所提供的现象常常较理论更为生动、复杂、丰富和具体。因此，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常常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

为了促进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的联系，理论工作者在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应当多了解一些实验工作的条件，实验测量所依据的一般原理，实验仪器的准确度以及现代实验所达到的技术水平等是有必要的。同样，实验工作者在从事实验研究的时候，了解理论发展的主要思想和物理图像，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它的主要结论，以及大略的推理过程等也是必要的。但是，就一般物理学的情况来说，理论工作者无需去直接从事实验，了解实验技术和实验操作上的一切细节，这是实验工作者的任务；同样的，也不能要求实验工作者熟练地掌握理论计算的数学技巧和推理过程中的细节，这主要是由理论工作者来加以解决的。此外，也没有必要把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的项目和题目都安排得完全一样。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在科学工作中出现这种分工是完全必要的，这是自然科学的一种进步，有助于深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因为现代的物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十分庞大的体系，任何人都不能精通物理学所有的部门。随着自然科学分工的发展，往往出现了不同领域间的“分割”，这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的。但是解

决这种“分割”的办法，不是去取消它们之间的分工，而是要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中，都可能出现个别的错误。经验表明，在现代的科学文献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包含有错误的实验报告，如果理论工作者根据错误的报告来进行工作，那末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样，在现代科学文献中有时也会看到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中可以包含着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参变量。这种“理论”的“弹性”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今天他们预言将出现某一种实验现象，而到了明天当实验推翻了他们的预言以后，这种“理论”将参变量重新调节了一下，于是又能解释新的实验事实了。显然，如果实验工作者相信了这种“理论”，并根据它们来进行工作，就会一无成就。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实验工作者将实验结果任意处理，使它和上述这种“理论”相符合。同样，有些理论工作者也喜欢在他们的计算中任意舍去这一项或那一项，轻率地宣称那些因素是不重要的，从而他们的理论计算也就和实验结果相一致。应该说，这种做法根本就不能称为科学工作，这不是严肃的科学工作者应有的作风。实验和理论之间如果不相符合，我们应当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新的成果。

总之，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必须大力加强理论和实验之间的联系。这样，就能够使理论不致成为空洞的理论，使实验不致成为盲目的实验，更好地共同解决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编

十三 为实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必须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迫害和镇压，机会主义者的“国内和平”的说教，都阻止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革命危机，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列宁亲手培育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大战期间坚决抵制了社会沙文主义的腐蚀，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早就按照列宁的路线作了充分准备，因而成功地实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布尔什维克领导劳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兵苏维埃。但是，正当布尔什维克在街上领导群众对敌人进行战斗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趁机涌进了苏维埃，在苏维埃中占了多数，同时又和资产阶级勾搭，建立了临时政府。这样，从革命一开始便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从根本性质来讲，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工兵代表苏维埃。

列宁知道了二月革命的消息以后，急如星火地准备回国，以便直接领导已经开始了的俄国革命。在还没有动身的时候，他就连续写了很多信，指示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群众一定要把革命推向前进，并且一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一定要按照革命的方式进行全部工作。列宁在三月十七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当前的任务是开展工作、组织群众、唤醒新的落后的农村阶层以及僕役阶层，在军队中成立支部，以便对新政府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揭露，以便准备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现在要消灭反动派，丝毫不信任不支持新政府（丝毫不信任克伦斯基、格沃兹迭夫、契恒凯里、齐赫泽之流），武装起来等待时机，武装起来为更高阶段准备更广泛的基础。”^①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在群众的欢迎会上，列宁用“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来作为他的演说的结束语。第二天，列宁提出了有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回答了俄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制定了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路线。《提纲》指出，二月

^① 《给亚·米·柯伦泰》。《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1页。



革命后临时政府所进行的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要摆脱战争，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不能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而是要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提纲》明确地向布尔什维克和全国人民提出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列宁写道：“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①

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普列汉诺夫发表文章说：“现在，我国某些人……号召俄国劳动群众夺取政权，但夺取政权只有在进行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客观条件业已具备时才是有意义的。目前，这许多条件还不存在”^②。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机会主义分子都没有收起这种滥调：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③，无产阶级“不能开动国家机关”，“环境非常复杂”，“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④，等等。这些言论，无非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理論在俄国的翻版，他们把马克思针对十九世纪情况提出的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单独胜利的个别原理，奉为教条。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像鸚鵡学舌一样，说什么在落后的俄国尤其不能单独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二月革命以后，列宁写了大量著作，系统地驳斥了机会主义者反对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陈腐理論。列宁说：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末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尽管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可以用组织全体居民参加苏维埃的方法来粉碎。至于无产阶级能否开动国家机器问题，列宁指出：只有在掌握了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才有条件去学习管理国家的本领，他们也一定会通过实践学会管理国家。“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⑤ 列宁在驳斥“环境非常复杂”论时指出：“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就是旧东西死亡的无比复杂而痛苦的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生活方式的产生。”“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末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树林里去。”^⑥

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⑦ 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① 《論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2頁。

② 轉引自《根本問題之一》，《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5頁。

③ 轉引自《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6頁。

④ 轉引自《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列宁全集》第26卷，第92、100、102頁。

⑤⑥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列宁全集》第26卷，第96、100頁。

⑦ 《論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頁。



的过程。国家同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集团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工监狱”。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显著发展、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国家学说进行严重歪曲的时候，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又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机器，就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上最迫切的问题了。对这个问题，列宁早在侨居瑞士的时候，就进行了充分的理论上的研究，作了大量的笔记。回国后，列宁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写成了《国家与革命》这个马克思主义巨著。这个著作透彻地回答了革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保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中的历史作用，对机会主义者特别是考茨基作了无情的批判。

考茨基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怎样的形式”，而是“应该怎样去改变现在的国家”。他说：“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①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总结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实际经验，严密地论证了这个原理：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②列宁认为，必须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统治。由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所提供的苏维埃，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他说：“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会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③

列宁在这个著作里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他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他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民主共和制度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可靠十分巩固地确立自己的权力。“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机关或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⑤

① 转引自《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65、472、476页。

②③④⑤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3、391、400、380—381页。



列宁批判了考茨基“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的论点。列宁说：“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①考茨基的这种观点，一点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范围。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压迫、镇压人民”^②。列宁后来指出：“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特别着重地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因为机会主义者对这一点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在群众中进行的日常鼓动宣传中也不占任何地位”^④。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三十年以后，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表现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⑤

为了掩饰自己向资产阶级国家献媚的丑态和对暴力革命的恐惧，考茨基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只空谈反对无政府主义，避而不谈反对修正主义，并且恶意地混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严格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就粉碎了机会主义诬蔑马克思主义的无耻企图。列宁说：“（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成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⑥

①②④⑤⑥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409、386、387—388、471页。

③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但願和平地取得政权，可是資產階級不会自願退出历史舞台

二月革命后，俄国局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同时并存：除了資產階級临时政府以外，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政府——工兵苏維埃。这种局面是不能长久維持下去的，事变进程要求全部政权集中到某一方面：或者是集中到临时政府手中，或者是集中到工兵苏維埃手中。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在《四月提綱》中提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計劃。对于临时政府，列宁提出的口号是：“不給临时政府以任何援助！”列宁指出，要經過布尔什維克的艰苦工作，使群众相信，苏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全部国家政权都应当轉归苏維埃。因此，必須把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維埃中排挤出去，使布尔什維克在苏維埃中占多数，改变苏維埃的政策。这是預計到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針，这个方針是在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見的情况下制定的。列宁說，那时候，“苏維埃是由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压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群众的代表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問題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就是在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最近要走的一步、直接能够实现的一步的口号。”①

列宁很早就說过，工人階級但願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是無論从理論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階級放棄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輕举妄动，就只能是对資產階級和一切有产階級的可耻让步。資產階級不会对无产階級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們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②。因此，列宁在預計革命和平发展的时候，並沒有放棄用革命精神教育和組織群众，並沒有放棄暴力革命的实际准备。

果然，有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資產階級临时政府，沒有对无产階級实行和平的让步，在七月四日用暴力鎮压了举行和平示威的群众，并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結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被鎮压了的七月三——四日的群众示威，尽管布尔什維克事先曾經阻止过，但是列宁絕不像机会主义者那样非难革命的群众。他写道：“如果我們党不支持七月三——四日这次不顾我們的阻止而自发地掀起来的群众运动，那就是直接地完全地背叛无产階級，因为群众已經行动起来，……他們的憤慨是合理的，是正当的。”列宁还說：“我們党在七月三——四日这两天所犯的真正錯誤，就在于党对全体人民的革命情緒估計不足，党认为政治改革还可以通过改变苏維埃的政策而和平发展，但事实上，当时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經由于同資產階級妥協而把自己弄得昏头昏脑，資產階級已經完全是反革命的了，因而，談不上什么和平发展。”③

① 《論口号》。《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3—174頁。

②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頁。

③ 《关于目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7頁。



七月事件表明，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沒有了。列宁写道：使革命和平发展，“这对人民来说会是最容易、最有利的事情。这会是一条最无痛苦的道路，所以当时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但是现在，这个争取政权及时轉归苏維埃的斗争已經結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經不可能了。”^①在列宁的指导下，布尔什維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

九月間，有几天又出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当时，布尔什維克领导的群众武装击潰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苏維埃开始轉到布尔什維克方面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生了危机。列宁在《論妥协》一文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組成完全而且仅仅对苏維埃負責的政府，只要布尔什維克真正有鼓动的完全自由，只要立即以新的民主精神改选苏維埃，布尔什維克就将通过苏維埃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革命和平发展。但是，这种可能轉瞬間就消逝了。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幕后協議，帮助了地主和资本家稳定自己的統治。列宁在写了《論妥协》一文后的第三天，又在該文末尾特別注明：“和平发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經过去了”，这篇文章已經成为“过时的思想”了。^②

列宁說：“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銀行資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壟断时代，壟断资本主义轉变为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③在这样的时代，无产阶级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更加成为必要的了。

誰在决战时刻拒絕武装起义，誰就是可耻的叛徒

列宁指出，在进行最后决战以前，工人阶级的政党，决不放棄一切可能的合法活动，包括議會斗争，但是，“应当把百分之一的精力用在这个清談館上，而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在群众上。”^④“一小时也不要放棄合法活动。但是也不要相信立宪的和‘和平的’幻想。”^⑤誰要是在决战的时刻拒絕武装起义，誰“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⑥。

当武装起义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俄国的政治现实的时候，机会主义者恶毒地誣蔑列宁和布尔什維克是“布朗基主义”。列宁粉碎了这种誹謗，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阴

① 《論口号》。《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4—175頁。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5頁。

③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7頁。

④ 《論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維克的錯誤》。《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頁。

⑤ 《政治形势》。《列宁全集》第25卷，第168頁。

⑥ 《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第26卷，第64頁。



謀，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階級。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轉板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軟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問題，也就是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①

关于起义的时机，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一文中写道：“九月底是俄国革命史上的，而且大概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的最偉大的轉折点。”必須制止“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傾向和意見”，“否則，布尔什維克就会遺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②由于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的阻撓，起义一再拖延。列宁为了爭取及早实现武装起义，同他們进行了艰巨的斗争。从九月底(俄历)到起义前夕，列宁一直不断号召立即起义，并且反复警告說，拖延起义“就是犯罪”，“就等于自取灭亡”，“就等于断送革命”。由于列宁坚持不懈的斗争，武装起义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取得了胜利。

經過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斗争，扫蕩了弥漫在革命道路上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烏烟瘴气，列宁主义的万丈光芒终于照亮了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維克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了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說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光明大道。

十四 經過斗争，爭取实现和平与和平共处

取得暫息时间，巩固苏維埃政权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維克党为巩固苏維埃政权进行了紧张而艰巨的斗争。对内，需要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廢除地主和資本家的私有制，鎮压剝削阶级的反抗；对外，需要立即結束战争，实现和平。

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十一月八日，在列宁主持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規定立即无偿地廢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交给劳动者使用。在这个会上还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建議，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約进行談判，实现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这个法令指出，苏維埃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們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繼續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毫无例外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約，終止这场战

① 《馬克思主义和起义》，《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頁。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57、65頁。



爭。”^①这个法令，向各国无产阶级特别向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列宁在说明这个法令时指出，要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坚信“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②。

《和平法令》公布以后，列宁指出：“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展开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可以轻易获得，谁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把和平给我们端过来，谁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谁把这种观点妄加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谁就是在骗人。资本家拼命厮杀，是为了分赃。很明显，粉碎战争，就是战胜资本，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进行斗争的。”^③“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把刺刀往地上一插，一下子就可以结束战争。”^④

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遭到了英法美等国的拒绝，于是，它便单独同德国及其同盟国进行谈判。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谈判在布列斯特开始。德国政府在谈判中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割地、赔款。当时，俄国的旧军队已经瓦解，不能继续作战，而建立一支真正可靠和思想巩固的社会主义工农军队的工作还刚刚开始。粮食空前缺乏。人民已经精疲力竭，困苦不堪，渴望结束战争。其他国家还没有爆发革命。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便于帝国主义来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因而主张立即签订和约。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必须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必须在当时最危险的强盗德帝国主义面前实行退却，以便取得喘息时机，建立新的军队，即建立能够保卫苏维埃祖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红军。但是，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却反对列宁的方针，他们主张继续战争或所谓“不战不和”。当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时，担任苏维埃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声明说：我们在复员军队，我们不进行战争。这样，德国军队就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开始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国家的许多领土，并威胁彼得格勒。列宁发出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警号，号召人民起来保卫苏维埃祖国，加紧建立人民武装，抵抗德国军队的进攻。年轻的革命军队英勇地抗拒了全副武装的德国强盗的攻击。同时，列宁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斗争，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德国政府，同意按在布列斯特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德国政府则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要求割让更多领土。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签订了和约。

列宁批判了“左派”的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空谈，阐明了缔结和约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现实意义。

列宁指出，布哈林、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种空谈很漂亮、很诱人，但是毫无

①②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228、229、231页。

③ 《在全俄海軍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3页。

④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綫代表联席會議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4页。



根据。帝国主义武装反对苏维埃政权在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当时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对比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争，就是拿苏维埃政权的命运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英法帝国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正是希望苏维埃俄国继续进行战争，来搞垮苏维埃政权。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就会断送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①

苏维埃政权缔结和约，“不是为了向帝国主义‘投降’，而是为了学习和准备同它进行严肃认真的战斗。”② 列宁反复指出：我们绝对必须准备革命战争；必须建立严整的、全民的和强大的军队；要善于坚持不懈地养精蓄锐，准备东山再起；“要从事组织，组织和组织。不管有怎样的考验，未来一定是我们的。”③

事实正是这样。在和约缔结以后，苏维埃国家就获得了喘息时机，赢得了组织红军的时间，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秩序，为后来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准备了条件。

布尔什维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一种妥协，这是有利于革命的妥协，只是“交出了次要的利益而保存了根本的利益”④，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不給机会主义者留下恶意歪曲的余地，列宁用许多比喻来说明两种妥协的原则区别。他说：“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同意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资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资本家有利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才是不能允许的。”⑤ 他又说，应当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在遭到武装强盗拦截时，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列宁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一贯坚持革命路线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并指出：“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和议而布尔什维克已经做了人力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后，它才被迫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之下。”“这样的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⑥ 列宁同时也揭露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贯实行叛卖和变节的可耻历史，指出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妥协，自始至终是在于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犯。”⑦ 列宁教导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别有利于革命的妥协和叛

①⑤ 《談談不幸的和約問題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1、417頁。

② 《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訓》。《列宁全集》第27卷，第50頁。

③ 《不幸的和約》。《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頁。

④ 《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1頁。

⑥⑦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頁。



卖性的妥协，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妥协，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妥协。

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拿布列斯特和约来为他们的叛卖性妥协的行为作辩护。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他们企图把列宁描述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张妥协的。这种做法，是十分卑鄙的，也是徒劳的。

实现和平共处，我们这方面没有障碍

苏维埃政权由于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所获得的暂息时机，是极其短促的。从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开始，外国武装干涉者就联合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战斗，到一九二〇年末，终于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主要势力。这样，苏维埃国家就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时期。实践证明，布尔什维克不但善于通过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来争得暂息时机，而且敢于拿起武器，用革命战争来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复杂的、曲折的斗争中，列宁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

列宁多次宣告，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同各国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苏维埃政府曾多次提出媾和的建议，申明自己始终不渝地执行争取和平的政策，但是外国武装干涉者一直阻碍着和平的实现。列宁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道：“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愿触犯他们的。”实现和平共处，“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①

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列宁在答英美记者问的时候，表示愿意同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一九二二年四月，英法等国发起在热那亚召开国际经济会议，苏维埃政府也派了代表团参加。列宁指出：“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②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报告的决议草案》中说：代表团正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维护了苏维埃俄国主权的完整，同在俄国恢复奴役和私有制的企图进行了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是可能的，但是必须经过斗争。列宁说：“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③事情正是这样。在遭到了苏维埃人民的痛击以后，外国武装干涉者不得不暂时停止武装干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们也就一个一个地同苏维埃国家建立了贸易和外交关系。出现这种情况，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列宁说：“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活动已大大增长，这就助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

①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3—334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1页。

③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3—124页。



运动，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广大群众也转到运动中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原已很尖锐，现在更日益加深。东方千百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于这一切情况，纵使国际帝国主义比苏维埃俄国要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通商条约。”“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势的状态，即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①

赢得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

列宁在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同时，从来不对帝国主义抱幻想。他一再告诫说，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不能容忍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时刻警惕帝国主义挑起冲突，破坏和平。在外国武装干涉开始以前，列宁就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拥有组织得极其完备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共所以不能，在于贸易关系，在于国际财政关系。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② 在外国武装干涉发生以后，列宁又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③

正因为这样，列宁反复强调，“我们在采取各种促进和平的步骤的同时，也应当极力从事军事准备，绝对不能解除我们军队的武装。”④ 要“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国和我们红军的防御能力”⑤。列宁教导说，不要轻信资产阶级的“和平”诺言。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某种协议，也会在它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加以撕毁，“在激烈的国际冲突面前，条约和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⑥ “我们政策中的第一个训条，从我们政府一年来的活动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所有工人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我们要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⑦

要赢得世界永久和平，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列宁说：“除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谈判、任何对于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⑧ 唯一的道路是“用革命的办法摆脱资本主义桎梏，消

①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1—442页。

②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79—80页。

③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

④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第414页。

⑤⑦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4、121页。

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2页。

⑧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3页。



灭资产阶级统治，赢得社会主义社会和持久和平”^①。

要消灭资本主义，绝不能像胆小如鼠的机会主义者那样，害怕和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暴力，而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列宁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著作中，就作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确信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战胜的。列宁把帝国主义比喻为“泥足巨人”、“稻草人”、“衰老垂死、病入膏肓的老头子”。他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演说中说，两年以前，“当时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情形就可以看到，连我们的敌人也愈来愈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看到：像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它们使我们愈战愈强，使我们能够击退外来的侵略，取得彻底的胜利。”^②

十五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划分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首要标志

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在许多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问题。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成为划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首要标志。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纷纷攻击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饱有学识”的并且精通诡辩术的考茨基写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竭力歪曲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把它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庸俗的自由主义学说。他在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的时候，拼命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他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中通过“和平”的、“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出来的，并且责备布尔什维克采用了暴力手段，责备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毫无理由”地“损害民主”、“消灭民主”。考茨基的这套谬论的实质，就是用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论“民主”和专政》、《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论国家》、《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等著作中，全

① 《为了面包与和平》，《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面而严密地驳斥了考茨基以及第二国际的其他机会主义者在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谬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些叛徒的可鄙的、丑恶的面貌。这些著作，是列宁继《国家与革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贡献了极珍贵的理论财富。

考茨基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

考茨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偶尔用过的一个“词儿”。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这种荒谬绝伦的歪曲。他引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列宁指出，这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所在。

列宁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机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考茨基掩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可鄙地吹嘘“纯粹民主”和“一般民主”。他把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认为英美有可能和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搬到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大谈其“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的过渡。他并且捏造说，巴黎公社是由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考茨基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老爷们“教导”人们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取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投票表决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彻底”或“纯粹”民主制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

列宁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他说：“纯粹民主”是永远也不会有的，只要阶级存在，就只能是有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②尽管资产阶级的宪法有许多“自由”“平等”一类的华丽词藻，它归根结蒂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列宁说：“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有許多漏洞或限制，以保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5页。

③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315页。



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状态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军事戒严等等。”^①至于“资产阶级的议会，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最民主的议会，只要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的所有制和资本家的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镇压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机器。”^②

考茨基伪造巴黎公社历史的做法是十分笨拙可笑的。列宁指出，当时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集中全力来反对公社的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难道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全民投票”和“纯粹民主”吗？考茨基援引马克思关于英美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来为自己辩护，这是徒劳的。列宁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美两国还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马克思当时是把它当作革命历史规律的例外情形来设想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主张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典型到什么程度或可能到什么程度时，竟‘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下流的奴僕了。”^③

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把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但是，如果像考茨基们所主张的那样，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受制于设法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蠢或者欺骗工人。列宁说：“当我们的斗争还只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以内进行时，社会主义者，为劳动者摆脱剥削而斗争的战士，就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当作讲坛，当作一个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基地。现在，世界历史已把摧毁这个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如果再限于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把这种民主粉饰为一般‘民主’，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本质，忘记了只要资本家所有制还存在，普遍选举权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武器，那就是卑鄙地背叛了无产阶级，投奔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方面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④无产阶级为了把大多数人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粉碎旧的国家机关，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⑤

同资产阶级民主相反，无产阶级民主只给劳动者以真正的民主，决不给剥削者以民主。

①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6、221页。

②④ 《给欧美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9—410、410页。

⑤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4页。



苏维埃俄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自由和民主给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全体劳动者，同时，对剥削者实行专政，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反抗。对于这种情况，考茨基很不喜欢。他做出书呆子或天真孩童的样子问道：既然剥削者占人口的极少数，劳动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

列宁回答说，剥削者占人口的极少数，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而不是抛掉国家的阶级性和民主的阶级性，来抽象地谈什么多数少数。无产阶级所以要专政，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使反动派畏惧”，“维持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能够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要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阶级。“若以为在比较深刻的、严重的革命中，可以简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那就是愚蠢到了极点，就是固守庸俗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反抗，多年内在事实上对被剥削者保有巨大的优势。剥削者在没有在最后的、拚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子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议。”①

列宁指出，考茨基这样那样地歪曲马克思的学说、进行诡辩，不过是要使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史无前例地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可鄙地吹嘘‘纯粹民主’，掩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暴力。既然考茨基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解释’，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②

不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就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

俄国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这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必须把阶级斗争继续进行到底。列宁说，“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方法把斗争继续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③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同剥削阶级进行的斗争，采取了最尖锐的国内战争的形式。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进行武装叛乱。富农还窝藏

①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223—224页。

③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8页。



粮食，企图用饥饿困死苏维埃政权。城乡投机活动十分猖獗。在苏维埃各个部门工作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怠工，从内部进行破坏。同时，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逐步改造小农和巩固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纪律的严重任务。

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事实上保有很大优势：他们有金钱，有动产，有组织和管理技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同那些过资产阶级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高等技术人员有密切关系，有军事技能等等；一部分小生产者会跟着他们走；他们还有非常广泛的国际联系。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他们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①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②。

列宁警告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不仅在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武装叛乱，而且他们还力图使苏维埃政权“和平演变”、蜕化变质。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敌人“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③。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指出，敌人把苏维埃国家实行新经济政策诽谤为“内部的蜕变”。列宁说，“这的确是阶级敌人粗暴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他要大家警惕，敌人“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④。他还曾多次指出，在经济上剥夺了剥削阶级以后，仍有可能产生新的剥削者。他说：“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历史上，在清除了老的一代的土壤上，经常出现新的一代又一代，只要土壤能够生产，它就会生产出够多的资产者。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⑤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建立起能够管理产品的一切生产和分配的、巩固的和严整的组织；同混乱、捣乱、破坏等现象作无情的斗争。要实现这些任务，必须依靠专政。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是专政的一个主要方向。另一个主要方向，是镇压各种坏分子。列宁说：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非常之多，这些人在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236页。

②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

③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2页。

④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第253页。

⑤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不“露头角”，“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①

列宁指出，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群众镇压剥削者和坏分子的革命热忱未能长久支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未能把大多数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吸引过来，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② 列宁强调指出，专政不应当像浆糊，而应当像铁一般坚硬，“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③。

改造小商品生产者，这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另一个严重任务。列宁指出：广大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小私有者。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小生产者“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他们用这种“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消灭阶级不仅仅是剥夺地主和资本家，“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④ 只要这样做，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从苏维埃政权内部来进攻无产阶级，钻空子来收买、利用一切蜕化分子，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很多动摇的、软弱的人无力抵抗投机、贿赂和个人利益的诱惑，不惜牺牲集体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这样就妨碍苏维埃政权战胜经济上的困难。列宁认为必须惩办严重破坏无产阶级队伍纪律的人。他愤怒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实行劳动纪律就是倒退的荒唐论调，号召劳动群众加强组织性，自觉遵守劳动纪律。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制度、劳动纪律、劳动生产率、统计和监督、空前巩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保证。”^⑤ 应当用共产主义精神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帮助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以及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这方面的工作是会碰到很大困难的，有时还会遭到失败，但最后总是会胜利的。

无产阶级专政既要镇压剥削者和坏分子，又要改造、教育小商品生产者和巩固无产阶级

①②③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2、243页。

④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⑤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4页。



内部的劳动纪律，既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又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广泛、最强烈的反抗，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列宁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①

列宁指出，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相当的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发表以后不久，列宁在为《国家与革命》增写的一节里又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

十六 在革命浪潮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第三国际

无产阶级英勇坚决的革命斗争和机会主义者卑鄙无耻的叛卖活动

国际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一千万人的生命，使几千万人变成了残废，毁灭了几千亿美元的财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饥寒交迫，对统治阶级的愤恨已经不可遏止，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十月革命为他们树立了行动的榜样。在欧洲许多国家里，都出现了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

一九一八年一月，维也纳爆发了总罢工。接着，柏林五十万工人也举行了总罢工，德国的许多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九一八年十月，捷克、匈牙利相继宣告独立，奥匈帝国土崩瓦解了。十一月，波兰也宣告独立。德国的工人和士兵，从十月底起，纷纷起义，成立苏维埃，在许多地区掌握了政权。十一月九日，柏林工人和士兵举行起义，德皇被迫退位。李卜克内西从皇宫的阳台上向武装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队伍发表演说，宣告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一九一九年三月，以贝拉·库恩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②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第8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9、400页。



党共同組織政府，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法、意等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列宁說：“在许多国家里已經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①

列宁热情地歌頌和支持德国、匈牙利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并且及时地向他們提出了一系列的忠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在《給欧美工人的信》中指出，“德国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代表‘斯巴达克派’反对卑鄙的叛徒謝德曼、休特古姆同资产阶级勾結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历史是怎样对德国提出問題的：或者是‘苏維埃政权’，或者是打着各种招牌（像‘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之类）的资产阶级议会。”^②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剛成立，列宁就提醒匈牙利共产党人，要他們注意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是真正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系統地介紹了俄国无产阶级巩固自己的专政的經驗，指出无产阶级应当繼續坚持阶级斗争，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他強調說，如果昨天加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間有人表現动摇，就要同他們进行无情的斗争。

在蓬勃发展的革命浪潮中，各国的革命左派领导群众斗争是英勇的、坚决的，但是，他們經驗不足，力量还薄弱，对列宁的忠告沒有很好地領会和貫徹执行，沒有彻底揭露机会主义者并且及时同他們决裂，这就便利了机会主义者的叛卖活动。一貫不願革命、害怕革命、敌視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这时公开地站到反革命资产阶级方面，成为“资产阶级的工人尉官”。他們和资产阶级一道，帮助资产阶级絞杀了群众的革命运动，在危急关头拯救了资产阶级。

在德国，当一九一八年一月柏林工人大罢工的时候，机会主义者篡夺了罢工的领导权，帮助德国政府，镇压了罢工运动。謝德曼曾經恬不知耻地、洋洋自得地說：“一月革命所以沒有酿成災禍，絕不能感謝当时的‘統治者’”，“我們預防了俄国的秩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的首領艾伯特、謝德曼、盖茨等人組成了临时政府。自称“我痛恨革命正如我痛恨罪恶一样”的艾伯特宣布，他将根据帝制国家的宪法来管理德国。謝德曼則声明要向共和制度过渡，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十二月十六日，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开幕，右派和“中派”在大会上占了多数。大会召开的时候，柏林二十五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推翻艾伯特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維埃，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大会拒絕了群众的要求，决定把全部政权交給艾伯特政府，贊成召开立宪会议。一九一九年一月，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諾斯克下令镇压了柏林工人的武装起义。一月十五日，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領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艾伯特和諾斯克下令杀害了。机会主义者当了屠杀无产阶级領袖的劊子手、杀人犯。在血腥镇压了工人群众的革命发动之后，召开了立宪会议，通过了维护资产阶级統治的宪法。德国革命失敗了。

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領袖，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曾經被迫接受共产党提出的

① 《在馬克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講話》。《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7—148頁。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9頁。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但是，在协约国帝国主义武装进攻匈牙利之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就力图取消苏维埃政权，并且积极参加了反革命暴乱。在内外敌人的夹攻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于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复灭了。

列宁无比愤怒地谴责了机会主义者叛卖革命的罪恶行为。他指出：机会主义者的叛卖，是德国、匈牙利革命所以失败、资产阶级统治所以能够继续维持或者复辟的一个根本原因。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被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出卖了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复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党人的叛变。列宁要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记住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沉痛教训：“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①

新型的、革命的国际和腐朽的、黄色的国际

还在德国、匈牙利革命前夕，列宁就指出：“欧洲的最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它现在还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②列宁的预见全部证实了。欧洲各国革命被无产阶级叛徒所葬送，这个大不幸教育了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浪潮的基础上，许多国家里相继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到一九一九年初，就有了三十九个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者的组织。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列宁就为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建立第三国际、恢复和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列宁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三十个国家的代表。列宁亲自领导了这次大会，在会上就主要议题——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了报告。在报告中，列宁指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列宁论证了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根本规律：“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所绝对必需的”^③。列宁的思想为大会所接受，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第三国际的建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列宁在《第

①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2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96页。

③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6、435、440页。



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写道：“第一国际（一八六四——一八七二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二国际（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百年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一面是革命者的联合，一面是叛卖者的纠集。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社会和平主义者麇聚在伯尔尼举行他们的代表会议，企图恢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业已破灭的第二国际。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原第二国际的二十六个党派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通过了承认和支持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的决议。会议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斥资布尔什维克党，只是由于害怕工人群众，才不敢做出正式的决议。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写道：“保护强盗式的‘国际联盟’；为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直接间接的联盟辩护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辩护而反对‘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不可容忍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成为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② 参加伯尔尼国际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列宁说：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③。

只有同机会主义派别决裂，才能加入第三国际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同第二国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各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纷纷离开了第二国际，站到第三国际方面来。成立还不到一年的第三国际，在投机政客们的眼里，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和诱人的东西。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间，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尽管在实际上仍然坚持第二国际的立场，反对第三国际的原则，却虚伪地声明退出第二国际，要求加入第三国际。列宁说，这个事实说明，纠集了无产阶级叛徒的、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已经被击溃；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列宁同时强调指出，机会主义“是一种缠人的病症，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像的要费时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27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51页。

③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7、459页。



級的社会主义，而是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資產階級，比資產者亲自出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們来领导，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无法維持了。”^①列宁指出，第二国际的一些旧的政党和領袖所以要求加入第三国际，正是为了繼續在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and 帮凶，这“对無產階級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險”^②。

为了克服这个主要危險，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列宁起草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著名文件。文件規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須很好地向群众說明無產階級专政的必要性，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全部实际活动中承认無產階級专政；必須无情地斥責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和平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同它們彻底决裂；必須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結合起来，坚持不懈地在军队、工人群众和农民中进行宣傳鼓动工作；必須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須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維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必須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党，党内应有铁的紀律。这个文件，为一九二〇年七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

列宁制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社会党内引起了广泛的討論。圍繞着这个討論，这些党内的左派同“中派”、右派之間展开了尖銳的斗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和德国共产党合并。一九二〇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法国、瑞士、意大利社会党的左派也相继和“中派”、右派决裂，組成了共产党。

“中派”分子不贊成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九二一年二月，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中派”在維也納召开了代表會議，成立了維也納国际。这个“国际”口头上批評第二国际，实际上遵循着和第二国际一样的机会主义路綫，因而被称为第二半国际。一九二三年五月，第二半国际就并入了伯尔尼第二国际。

第三国际的誕生以及它同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胜利。列宁締造了第三国际，捍卫了第三国际的純洁，保障了各国共产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国际团结。在列宁的领导下，第三国际高举革命的紅旗，团结了各国無產階級中的一切优秀分子，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

十七 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工人运动内部的两种錯誤思潮

为了把各国無產階級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要求各国共产党像布尔什維克那样，既要有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頁。

②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綱》。《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1頁。



原則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既不陷入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泥坑，又不犯“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适应这种需要，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写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总结了俄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工人运动的内部敌人进行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并得到锻炼的。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它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无论过去和现在布尔什维主义都对这个敌人给予最大的注意。”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是“左”倾思潮，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①。列宁认为，“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正在成长、巩固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反对本国的（每个国家的）‘孟什维主义’，即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反对共产主义‘左派’的斗争（这可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②

对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存在的“左”倾错误，列宁是这样估计的：“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右倾教条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与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③这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抱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这是一种异常可喜、可贵的情绪，应当善于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获胜的希望。对于那些善于表达群众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这种（往往是蒙昧的、不自觉的、未唤醒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竭力帮助。”列宁又接着说：“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某些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④

无论是右倾思潮或者是“左”倾思潮，在本质上都是非无产阶级的，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彼此补充、互相转化。列宁一再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继续以主要力量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要反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已经产生的“左”倾错误。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部著作中，列宁痛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叛卖行为，详尽地批判了“左”倾思潮，总结了俄国三次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经验，总结了德国和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反复教导共产党人学会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和斗争艺术，竭尽全力来引导千百万群众前进，以争取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

①②③④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14、72、84、61页。



普遍规律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列宁叙述了俄国的革命者寻找真理的痛苦过程和布尔什维克经历的多种斗争形式。他说：“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以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①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又经历了十五年（一九〇三至一九一七年）的斗争实践。在“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激烈的，秘密的与公开的，小组的与群众的，议会方式的与恐怖主义的”复杂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熟练地掌握了能进能退、善攻善守的革命策略，从而获得了无比丰富的经验。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②。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的意义，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可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国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就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糟糕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辩护人。”^③

毫无疑问，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十月革命所反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的时候，必须结合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特点，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列宁说：“要使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这个基本的原则性的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种种特征而具有而且必然具有的一些具体特点。”^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策略上的统一，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细节上把这些原则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应用于这种情况。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⑤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和党的纪律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论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党的纪律问题，批判了“左派”共产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糊涂观点。

①②③④⑤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8、8、12、1、2、73、73—74页。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对立的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机会主义领袖叛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起了普通党员和劳动群众对这些“领袖”的愤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左派”共产党人，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懂得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什么“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的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进行革命活动，没有领袖是不可设想的，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领袖。列宁说：“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旧领袖。”“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把群众和阶级拿来对比，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比才可以”。“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不然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

“左派”共产党人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上的糊涂观点，实际上就是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列宁说，这就等于为资产阶级效劳而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这就等于放纵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等劣根性，而纵容这些劣根性，就必然使无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都遭到失败。

列宁总结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经验，认为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进行需要有坚定性、需要有纪律、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②这种纪律依靠什么来维持呢？依靠什么来检验和加强呢？“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政治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③

^{①②③}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24、23、28、23、5、6—7页。



必須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

列宁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认为提到各国共产党的日程上来的任务，是要布置百万大军，配置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促使决战时机完全成熟。这就要求：（一）使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完全陷于混乱，彼此冲突，互相厮杀，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而筋疲力尽；（二）使一切动摇的、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妥协分子，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三）使无产阶级中间主张采取最坚决、最勇敢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那种群众情绪产生出来，并且大大高涨起来。到那时候，革命时机就成熟了。如果共产党人能够正确地选定时机，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要做到这些，共产党人必须把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才干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加速他们的分裂和崩溃；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最充分地发动群众，并且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列宁说：“一支军队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①

列宁教导各国共产党人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关中，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来行动的群众中，捍卫革命的利益，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坚决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

“左派”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在反动的工会里工作，应该退出工会，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清一色的共产党人的“工人联合会”。列宁说，这是“可笑的幼稚的废话”，最清楚地说明了“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浮。列宁指出，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走狗、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影响之下。要想帮助群众，博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正是要在有无产阶级群众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里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哪怕那些机构是最反动的，也要不顾一切牺牲，克服重大障碍以便系统地、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在那里进行工作。”^②

当然，在反动的工会里工作的共产党人，必须同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列宁说：机会主

①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7、34—35页。



义者、工人贵族盘踞西欧各国的工会，他们具有帝国主义的情绪，被帝国主义收买。必须同他们斗争到底，使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领袖们颜面扫地，并且把他们从工会中驱逐出去。不把这种斗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

“左派”说，“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斗争形式，都应当坚决拒绝。”^① 列宁回答说：“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也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政党、作为群众的政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教育不开通的、闭塞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② “最尖锐、最无情和最坚决的批评，不应当是对准议会制度或议会活动，而应当是对准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利用议会讲坛的领袖。”^③ 拒绝参加议会是幼稚的，因为用这种简单、轻便、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是不能解决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的，这样做，实际上是逃避困难。

列宁教导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异乎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方式，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欺凌的贫民的帮助下散发传单，走遍工人住所，走遍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深入最普通的平民酒馆，进入最普通的平民会社、团体以及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像在议会中说话那样）跟民众说话，丝毫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要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关和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向群众宣传布尔什维主义”^④。

革命者的妥协和叛徒的妥协

“左派”还提出了“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他们说，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的政策，都是不正确的和异常危险的，都应当坚决拒绝。列宁批判了这种所谓“原则上”反对妥协的有害的说法，认为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有不少实行妥协的事例：还在布尔什维克产生以前，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間，列宁参加的老《火星报》编辑部，就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司徒卢威成立过政治联盟；一九〇七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过短期的政治同盟；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尔什维

① 转引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页。

②③④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47、80页。



克同考茨基派等，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十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盘接受了未作任何修改的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所有这些都是妥协。布尔什维克通过这种妥协，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联合他们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从来没有受这些政治派别的约束，一直对它们的错误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斗争。列宁指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革命活动中，特别是在推翻国际资本的斗争中，就像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一样，绝对不可能走一条笔直又笔直的大道，一定要通过许多迂回、曲折和中间站，才能达到最终目的，也就是一定要采取许多机动、通融和妥协的策略。应当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应当运用这个策略，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的敌人。

“左派”反对布尔什维克实行革命的妥协，而机会主义者则歪曲地援引布尔什维克所作的妥协，来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护。为了教育革命者，同时也是为了回击机会主义者，列宁反复地论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他说，“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罢工者钱用完了，没有外方援助，陷于极端的饥饿和苦难）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使接受这种妥协的工人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把一切推在客观原因上，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是被资本家说服，有时是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是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①。前一种妥协，是局部的、非根本问题上的、暂时的妥协，是为了等待有利的条件，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对敌人进行英勇无畏的进攻；后一种妥协是放弃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叛卖性的妥协。列宁又举布尔什维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说明这是革命的妥协，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不容机会主义者任意歪曲；而机会主义者同资本帝国主义强盗实行妥协，则是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强盗的同谋犯，是叛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妥协。妄图把这种妥协同革命的妥协混为一谈，是拙劣的、可卑的。列宁说：“愿意作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在何种具体情况下，妥协是机会主义和叛卖的表现，因而是不能容许的，并且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评，最无情地加以揭露，毫不调和地同它作战，决不许那班老于世故的‘求实主义’的社会党人以及议会掮客，拿‘一般妥协’的空谈来支吾搪塞，脱身卸责。”^②

既要具有革命热情，又要保持冷静头脑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它在国际范围内影响的不断扩大，使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几

^{①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49、19页。



乎气得神经错乱。他们一方面用暴力镇压革命，一方面发动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围攻。他们建立了各种经费非常充裕的机构，增雇了很多学者、鼓动家、神甫之流，发行了无数书刊和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们总以为用真枪真剑或唇枪舌剑可以窒息真理，但是，事情却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正是由于他们的围攻，促使了更多的群众去探索真理。对于他们所干的蠢事，列宁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要‘抹杀’和窒息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办不到了。”^①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左派”却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他们单凭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他们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列宁在分析这种思潮的社会根源的时候指出，小资产者“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有一种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的特性”^②。

列宁认为，“左派”的情绪，在某些方面表达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憎恨，这是可贵的。但是，制定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热情，而必须清醒地极为客观地考虑本国的和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参照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他说：“政治乃是一种科学，乃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③。

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列宁说：“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④

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只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列宁说：在领导群众对敌人进行决战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布置就绪了”^⑤。“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至少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表示完全不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

①②③④⑤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82、14、61—62、52、75页。



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①。

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既要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坚强信心和无比热情，又要在实际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冷静的头脑，并且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列宁说：“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豕突狼奔，暴怒若狂，肆意横行，做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向布尔什维克预先报复，竭力屠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个、几千个以至几十万个明天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的垂死挣扎一样。”^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着；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摧残和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顿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各国共产主义者应当坚信，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我们的。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应当把最大的热情和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把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高度原则性和策略上的最大灵活性结合起来，更有信心地、更坚定地向前胜利前进。

十八 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形势和任务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工程提到日程上来。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我们已经夺取了俄国——从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穷人，从剥削者手中夺过来交给劳动者。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我们必须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崇高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个最困难的、最崇高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并且这也是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因为只有在解决这个任务以后（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决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③

但是，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经济建设工作被迫中断。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党才重新把工作转移到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

当时经济情况非常困难。经过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的国内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和燃料极端缺乏。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处于同农民利益相抵触的地位，工人当中也有了不满情绪。显然，必须针对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方针。

①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4、82—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1、221—222页。



列宁指出，当时的任务是要在恢复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工业，给工农联盟建立新的经济基础。要恢复农业就必须用粮食税代替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就必须扩展全国商品流转，允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这样，农民的经营兴趣就会提高，农业就可以迅速恢复。在农业生产恢复的基础上，工业就可以恢复并发展起来，反过来又会给改造个体农民提供物质条件。

列宁早在一九一八年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就分析了过渡时期俄国的经济结构，指出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宗法式的自然经济，个体农民的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后来列宁又把它们分成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即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就是代表这三种经济的社会力量。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着“谁战胜谁”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战胜了资本主义，把全部小商品生产纳入社会主义大经济的轨道，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以实行粮食税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保证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策。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倡议，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全面地论证了这个政策。正如斯大林所表述的，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①

在党的政策这个重大转变的时节，不少人思想上是混乱的，政治上是动摇的，而托洛茨基则利用这种时机向党发动了进攻，他恶毒地挑起了一场大争论。接着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集团都起来反对列宁。

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

这场争论是从职工会问题开始的，其实，职工会本身在当时并不是党的政策中的主要问题，事实上争论也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一九二五年一月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指出，当时所争论的实际上是“关于应如何对待那些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农民，关于应如何对待非党工人群众，以及一般关于党在国内战争已归于结束的那个时期中对待群众的方法问题”^②。

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周围，积极地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采用说服方法，党和职工会毫无疑问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托洛茨基却提出了“整刷”工会的口号，他把工会看作国家机关，要在工会当中采取强制的军事

①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② 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34页。



命令手段。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挑拨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列宁说：“假如党与工会发生分裂，党是有罪过的，其结果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因为除了千百万无产者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支柱”^①。

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时，论证了工会的性质和作用，论证了工会和国家以及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列宁说：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②它是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的桥梁。“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把阶级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③

布哈林在这场争论中纠集起一个所谓“缓冲”集团，其实他完全是帮助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列宁说：布哈林所做的，正是往火上倒煤油，但名之曰“缓冲煤油”。

托洛茨基在争论中攻击列宁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自己则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是“关心生产”的。布哈林站在折衷主义立场，说什么“从经济上”看问题和“从政治上”看问题有同等价值，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偏重了一个方面。列宁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他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个著作中，深刻地论证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列宁写道：“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④

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批判

跟在托洛茨基后面反对列宁的“工人反对派”，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派别集团。他们和托洛茨基从两个极端走到一起。托洛茨基企图通过“工会国家化”走到瓦解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工人反对派”则打算通过把全部国民经济管理事业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途径，来取消党的领导 and 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工团主义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交给按生产部门分割开来的非党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培养群众，来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⑤“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久经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一切工团主义的荒谬言论，生产者的指定人选，——所有这些都应当扔

① 《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页。

②③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页。

④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1—72、72页。

⑤ 《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页。



到廢紙簍里去。”^①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进一步批判了这种錯誤倾向。列宁說，他們的主張是完全違背馬克思主义的。因为第一、“‘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完全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違反了明确地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第二，他們那种“专门指靠非党群众或者迎合非党群众的思想，也是根本違反馬克思主义的。”^②

工人反对派为了掩飾他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場，举出恩格斯关于把生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来为自己辯护。列宁指出，工人反对派利用恩格斯的論断来为他們的論点辯护，無論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只要把原著切实查对一下就可以肯定，恩格斯讲的是沒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我們大家來說都是毫无疑問的。一个社会已經沒有阶级，当然就沒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們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們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經沒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毫不客气地譏笑那些妄說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可以消灭的各种思想、言論和假想”^③。

列宁分析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产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維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而主要地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国共产党的影响。”^④

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工人反对派”的爭論，以这些机会主义派别集团的失敗告終了，党組織在爭論中紧紧地团結在列宁的周圍。一九二一年三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作了工会問題爭論的总结，并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統一的決議》、《关于我們党內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決議》。

合作化——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須通过集体化，引导农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列宁的一貫思想。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列宁进一步地具体地研究这个問題，并且提出了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合作社計劃。

在这个問題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主張，是同列宁的思想根本对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應該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小农破产，把他們变成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資料集中起来以后，才可以提出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資料公有化的問題；“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应当用剝夺小农的办法使他們的生产資料公有化。

列宁在《論粮食稅》以及他最后写的《論合作制》、《論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論著中，回击了这些机会主义者的謬論。

① 《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頁。

②③④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3、237、232頁。



斯大林把列宁的論点概括如下：

“（甲）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們轉归全民所有；

“（丙）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們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規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丁）以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規模生产的現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給它們头等拖拉机和其她机器；

“（戊）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时期內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換）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經濟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維埃貿易，即国营貿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貿易，把所有一切資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①

列宁的合作社計劃，是使农民群众在工人階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工人階級一起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綱領。

十九 坚决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社会主义国家必須支援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大大促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也促进了殖民地附屬民族解放运动。正如斯大林所說，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經過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綫”^②。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和无产阶级結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③。

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指出，捍卫苏維埃共和国，建設社会主义，对于推动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列宁并没有說苏維埃国家的建設可以代替世界各国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日子，列宁說道：“我們的任务是维护、捍卫和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力量，这个社会主义火炬，这个积极影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泉源；在当前情况下，这个任务就是軍事任务。”^④当国内战争临近結束时，他說：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建立共产主

① 《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10頁。

②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9頁。

③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4、206頁。

④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28卷，第13頁。



义制度，“这项任务具有全世界的意义”^①，“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②。当苏维埃国家开始过渡到和平建设轨道的时候，列宁就把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③

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建设起比资本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会促进世界革命，同时，也只有世界革命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取得最终胜利。列宁一再强调说：“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④“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⑤“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⑥“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⑦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以及某些自称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党的领导人，用民族利己主义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列宁痛斥了这种叛徒行为，他说：“我看问题，不应该从‘本’国的观点出发（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议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而应该从我要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⑧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而是建筑在对世界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上面。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⑨

列宁同时也深恶痛绝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说：“我们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思想和沙文主义思想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⑩。“我宣布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

①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379页。

②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0页。

③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7页。

④ 《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三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0页。

⑤ 《在全俄纺织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页。

⑥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2页。

⑦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7页。

⑧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8页。

⑨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8页。

⑩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9页。



的好牙吃掉它。”^①

革命不能輸出，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是从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坚定不移的主張。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同情和支持一切国家人民的解放事业。列宁模范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制定了布尔什維克和苏維埃政府的国际政策。他在为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綱草案草稿中，規定苏維埃国家必須“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②。在为大会起草的決議中，列宁写道：“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全部人力和物力来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③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割裂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資本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认为前者对于后者是无足輕重的东西。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相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屬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④一方面，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沒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他們是不能取得胜利的”^⑤。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只有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才能順利地发展。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写道：“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維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資本主义，如果沒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⑥列宁认为，共产国际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只是在口头上譴責帝国主义，空喊国际主义，而实际上却不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斗争。列宁尖锐地揭露了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假仁假义的行为。他說：第二国际“英、法、荷、比等国的党，都是在口头上仇視帝国主义，实际上却不在‘本国’殖民地内进行革命斗争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不經常援助殖民地内已經普遍开始的革命工作，不把殖民地革命政党所需要的武器和书报送到殖民地去。这些党是恶棍和叛徒們的党。”^⑦

① 《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給政治局的便箋》。《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頁。

②③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4、107頁。

④⑤ 《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7、139頁。

⑥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頁。

⑦ 《論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2頁。



列宁提出：“凡是願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在殖民地所下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①

无产阶级要领导民族民主革命

列宁科学地分析了殖民地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认为在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也要联合资产阶级，但是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密切地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正确地解决革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

列宁指出，在殖民地落后国家中，封建关系占优势，农民是主要的群众。在这些国家里，除了反对帝国主义外，还要反对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②。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③。

列宁精辟地分析了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④

无产阶级在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列宁说：“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溶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⑤。他又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与第二国际的英雄同类的改良主义资产阶级。”⑥

列宁分析了十月革命后殖民地落后国家争取解放斗争的新的历史条件，指出：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能力给它们帮助，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紧紧地掌握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把民族民主革命引

①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4页。

②⑤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9页。

③④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1、211—212页。



向彻底的胜利，那末，落后国家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人口的大多数

第二国际和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否认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只有达到了西欧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嘲笑了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和他们的俄国同道，说“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① 经济落后的俄国，利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革命形势，比经济发达的西欧国家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俄国革命的特色。列宁这样回答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②

俄国是这样，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东方，也会是这样。列宁说：“我们的欧洲庸人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③

列宁就是这样满怀信心地来评价东方的革命。他确信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一定会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得自己的解放，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说，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压迫者在斗争中运用了最优良的武器和战术，似乎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一旦把千百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真正唤醒，就会有极大的本领，就能创造奇迹。”^④

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说道：“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历来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而至今仍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停滞和腐败的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新民族和新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⑤

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人口的大多数。列宁说：“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市僧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

①②③ 《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435页。

④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1页。

⑤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页。



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①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又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②

結 束 語

毛澤东同志說：“馬克思主义必須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③

偉大的列宁的一生是在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尖锐的斗争中渡过的。列宁自己这样写道：“这就是我的命运。連續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这是从一八九三年开始的。庸人們的仇視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拋棄这个命运去同庸人們讲‘和平’”^④。正是在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列宁保卫了馬克思主义，并把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斯大林曾經說：“列宁主义是在对各色机会主义，其中包括对西方的中派主义(考茨基)以及对我国的中派主义(托洛茨基等等)进行无情的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⑤“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馬克思的学說中基本上已經有了。这个学說，照馬克思的話說来，‘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貫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馬克思的唯物主义辯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⑥

他又說：“列宁始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为依据的。”“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馬克思恩格斯学說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馬克思恩格斯学說的继承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資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学說。这就是說，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馬克思的学說，他給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4頁。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3—454頁。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頁。

④ 《給印涅薩·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48頁。

⑤ 《論布尔什維主义历史中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7頁。

⑥ 《論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8頁。



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长期的、坚决的、顽强的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就根本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

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派别，决不会自行消失，决不会自己改邪归正。列宁说：“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给机会主义提供了养料，它起初只是一种情绪，后来成了一种流派，最后竟成了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一个集团或阶层。”^②“在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中间可能有个别人会回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但是社会沙文主义或（这完全是一回事）机会主义的派别却不会消失，也不会‘回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发展和破产的历史证明，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随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派别，只会在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敌视革命的道路上愈跑愈远。

修正主义派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但是，他们又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列宁说：“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④“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识破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这种鬼蜮伎俩，应当像列宁那样无情地撕下他们的假面具，使他们在广大群众面前丢丑，使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藏身之所。

①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5—88页。

②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2页。

③④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6、117页。

⑤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3页。



列宁指出，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斗争的关键在于争取群众。他说：“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①“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②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列宁说：这种斗争，“有时熾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隐燃着。”^③即使老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破产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它们总是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培养新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初曾经预言：“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④。这就告诉我们，要时刻注视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出现，并同他们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斗争目标，了解事变的全部规律性，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可靠地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尽管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可以喧嚷一时，但是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它毕竟是一股逆流，终究要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洪流所淹没。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前进！

（續 完）

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8页。
 ②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页。
 ③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18—319页。
 ④ 《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5页。



红旗

HONGQI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路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12

一九六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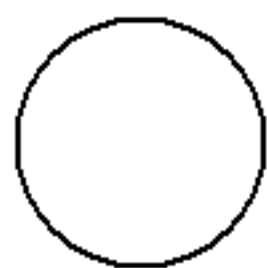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二期 ★



☆ 六月十七日出版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路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们，都对中苏两党会谈十分关切，希望我们的会谈有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神圣责任。中苏两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负有更大的义务，理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中共中央就是抱着这样的真诚愿望，对待即将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的。

苏共中央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就中苏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问题，系统地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这封信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谈谈我们的观点，作为我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会有助于我们两党的相互了解，会有助于在两党会谈中逐点的、详细的讨论。

我们还希望，我们这样做，会有助于各国兄弟党了解我们的观点，会有助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中充分地交换意见。

(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论为准则，而不能离开这个准则。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了宣言和声明。这两个文件，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路线。宣言和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只有坚持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二) 什么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三) 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

这条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各国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也是最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路线。

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那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表达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都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都不会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基本方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四) 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规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出发点。

如果避开具体的阶级分析，或者随便找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结论，必然滑到同马克思



列宁主义根本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去。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有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而大大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尽管这样，以上的这些矛盾还是客观地存在着。

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

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

(五) 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问题上，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

1, 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矛盾。

2, 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3, 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



級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

4, 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壟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

5, 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显然，这些错误观点都必然会引出错误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损失。

(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上已经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已经不只是近两亿人口，而是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要求，主要是：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对内对外政策；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綫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实现这些要求，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实现这些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各国，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是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目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斗争的。当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由于坚决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敌视和危害的时候，是否坚决维护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否维护组成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否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如果有人不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



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不是维护团结的政策，而是维护分裂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七)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件，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进行着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宣传。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进行反苏的战争、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这种宣传作为烟幕，来掩盖它压迫本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一九六〇年声明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其结果只能同它的愿望相反，只能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

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

相反的，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幻想的破产。

(八)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现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这种骗人的“理论”，受到这些地区人民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



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没有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赢得自己的解放。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①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九)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

历史赋予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主要地是要联合农民，建立巩固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版，第238页。



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农村中进行工作，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需要学会各种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就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打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巩固同他们的团结。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

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一九六〇年声明說：“共产党人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搖撞騙”。

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十)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争取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觉醒之中。他们的斗争，打击着垄断资本和反动势力，不仅为本国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光明的前景，而且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愿意反对本国垄断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左翼分子和中间分子，同他们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 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依据。

共产党人从来愿意经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呢？绝对不能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九五七



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任何旧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

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有人说，马克思在预言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先例，为什么不能在沒有先例的情况下预言资本主义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种荒唐的比拟。马克思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而那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的预言家，却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抹煞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人，怎么能够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帮助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加强它们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机器，其目的首先是镇压本国人民。

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和武力进攻的时候，给予有力的回击。

如果不作这样的准备，就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局面，以致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十二) 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性，都是不



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一种客观規律。历史证明，革命沒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沒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

无产階級政党的任务，是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分析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人民群众繞过暗礁，避免某些不必要的牺牲，有步驟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牺牲呢？奴隶革命，农奴革命，資产階級革命，民族革命，都不是这样，无产階級革命，也不是这样。即使革命的指導路綫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革命不遭受某些挫折，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某些牺牲。只要坚持正确路綫，革命最終总是要胜利的。借口避免牺牲而取消革命，这实际上只能是要人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忍受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識告訴我們，革命引起的分娩陣痛，总比旧社会的慢性痛苦少得多。列宁說得很对：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靜的日子里，也經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階級遭到无数的牺牲”^②。

如果誰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風順，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不管在怎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败，无产階級革命家都应当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拋棄革命的旗帜。

在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階級政党就輕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傾冒險主义。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无产階級政党不敢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傾机会主义。

无产階級政党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在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时候，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和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組織准备，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推翻反动統治，建立新政权。否則，即使客观条件成熟，也会白白地丧失夺取革命胜利的时机。

无产階級政党必須坚持高度的原則性，也要有灵活性，有时也要实行有利于

^② 《新的激战》。《列宁全集》第5卷，第11頁。



革命的必要的妥协。但是，不能借口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而根本放棄原則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

无产階級政党要領導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那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統治，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如果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么，他们就势必喪失人民群众的信任，被拋到革命潮流的后边去。

如果党的領導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綫，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們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領導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資产階級革命派就会起来領導革命，无产階級政党就会喪失革命的領導权。当反动的資产階級叛变革命、鎮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綫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

如果共产党人沿着机会主义道路滑下去，那么，他們就会墮落成为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資产階級的附庸。

現在自称为继列宁之后对革命理論作了最大創造性貢獻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們真正考虑过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經驗沒有，他們真正注意到国际无产階級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沒有，他們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沒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教訓，民族解放运动的經驗教訓，是很多的。有应当受到人們歌頌的經驗，也有使人痛心的經驗。各国共产党人和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認真地思考和研究这些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結論，吸取有益的教訓。

(十三) 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



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能采取热烈同情、积极支持的态度，而绝对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

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③ 谁不了解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赐，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说来，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决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正如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拆穿了说，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

^③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第72页。



支持这种革命。

(十四) 几年以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经说得不少了，说得够多了。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很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

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④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战争呢？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还是世界战争？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也就是反对革命。

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

④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7页。



会有这样的主张。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列宁是这样看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战争根本不能发生。”^⑤

一九六〇年声明也說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識告訴我們，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謂没有武器、没有军队的世界，只能是沒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說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棄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銷毀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⑥

世界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竟那里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呢？他們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嗎？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們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军的主张，是必要的。經過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军协议，是可能的。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騙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

^⑤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7—368页。

^⑥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为了克服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论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近年来有些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事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许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难道事实不是证明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吗？

(十五) 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十几年来采取了核讹诈的政策，企图用以实现它的奴役全世界人民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帝国主义者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也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促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是把自已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的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們本



身的利害关系。

同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力量，是自己的正确的政策，它根本不需要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里，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

核武器的出现，不能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历史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各种旧制度的灭亡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已经过时和已经变成陈腐的“教条”了。

(十六)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众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列宁领导下，随后又在斯大林领导下，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只是在德帝国主义者举行进攻的时候，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实行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做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说成是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都毫无所知，说成是大逆不道的异教徒。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随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項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項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十七)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 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 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 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棄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遺留給社会主义的傳染病、瘟疫和潰瘍”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貫穿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說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說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



不是革命的終結。”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十八)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⑦

列宁经常强调地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伟大学说，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的发展过程，同时自己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⑧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⑨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⑧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6页。

⑨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要放纵那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发展？

就是说，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

那么，所谓“全民国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全民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资产阶级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

有人会說，他们那里已经是沒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說，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說，沒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說，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沒有必要了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除了镇压敌对阶级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



創造条件。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濟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质，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十九) 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的党”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

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階級的、超階級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階級性的。党性，就是階級性的集中表現。

无产階級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階級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階級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階級的本性，根据无产階級的現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問題，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紀律。沒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階級专政，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階級的政党已經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階級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馬克思、列宁的无产階級政党的学說相抵触？

那岂不是在組織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階級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資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在这种情况下，談論什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那岂不是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二十) 几年以来，有些人違反列宁关于領袖、政党、階級、群众之間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說，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錯誤的，有害的。

列宁在这个問題上提出的学說是这样的：

1. 群众是划分为階級的；
2. 階級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3. 政党通常是由比較穩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經驗、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

列宁說，以上这些“都是起碼的常識”。

无产階級政党是无产階級革命的和战斗的指揮部。任何一个无产階級政党，必須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必須建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成



为有组织的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列宁批判了那种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这“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中国共产党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主张和坚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认为凡属正确的领导，都必须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复活动，又是什么呢？

现在应该是到了认真地、全面地宣传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时候了。

(二十一)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必须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发挥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才能够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够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

也只有这样，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才能增加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力量。因此，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计划，



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互助合作、互通有无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

如果否认这些基本原则，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

(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我们注意到，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沒有“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都应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人可贵的品质是言行一致。只有不仅在言论上，而且更重要的在行动上，真正坚持而不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真正遵循而不是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才是维护和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



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許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許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沒有“上級”和“下級”之分，那就不能允許把自己一党的綱領、決議、路綫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强加給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則，那就不应当強調什么“誰是多数，誰是少数”，依恃所謂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的錯誤路綫，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決議和声明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間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我們认为，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強調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則，是特別重要的。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問題。苏阿两党、两国关系問題，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問題，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則的問題。这个問題的正确解决，对于維護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具有原則性的意义。

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絕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問題相提并論。

你們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棄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間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繼續攻击阿尔巴尼亚同志采取“分裂行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問題的解决的。

究竟是誰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

究竟是誰把苏阿两党之間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究竟是誰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无论如何，怎样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谈论的“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诽谤的最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的党和没有执政的党，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过去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不仅损害有关兄弟党的利益，而且损害有关兄弟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国大党必须谨记列宁的遗训，千万不能再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

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遭到许多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和损失，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二十三) 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必須同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各種機會主義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宣言和聲明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或者說右傾機會主義。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現代修正主義的代表。

聲明特別指出：

“各國共產黨一致譴責國際機會主義的南斯拉夫變種——現代修正主義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

聲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布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用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對抗，把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立起來，使自己的國家脫離了社會主義陣營，使它依賴美國帝國主義者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的所謂‘援助’”。

聲明繼續指出：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進行着反對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破壞工作。他們以非集團政策為借口，進行着有害於一切愛好和平力量和國家的團結的活動。”

因此，聲明就得出這樣的結論：

“進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領導人，為了使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反列寧主義思想的影響而積極鬥爭，仍然是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一項必要任務。”

這裡提出的問題，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

直到最近，鐵托集團還公開聲明堅持他們的修正主義綱領，堅持他們同宣言和聲明相對立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

長時期以來，美帝國主義及其北大西洋集團的同伙，用了幾十億美元豢養鐵托集團。鐵托集團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打着“社會主義國家”的旗號，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人民革命事業，充當美帝國主義的別動隊。



說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美好趋向”，說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說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〇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呢？

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



产党的綱領和決議当作自己的路綫，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錯誤。

現在，有些人正是違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們借口什么“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拋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們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的药方，說成是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迫別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許多严重現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二十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經驗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須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須要有一个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須要有一个善于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須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須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錯誤，善于进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經過认真的調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經驗，跟着外国某些人的



指揮棒团团打轉，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燴，而单单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絕不可能領導无产階級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絕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絕不可能完成无产階級的偉大历史使命。

这是各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觉的工人，一切先进分子，需要深思熟虑的問題。

(二十五)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們历来主張經過內部协商来解决問題，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苏共同志知道，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論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們身上的。

公开爭論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爭論，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我們认为，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爭論，就沒有理由，也沒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們。

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辯的文章在自己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許多罪名，硬加在我們的身上。我們把这些攻击我們的文章和言論，在我們的报纸上发表了。

苏联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編輯部文章，苏共代表团团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的編輯部文章，这些也在我們的报纸上全文发表了。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三十日的两次来信，我們也全文发



表了。

我們对于若干兄弟党攻击我們的文章和言論，有些已經作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例如，对苏共同志的許多文章和言論，我們都还没有直接回答。

我們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这些文章的題目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們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問題》，

《評美国共产党声明》。

你們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末尾，指責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文章。把我們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顛倒了是非。

既然你們把我們文章說得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們为什么不像我們发表你們的文章那样，也把我們的这七篇所謂“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統統公开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誰是誰非呢？当然，你們也尽可以逐条駁斥这些你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

你們說我們的文章“毫无根据”，說我們的論点是錯誤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們的真正論点告訴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說是对待兄弟党之間討論問題，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

我們希望，兄弟党的公开爭論能够停止下来。这个問題，必須根据兄弟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誰都沒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辯就下令“停止公开爭論”。



苏共同志知道，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已经决定，从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起，对于兄弟党同志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覆。我们保留公开答覆的权利。

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信中說，关于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 × ×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意见。我们这样坦率地提出这些意见，正像我们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所希望的，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当然，对于这些意见，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你们在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和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进行充分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信中，曾经建议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如果不方便，请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表示赫鲁晓夫同志不能到中国来，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邀请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毛泽东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谈过他现在不准备访问苏联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五月九日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已经通知你们，中共中央将派出代表团，在六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我



們又同意把两党会談推迟到七月五日举行。

我們真誠地希望，中苏两党会談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作出貢獻。

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兄弟党一致協議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結起来。

中国共产党願意同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为了維護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了維護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为了維護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繼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們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里今后不再重复出現那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現象。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階級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維護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团結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更加偉大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們的共同敌人！

此 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红旗

HONGQI

13-14⁰

一九六三年



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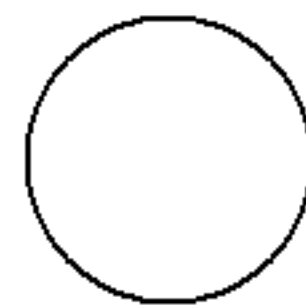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

目 录

社 论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 (2)
	一个团结勤奋向上的集体.....李成章 华 福 (15)
	老贫农的本色李廷凡 钱 进 (19)
	“劳动带头干, 工作是模范”.....申元则 连治水 (23)
	身份是社员, 劳动是本分孙汝纯 毕可友 (27)
	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郑际雄 (30)
	社员的好榜样, 青年的带路人.....莫占林 (35)



他們为什么能一贯参加劳动?万里云 潘用庭 (39)

四望山下 碧 野 (42)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王樂生 杜加星 項紹棠 (47)

他是庄稼人周維敷 任洁民 (52)

十三年手不离鋤張 健 任 山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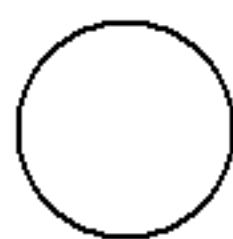
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
 伟大范例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 (60)

把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永远坚持下去
 中共鞍山市委委员会 (66)

地委书记余锡渠同志伊 曉 (71)

☆ 七月十日出版 ☆





——社 論——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 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

列宁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底意义，比如說，某个生产組合榜样底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满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才能够梦想以慈善机关榜样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轉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在剝夺者已被剝夺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榜样底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所多次指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来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①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不断反复地证明了列宁这个論点的千真万确。

本刊十三、十四期合刊发表的十四篇文章，介绍了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县、专区等几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些模范事迹。这些集体的和个人的光辉榜样，有力地激励、推动广大干部，包括在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工作的干部，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制度，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光辉榜样，同时又启发我們进一步認識、領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深刻意义。

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本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告訴我們：

一、干部和群众一起劳动，以实际行动表明我們的干部同样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群众就会把干部看作是他們自己的“贴心人”，对干部无話不說，无事不談，彼此之間亲密无間。

有的人民公社干部說：“社員看干部，亲不亲，看劳动。”“咱是劳动人民出身，劳动是咱的本分，不劳动就要脱离群众。”

社員群众反映：“社、队干部和咱們一起劳动，咱們和干部就沒有隔膜。”

二、干部坚持参加劳动，能够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发揚艰苦朴素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有的基层干部說：“铁耙不用要生銹，干部不参加劳动会褪色。”“劳动是对咱們的考驗。”

^① 《苏維埃政权底当前任务》。《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91頁。



“干部和社員一起劳动，臉上的灰尘，身上的髒东西，大伙看得一清二楚，馬上帮着擦洗，使干部永远干淨。”

三、农村工作干部参加劳动，可以增强阶级意識和阶级感情，更好地依靠貧农、下中农，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綫。

有的人民公社干部說：“劳动把阶级兄弟的心联結在一起”，“革命干部不劳动，就会忘記过去的穷兄弟，就会在阶级斗争中站不稳脚跟。”

四、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劳动，能够有力地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群众說：“干部积极带头劳动，咱們都把心窝子掏出来干。”“干部下田間，一天頂两天，問題解决快，社員干得欢。”

五、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可以增加社会物质財富，減輕生产者的負担，巩固集体經濟，巩固全民經濟，促进生产发展。干部在生产中洒下了自己的汗水，就更加爱惜劳动的成果，成为社会主义經濟的精打細算的好管家人。

六、干部参加劳动，起着移風易俗的作用，有利于造成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社会風气。在这种社会風气下，能劳动的人不劳动，就会觉得“理亏”，就会觉得难为情。

七、在干部参加劳动的影响下，年輕的一代，就可以循着勤劳、儉朴、热爱集体的道路，健康地成长起来。

群众說：“守着什么人，学出什么人，什么样的人，教出什么样的人。”

八、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生产情况更熟悉了，生产知識更丰富了。不懂生产技术的干部，拜老农为师，或者拜老工人为师，学会了生产技术，取得了生产經驗，领导生产就更具体、更踏实了。

有的基层干部說：“只有参加生产，才能取得指揮生产的发言权。”

九、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便于在生产中进行科学試驗，經過刻苦钻研，可以把自己鍛炼成又紅又专的干部。

有的干部說：“生产劳动像熔炉，既能把思想炼紅，又能把本領炼好。”

十、干部在劳动中和群众打成一片，能够及时地宣傳、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針政策，很好地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实际情况，有利于进一步地发展民主生活，正确地解决工作中的問題。

有的干部說：“和群众同劳动，同商量，既能摸透人的脾气，又能摸透自然的脾气，这是领导好生产的两个重要条件。”基层干部“經常和群众滚在一块，貼着身子实干，实际情况了解得透，底子摸得清，說的話，句句在群众心上，出的点子，个个合群众心意。”

群众反映：“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說到，生产还能搞不好！”



总之，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制度，参加集体经济或者全民经济的集体生产劳动，这表示我们党的干部同样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就能够同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及时地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状况，及时地同群众商榷，更好地发扬民主，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

相反，我们的干部，如果不积极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群众就会把这样的干部看作“官老爷”，这些干部就要脱离广大群众，就会在思想感情上和劳动人民疏远起来，群众就不会对他们说知心话。他们就不能深入地了解情况，如实地反映情况。正如有的基层干部说：“要是脱离了劳动，只能摸到问题的毛毛皮皮。”“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上面，摸不到底。”这样，干部就听不到群众的呼声，了解不到群众的要求，出的主意就不能符合实际情况，就不能执行群众路线，难以健全民主生活，无法正确地解决问题，真正做好工作。有的干部如果长期脱离劳动，就会从轻视劳动，不劳动，发展到厌恶劳动，贪安逸图享受，从铺张浪费到挪用公款，甚至发展到贪污盗窃，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

由此可见，广大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一个普通劳动者，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虽然干部和群众之间有分工上的不同，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在旧社会，在剥削制度下，各级官吏是爬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欺压人民、剥削人民，他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对立的关系，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我们新社会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同旧社会的官民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当了干部就以为是做了“官”，染上“官老爷”习气，这就混淆了新社会干群关系同旧社会官民关系的界限。

人民群众对于干部染上官老爷习气是很不满意的。如果干部不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劳动，自视特殊，以为比群众高出一头，群众就会把他们看作是“官”。山东省文登县高村人民公社社长兼生产大队队长张富贵同志的体会，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有一段时间，张富贵同志参加劳动少了，有些社员就说他“当上了甩手掌柜”，看到他过来就说“大官来了”。他由此提高了警惕，自觉地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就逐步改变了群众对他的看法，重新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信任。北京市顺义县张喜庄人民公社后渠河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由于不参加劳动而落选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



生产队队长“光说不练”，“只谋不干”。他在社员干活的时候，总是两手背在后面，哈着腰问社员：“你干得怎么样啦？”或者对社员说：“你干得对！对！对！”说完就照例倒背着双手，到生产队的场院看门睡觉去了。社员们一看到这位队长，都装作没有见到他一样。今年改选队干部的时候，社员群众就不选他做队长了。前一个事例说明，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勤勤恳恳地当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后一个事例说明，基层干部脱离劳动，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

一个革命干部，要能够真正做到自觉地参加劳动，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深厚感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干部在劳动中和群众同甘共苦，又可以进一步地提高阶级觉悟，更好地培养阶级感情。农村和城市的事例，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事例，都证明，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干部，当了干部仍然坚持参加劳动，能够使自己固有的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始终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干部，在生产劳动中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可以改造自己，真正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干部。这样，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更好地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同群众一起，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表明干部以身作则，向好逸恶劳的恶习，向企图靠剥削别人发财致富的人，向一切轻视劳动人民的旧观念、旧思想、旧习惯，进行坚决的斗争。山西省昔阳县，浙江省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在广大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浪潮中，形成了一种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全新的社会风尚。它使好逸恶劳的人受到责备，不能心安理得；使游手好闲的人受到群众监督，不能洋洋得意。这种社会风尚，在那些地方已经成为一种滌荡和扫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成为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在这里，还需要说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干部是数以千万计的，他们的子女的人数就更多了，我们的干部尽可能地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以给予子女后代做出良好的榜样，使子女后代从小就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尊重劳动的感情。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将来，毫无疑问，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

好逸恶劳是剥削制度造成的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势力，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一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我们在向这种习惯势力和传染病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大大提高劳动人民的自觉性，激发劳动人民的热情，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劳动。正如列宁所说的：“要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要使地主资本家的政权永远不能复辟，就必须建立一支伟大的劳动红军。这支劳动红军只要有了劳动纪律，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工人和农民应当证明，而且他们一定会证明：他们在不要地主并反对地主，不要资本家并反对资本家的情况下，自



己会正确分配劳动，树立起为共同利益而劳动的严密的纪律和忠诚老实的态度。”又说：“劳动纪律，高涨的劳动热情，自我牺牲的决心，紧密的工农联盟，这就是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的东西。”^①

同时，我们又必须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对过去的剥削者、寄生虫进行严格的监督，强迫他们实行劳动改造。也正如列宁所说的：“只有由工农群众自愿而诚意地带着满腔革命热情来共同进行这种对富人，对骗子，对懒汉，对流氓而实行的统计和监督，才能克服可恶资本主义社会底这些余孽，才能克服人类中的这些糟粕，这些无可救药的，腐败的，僵死了的成份，这种由资本主义留给社会主义的恶疾、瘟疫和毒瘤。”^②

好逸恶劳还是诚实劳动，轻视劳动还是热爱劳动，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干部认识不够，觉悟很低，不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制度积极参加劳动，不在群众中做出诚实劳动、热爱劳动的榜样，我们就不能有效地提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不能很好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对一切剥削者和寄生者，实行严格的劳动监督。时间长了，反动的剥削阶级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就会利用某些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空子，使用各种手段，对干部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把某些蜕化变质的干部变成他们的代理人，或者在一些组织中安置他们的人，从而达到他们篡夺我们某些单位领导权的目的，使个别单位的党的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或者群众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也会在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下，受骗上当，以至于和他们同流合污。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就可能出现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极为不利的严重局面，就可能出现反革命复辟的严重危险。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尽管这种斗争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但是，无产阶级终究会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究会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我们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整个中国必将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

我们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的根本保证，是我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党的领导下，早已建立了

① 《留声机片录音演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0页。

② 《怎样组织比赛？》。《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309页。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革命专政。在我国国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寄生虫、骗子、流氓，他们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而拥护这个革命专政的却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们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侨胞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充分的信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一方面，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那些图谋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领导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是一个善于把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是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是一个善于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革命党，是一个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久经考验、久经锻炼的，光荣、伟大、正确的革命党。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已经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并且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胜利。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在把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党，为了履行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赋予它的神圣职责，过去已经坚决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现在和将来也还要继续坚决向它们进行斗争，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维护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利益。

为了继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国人民面前，在全党同志面前，有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必须向那些企图削弱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削弱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倾向，哪怕是一种处在萌芽状态的



倾向，进行严肃的斗争；向那些如果滋长起来就有可能影响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改变性质，影响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性质的倾向，在这些倾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进行严肃的斗争。我们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总结实践的经验，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采取有效的制度，来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性质，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性质。在这方面，全面地、系统地、持久地实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党组织，有密切联系劳动群众的义务，没有脱离劳动群众的权利。我们国家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基层政权的干部，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他们应当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只要我们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制度，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的集体生产劳动，我们的干部就一定能够同劳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政府和各级党组织，就一定能够同劳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摧毁以至肃清那些妄图侵蚀、以至瓦解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各种反动势力，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继续处理敌我矛盾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①

生产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不同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的问题。在我国，废除了剥削制度以后，早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国人民已经结成同志式的合作互助的关系，从事生产斗争。这种生产斗争愈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愈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的积累就愈增加，我国人民的生活就愈富裕。所以，对于我国劳动人民来说，进行生产斗争已经不像在旧社会那样，只是他们免于饥饿、免于死亡的谋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生手段，而已經成为創造幸福新生活、建設偉大新社会的根本途徑。我們必須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組織一切可以組織的人員，全部投到生产斗争中去。决不能使那些能够参加生产斗争的人不参加生产斗争，决不能使那些不需要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任意地脱离生产劳动。

馬克思說过：“节省時間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門中有計劃地分配劳动時間，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經濟規律。”^① 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还說过，在各个生产部門之間分配劳动時間，或者說分配劳动力以外，还有一个在整个社会中的生产部門和非生产部門之間分配劳动力的問題。馬克思說：“……生产劳动者会替不生产劳动者，創造他們所賴以維持，所賴以生存的物质基础。”^② 又說：“假設两国的人口相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又相等，則亚当斯密如下的話，常常是正确的：两国的财富要由生产劳动者与不生产劳动者間的比例来丈量。这不外說，在生产劳动者人数比較多的国度，年所得中将有一个比較更大的量，被消費在再生产上，所以每年会有一个較大的价值量被生产出来。”^③ 对于这个重要問題，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曾經作了通俗而深刻的說明。他說：“我們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們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險。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④ 毛澤东同志还說过，即使那些必須脱离生产事务的人員，也要尽可能地参加生产，来增加物质财富，以減輕生产劳动者的負担。他說：“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訓練和工作的間隙里，一律参加生产。”^⑤ 他又說：“現在我們边区的軍队已經学会了生产；前方的軍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們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說过的：‘无敌于天下’。我們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占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絕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問題，用稅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結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軍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⑥

毛澤东同志的这些話，一直到今天还保持着非常现实的意义。毛澤东同志說这些話的时候，我們党还没有在全国範圍內掌握政权。解放以后，我們党已經处于全国执政党的地位。

① 《1857—1858年經濟学手稿》。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頁。

②③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86、373頁。

④ 《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解放社1944年版，第177頁。

⑤ 《必須学会做經濟工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17頁。

⑥ 《組織起来》。《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932—933頁。



这种地位就要求我们更加警惕地、更加认真地注意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分配劳动力的问题，更加用心地、更加有效地增加生产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生产人员。城市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农村同样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手边有一个生产大队的材料。这个生产大队共有一百九十八户，八百三十五人，男劳动力一百四十五名。由于五个大队干部违背国家规定的制度，完全不参加生产，或者几乎不参加生产，由于每个生产队享受工分补贴的人员过多，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所以，全大队的干部，包括生产队干部，他们在一九六二年的全年工分补贴，竟达到了该大队全年总工分的百分之十点二，等于制度规定的百分之二的五倍以上。全大队的干部包括生产队的干部，全年工分补贴总数，相当于该大队二十七名中等劳动力全年劳动所得的工分。这样做的结果，增加了社员的负担，减少了社员的个人收入，减少了集体经济的积累，挫伤了社员群众的集体生产积极性，使干部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当然，这样的例子是极个别的。我们全国绝大多数的公社、绝大多数的生产大队、绝大多数的生产队，是同这个大队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应当从这种个别的例子中，看出一个基层干部任意脱离生产劳动的重要问题，看出一种可能发生的、因为干部不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并且决定我们对这种问题、这种倾向的态度。

究竟我们对这种倾向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容忍这种倾向，放纵这种倾向，甚至还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例如说什么干部工作忙，不参加劳动是可以原谅的，说什么干部参加劳动就没有时间做好工作，还说什么干部参加劳动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这样来助长这种倾向呢？还是应当严肃对待，认真处理，批评这种倾向，制止这种倾向，驳掉各种各样为这种倾向辩护的所谓理由，坚持党和国家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呢？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采取的态度，只能是后者，绝不能是前者。原因很简单，虽然像前面所说的那个大队的例子在我国社会里是极个别的，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遵守制度，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但是，这个例子，确实代表一种如果我们不加警惕就会滋长起来的倾向，确实说明好逸恶劳的恶习已经侵蚀了我们一些干部。如果我们不采取严肃的态度去制止它，而采取错误的态度去放纵它，这种倾向就会发展起来，好逸恶劳的恶习就会侵蚀我们更多的干部，违背党和国家规定的制度而脱离集体生产劳动的人就会一天天多起来，不生产物质财富而消耗物质财富的人就会一天天多起来。这样，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就会滋长蔓延，生产劳动者的负担就会愈来愈重，生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挫折。对于一种坏的倾向，我们应当在它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看见它，制止它；不要等到它发展起来，才去注意它。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即使能够克服它，也要花很大的力气了。

不应当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任意地脱离生产劳动，能够而且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人，不



尽可能多地参加生产劳动，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能否迅速增加的重大问题。

大家知道，我国社会主义资金的积累，正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绝不能用帝国主义者掠夺殖民地的办法来实现，绝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索取赔款的办法来实现，也不能靠从外国取得奴役性借款的办法来实现。帝国主义者不会借款给我们，帝国主义的走狗外国反动派也不会借款给我们。我们也根本不打算接受任何不平等的条件，向帝国主义者、外国反动派或者其他什么人借款。

我们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要同世界各国进行国际贸易，互通有无。要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主要的是依靠自力更生。我国社会主义资金的积累，唯一的来源是靠自己，靠全国人民辛勤劳动，增加生产，靠我们坚持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六亿多英勇勤劳的人民，有成百万成千万品质好、作风好、联系群众、受到群众欢迎的干部，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比拟的广大的国内市场，有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这些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完全有可能，因而也完全有信心，通过内部积累的途径，增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困难呢？能不能因此就说，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呢？不能这样说。除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捣乱以外，这里要着重说到的是：在我们的干部中，还有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这些同志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熟视无睹，麻痹大意，甚至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些同志的官僚主义还表现在：有的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有的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检查工作。有的不钻具体业务，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的爱铺排，摆摊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很大。有的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遇事推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好逸恶劳，多吃多占，争名位，摆官架子，官气很大，不关心群众痛痒，不关心国家利益。有的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压制批评，滥用权力，违法乱纪，甚至站在群众头上，称王称霸。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存在以至滋长，必然妨碍领导和群众的团结，妨碍人民内部的团结；必然伤害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积极性，伤害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的积极性；必然使我国深厚的生产潜力不能充分地发掘出来，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事业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必然使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成果不能合理地利用，甚至会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损失。这样，就不但不能增加、反而会浪费社会主义积累的资金，不但不能加快、反而会减



低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速度。

官僚主义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遗留给我们的毒害。而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必须无情地揭露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深刻地认识官僚主义在各方面对我们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提高干部的觉悟，动员广大的群众，严肃地、认真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是沒有染上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都应当随时警惕，避免这种毒害的影响。凡是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染上了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都应当痛下决心，从自己身上把这种习气扫除干净。我们务必力求作到，在革命队伍里面，在各级政府里面，在各种事业、企业单位里面，在人民团体里面，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只要我们认真地、逐步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强领导和群众的团结，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大大地激发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积极性，进行生产斗争的积极性，充分发掘一切生产潜力，顺利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这样，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大大增加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数量，大大加快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速度。我们每年资金的积累，就将比现在多得多、快得多。让我们的全体干部都深刻地认识到，用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来增加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吧！

官僚主义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我们各方面进行认真的工作。要加强政治上的领导，要进行组织上的合理调整，要抓紧思想上的说服教育，要废除那些使官僚主义能够存在和滋长的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坚持和建立那些能够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这方面，我们要坚持的重要制度之一，就是党和国家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说：各级干部凡是能够而且需要参加体力劳动的，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时间，采取各种各样办法，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一九五八年九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几年来，我们许多干部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和决定，在进一步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必须继续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和决定，并且总结实践的經驗，使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更加完善起来。

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干部是在战争中学会领导战争、指挥战争的。如果当时我们的干部不投身到战争中间去，只是纸上谈兵，那就不可能学会领导战争、指挥战争，我国



人民也就根本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同时进行生产斗争，已经成了全国人民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广大干部也必须投入到生产斗争中去，在生产中学会领导生产、指挥生产，了解生产斗争的规律，掌握生产斗争的规律，把全国人民更好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生产斗争的伟大革命运动，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使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要使我们的伟大祖国在世界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在全国持久地开展三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一个是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一个是生产斗争的革命运动，再一个是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技术水平还很低，我们要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在科学技术上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在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革命运动的同时，发挥现有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开展一个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

这样三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意义极其深远，规模极其宏大，内容极其丰富，问题非常复杂。采取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是绝不可能领导这样的革命运动的，只有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格的科学态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谨的科学方法，才能领导好这样的革命运动。

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进行工作，首先就要系统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准确地、全面地了解实际情况，以便得到正确反映实际的思想，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使主观指导符合于客观实际。调查研究，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东张西望，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搜集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个别材料，为自己的主观主义设想辩护，而是真正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蹲下来，与群众同劳动，同商量，对一些重要问题，取得系统的、最基础的知識。但是，有一些同志则不是这样，他们口里也讲调查研究，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因而他们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查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中，把群众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还要经过思考，经过分析和综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和意见，加以鉴别，特别是要进行阶级分析，弄清它是从哪个阶级来的，对哪个阶级有利，这样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取舍。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听到、看到的一切，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接受过来，那是很危险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最好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因为在生产劳动中，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乐于对干部说知心话，干部能够真正了解群众的情绪、要求和愿望，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细致地分析问题。如果干部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群众，下去调查，只是主观



主义地大胆假设；然后又主观主义地小心求证，这样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调查研究工作的。

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把经过调查研究，经过典型试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还要到群众的实践中去进行检验。经过多次反复，使领导的意见逐步地完善起来，并且变成群众的行动。这又是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方法进行工作的一项决不可少的要求。采用这样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工作，我们的工作就能进行得更顺利，更有把握，避免或减少某些错误。

上面所说的这种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学会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工作，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論，是摆在我们广大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認識論，他們的世界观和方法論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們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們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我们领导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取得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我们要使这种制度更好地坚持下去，就必须进行思想斗争，克服思想障碍，切实帮助干部深刻認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同时也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特别要加强对县委的领导、帮助和监督，认真提高县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督促他们以身作则，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劳动。要帮助县级党、政组织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精简会议，简化公文表报，为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并且经常认真地检查、了解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在广大的基层干部中，在广大群众中，造成参加劳动光荣、不参加劳动可耻的革命风气和革命舆论。

我们全体干部必须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只要我们认真地这样做，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能够在国际国内的任何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永不褪色；我们的党就能够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我们的国家就能够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够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就能够更快的发展；我们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帮助就会更多，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完成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赋予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一个团结勤奋向上的集体

李成章 华 福

一九六三年四月下旬，云南省晋宁县上蒜公社上蒜大队三十个生产队的队长开评比会，一致评选上蒜村第四生产队为模范生产队。生产队队长们说：上蒜四队的干部和社员一条心，觉悟高，集体生产搞得好，国家的任务也完成得不错，确是一个模范队。我们要向四队看齐！

有个好队长

上蒜村四队为什么能成为模范生产队呢？

这个队的社员说：“龙头动得好，龙身才舞得好；因为我们有个好队长呀！”就在评选模范生产队的当天晚上，社员们不顾队长李凤英的反对，首先提名“李大姐”，要评选她为模范社员。

上蒜村本来是一个生产队。因为户数太多，安排生产不方便，去年夏天划分成四个生产队。分队的时候，社员们都盘算该选谁当队长。四队的社员在心里点了点本队的人，认定原来的副队长李凤英适合，便议论着要选她。李凤英听说要选自己当队长，愁得不得了。她想：过去虽然当了几年副队长，但究竟是副的，天塌下来，有长汉子顶着。现在要自己做长汉子，大字不识一个，记性又不

好，那行吗！正在这时候，从前的社长、现在的县委书记李能同志回村子来了。李能很了解李凤英。听说这事，他便去找李凤英。李能说：“大家要你当队长，你不当，是吧？”“是的呀，大哥！”李凤英老实地承认。李能对她说：“当队长当然不会没有困难，不过只要依靠党支部的领导，有事找社员群众商量，按党的政策办事，大公无私，工作是可以搞得好的。”李凤英不吭气。“你不想当，好吧！”李能说，“那就让地主、富农来当吧！”

响鼓何消重槌！李能这一句话，打动了从小受苦受难的李凤英的心。从此，李凤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拿出全部力量，挑起九十多口人的生产、生活的重担。她牢牢记住党的教导，认真地贯彻党的政策，把集体经济办好。

最令社员钦佩的，是李凤英的大公无私。去年，公社号召社员积极支援国家建设。李凤英家里养了两头猪，火把节杀了一头，把一半卖给国家。后来她想，卖活猪给国家，国家才好调运，便说服她哥哥李进，合伙又把一头大猪卖给供销社。去冬订积肥计划分配任务时，有个队委委员建议：“大姐事情忙，要照顾全盘，还要开会，莫要给她订任务了，我们一个多簸几簸就行了。”社员都赞



成。可是李凤英却反对。她說：“这些事情，我們当干部的更要带头。”去年她家的投肥任务是五千斤，結果投出了五千一百五十五斤。今年已經投出的肥料，按劳动力計算，也比大部分人家多。不久前，队上計劃在种植业方面开展多种經營，要撒辣子秧，但是沒有种子。李凤英說：“我家有，先拿去撒了再說。”李凤英不但生产安排得好，对社員生活也很关心。所以社員們越来越热爱、信任自己的队长。社員二順的媽甚至这样說：“我們的队长，点着火把都沒处找。”

团結的队委会

社員們把当上模范生产队的功劳归在生产队长身上，队长坚决不同意。李凤英說：“我，有个哪样本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我們队的事搞得还可以，是因为干部、社員团結心齐。”

事实确是如此。这个生产队团結的核心，是由老貧农和下中农組成的队委会。李凤英在工作中，紧紧依靠了这个队委会。七个队委委員中，有三名共产党员；其中，五人是在貧农，两人是在下中农。他們当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因为公道和能干，得到社員的信任。这是他們共同的地方。

此外，他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副队长段云，他最大的优点是不会光扛着鋤头轉田。他既督促社員做，又自己亲身做。累人的活計他搶着做。再說当了近十年保管員的李昌，得了个“铁柜子”的美名。他把保管工作的范围，从仓库扩大到了田里。段寿是个青年人，不爱說話，主意少些，但會計工作做得挺認真。初当四队會計的时候，沒

有經驗，很少公布工分。社員提了意見，他馬上改进，做到工分十天累計一次，十天公布一次，一直坚持到現在。

队委委員們在工作中既有明确的分工，同时，也能很好地合作。李凤英管全面，李昌、段寿管财务，馮会仙帶領妇女做活，段云、段有志等帶領男社員做活。有事情，总是大家先商量，思想一致了再干。李凤英常說：“一人沒有二人意，三人出个好主意。”大大小小的事，她都尊重队委会成員的意見。队委委員們受到尊重，就更爱出主意、提意見。队长和队委委員团結、齐心。这种团結齐心，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灶头会”上。

什么叫“灶头会”呢？“灶头会”是一种每天晚上都开的碰头会，会场就在队长家的厨房的灶面前。队委委員們常在晚上找到李凤英家的灶房里来商量工作。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天一黑，不用請，不用喊，村这头、村那头的大部分队委委員，就信步走到李家灶房里来。有工作就商量工作，沒工作就閑聊一陣回家。事实上，“灶头会”成了队委会議的补充。

“灶头会”的内容，一般是研究当天的生产情况，安排第二天的生产，研究社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灶头会”上的亲切交談，还往往貫穿着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有天晚上，商量开展多种經營，預备利用村旁的两个塘子栽茭瓜。有个队委委員說：“栽茭瓜，我們赶紧点，免得其他三个队也来爭塘子。”李凤英想，这两个塘子，是四个队共有的，而且李能同志回家来也經常說，四个队要团結好，共同搞好生产。她便对那个队委委員說：“你想把我們生产队搞好是对的，但那三个队将来



收入少，还是要不得。要四个队都增产增收才好。”过后，他们就去找另外三个队的队长，讲了栽菱瓜的打算，一齐到塘子边商量着划了水面。又有一天晚上，一个队委委员告诉李凤英，說她的儿子李来学，挖田的质量不好。李凤英不仅批評了儿子，并且还在社員大会上檢討了对儿子管教不严，建議减发工分。

干部带头劳动

第四生产队的干部，都是生产上的能手，都能在劳动中起带头作用。队长李凤英对栽秧、打豆最内行，副队长段云是使牛的好手，其余的队委委员在劳动上也从不让人。小春作物成熟的时候，队上派人去看守，免得猪、鸡到田里糟蹋。换了几个人都看不好，队委会决定派队委委员李昌去。李昌不怎么願意。他說：“这些輕巧事，找年紀大些的人做吧，我才五十一岁，該和大家一道挖田。”后来大家把他說服了。不过他和別队看豆的人不同。別人空着手看守，他却扛了鋤头去就近挖田。翻田正緊張的时候，許多人家的小猪滿了双月，該卖了。有的社員請假去赶街。段云虽然也需要卖猪，却没有請假。有人劝他去，他摇摇头說：“这几天活計正紧，大家正看着我們呢！”始終和大家一道挖田。栽秧正紧，李凤英病了。有人劝她休息，她說：“农忙时候，一个人要頂几个人用，怎么能閑着！”她就去替社員煮飯，換出一个劳动力栽秧。

队干部們不仅成天忙在田里，还专拣难干的活儿干，哪里困难大就到哪里去。春天，队上挑塘泥改造白胶泥田。干这项活是挺累人的。男队委委员大都参加了进去。开始，有的社員把塘子泥挑到田边上就倒。李昌

等队委委员总是挑到大田当中去倒，社員在他們的影响下，也都跟着把塘泥挑到田中間去了。队上栽菱瓜，要用些刺棵拦猪，派妇女去砍。有些女社員怕刺戳，犹豫着。李凤英和队委委员馮会仙二话沒讲，拿起镰刀就干。女社員們看了，佩服地說：“我們是娘养的，人家也不是蛋抱的。她們不怕，我們怕哪样。上！”就都上去了。

队干部們这样热心参加劳动，是有原因的。党經常不断地教育李凤英，当干部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与社員同甘共苦。李凤英把这話牢牢記在心上，用来鞭策自己，也督促队里的干部。他們现在的共同体会是：当干部的跟社員同甘共苦，社員才会跟你一条心；劳动果实要用汗水去換。因此，尽管他們常要花一些時間操心队上的事，可从来不随便耽誤参加集体劳动。为了坚持劳动，他們还在干部报酬方面采取了措施，队长和副队长一律是誤工補貼，不領固定補貼，會計每月領一点固定補貼。

四队的干部平时很注意勤儉節約。为了办好集体經濟，处处精打細算，做到省得一顆是一顆，省得一分是一分，因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社員收入。

队干部在与社員共同劳动中与社員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社員把干部当作自家人，从搞好生产出发，有意見就提；干部对社員的意見能虛心听取，認真对待。

思想工作第一

为了保证把人民公社集体經濟办好，第四生产队的党小組和队委会，始終注意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們进行思想



工作的特点是：經常結合工作，抓住活的思想，因人制宜地进行思想教育。

他們平时注意对社員进行階級斗争的教育，不断提高社員的思想觉悟。四队的社員大部分是有比較明确的階級观点的，但也有少部分社員，尤其是青年社員，对階級斗争缺乏認識。队里的富农李左香，伪装积极，暗地里却进行破坏。有些人看不清楚，认为現在地主、富农改造得差不多了，都是挣工分吃飯。党小組和队委会很重視这个情况。李凤英經請示大队党支部，召开了社員大会，充分发动群众，揭露了富农的破坏活动，使社員受到了深刻的階級教育。段云曾感慨地說：“地主、富农就是不会甘心他們的失敗的，他們見不得我們好，总是要进行破坏的！我們随时都要提高警惕。”

上蒜村的农民，解放前受着地主、富农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貸剝削，受着反动政府和軍队殘酷的压迫。提起过去，人們就会眼泪汪汪。解放以后，經過土地改革，党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这里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人們的生活蒸蒸日上。現在，村里有了卫生院，人們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衣食更是有了保障。因此，四队的党小組和队委会在进行思想工作的時候，牢牢抓住了回忆对比的方法。例如，副队长段云的媽嫌儿子整天为队上的事情忙，沒時間种自留地，常埋怨段云。段云很煩惱。李凤英知道了，一面鼓励段云，一面去說服段云的媽。她对老大媽說：“奶奶，你想想，从前的保甲长是哪样人当，可有我們貧苦农民的份？現在是我們的天下，党和社員信任我們，才叫我們当干部。我們不当，难道让过去欺

压人民的保长、甲长当嗎？从前，你家过的什么日子，記得人家挑你的穿心盖（把手脚扎在一起，用杠子抬）嗎？現在又过的什么日子……”老大媽是受过苦的人，在李凤英的耐心教育下，慢慢想通了，不再和儿子鬧气了。經過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少数不大关心集体生产的社員，也有了轉变。

这个队还結合着每个时期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对社員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每到應該交售某一种农副产品的时候，总有少数社員反映出一些思想問題。例如，有的社員交售肥猪，願意交宰了的，好留点肚杂。针对这种情况，党小組和队委会不断帮助社員回忆国家的关怀和扶持，說明工业化給农民带来的好处。上蒜这个地方，解放前水利条件很差，要水的时候沒有水，不要水的时候洪水淹庄稼，真是三年两不收。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兴修了小型水利，安装了抽水机，继而兴修了柴河水庫，使得整个公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田灌溉有了保证。去冬今春严重干旱，因为有了水庫，田照样泡，秧照样育。社員說：“要是在过去，这会儿連吃水都沒着落了。”另外，队上还使用了化肥，由拖拉机站代耕了田地。經過这样的对比教育，社員大都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李明春說：“我們如今是住在‘龙’嘴底下啦！多收的粮食是国家給的！”馮会仙說：“我們使个頂針都离不了工业化呀！不支援国家建設，还有良心嗎！”

經常的、生动的政治思想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队里的絕大多数社員都有比較高的觉悟。他們热爱集体，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和为队里出策献計。平时干活計，不管干部



在不在場，质量和数量都不錯。今年四月下旬第一次評比，有十五名社員光榮地被評選為模範社員。

經常的、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同样表現在四隊社員积极支援国家建設方面。以一九六二年来說，第四生产队比較好地完成了各項农副產品交售任务。粮食征购任务全部完成。烤烟交售任务是一千四百八十斤，交售了一千五百多斤。合同上訂的卖给供销社鴨子一百四十只，实际卖了三百一十只。今春收得棕片二百六十搭（每搭十叶），除挑出二十一搭較差的搓绳外，其余的都卖给了供销社。去年社員卖给国家的猪共八

头，其中多数是活猪。

上蒜四队被評選为模範生产队的消息，使得全隊社員十分振奋。社員們到处議論着这件喜事。社員們根据模範生产队的标准，檢查修訂了本队原訂生产計劃，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生产队的計劃落实后，社員也紛紛开家庭会，制定爭取当模範社員的計劃。

現在，在上蒜四队出現了新的生产热潮。在干部的帶領下，社員的劳动出勤率很高。全隊社員下定决心，要把模範生产队的光荣称号保持住。

老貧农的本色

李廷凡 錢 进

翁信，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李俊人民公社魏团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副队长。在旧社会里，他从十二岁起直到二十六岁，都给地主放牲口、当长工。后来，他回到魏家团庄自己种地，一心想創家立业。可是他終年辛勤劳动，还是吃不飽，穿不暖，一年四季不得不给别人打短工。一九四七年八月，伪保长魏三江借口說他没有按时交粮，一頓柳棒打得他險些丧了命。这些往事，十几年来他一直沒有忘記。他常說：可不能忘了过去，过去的貧苦农民，誰能照管得了自己？現在，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依靠集体經濟，貧苦农民的生活才越过越好。就是这样，翁信从当飼养員，

直到当了生产队副队长以后，始終保持着老貧农勤劳刻苦和維護集体利益的本色。

日夜辛劳为集体

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間，翁信負責飼养集体的牲畜。每当社員們套車的时候，翁信总是一面忙着給大家搭配牲口，一面提醒大家要爱护牲口：“在路上，千万不要乱打；快到卸車的时候，不要攆着跑。牲口回来，我們可要檢查呢，哪一头牲口有个一差二錯，可要找你們算賬！”

車队出发以后，翁信就帶領着飼养員們墊圈、扫槽、鋤草。到晌午，車回来了，卸



了套让牲口打完滚，他连忙拿起扫帚、抓子，给骡马扫土、抓痒。后晌，他又是扫槽、锄草。黄昏卸车以后，他又组织大家给牲口添草、饮水、喂料。他就是这样整天忙个不停。他经常对饲养员们讲：喂牲口的时候，要注意口老的对口老的，口轻的对口轻的；嘴快的对嘴快的，嘴慢的对嘴慢的；瘦弱的单另喂养。还要注意哪匹马吃草肯噎，哪个牲口饮水爱呛，哪个性暴，哪个老实，……他谈起来就没个完。他还常对饲养员们说：“经营好我们的千来亩田，离不开这几十头牲口，饲养好牲口，我当组长的有责任；大家也有责任，咱们要时刻经心，不能叫牲口出毛病。”饲养员们学习他的经验，工作也干得很出色。

马无夜草不肥。到了夜里，翁信还是很忙碌。他一会儿走进草棚，一会儿来到槽头，左臂挽着草筐，右手提着马灯，挨个给牲口添草。听着牲口吃草的响声，轻轻拍着牲口的脖子，看着它们吃草的神态，他笑在嘴角，喜上眉梢。他回想办初级社的头一年，只有四匹马、四条牛、五头驴。当时一些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讥笑说：“这些穷棒子，牲口没牲口，车没车，还想办社哩！……”谁知集体的家业发展得这么快，只几年功夫，就槽头兴旺，骡马成群。他乐呵呵地好像总是没有瞌睡，每天夜里都要起来几次给牲口添草。

翁信爱护集体财产，有时连生命危险也不顾。有一年夏天，社员翁虎拉上白骡马到李俊堡去。刚生下七天的小马驹，活蹦乱跳地跟在后头。刚走到双渠桥上，翁信在远处突然发觉小马驹不见了，他立刻飞奔桥头，一把拉住翁虎问道：“马驹子呢？”翁虎回头一看，不见了马驹，心里非常着急。他俩往四周寻找，发现马驹掉到渠里了。翁信急

忙把衣服一脱，一个猛子扑到渠里。浑水一呛，他一头碰在桥桩上，嗡的一下子头昏了。他在迷迷糊糊中，摸到了马驹，两手紧紧抱住它。马驹挣扎着，翁信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把马驹救上岸来。这时，翁信脸色苍白，昏迷地倒在岸边。过了一阵，他苏醒过来，一睁眼就问道：“马驹怎么样了？”

凡是不利于集体的事，他只要看见了，都要管。一天黄昏，他刚喂完牲口，就扛上铁锹向稻田走去。奇怪！一块该淌水的田连田口子也没开。他急忙跑到负责淌水的社员家去查问。原来那个社员熬累了正在睡觉呢。翁信立刻喊醒他批评说：“你睡觉事小，粮食减产事大。今儿洪水下来了，正是淌好水的时候，不淌等到几时哩？”“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一席话把那个社员给说笑了，接受了翁信的意见，赶到田里去淌水。

勤俭节约不忘本

翁信入社以后，就把社当作自己的家，凡是对集体有利的事，不管有多麻烦，他总是高高兴兴地主动去做；处处注意勤俭节约，爱护一草一木。他喂完了牲口，一有点空就到田头去，看庄稼长得怎么样了，哪些田该淌水，哪块田该薅了，随时提醒队长；发现社员忘在田头的犁、耙、绳索等物件，他都收拾回来，交给保管员。平时在路上见到一个钉子、一块木板、一根烂绳子，他都要拣起来，保存好。遇上牲口的缰绳断了，龙头烂了，或是车上哪个地方该修理了，翁信平时收拾的那些小东西就用上了。他还拿他收拾来的一部分破烂，到供销社废品收购处换成铃铛，给牲口挂上。社员们赶上车，铃声叮当响，就是天黑赶路，也便于互相照应。大伙都夸奖老



翁是个細心人。有时候，队上的麻包烂了，或有什么别的針綫活，翁信就拿回家去，让他老伴給縫縫补补。就連社員們碾米磨面的事，他也管，只要事前作好安排，他就按时把牲口送到磨道里；有些妇女不会套牲口，他就給帮忙。翁信在一年里，不知道要做多少这些“份外”的事。可是，他一不要队上給他評工分，二不是为了叫人夸奖。他以自己能为大家多干一些活，多出一把力，而感到愉快。

在他的带动下，整个飼养組很好地發揮了劳动积极性，为集体节省了开支。夏天，他帶領飼养員打草放牲口，飼养場的圍墙坏了，他不要队上派人，发动飼养員自己打圍墙；“窝棚”也是自己动手盖；拉土垫圈，他們也自己干。农忙收割或播种的时候，他經常抽出两个飼养員去帮忙。翁信常向大家說：“我們过去都是貧雇农，在旧社会，大家穷得炕上連張席子都鋪不起，吃了上頓飯还不知道下頓在哪里！迟解放两年，我們有些人連命都要保不住。現在我們过的啥生活呢？鋪有鋪的，盖有盖的，家家都有四、五床被子，誰家也不缺吃少喝，存的錢用不完。你們說，是过去好还是現在好？”飼养員們被說得眉开眼笑，他們在翁信的启发和鼓励下，更加热爱集体，越干越有勁。

胸怀壮志挑重担

翁信爱上了飼养員这个崗位，积累了飼养牲口的丰富經驗，下定决心当一輩子飼养員。可是在一九六一年年底，他被全队社員选为副队长。开始，他有点顾虑，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沒經驗，怕領導不好。但他想到：在党的领导下，今天建設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應該为群众多出些力。大

家既然选我，就是相信我，就不能辜負大家的希望。从此，他肩上的担子挑得更重了，心也操得更多了。

去年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第三生产队的干部在一起开会，討論如何解决稻田缺肥問題。會計翁光礼拿起算盘，啪啦啪啦撥了一陣，向大家說：“不管怎么算，还缺三百八十多亩田的肥料。”队长梁占祥說：“稻田缺这么多肥料，大家看咋解决？”干部們議論开了，有的說发动社員打蒿子漚綠肥，有的主張挖湖泥，还有的提出把大队的羊群赶到田里踏粪积肥。翁信坐在鋪盖上，不住地抽着旱烟，皺着眉头沉思。梁占祥轉身問他：“翁队长，你也說說，这肥料到底咋解决？”翁信說道：“我也琢磨半天了，打蒿子、踏粪，都解决不了多大問題，挖湖泥倒是个正經主意，我算着挖湖泥足够解决稻田缺的肥料。你們領上大家干旁的活，我領上少数社員挖湖泥。”話未落音，大家哄嚷开了：“哈！你这么大的胆子，几百亩大的稻田，騎上馬也要跑半天呢，到啥时候才能把湖泥送到稻田里？”“湖泥全是稀糊糊，車都下不去，一天能挖多少，我們有多大力量？”梁占祥也半信半疑地笑着問他：“你真的敢包下来？”翁信斬釘截铁地回答：“梁队长，你掌握全盘，拉湖泥你就不用管了。給我十輛車，十几个小伙子，到时候一定完成任务。”梁占祥笑着追問：“你这个眼是咋算的？”翁信一板一眼地答道：“一輛車一天可以拉二十几車，靠湖边的地，一天能拉六十多車，每亩田平均上二十車湖泥，十輛車一天总能拉它二十多亩田的肥料。滿打滿算，半月、二十天也就够了。”

第二天，翁信領上十几个精壮小伙子下了湖。湖泥又黑又臭，翁信鼓励大家：“这里



真是个肥料棧，大家鼓勁干，今年丰收就靠它了。你們誰敢和我比賽？”團員侯光首先响应：“比賽就比賽，我們年輕人咋說还不如你？”翁信笑着說：“別看我老，我干的少了还不算哩。”一群年輕人齐声叫道：“向老队长学习！”頓時，大家有說有笑，越干越起勁，一块块紫泥飞向湖岸。到收工的时候，看着一堆堆像小山似的湖泥，大家忘記了疲劳。

那些天，运湖泥的社員，五更天就起来，赶着大車，浩浩蕩蕩地奔向稻田。大家哼着小調，唱起秦腔，人欢馬跃，好一派熱鬧景象。別的队看見了，羨慕地說：“看人家三队的干劲！”于是他們也套起車，赶忙去拉湖泥。那些日子，翁信起五更，睡半夜，和大家一起，挖泥、裝車，忙个不停。他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帮飼养員喂牲口，两只眼睛都熬紅了。老伴劝他休息一下，他不肯；队长梁占祥要同他輪換，他也不干。他意味深长地說：“輪換啥哩！解放前我給地主当长工，連天連夜地給地主干活，一年到头，还是挨餓受冻；解放后才有了吃穿。如今我們办公社，是为了大伙生活过得更幸福，現在是給自己干，再苦也不怕。不吃苦中苦，哪有甜中甜！”

辛勤的劳动，获得了丰收。去年他們这个生产队的稻田平均亩产比一九六一年增产百分之十八。今年，水稻播种按时完成了計劃，麦田比去年扩大了种植面积，庄稼都生长良好，丰收在望。社員們一想到生活一年比一年更美好，就从内心感謝翁信和其他干部的辛苦操劳。

大公无私作表率

解放十多年来，翁信在党的指引下觉悟

不断地提高。他懂得了：要使社会主义集体經濟兴旺，干部应当始終不忘党的教导，經常同群众保持亲密的联系，处处公正无私，为集体着想，作群众的榜样。今年春播前，队里还有几十亩麦田缺肥料，原来計劃买粪肥来解决。翁信一盤算，买粪肥一車要几十元，生产成本提高很多，对集体不利。于是他就建議发动社員向队里投肥，并首先将自己原打算在自留地用的一大部分杂粪肥和炕土肥料，带头投到队里。他的模范行动带动了社員，大家都积极向队里投肥，几天時間，社員們就投了二百車粪肥，及时解决了麦田缺肥問題。

一年多来，翁信虽然当了副队长，可他还是时常帮助飼养員干活，常給牲口治点小病。飼养組长侯彦明总觉得过意不去，在評工分的时候，他几次提出要給老队长多評些工分。翁信却从来不接受这种照顾，他說：“像这样做点零活，也給評分，那像啥話！牲口喂好了大家使嘛。”提起这些事，社員們总是人人点头称贊：“一年里，老队长哪天不苦在人头里，可是針尖大的便宜他也不爱。”

翁信最突出的思想作风，就是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联系群众，大公无私，始終保持老貧农的本色。他在做飼养工作的七年中，每年都被評为模范飼养員。担任副队长以后，仍然坚持經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已經五十来岁了，但总是拣重活干。一年当中，他除了到大队、公社开几次会以外，从来不誤工。去年他实做了三百五十个劳动日，是全队出勤最多的一个。今年年初，他又被評为模范干部。公社党委号召全社干部向翁信学习。



“劳动带头干，工作是模范”

申元則 連治水

早先，人們形容羊井底是个“山多树少，坡多草少，沟多水少，人多地少”的穷地方。这个座落在山西省平順县的貧瘠山村，在一九五二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前，要說地盘可不小，差不多有两万亩；要說耕地却不多，全村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多地。成立互助組以后，依靠集体劳动，粮食产量虽然比单干时有所提高，但是，正常年景，每亩也只能收二百五十来斤，多种經營的收入也很少。在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以后，經過十一年的艰苦奋斗，这个貧瘠山村的自然面貌已經改观，农、林、牧、副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全大队一九六二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七；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五百一十斤；农、林、牧、副业总收入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四点七倍。現在，周圍村子的群众称赞羊井底是：“高山松柏核桃沟，河边两岸垂楊柳，山腰梯田加五果，低山緩坡牧草稠，牛羊成群風景美，农林牧副齐丰收。”

提起羊井底由穷变富的原因时，社員們異口同声地說，这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大家齐心协力，奋发图强，充分發揮了集体經濟优越性的結果。同时，这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羊井底人民公社主任兼羊井底

生产大队大队长武侯梨同志，十一年如一日，始終坚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领导生产，也是分不开的。

貧农出身的武侯梨，一九四四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〇年，他以身作則带头劳动，领导互助組发展生产，特别是植树造林成績优异，被选为全省的林业劳动模范。以后，他又领导群众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人民公社。从一九五二年以来，武侯梨虽然身兼数职，經常外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可是，他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带头参加集体生产，被誉为集体劳动的模范。十一年来，他每年都做很多劳动日，一九六二年做了二百三十四个。武侯梨經常这样說：“咱是劳动人民出身，是共产党员，劳动是咱的本分，不劳动就要脱离群众。”所以，他除了外出开会以外，一有工夫不是上山，就是下田，同社員一起劳动。平时，想在村里找到他是很困难的。如今，他已經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可是，劳动劲头賽过年轻人，在劳动中总是拣重活干。今年春天，大队决定进一步挖掘增产潜力，給远地增施肥料。往远地运肥，路窄坡陡，很費力气。武侯梨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牛双景同第一生产队的社員們一起，往全大队路最窄、坡最陡的“小牛腿”（地名）地里运肥。在运肥中，武侯梨不仅担得多，而且走得快。在武侯梨和其他干部的带动下，参



加运肥的社員們勁上加勁。結果，三天的运肥計劃，两天加一个早上就完成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因此，社員贊揚他是“劳动带头人，工作是模范”的好領路人。

武侯梨从自己的實踐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不下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做不好工作的。他說：“領導要实际，天天要下地，三天不下地，領導不实际。”这是他多年来的經驗总结。曾經有过这样一件事，大队决定修一百亩梯田，十一月中旬开工。开始时，大队干部只是做了一般的布置，沒有同社員一起参加劳动。开工后的第三天，第一生产队队长刘連弟汇报說，第一生产队每天出动九人，三天修成梯田一亩。武侯梨和党支部書記听了汇报认为成績很大，當場表揚了他們，并且通过黑板报、广播筒向全大队进行了傳播。事后，經過深入檢查，发现这个生产队每天只有三人出勤，修成的梯田，虽然够一亩，但是，质量比規定的标准差得很远。从这件事情中，武侯梨深深地認識到：土地由社員种，庄稼在田里长，經驗从基层来，問題也在那里出。要使自己的領導工作做得更加切合实际，达到正确指揮生产的目地，就必须經常到田間去同社員一起劳动。只有这样，在指揮生产上，才可能真正做到“知天知地知庄稼”，在做人的工作上，才可能真正做到“知人知面又知心”。

农村基层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是他們的本分，而且也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但是，仅仅認識到带头参加劳动的重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正确处理工作和劳动的关系。对农村基层干部來說，参加集体劳动和領導生产，本来是一致的，但是，如果

安排不善，也会发生某些矛盾。原来，羊井底生产大队有些干部由于不会安排工作，經常不能下地劳动。他們說：“反正只长两只手，顾了調泥，端不了坯；做了工作，下不了地。”还有的干部說：“咱是土里生土里长，誰还不会和土疙瘩打交道，就是工作纏得下不了地。”也有的干部說：“白天桌上趴一天，晚上熬上半夜眼，就凭良心吧，还不給咱記个劳动日！”也有的干部每天光顾埋头劳动，丢掉了工作。为了解决参加劳动和做好工作的矛盾，武侯梨通过多年的实践，逐步摸索到一套“五結合”的办法，即：集体領導和分工負責相結合，依托重点和指导全面相結合，調查研究和解决具体問題相結合，定期开会和田間商量相結合，带头劳动和現場指導相結合。这个“五結合”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党一贯提倡的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導相結合、領導和群众相結合的方法的具体运用。

第一，集体領導和分工負責相結合。有些大队干部由于管事过寬，不但农、林、牧、副业生产中的各种問題都得由他們来解决，而且社員生活上的婚喪大事、家庭糾紛等問題，也要找他們处理，因此，跳不出事务圈子，不能很好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武侯梨研究了这种情况以后，为了更好地發揮集体領導的作用，使干部騰出更多的時間参加劳动，就向管委会建議，根据集体領導和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原則，在管委会的委員中，按农、林、牧、副业和青年、妇女、武装等系統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使每个干部各負其責，各行其事。并且規定，凡是在自己职权範圍內的事情，发现一般問題，个人有权解决；凡是屬於較大的問題，就集体研究处



理。另外，还具体規定，主要干部每旬三、六、九日晚上碰头一次，每月一次“回头看”，檢查总结上月工作，布置下月工作。这样，既加强了集体领导，发揚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又保证了每个干部都能抽出一定時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特别是武侯梨本人，由于把大队工作的担子，分担在各个委員的身上，就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同社員一起劳动，在参加劳动中领导生产。

第二，依托重点和指导全面相结合。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武侯梨为了照顾全面工作，曾經有一个时期，忙着到处跑。虽然和过去一样，跑到哪个生产队，就同哪个生产队的社員一起劳动，及时发现問題和解决問題。但是，却放松了培养重点的工作，不能“以点带面”，更好地推动全大队的工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就把第二生产队作为自己指导全大队工作的“根据地”。不論春耕夏鋤，还是秋收冬藏，他都首先在这个生产队做出样子，带动其他生产队。例如，在一次垒谷坊中，他先在这个生产队里，亲自动手垒了一条质量很高的谷坊，并且摸索出垒好谷坊的方法，拟出了劳动定额。接着，就召集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員代表到現場参观。这样，不仅把垒谷坊的經驗推广到全大队，而且对那些干活不讲究质量的社員，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社員耿二則和刘小金，在参观以后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看了侯梨垒的谷坊，我們那条非返工不行。”他們回去以后，便自动返工重做。

第三，調查研究和解决具体問題相结合。武侯梨在参加劳动过程中，十分重視了解情况，根据社員的意見和要求，来考虑全大队

的工作。他除了在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了解情况以外，还經常抽空到其他几个生产队檢查工作和了解情况。所以，他在领导生产中，情况摸得准，問題解决得透。一九六二年春耕下种时，他发现第七生产队进度緩慢，便深入到这个生产队，一边劳动、一边調查訪問。經過深入了解，鬧清这个生产队春耕进度緩慢是因为耕畜瘦弱，肥料送不出去，土地耕不过来。于是，他一面鼓励社員积极克服困難，一面和大队管委会研究，从大队临时抽調了三根耕畜，帮助他們进行春耕，及时完成播种任务，为秋季超额完成包产任务打下了基础。事后，武侯梨深有所感地說：“經常深入实际，才能抓住問題的根根底底，要是脱离了劳动，只能摸到問題的毛毛皮皮。”

第四，定期开会和田間商量相结合。前几年，这个生产大队开会过多，曾經影响大队干部不能更多地下地劳动。为了解决会議占用時間过多的問題，武侯梨和党支部研究以后，采用了定期开会和田間商量相结合的办法，适当减少会議的次数，縮短开会的时间。例如，規定每月定期召开支委会和管委会各两次，除黨員、团员按期开会过組織生活以外，其余会議一律要經過党支部或管委会的批准才能召开；农忙期間，除特殊情况以外，一律不准召开群众大会。每年的生产計划、分配方案等重大工作事項，他們多半是先在定期会議上，研究出初步意見，然后，由分管各生产队的大队管委会委員，分头到各生产队去傳达，結合田間劳动和利用大伙一起吃飯的机会，广泛征求社員意見，最后，再召开專門会議进行修訂。

第五，带头劳动和現場指导相结合。队



干部既是普通的劳动者，又是生产的指挥员，既要同社员一起劳动，又要在劳动中领导生产。所以，干部下地不能只顾埋头劳动，放松领导者的责任。对于这一点，武侯梨认识得很清楚，做得也很好。他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同普通社员一样，能够服从队长的指挥，认真完成队长分配的劳动任务；和社员打成一片，有说有笑，毫无隔阂。在生产队长和社员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毫无架子。同时，他在劳动中又能及时发现問題，帮助生产队长出主意、想办法，进行现场指导。这样，不光以身作则影响和带动了一同参加劳动的社员，同时，还帮助生产队干部提高了工作能力。一九六二年秋天，阴雨连绵，秋耕不能按时开犁，眼看快要上冻了，全大队还有一半秋地没有耕过。天晴以后，武侯梨向第二生产队队长武全保建议，除了要发挥现有耕畜的作用以外，还必须组织劳动力突击刨地。武全保接受武侯梨的建议，一方面改变了耕地牲畜一天回家两次的习惯，采取上地带草料的办法；一方面组织了二十个男女社员突击刨地，并且让武侯梨亲自带领一个作业组包干完成。不料，在秋耕任务接近完成时，又下起雨来，有些人不愿再继续刨下去。这时，武侯梨一面向大家说明不耕完地的害处，一面以身作则冒雨刨地。在他的带动下，其他社员也跟着继续干，经过三天的紧张劳动，按时完成了秋耕任务。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雪，土地封了冻。社员看到遍地白雪，感激地说：“要不是侯梨带领大家冒雨突击，今年的秋地可耕不完。”武侯梨就是这样把参加劳动和领导生产密切结合起来。

武侯梨由于运用了“五结合”的工作方法，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领导全大队办好集体经济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在参加劳动方面，每年给他评定的定工劳动任务，总是超额完成。队里给他评定的补贴工分，他从不多要一分一厘。一九六二年，全大队有二百三十二个社员，因为超额完成了“三投”（投工、投肥、投草）任务，受到了大队的奖励，武侯梨也是其中的一个。在领导工作方面，他每年除了抓紧当年生产以外，在农田基本建设上，按照十年规划，每年都要重点办好一件事。所以，人们说羊井底自从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一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到一九六二年，羊井底生产大队在一九五三年制定的十年建设规划，已经胜利实现，武侯梨又一次代表大队出席了全省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羊井底生产大队被评为特等先进单位。武侯梨为什么能够成为群众的好干部？副大队长武喜存说得好：“论写写算算，说说道道，村上数不着他，可是，要论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数他高。这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侯梨能经常和群众滚在一块，贴着身子实干，实际情况了解得透，底子摸得清，说的话，句句在群众心上，出的点子，个个合群众心意。”

在武侯梨的带动和影响下，羊井底生产大队的其他干部也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减少了补贴工分。一九六二年，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补贴工只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九五。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改进了干部的工作作风，集体家业管理得很好，全大队呈现出一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旺盛景象。



身份是社員，劳动是本分

孙汝純 毕可友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东省文登县高村人民公社社长兼生产大队队长張富貴，从一九五三年办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十年如一日，始終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現，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受到社員的热烈贊揚和爱戴。

張富貴早在一九四四年，就以劳动出色和领导互助組取得优异成績而当选为胶东解放区的劳动英雄。从那时以后，他始終站在群众的前头，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领导大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从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張富貴虽然身兼数职，工作任务相当繁重，每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都要占去一百天左右，可是他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社員一起劳动。据統計，一九六〇年他担任公社社长时，参加劳动一百八十天，一九六一年回到生产大队工作，劳动了二百六十天，一九六二年参加劳动二百二十天，三年中平均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都在二百天以上。

張富貴常說：“领导生产咱是干部，干起活来咱就是社員，就得和社員一样地干。”一九五五年春天，在村北的一块地里打井，挖下半尺深就是乱石，坚硬难刨，鐮头下去震得手发麻，挖了近两丈深还没有見水，有的社員主張填死，另选择地址。但是，全村八百零九亩

土地几乎全是这样。为了坚持繼續挖下去，張富貴开始时和社員一起輪流擲土，到后来自己把起鐮来，把擲土这件較輕的活让給別的社員干。有人发现他用力猛，两手的“虎口”都震裂了，流出鮮血，便从他手里搶过鐮来。可是他擦擦血，用布条纏了纏，又繼續掄着鐮头刨起来。最后，一直坚持到把这眼三丈多深的水井砌成。社員倪玉才說：“沒有点硬骨头，沒有点毅力，这眼井是打不成的。”

一九五九年，張富貴为了取得改碱、治澇的經驗，指导全面工作，他深入到岭上大队，和社員們一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填洼、挖渠，把这个队的七十多亩高低不平的澇洼碱地整好。接着，又展开了压沙活动。每天早晨天不亮，他就起床，到往返四里多路的河里运沙，一个早晨运八、九趟。在他的带动下，十九名青年，由平均每天运十五趟，增加到二十三趟。四十亩碱地压沙九千六百車的計划，仅用二十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比原訂計划提前十一天。一九六一年以后，他被派回生产大队兼任大队长，固定在第一生产队参加劳动。对于队里分派的活，他从来都认真地完成，并尽力爭取超过。去年秋季，队里为了儲备飼草，規定每个劳动力割草四天。張富貴和其他社員一样，积极参加割草，提前完成了四天的任务。接着他



又要队长分派给他相当于三个劳动力的割草任务。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副队长隋桂生就上山了，满以为自己是最早的一个，可是到了那里一看，张富贵在月光下握着镰刀，已经割了半条草堰的草。在五天时间内，张富贵一个人就交出了饲草四千一百五十多斤，超额完成了任务。社员倪洪信说：“别看咱们的老模范年纪大，干劲可不败！”

张富贵在劳动中，总是见困难就上，拣重担子挑。去年春天，队里向村东北井湾子一带地里送粪，有的社员嫌上坡吃力，不大乐意干。张富贵本来负责刨地，可是在听到这种反映后，就主动把刨地的活让给别人，自告奋勇地参加运肥。别人驾着胶轮车，他却驾起一辆木轮车，一连运了两天，头一天推了三十六趟，第二天推了四十三趟，都大大超过了定额。去年冬季，张富贵和生产队长倪玉华带领一帮社员去挖水渠，有的社员嫌冷，不愿下去，这时，他们二人卷起裤子脱下鞋就先下去了。其他社员见他们二人下去，也都跟着下去了。

张富贵带头劳动的模范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干部和社员。一天，社员隋夕泽对他讲：“你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又是公社社长，何苦还这样撒腿拉手地干？”张富贵却回答得很干脆：“我的身份是社员，劳动是本分。如果照你这样想，大家也就不会选我当干部和模范了。”

张富贵出生在一个三代扛活的贫农家庭里，从小就死了娘，父亲也因为逃荒死在外面，幸亏伯母抚养了他。他十三岁时，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后来在地主倪玉岱家扛大活时，曾光着脊梁，淌着汗水，被迫为地主在

一天里割过七亩小麦。但是，当他向这个地主提出借二、三十斤玉米来维持家庭生活时，却被拒绝了。张富贵为此伤心地躲在一边擦眼泪。一九四〇年八路军解放了他的家乡，张富贵的生活才好起来。他的伯母在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说：“孩子，不要忘了咱的生活是怎样好过来的，不要忘了财主家把我纺花挣的二亩地抵押了去，是谁帮助咱要回来的。我死后，你要听八路军的话。”

在党的教导下，张富贵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牢固地树立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位名叫隋夕太的老社员见张富贵上了年纪还这样猛干，曾多次对他讲：“光社里、队里的工作就够你忙的啦，你少干点没有关系，没有人跟你攀比。”可是，张富贵却说：“咱是劳动人民出身，能劳动不劳动，就是忘本。再说，当干部不劳动，又怎么能领导好生产？”

张富贵从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参加生产，才能领导好生产。”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的时候，由于摊子大，事情多，加上他的老婆有病，半年的时间只干了二十个劳动日。有一次，他检查生产时，老远就听见锄玉米的两个社员在说他。一个说：“大官来了！”一个说：“张富贵现在摆摆洒洒的，真是当上甩手掌柜的了。”社员的这一批评，给张富贵敲了警钟。“甩手掌柜”这句话，使张富贵想起了农民对那些不劳动光剥削的地主阶级的仇恨，又想到大伙选举自己当模范和干部，不也就是因为自己劳动好吗？从社员的批评里，张富贵找到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他深深地感到这一段时间自己参加劳动太少了，并且意识到这就是脱离群众的开始。于



是，他首先在全体党员会上作了检讨，接着又在全体社员会上作了认真的检查；并在党的帮助下，妥善安排了社里的工作和家务，重新和社员在一起，铺下身子干起来。从此以后，他在检查生产时，生产工具总不离身。他看到社员倪秀远锄地瓜地时用力小，扶不起耩来，就不声不响地帮倪秀远锄，锄过几垄之后，才对倪秀远提出意见。到了晚上，张富贵再去看时，倪秀远锄的地瓜地，质量完全合乎要求。这一年的下半年，张富贵干了一百二十多天活，社员的反映好了，工作也好做得多了。

张富贵身兼数职，既是省、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又是省、专区、县三级农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公社社长兼生产大队队长，需要经常外出开会。可是，张富贵却认为时间是受人支配的，只要有心劳动，好好解决劳动和工作的矛盾，就能挤出时间劳动。他不仅对整工夫抓得紧，而且充分利用零星时间，有空就干。今年三月间，他在济南开完省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仍然放下背包，拿起镢来赶到地里干活。社员倪永振关切地说：“你刚到家，也该歇歇呀！”他却说：“离天黑还早，大伙都在地里，我在家也呆不住啊！”平日社里或队里开会，只要会前会后还有时间，他也总是要和社员干一阵儿。去年秋天公社开会布置秋种，他天不亮就去刨地，到吃早饭时已刨了二分，在地里吃完早饭，把镢交给社员，就赶到公社去开会。会议结束后，社员还没收工，他又去刨了一分多地。这天，他虽然开了一天会，仍旧干了半个多工的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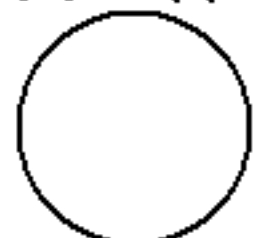
张富贵在劳动中，经常和社员谈心，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根据社员们的意见和要求去考虑全队的生产和工作。他虽然固定在第一生产队参加劳动，但是上山和回家的路上，在休息的时间，经常到其他几个生产队去检查生产，因此他对全大队的整个生产情况了解得很及时。去年春天栽地瓜，他发现第一队栽得很稀，又到第二队去看看，第二队又栽得过密，唯有第三队不稀不密正合适。经过同社员进行研究和比较，才知道这是由于各队的劳动定额不一样，从而帮助第一队和第二队很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保证了栽地瓜的质量。

张富贵同志十年如一日地带头参加劳动，在干部和社员中有很大家影响。大队党支部书记隋夕荣深有体会地说：“以前我每逢看到张富贵了解情况多，能及时提出工作中的问题，总觉得是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如他。如今铺下身子干，和社员打成一片，不光了解情况多，领导生产具体，社员对咱的态度也好了，我这才知道带头劳动的好处。”隋夕荣虽然身体不太好，去年还干了一百六十二天活。党支部书记何孔洲，劳动一百九十天。大队会计隋永生，劳动一百八十五天。妇女大队长迟人荣（军官家属）去年在家七个月，参加劳动一百二十天。社员王玉英和她一起干活时对她讲：“你少干点怕什么？就是不下，玉杰哥（迟人荣的丈夫）还不掏钱给你吗？”但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不能这样说，你看看咱社长，论年龄比我大，论工作比我多，他还那样使劲干哩！”全大队三个生产队长，也都分别干活二百八十天以上。张富贵的不辞辛劳、铺下身子干的行动，已成为人们学习的好榜样。



始終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 郑 际 雄 ·



“学好样，看好样，社員看的干部样。”这是上海市宝山县吴淞公社張建浜生产大队社員称赞大队干部劳动好的一句顺口溜。

常年坚持参加集体劳动

張建浜生产大队共有二百八十一户，一千二百七十六人，五百六十三个劳动力，一千五百二十四亩耕地，是个夹种粮棉、蔬菜和果树的大队。这个大队的六个干部，两年来，在党的教导下，以普通社員的身份，常年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在生产中领导生产。一九六一年，六个干部平均每人做了一百九十八个劳动日，其中党支部书记潘东才做了一百九十二个劳动日，副书记金祥其做了二百一十一个劳动日，大队长应妙根做了四百六十八个劳动日。一九六二年，六个干部平均每人做了一百七十个劳动日，其中潘东才做了二百零四个劳动日，金祥其做了二百四十九个劳动日，应妙根比上年工作忙一些，也做了一百八十九个劳动日。

他們不仅經常参加集体劳动，而且在劳动中拣重担子挑，做出榜样，带动社員搞好生产。今年春播时，潘家宅生产队为了不誤农时，决定把一部分棉花套种在油菜行里。队里有些妇女，嫌这种农活干起来麻烦，个个

摇头，嚷着油菜早已封行了，說啥也沒法走进去套种。潘东才知道了，笑了笑，就領着妇女們下田去踏看。刚到田里，一轉眼，老潘就不見了。原来他钻进了又高又密的油菜丛，跪在油菜行里套种，前面用手撒棉籽，后面用脚膝将泥土盖上，种得既快又好。不一会儿，种好了一行，他钻出来同大家討論这个办法。这一来，大家心里一亮，劲头也来了，终于按质按量地完成了棉花播种任务。社員們都称赞老潘，說他这样做，比开上一天会还有效得多。姚华浜生产队干部何阿利最近还談到一桩事情：一九六一年五一节那天，队里休假，他一早就动身去走亲戚，路过潘家宅，看到潘东才一个人在队里的茨菇田里翻地。到了傍晚，何阿利从亲戚家回来，潘东才还在翻地。走近一看，一亩五六分田全部翻了过来，說明潘东才已經扎扎实实干了一天了。何阿利走上前去，說道：“老潘，你連休息日子也不歇一歇，太辛苦啦。”潘东才却笑着回答：“社員比我們还辛苦，抽今天有空，順便照顾一下田里，有啥辛苦。”

大队的其他几个干部，学着支部書記的样，干活也都出色。去年秋种时，譚家宅生产队的油菜，移栽进度很慢，眼看要誤农时了。大队长应妙根赶到他們那里去了解原因。



队里的人說：“油菜种在稻畝田里，稻畝太硬，翻也翻不动，只好拖几天，等下场雨再說。”应妙根听了，也不多說話，順手拿了把铁耙，邀大家到田里試試看。到田里，应妙根用勁翻了一陣，感到农活确是很吃力。他同社員們商量，等天下雨是靠不住的，还是現在多花一些力气，早动手的好。社員們同意他的意見，當場一齐动手翻地，应妙根和大家一起干了一整天。第二天，社員以为大队长今天总不会再来了，誰知道大清早赶到田头，就看到妙根已經在那里干活了。到了第三天，应妙根还是和大家一起翻地，而且越干越有勁。大队干部带头干活，鼓舞了社員的生产干劲，很快就把油菜移栽好了。

“千万不能忘了老本行”

这个大队的干部为什么劳动这样积极呢？說起来有一段曲折。

一九六〇年以前，这个大队的干部劳动并不經常，在大队办公室常常有三、四个干部，有事办公，无事聊天；到生产队去，也只是看到有啥問題，就在田头指指点点，說完了轉身就走。这里离吳淞鎮很近，干部常常溜到鎮上去逛，社員意見很多。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潘东才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共产党员，又是种田出身的，党教导他，当干部一定要参加集体劳动，因此在开始时，对干部不参加劳动有些看不慣，可是过了一陣，也就习以为常了，并且渐渐地认为，当了干部，是要有干部的“样子”，否則沒有威信，工作不好办。不久，他到一个生产队去帮助工作，社員在劳动，他

蹲在田岸上，把生产队的干部叫在一旁，商量問題。当时大家待他很冷淡，他也很不自在，一双手好像沒处放似的。隔了几天，他又要到那里去，心想还是带上件把农具，凑和着同社員一道干点活。可轉念又一想：“当支部书记的带件农具东跑西轉，干部、社員看見不会笑话嗎？”犹豫了一陣，还是把镰刀带上了。可是，为了怕人在路上看見，把镰刀藏在自行車車袋里。到了队里，他馬上拿出镰刀来和社員一起割稻，社員看到支部书记到队里来干活，态度也变了，同他有說有笑。

从这次以后，潘东才时时都把劳动惦记在心，到生产队去，总要带着农具。参加劳动多了，社員待他也更加热情了，而且乐意把心里話都告訴他。有一次，潘东才在田里劳动时，同几个老农聊天，問起对大队有啥意見。老农們直截了当地告訴他，頂大的意見，就是有几个大队干部“架子大”，不是办公室坐坐，就是东蕩西溜，劳动太少。听了这些話，潘东才更感到这是个大問題，于是在大队干部会上提出来，要大家討論。

一开始，有的大队干部认为，这意見說来虽不錯，不过当了干部，責任不同，再要参加劳动，一来会影响工作，二来自己还像什么干部。大队长应妙根还賭气地說：“我本来是农民出身，又不缺手拐脚，做干部不行，干脆回去劳动吧。”潘东才看到大家的情緒不对头，便先从自己談起，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轉变过程，还耐心地說：“当干部的，責任是不同，社員要积极劳动，我們除了劳动还要工作，还要把大队的事办好，担子很不輕。不过大家想想看，像現在这样不积极参加劳动，和群众联系不好，問題发现



不了，社員對我們有一肚子意見，工作能做得好嗎？”

經他這麼一說，大家慢慢地心平氣和了。他們一邊學習黨的有關文件，一邊就熱烈議論起來。好幾個人都談到：老潘勞動多，社員就歡迎他。我們現在到隊里去，有時說些什麼，隊幹部、社員常常聽不進去，現在想起來，是對我們不勞動有意見。黨支部副書記金祥其過去是個勞動的好手，這一陣，對勞動也放鬆了，他慚愧地說：“社員選我們，一來是相信我們能先公後私，二來也因為我們是勤勤懇懇的種田人，能和大家同甘共苦，搞好生產。我們當了幹部，千萬不能忘了自己的老本行。”大隊長應妙根也感到了自己的不是，他說：“解放前，我受盡了地主、反動派的剝削欺凌，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如今當上了幹部，沒有好好勞動，把工作搞好，這是落了疤疤忘了痛，實在不應該。”經過互相幫助啟發，回憶對比，大家認識有了提高，都表示一定要積極勞動，做好工作。黨支部委員會並作出決定，要求黨員幹部改變作風，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鐵要打，人要煉”

黨支部的決定作出以後，大隊幹部都到生產隊去參加勞動了。開始，大家的勁頭很高，有的挑担，有的翻地。沒有干多久，大家都暗暗吃驚：多時不勞動了，想不到一勞動就這麼疲累。干了兩天，個個都累得腰酸背痛，尤其是挑糞干重活的，夜里躺在床上，骨頭就像散掉了似的。原來以為是種田人出身，參加勞動問題不大，現在感到有問題了。

幾個幹部湊在一起，黨支部委員兼團支部書記曹志英就嚷着：“天天干不行，還是打打雜差的好。”盛阿英還怪老潘太認真，輕快的日子不過，硬要頂了石臼做戲。慢慢地，大家對勞動又放鬆了，辦公室里的人又多了起來。潘東才發現了這個問題，就向大家提出：“身體疲累，這正是久不勞動的緣故，堅持一月、半月就好了。只要不怕勞苦，這一關一定闖得過。”大家感到這話雖對，可是說說容易，做起来却很難。潘東才心里也想，從長久不勞動到熱愛勞動，的確需要一個鍛煉過程。自己是支部書記，就得起帶頭作用，帮助大家過好這一關。他除了安排日常工作和參加有關會議之外，一有空就在潘家宅生產隊勞動，起早落夜，和社員一起挑糞、澆水、翻地、種菜。一個月過去了，在大隊幹部會上檢查勞動情況時，一般都做了一百個工分左右，大家以為勞動得很不錯了，可是一看潘東才的勞動手冊：整整做了二百三十多個工分。潘東才笑着对大家說：“開頭挑糞，肩胛痛透痛透，硬着頭皮干下去，就越干越有勁了。”支部書記做出了榜樣，對其他大隊幹部鼓舞很大。曹志英當場表示：鐵要打，人要煉，老潘這麼忙，還干了這麼多，我們更不應該落后。不久，她在姚家宅生產隊積肥，一連干了好幾天，累得手臂也舉不起，還是堅持下去，後來很快也就習慣了，身體也比從前結實多了。

闖過了艱苦關，大隊多數幹部參加勞動都比較自覺、比較經常了。但是，副大隊長盛阿英一向懶散慣了，還是不夠經常。她勞動一會兒，往往推說要買點什麼，騎了自行車，就到鎮上去逛了；有時就干脆坐在家里划



划表格，填寫數字。社員對她意見很多，說她像“水浮蓮”，飄來飄去。有一回，她在田岸上對社員指指點點，社員就沖撞她，說：“你來干干看。”聽到群眾的批評，盛阿英很苦悶，甚至想不當幹部了。潘東才知道了，就反復幫助她，特地到她家裏，懇切地對她說：“我們是共產黨員，又是幹部，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勞動中鍛煉改造自己，怎么能受了點批評、遇到些困難就鬧情緒呢？”同時具體幫她安排了工作，還對她說：“你體力較差，社員都知道，只要自己盡力多參加勞動，社員是會體諒的。”經過潘東才的幫助，盛阿英也有了轉變。不久，她在隊裏插秧，清晨四點多鐘就出工，摸黑才收工，還抽空幫隊裏記工分。幹部和社員們都很為她操心，要她注意身體。得到大家的關懷，盛阿英信心更足了，她把工作安排在晚上做，和社員一起插了十多天秧，從此也積極參加勞動了。

現在，大隊幹部已經養成了熱愛勞動的好習慣，不再感到疲累了。有時候，雖然夜里開會開得比較晚，他們第二天一早還是堅持和社員一起出早工；有時候，上午要到公社開會，也盡量做了早工再趕到社裏去；從公社、大隊開會回來，不管時間是早是晚，只要社員還在田裏干活，他們也下田去勞動，和社員一起收工。他們到生產隊去工作，就帶上一兩件農具，工作到哪裡，勞動到哪裡。

為了常年堅持參加勞動，大隊幹部還實行了定工勞動、定額補貼的辦法。每年年初，

由大隊根據每個幹部的實際情況，提出全年的定工勞動任務及補貼工分總數，由大隊社員代表大會審查通過。大隊幹部每人都備有一份勞動手冊，到隊裏勞動，和社員一樣評工記分。

大隊的幹部都分別固定在一個點裏勞動，為了保證工作和勞動兩不誤，大隊規定幹部及時匯報點裏的生產情況、社員思想情況和貫徹執行黨的政策中的問題，由大隊集中起來，經過分析研究，提出意見，指導全面工作。

“鐵耙不用要生鏽，
幹部不勞動會褪色”

現在，張建浜大隊幹部常常說：“鐵耙不用要生鏽，幹部不勞動會褪色。”事實也確是這樣。幹部堅持參加集體勞動，就能永遠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發揚艱苦樸素的作風，抵制剝削階級思想的侵蝕。這次整風整社，社員對大隊幹部的意見不多，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幹部在勞動中同社員打成一片，能夠接受社員的監督。幹部一有什麼缺點錯誤，社員就隨時批評、幫助，因此很多問題剛一露頭，就能夠及時得到改正。過去有些幹部用錢不注意精打細算，如今經常參加勞動以後，就時時想到，隊裏的每一個勞動果實，從種到收，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珠，得來不易，因而對集體財物更加愛惜了，對自己的生活作風也更加檢點了。大隊長應妙根過去常到吳淞鎮上去吃吃



玩玩，这两年来也改变了。这个大队的干部都很少上街，即使到公社所在地的镇上开会，也是一散会就赶着回来，参加生产。他们說，不参加劳动，一空下来就想上街，参加了劳动，就一心一意想搞生产，把队办好。党支部书记潘东才除了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之外，一到家里，拾水、烧火、洗衣服，缝缝补补，什么都干。在他的鼓励帮助下，他爱人虽有三个孩子拖累，每年也还做了三百多个劳动日。

大队干部克勤克俭，对生产队干部也是帮助。今年三月里，谭家宅生产队要造一间仓库和一个粪坑，打算买一些木料砖瓦，预算要花三百多元。在这里蹲点劳动的大队长应妙根知道了以后，就和干部、社员商量，一定要精打细算，注意节约，大家决定粪坑暂时不造，仓库也利用废料，因陋就简，自己动手修造。结果，修仓库只花了五十多元。社员们高兴极了，说应妙根会盘算，而应妙根却坦率地说：照过去的做法，这预算也许就批准了，如今经常劳动，盘算也就不同了，我们一亩田辛苦耕种一年，纯收入大约五十多元，这回一次要花三百多元，就等于六亩田一年的纯收入，这不盘算行吗？通过事实的教育，大家对勤俭办队也更加注意了。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进一步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干部下田劳动，社员都招呼他们同自己在一起干活，边劳动边谈心。他们在劳动中了解了社员的思想、生活情况，社员有什么需要，就主动地帮助社员解决。

有一回，潘东才在苏家宅生产队劳动，社员随便谈起，队里有座石桥坏了，过路人提心吊胆，很不方便。潘东才听到后，忙和队干部商量，很快就想办法把桥修好了。社员们知道了很感动，都说：“老潘真体贴社员。”

干部经常同社员一起劳动，也容易及时发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生产中领导生产。去年有一次，潘东才在姚华浜生产队劳动时，发现男女社员之间的工分差距很大，如有个男社员，有一天竟得到了二十五个工分，而沈雪英婆媳三人却只得到了二十四工分，问题在哪里呢？潘东才同社员一起劳动，并且一起参加评工记分，才发现一是男劳力的底分偏高，二是一部分重活的定额偏高。问题找到了，他就发动干部、社员合理修订了劳动底分和劳动定额，解决了男女社员同工同酬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两年来，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在生产中领导生产，对全大队各生产队的农副业增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六二年，全大队农副业的各项指标，除棉花因受灾减产之外，其他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稻麦两熟亩产平均八百四十八斤，总产量超过原计划的百分之一一点三；油菜平均亩产一百八十三斤，超过计划百分之七点七；蔬菜平均亩产七千八百斤，超过计划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其他生猪、羊、禽、兔等也都超额完成了任务。随着生产发展，社员收入也有了增加，一九六二年，全大队分配总额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九点三。



社員的好榜样，青年的帶路人

莫占林

“前有車，后有轍”，是北京市順义县張喜庄人民公社后渠河生产大队干部，在介紹他們参加劳动的意义时說的一句話。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杜永余和大队长張文治，从八年前組織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起，就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去年，党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二百七十天，大队长参加劳动二百七十八天。在他俩带动下，絕大多数干部在参加劳动中有力地領導了生产；絕大多数青年社員都踏着他們父兄的脚印，树立了“劳动光荣”、“以社为家”的思想；大队的集体經濟日益巩固，生产事业蒸蒸日上，人們的精神面貌也显得光彩焕发。

这个大队和所屬两个生产队的十七名干部，絕大多数原来都是貧雇农，他們当了干部后，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去年，他們平均每人劳动二百八十七天。党支部书记和其他主要干部，对于耕犁拉打、篩簸揚拿、提粮下种，样样农活都是行家。哪里缺人，他們就递补到哪里，哪里发生了問題，他們就奔向哪里。今年春寒未消的时候，水渠堤壩决了一个五尺多长的口子，眼看水就要把邻队的麦苗淹沒。在这个时候，队长張文治首先跳进水里，青年們也跟着跳下去，一个从

未經过風霜的独生子，也不由自主地脫去棉衣跳进水里。經過一番緊張激烈的战斗，决口的堤壩迅速被修复。去年有一百七十多亩玉米严重受澇，大家都认为沒有指望了。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干部怀着焦急的心情，同几个有經驗的老农一道，在現場观察研究，最后决定采取集中人力边耨地边追化肥的办法。几天以后，玉米果然复苏了，秋收时收了二万五千多斤。社員們說，这些玉米是“拾得来”的，要是干部不参加劳动，哪能及时發現和解决問題，这批玉米准扔了。

干部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常常开会，有时早晚还要抽時間到地头料理活茬。他們除了在和社員一起干活的时候按劳登記工分外，其他非生产性劳动一概不記工分。干部領取誤工補貼，最多也不能超过制度規定的天数。去年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只分別領取了七十天和四十二天的誤工補貼。全大队支出的干部誤工補貼，只占投工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八一五。干部积极参加劳动的模范行为，給广大社員树立了榜样，博得了社員的信任和好評。許多社員說：“社、队干部和咱們一起劳动，咱們和干部就沒有隔膜”，“干部积极带头劳动，咱們都把心窝子掏出来干”，“干部說什



么，咱們都相信”。

对于干部要不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問題，在后渠河大队的干部中，曾經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有的說，干部领导生产主要是“操心”，即使不参加劳动，也能把生产领导好。支部书记认为，干部是群众的“样板”，如果干部动嘴不动手，就会失去社員的信任，不能搞好生产，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第一生产队队长坚持在劳动中领导生产。他在收工以后，常常到庄稼地里查看活茬情况，晚上就同队干部一道研究部署第二天的生产。由于他对全队的每一种活茬情况，每一个社員的思想和劳动能力，都了如指掌，派起活来就能因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每个劳动力的作用。最近，他抓住麦收前的間隙，抽出十三个最强的劳动力，到邻村帮助修建猪圈。留在队里的其他劳动力则分别担任玉米和白薯地锄草工作。八天以后，一齐动手收割小麦。由于計算周到，安排合理，这个生产队的生产搞得挺好。第二生产队队长“光說不练”，“只謀不干”，在社員們干活的时候，总是两手背在背后，哈着腰問社員：“你干得怎么样啦？”或者对社員說：“你干得对！对！对！”說完就照例倒背双手到生产队的場院看門睡觉去了。社員們一看到这位队长，都装着沒见到他一样。由于脱离了劳动，他对活茬的情况也不熟悉了，“謀”也不灵了。有一次，他看到第一生产队割糜黍，就想当然地叫一批青年社員也去收割糜黍，他們到地里一看，糜黍还没熟呢！大伙对这位队长就越看越不順眼了。由于这个生产队的生产安排得不完全得当，生产受到一定影响。这两个生产队的生产条件基本相

同，年終結算时，二队比一队少收粮食八千斤，一队的劳动日工值也比二队的高。今年改选队干部时，这个队长落选了。

会计是否也要同其他干部一样参加劳动，这个問題也有爭論。有的干部认为，会计只要把賬目記清楚，就算尽了責任，用不着参加劳动。有些干部不同意这种意見，他們认为，会计平时一天只有几笔賬，工作量既不大，就应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多一人劳动为集体多增加一份财富，队里还可以少補貼一点工分；他們还认为，生产队的会计，是劳动者的管家人，劳动者的管家人应该和劳动者一起劳动，而不应当学地主的“管賬先生”那样，当“甩手掌柜”。现在，大队和生产队的三个会计集中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有賬記賬，沒賬时一人值班，两人下地干活。去年两个生产队的会计都劳动了二百六十天左右。

爭論最激烈的是当干部吃亏不吃亏的問題。持有“干部吃亏論”的人认为，干部又做工作又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多劳应该多“得”，为什么不能多記工分？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当干部不如当社員，干部就是“吃亏”。

許多干部都不同意“吃亏”的說法。有的說：当干部的，只要一不躲懶二肯干，就不会少得工分，去年絕大多数干部所得的工分都不低于强劳动力，就是一个证明。有的說：当革命干部，做共产党员，为社員多做些事，多劳累些，这是应该的，怎么能說是“吃亏”呢？党支部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症結。他說：到底是当干部吃亏，还是旧思想纏住了我們？咱們都是給地主、富农扛过活的，为什么不想一想，那时，咱們是怎样受人



家剥削？受人家欺侮的？现在好容易自己当家作主了，不好好掌握“印把子”，却说“当干部吃了亏”，难道这不是好了疮疤忘了痛？经过这场争论，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思想，才在绝大多数干部中树立起来。去年除会计外，其余十四名干部都分别劳动了二百七十天到三百四十一天。一支有战斗力的、能够和社员同呼吸、共命运的干部队伍形成了。

在这个大队的一百零二个劳动力中，有三十七个劳动力，是最近几年陆续参加农业生产的城乡知识青年。其中绝大多数青年都在干部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循着勤劳俭朴、热爱集体的道路成长起来了。

二十岁的刘文路，是去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农业生产行列的。开始时他想：整天同土疙瘩打交道，这有什么前途呢？因此，他在干活时不大讲究质量，追求高工分，看到困难的活，就趁早闪在一边。去年秋收时，大伙都以非常喜悦的心情，争着把装满粮食的粮袋从场院扛运到仓库里去，可是，在刘文路的眼睛里，这些沉甸甸的粮袋，却是一副又累又重的担子，他连忙赶到一些轻巧的活茬场所去了。

经过一段时期的劳动和观察，刘文路发现干部的劳动态度和他多么不同：老队长的腰部原来就有些毛病，在挑上劳动中又把腰扭了，众人都情不自禁地为这位老队长担忧。可是，老队长第二天又照旧在劳动。这件事情使刘文路受到深深的感动，他不禁为自己先前的行动而羞愧了。

现在，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干部，干部挑重活，他也抢着干重活。今年春初，看到干

部在泥濘不堪的渠旁挖泥修渠，他也卷起裤腿赶到泥沼里挖泥。黑夜，他紧跟在干部后边，推着三百斤重的运土车，从渠下奔向渠上。在这次修复渠道的工程中，他们的生产队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挖土的，但是在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上，却居上游。这使他第一次真正感到劳动的伟大和幸福。他现在已经安下心来，“以社为家”了。为了继承老农的经验，他自觉地积极学习他们的农业技艺。最近在参加谷子、高粱间苗的劳动中，老农在前面干，他紧紧在后面跟，开始不是质量不合格，就是速度跟不上；经过勤学苦练，他现在已熟练地掌握了这两种活，还初步学会了施肥、锄草和撒种等种植技术。

比刘文路大两岁的杜连来，六年前读完初级小学，就在本村参加农业生产。他是一个孤儿，解放前依靠要饭来养活自己和双目失明的母亲，解放后在政府救济下，家庭生活有了安排，自己也上了学。在他投入农业集体生产这个革命熔炉的第一天，党支部书记源源本本地把他家的一部悲惨的“家史”告诉他：他爸爸干起活来是个好样的，村子里谁都称赞，可是在旧社会，贫雇农没有给自己劳动的权利。他爸爸给地主、富农扛了一辈子的活，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结局像所有的贫雇农一样悲惨，抛下妻儿，离开人世。支部书记对他說，现在咱们有了劳动的权利，党和政府又帮助咱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可要珍爱劳动呵！杜连来噙住眼泪，在一个本本上记下了支部书记的话，并且把这当做参加劳动生产的第一课。

可是，在他最初参加劳动的时候，实际的劳动生活，却向他提出种种问题：在一个



陰雨天里，隊里派出兩種活，一部分人栽白薯，一部分人挑水給白薯澆地，他的任務是挑水，從溝下挑到溝上，路滑難行。他瞧着泥濘的坡道正在躊躇的時候，黨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正干在前頭，一度出現在這個青年人臉上的猶豫的神色立即消失了，他很好地完成了挑水的任務。又有一次，隊里的活茬很緊，他家里抹房、搭炕等活計也很急，是先公後私，還是先私後公呢？他到黨支部書記和隊長家里一瞧，發現支部書記家里的炕已拆了五、六天了，炕應該隨拆隨搭，可是支部書記一直沒時間干私活；隊長家里的豬圈沒墊土，他家的小孩正在費勁地向圈里扔泥上。他從這些活生生的事實中，受到了啟發。現在，他是全隊公認的突擊重活的能手，哪里有困難，哪里就有他在勞動。在粘滑的坡道上推車運土，他不用人拉繃，就推着三百斤重的土車向上猛沖。為了早日把糞肥送到地里，好騰出時間適時播種，他走在三十個青年社員的最前面，一天挑了一百二十挑糞。在他的帶動下，這些青年人把預計要三天才能運完的一百三十方糞一天就運完了。去年秋收時，他白天勞動，晚上受社員們的委托，在場院里連續住了四個多月，認真看守糧食、柴禾。他就是这样熱愛勞動，熱愛集体的。

二十三歲的杜蘭英，成長得更成熟一些。她也是在讀完初級小學後參加農業生產的。她在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堅決跟着黨走，把黨支部書記和其他干部的模範行為當作自己的學習榜樣。她奮不顧身地勞動，和群眾打成一片，遇事堅持真理，維護群眾利益。每次評獎時，她的名字都列在

前茅。她擔任過婦女隊長，團支部書記，前年又被選為婦女大隊長，今年被批准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

她的體質不很健壯，可是在社員中，她却是大家公認的一個勞動最好的女標兵。她被婦女們選為隊長後，總是站在婦女們的前頭干活，並在活茬的質量和操作的速度上做出“樣板”。社員們休息的時候，她就趁空檢查活茬質量。在日常生產中，她處處關心群眾。王洲蘭體力較弱，龐富蘭有六個孩子，家務很重，她就給她們派靠近家邊的“碎活”。秋收以前，她安排婦女們趁空縫制棉衣，使她們在秋收時能夠集中力量參加秋收。去年鋤地時候，她發現女社員干活的效率比男社員低不了多少，活茬質量也不差，可是女社員勞動一天，要比男社員少記二、三個工分。女社員們對這種同工不同酬的不合理現象議論紛紛，很有意見。可是這個隊的有些干部認為，女社員的勞動能力弱，是“配角”，應該記低工分，不承認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她就將這件事提到大隊會議上討論，最後糾正了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按照男、女勞動力在各種農活中的綜合勞動效率，合理地規定男、女勞動力的標準日工分。社員們對新的記工辦法都很滿意。

有一天，她到縣里開會，按慣例由大隊給她記誤工賬，第一生產隊的記工員又在隊里給她記了工分，她翻開勞動手冊發現了這種情況後，立即讓記工員作了更正。她緊緊記住黨支部書記一直囑咐她的話：“當干部絕不能多吃多占隊里的勞動果實！”她在这方面對自己要求很嚴，常常起早帶晚為集体干零星活，也不記工分。她很少為私事誤工，到



公社卖猪、买用品，也都是利用中午歇晌的时候去办。她最近几年所得的劳动工分，比全队所有女社员都多。

刘文路、杜连来和杜兰英，在这个大队的知识青年中，代表着三种类型。近一两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十多名知识青年，像刘文路一样，已经安下心来，正在随着“轍”儿开步走；参加农业生产三年以上的十多个青年人，大都和杜连来的情况相同，树立了“以社为家”的思想，正在顺利地随“轍”前进；有十个青年人，和杜兰英相类似，他们分别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副队长、妇女队长等职务。

现在全大队的三十七名知识青年，有十

四人是共青团员，有五人受到大队的表扬和奖励。他们在党支部领导下，以团组织为核心，每月十日、二十日收工后集中学习一、二小时，冬闲时每周学习两次，有时讲团课，有时结合队里生产讲农业知识，有时则请党支部书记和其他老贫农，讲述本村贫雇农在旧社会中受压迫的历史。他们在劳动中，想到老一辈的人差不多都受过地主的迫害，为了鞭策自己，总是学着干部的榜样，把轻些的活让给老一辈的人干，而自己把重活承担下来。挑粪、黑夜澆水等，青年人都抢在前头干。老年人赞赏地说：“这真是守着什么人，学出什么人，什么样的人，教出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能一贯参加劳动？

万里云 潘用庭

福建省尤溪县团结人民公社大队干部，一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不仅形成了制度，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能够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几年来这个公社的生产稳步上升，获得丰产丰收，多种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由于各项工作成绩显著，全社五个大队都被评为县的模范大队。

团结人民公社五个大队的二十一个主要干部，从一九五六年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时候

起，就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几年来，平均每人每年参加集体劳动一百八十天，最多的在二百天以上；到了一九六二年，则达到二百二十八天，其中最多的三百四十三天，最少的也有一百零八天。生产队干部每人平均劳动天数达到三百一十八天。今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比去年还要好。

团结人民公社大队干部为什么能够一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呢？

首先由于他们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有良好的劳动习惯。他们大部分是土地改革时期贫农出身的积极分



子或干部，亲身受过旧社会的苦，因此更体会到新社会的甜。解建大队党支部书记張世鎮說：“我們是土生土长，一貫靠劳动吃飯。解放前，劳动累得半死，还是沒吃沒穿的；今天在党的培养下，当了干部，怎能不积极工作、劳动生产？”光林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元策，从一九五九年以來一直在比較落后的生产队工作，同群众一起把这个生产队搞好了，就又带着老婆孩子搬到另一个生产队去落戶，参加生产劳动，改造落后队。这样，他接連搬了三次家，帮助三个比較落后的生产队改变了面貌。他說：“我家六口人，在旧社会吃野草、树叶，現在生活好，又叫咱当家，怎能离了劳动？”上源大队党支部书记林世浪，从一九五〇年当干部以來，一直是下队带鋤头，上山带土箕，到县、社开会还順便运物資。从一九五二年起，他一直是县、区、社的劳动模范，并出席过省的林业先进工作者會議。他常說：“我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参加劳动像什么？”因結大队大队长蕭祥金，也是从土改后就当干部的。他劳动是个全把式，在劳动中也是淨搶重活干的。他說：“重活、髒活都是真功夫，干部带头才能够保证质量。”劳动对于这些貧农出身的干部确实是普普通通的事情。公社畜牧場配种員郑世英今年已經六十一岁了，还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劳动。他在一九四九年便参加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斗争。一九五六年他是乡治安主任。那时，社的畜牧場由于缺乏經驗，六头母猪和十多头小猪养不好，出于对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的高度責任感，他自动要

求当飼养員。到畜牧場后，他精心細养，猪长得很好，从此他就轉入养猪这一行业。人民公社化后，他被調到公社畜牧場管种猪，經常赶着公猪到三十多个生产队去配种。去年劳动了三百多天，得了三千二百四十个工分。由于他积极工作和劳动，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被选为公社民政、調解委員。

团結人民公社的大队干部劳动好，和县委、公社党委認真貫徹党的政策，重視干部的思想教育是分不开的。

尤溪县委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就抓住城关区園溪乡党支部书记詹其燮的工作好、劳动好、思想好的事迹，广泛宣傳；号召全县区乡干部学习詹其燮。在詹其燮的影响下，原来劳动好的干部，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了；原来劳动不够好的干部，也受到了教育，改变了工作作风。人民公社化后，上級党委又一再号召干部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发揚艰苦朴素作风，和群众同甘共苦。后来，还具体規定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定額制度和严格的檢查評比制度。任务要求更加具体，干部思想更加明确，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走上了經常化、制度化，并逐步成为习惯。

群众的监督也是这个公社大队干部能够一貫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五六年办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干部領了固定工分補貼，加上工作繁忙，有些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少了。群众对这些不認真参加劳动的干部很有意見，批評他們說：“农不农，秀不秀的（意即不务正业），像个个什么样？”这类輿論对干部影响很大。前解建乡



党支部书记張德朝，有一段时间成天忙着开会，一个月劳动不上两三天，工作也没做好，他领导的大通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桥头两个较好的生产组，生产反而比别人差。当时群众对他的批评很尖锐，同时县委又正在号召学习詹其燮的先进思想和先进工作方法，使他认识到过去的做法不对头，于是他下决心改变工作方法，认真和社员一起劳动，密切和群众的联系，逐渐地把生产组的落后状况改变过来。上源大队大队长刘连坤去年只参加集体劳动一百零八天，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年终评比时，社员就批评他这一条，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今年一至五月他的劳动天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现在这里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干部是否参加劳动是衡量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劳动好的受到群众赞扬，劳动不好的就受到群众的批评。团结人民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由于能够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社员相处，更加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许多群众心里有话，就主动找干部谈，有问题，就主动找干部解决。到处可以看到干部关心社员、社员体贴干部的事例。社员对干部的体贴、帮助，实际上是对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和积极为群众工作的一种督促和鼓励。

县、公社以及大队本身工作制度的改进，也保证大队干部有时间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为了使干部能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各大队很注意加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作风，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党支部书记主要抓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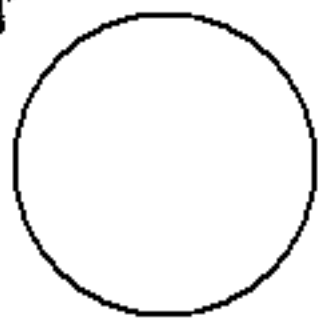
的政治思想工作，大队长管生产、生活等行政工作。支委会每月一次，紧急问题可以临时碰头。各大队都有生产、民政、调解、文教卫生、武装、治安等组织，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人做，有人管，使干部不致忙于各种事务，顾此失彼，妨碍生产。同时，他们又实行了干部全面完成劳动定额的制度。每个干部都到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并通过劳动生产解决生产队的问题，以推动其他生产队的工作。大队干部在哪个队工作，就在哪个队参加劳动和分配，同社员一样完成劳动定额，一样评工记分和实行奖赔，并和社员一起评比。此外，每一季度干部又自行评比一次。

在会议制度上，大队干部规定凡是能够在田头商量或个别商量解决的问题就不开会，能够在自然村开会解决的不集中到大队去开会，必要开的会在晚上开，并且在会前充分准备，尽量缩短会议时间。此外，还规定主要干部开碰头会的制度，以便及时处理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制度，干部和群众都很欢迎。公社布置工作或下达指示，尽可能由委员分头去各队传达贯彻，尽量少开大队干部会议，个别商量能解决的问题，该谁来就通知谁来。去年公社召开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议，每月平均只有一次。县委也是如此，书记、常委、委员经常深入大队、生产队，大队一级干部会议也很少召开。县里发表报、要数字，一般只发到公社，并力求简明和切合实际，以免下面干部陷入写材料、搞统计的事务之中。这些做法，都为大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望山下

碧野



在春风细雨中，我跟着中共湖北省南漳县委派驻前进生产大队的工作组长老李，一同去四望山脚下。我们路过青泥湾，隔着蛮河，对岸就是四望山。青泥湾平坦辽阔，土地肥沃，拦河堰一道又一道，渠流纵横，水田漠漠，是全县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只有一河之隔，那四望山脚，却是历来穷僻荒凉的去处。

隔着蛮河遥望那烟雨濛濛的四望山，灰色的雨云缭绕山腰，苍黑的山峰巍峨峻拔，高出群山之上。不论晴雨，不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见它，果真是名不虚传的“四望”山。

“四望山是老游击区，你要访问的那个郭玉山，当年是个很出色的游击队员……”

老李的话，给脚下蛮河的潺潺水声打

断了。蛮河上，横跨着一节一节颤悠悠的桥板。雨洗的桥板光溜溜，有点滑脚。蛮河水在桥底下掀起激浪，桥板一个劲的摇晃，使人眼花。

我们踏上河对岸的卵石滩，又穿行在柳林中，柳梢飘洒着水珠，处处传来淙淙的泉流声。心里产生一种春意正浓的美妙感觉。

“看来四望山下并不荒凉呀！”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说。

“这是近些年才改变过来的。”老李笑着说。

穿出柳林，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映照天光的水田。油黑的秧田里，撒满金黄的谷种，一个戴着斗笠的孩子，手舞竹竿，正在斜风细雨中追赶着想偷吃秧田里的谷种的喜鹊。

“雨天里还在看守秧田，这孩子真负责！”我称赞道。

“这都是郭玉山教导出来的！”老李骄傲地说。

在细雨濛濛中，我们顺着一条滑滑溜溜的田间小路，来到前进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山同志的家门前。这是三间低矮的瓦房，墙上的土坯经过长年久月的风吹雨打，从屋檐到墙脚，布满大大小小的裂缝。可是屋子周围，却另有一番新气象，栽种着柿子、桃、杏、核桃和石榴。这些带着春雨的果树，在微风中抖闪着绿光，显得欣欣向荣。

郭玉山的妻子热情地招呼我们。又让坐，又烧茶。她说：“玉山下田干活去了。他是忙人，我也忙，连屋子都顾不上收拾。”



我注意到屋里的陈設非常簡單，但是堆滿尾角的鋤頭、鐵鍬、鏟頭等生產工具，却特別令人注目。

“我家的房子還是土改時候分的呢。”郭玉山的妻子一面往灶里添柴，一面說，“本來大隊撥給五千塊磚瓦，要給我修房子，可是玉山生來只有公沒有私，他說先給社員修，自己的不忙！”她像是在埋怨，又像是在夸耀。

“大嫂說的句句是實話。”老李對我說，“郭玉山十幾年來沒有忘記勞動人民的本色。他是大隊黨支部書記，又是公社黨委副書記、區委委員、縣人委委員、省人大代表，可是，連一件干部服也沒制過！”

“他呀，一個錢都攥得手心里冒汗！”她在灶間里帶着笑聲說。

“這倒要看在什麼事兒上了！”老李急忙分辯道，“老郭自己省吃儉用，可是對幫助有困難的社員很大方呀！就拿你家鄰居劉振昌來說吧，他害肺病，孩子又多，他家沒鹽，你家給；他家沒柴，你家送。我說這話不假吧？”

“這些事都是真的。玉山常常這樣對我說：階級兄弟有困難，我們大伙應當幫忙嘛！”郭大嫂在灶間里感動地說，“就說我家燒的這些柴吧，也是玉山趁着月亮地上山砍來的。他白天領着社員們干活，晚上還給家里種菜園、上山挑柴。他已經是四十開外的人了，還經常挑一百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也够難為他的了！”

她的話剛剛落音，忽然有一個渾身被雨

打濕、頭纏白布巾的中年漢子走進門來。我猜他是郭玉山，急忙站起來。可是老李却給我介紹說，他是前進大隊黨支部副書記雷大銀。

“我只頂得上半個郭玉山。”雷大銀也發覺我把他認錯了，就直爽地笑着對我說。說話間，他朝屋角看了一眼說，“老郭准是去二隊了。”

我很詫異，為什麼雷大銀看了一眼屋角，就知道郭玉山去了二隊呢？老李是個細心人，他看出我的疑惑，便向我解釋：現在正是耙稻田壓青肥的季節，二隊生產比較落后，雷大銀看見沒有了釘耙，就猜着郭玉山到二隊勞動去了。

雷大銀是個火燒火燎的角色。這幾天他正害病呆在家里，是那個看守秧田的孩子告訴他郭家來了客人，才趕來看看。一見面他就憋不住地跟我談起了郭玉山。

郭玉山從來沒有忘記在舊社會給地主種應工田的苦處。所謂應工田，就是地主只給二畝壞地耕種，年頭到年尾，地主一聲喊，就要趕去給他家干活。耕種二畝地，不是誤了農時，就是草長得比庄稼還高。在舊社會受盡飢寒的人，他就更會感覺到新社會的溫暖。郭玉山體會“勞動”這兩個字，不但是給社會主義創造財富，同時是給無產階級鞏固政權。因此，他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勞動。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他當公社副書記兼大隊支部書記的時候，就經常跟社員一起勞動。去年五月間，郭玉山回大隊，正趕上割麥子、上山割草瀝肥。他碰見啥活



干啥活。按襄陽地委規定，大隊幹部每年勞動一百二十天就行了。可是他去年從六月到九月就干了七百八十五個工分。

接着，雷大銀又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

去年十月間種冬麥，郭玉山帶領着十五個人取溝，各取一塊田。定額二十五丈長、一尺寬、一尺八寸深，為十二個工分。郭玉山取了三畝半，質量好，每天只合五個工分。可是社員陶亭禮、楊如祥兩個貪多圖快，取的毛毛草草，沒有達到質量要求。郭玉山講究實幹，平時話少，可是遇見了這種事，話就多了。他立即指着他倆取的溝問道：“看你們取的這種溝，能不能排積水？能不能增產？”陶亭禮和楊如祥都不好意思地紅了臉，却說：“要是像你那樣取溝，工分低了，可划不來！”郭玉山說：“定額高了，盡可以向隊里提意見修改，可是你們干活為了大伙增產呢，還是為了自己掙工分？”陶亭禮和楊如祥一聽，連忙拿起工具返了工，還彼此相互警告說：“以後再不敢弄虛作假了，老郭一畝也不放過的！”

“群眾愛的就是郭玉山對人和氣對事嚴！”老李在旁補充說。

“要是沒有老郭領頭帶路，我們這四望山腳下眼前就不會有這一派好風光！”雷大銀接過郭大嫂遞過的大碗溫茶，喝了一口，咂了咂嘴巴說：“以往，春天育秧，還要到青泥灣去找谷種；可是現在，青泥灣的姑娘們也爭着來我們四望山腳下對親了！”

雷大銀這最後一句話，逗得郭玉山的妻子笑了。

“說真的，玉山當了十幾年幹部，別說大隊里的社員，就是連我這個床頭灶腳的人，也是處處佩服他！”郭玉山的妻子說得很動情。

“瞧瞧，你不怕在客人面前落個夸夫之嫌？”雷大銀很有風趣地看了她一眼。

她果真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只說了句，“我還要喂豬呢，你們不要走，等一會我回來給你們做飯。”就一陣風似的跑出門去了。

雷大銀從門里望着她去遠了的背影說：

“她也是一個女將，把隊里的豬喂得膘肥肉厚，每年出的肥，比哪一個豬場都多！”

“你們這里田肥水足，生產可趕上了青泥灣？”我問道。

老李立即把話接了過去，

“說起肥源，除了牛欄豬圈以外，這里還有一座四望山，山上的茅草、花櫟樹葉，瀝成綠肥，每年就有幾百萬斤；說起水源，這幾年開渠引水，也不比青泥灣差，四望山有仙女洞、獅子岩這兩股大泉呢。”

“我們四望山的泉水流進五里長的盤山渠，流上高高的銀子崗！”雷大銀像唱歌似的說。

他倆一拉一唱，說得我動了心。我要求上四望山去看一看。

我們走出門來，抬頭一看，天空只飄着雨絲，頭頂上露出一片耀眼的天光，這預兆着春晴。四望山上的雨雲消散了，雨洗後的巍峨山峰，屹立在我們面前。

我們走出村子，一條溪流迎面奔來。溪流上有一座磨房和一座彈花機篷寮。在嘩嘩



的水声中夹杂着水磨隆隆和水力弹花机叭叭。溪对岸，出现了一个像镜面一样光洁的打谷场，场边是新修的仓库。

“好繁荣的气象！”我不由得赞叹起来。

“这都是郭下山想的点子。大队里有了水磨磨面，有了水力弹花机弹棉花，社员们就不用跑远道去公社磨面弹花了。打谷场和仓库连在一起，边打场边入仓，又节省了多少劳动力呵。”老李细致地一一向我介绍。

“你瞧，那山上有个梳妆台呢！”雷大银忽然兴冲冲地对我说。

我顺着他的手指向四望山上望去。在越来越明朗的天光下，果真有一座奇怪的石崖，腿细头粗，孤零零地竖立在山腰里。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一座削尖的孤峰压上了一块大岩石，像一根玉柱顶着一面大银盘。狂风吹不垮，暴雨打不至。

老李含笑地告诉我：民间传说有个仙女住在四望山的仙女洞，那上面就是她的梳妆台。乌云是她的头发，太阳月亮是她的耳璫，星星是她的项珠，彩霞是她的披肩，山花是她的容颜。这是过去住在这个穷地方的人们对自己家乡的幻想和安慰。但这个幻想，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他边说我边听，跟着雷大银上了山坡。忽然老李停住脚步，回身把手一扬，提高了声音说：

“你看，这周围有多少堰塘，这许许多多堰塘不正是明镜，它们给天光云彩照影梳妆吗？”

我吃惊这个年轻的工作组长天赋一种诗

人的气质，既细致又深情。在他的手势下，我回头一看，映着天光的无数堰塘正像开启的明镜，倒影着流云、青山、绿树和梯田。

于是我怀着一种肃穆的心情跟上他们走进一条山沟。山沟里流着一条溪水，浪花在水石上奔腾、飞溅。越往里走，山沟越窄，草木越深，只见一线天。山径时隐时现，时断时续，一会儿在溪流这边，一会儿在溪流那边，我们卷起裤脚，时不时要趟过急流才能前进。

“瞧，这就是仙女洞！”峭壁前回响起雷大银宏亮的喊声。

我跟着老李拨开杂树乱草走前去一看，果真山崖下出现了一个大石洞。洞很深，黑黝黝的；洞口有几间房子大，可以坐上百十个人。天光从两山之间投落到沟底，可以看见有一股泉水从洞底下渗出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水清沙白。近看泉水不大，可是流出十步远，就变成了嘩嘩的小溪。

“真没有想到这股泉水这么大！”我的声音在悬崖峭壁前回响。

“原来泉眼小得多，是老郭领着几个党员，点着灯笼火把进仙女洞，经过十天八夜才把它疏通了的！”雷大银的声音在崖前嗡嗡地响。

我坐在水石上，把脚伸进冰凉的泉流里，呆呆地看着崖洞下清澈的泉源，大有心旷神怡的感觉。要不是雷大银震得山崖嗡嗡响的大嗓门在催我走，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清静的仙女洞呢。

我们顺着原路回到山沟口子上，然后绕



着弯弯曲曲五里长的盘山渠往前走。这时，雨云已经散尽，天空显得碧蓝碧蓝的。天晴日暖，春风拂面。沿着四望山脚的盘山渠和注满了渠水的一个个堰塘，在微风下泛起涟漪。

“挖这五里长的盘山渠和这大大小小的堰塘，工程可不小呵。”我说。

“这条盘山渠和许许多多堰塘，哪一处没有老郭的脚印！”雷大银挥臂指点着远近的堰塘说，“那是泥鳅沟，那是龙窝，那是黑鱼冲，原来的死水塘都变成了活水堰。山那边，还有个狮子岩大泉，狮子岩的泉水引上了银子岗！”

泉水顺着渠道在山岗上滚滚地流动，水声淙淙。我欢欢喜喜地跟着渠水跑了一阵，然后冲下山岗，朝着一片长得特别油绿的麦地跑去。

老李告诉我，这儿是郭玉山的品种试验田。田里的庄稼好像比别处长的都要早些。麦子已经扬花，棉花已经出苗，稻秧已经翠绿。一块连着一块，全竖有木牌，十分整齐。每一块，土质一样，面积相等。在麦子试验田里，栽种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阿勃和阿伏、印度的24号、川农51号、南大2419号等麦种；在棉花试验田里，播种的是岱字15号、彭泽4号、石短5号、红岱2343号等棉种；在水稻试验田里，栽培的是大秣、中秣、339、南巡1号、背籽糯、三颗寸等稻种。

“哎呀，天南地北的种籽都有哪，这试验田真是把全世界都包进去啦！”我惊叹起来。

“老郭说这是农业科学呵，分厘也差不

得。他常说，从这几块试验田里，我们要眼看全国，也当真要看看世界，看看哪一种作物产量高，是适合在我们四望山脚下播种的。”老李用一种敬佩的口吻对我说。

这当儿，雷大银忽然一抬手说：“你们瞧，谁来了！”

我抬起头，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扛着钉耙从田间小路走过来。他剃光头，穿着对襟上衣，肩膀和肘子上都补着补丁；下身穿的裤子裤腿特别大，看样子是便于卷高了下田干活的。

“老郭，我们正找你！”老李朝那个人喊了一声。

我不禁一阵惊喜。啊，他就是我要访问的郭玉山！

郭玉山笑嘻嘻地朝我们这边走来。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他那被风吹雨淋日晒的脸孔，像铁铸的一般黑；又浓又黑又长的双眉，蕴藏着聪明和智慧；他的善良的眼光，显得又忠诚又和蔼。

一种敬佩和爱戴的感情升上我的心头。郭玉山克勤克俭，热爱劳动、热爱集体，有远大理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农村干部呵！

正在我凝然深思的时候，工作组组长老李给我和已经走到跟前的郭玉山作介绍。郭玉山拉住了我的手。我感到他的大手又有劲又暖热。

太阳高照，晴空万里，雨后四望山显得格外青苍，水流飘曳闪光，田野翠绿，我们祖国的春光多么明媚呵！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王樂生 杜加星 項紹棠

浙江省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自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林、牧、副、渔等各项生产得到全面发展。全社六千三百多亩田地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六百二十四斤增长到一九六二年的八百五十八斤，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目前，全社生猪的存栏数达二千二百三十头，每户平均一点二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由于生产发展，全社的总收入从一九五七年的三十七万元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六十三万七千元；社员的分配收入，从一九五七年的二十七万八千元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四十八万元，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二。这个公社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五年中，除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一千零七十万一千斤粮食征购任务以外，还多向国家出售了七十二万五千斤商品粮食。公社化以来，在国家的支援下，各生产队还依靠集体的积累，联合兴建了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全社初步实现了排灌机电化，加工机械化。

城西人民公社生产年年好，生活步步高，这是广大社员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的偉大红旗，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结

果。同时，也和全社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在生产劳动中起带头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城西公社的干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公社党委的全体委员（包括党委正副书记、公社正副社长），都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国家粮食，以普通社员的身份，同社员一起劳动，同社员一起评工记分，同社员一本账分配。他们因公误工减少收入的部分，由公社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给以一定数量的补贴工分，这些工分的报酬，从社办企业中开支。一九六二年，这个公社的党委委员，除了一个分管公社工业企业的以外，其他八个干部，实做工分七千一百分，平均每人参加劳动一百一十一天。今年头四个半月，公社八个主要干部，除一个生病的以外，实做总工分三千二百零一分，平均每人参加劳动五十天。这个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也很好，绝大多数人的实做工分都达到了同等劳动力的水平。

干部参加劳动的好处很多

这个公社的干部，五年来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的结果，证明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好处



很多。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便于接受社员的监督，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避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个公社的干部，由于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保持了劳动者的本色。他们衣着朴素，手脚勤快，成天戴着箬帽，赤着双脚，和社员一起挑大粪、干重活；有事情，田头当会场，坐下来就商量，没有一点“架子”。社员们对干部也很亲切，很信任，他们很少称呼干部为书记、社长的，像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老年社员都叫他阿龙，青年社员都叫他阿龙哥。今年五十九岁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严傅兴，大家都叫他“老严伯”。公社的干部，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改选，廖锡龙、严傅兴、苏德华等同志，五年来都是连选连任。平时，群众敢于监督干部，干部也能够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把群众的监督比作是“擦脸”、“洗澡”。干部有些缺点，也能够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及时得到克服。去年年底，沙岗大队几个社员结婚时摆酒请客，在这个大队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严傅兴没有劝阻，也给他们送礼，和生产队干部一起参加吃喜酒。许多社员对这一点有意见，说：“干部带头送礼吃喜酒，这是提倡浪费！”老严知道了，就主动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讨。社员很满意。在公社干部的影响下，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能接受群众的监督。沙岗大队党支部书记潘顺弟，出身贫苦农民家庭，解放后，劳动很积极，但是，在当了大队干部以后，渐渐脱离了劳动，讲究吃穿。后来，经过公社

党委和群众的批评与教育，他觉悟过来，重新脱下鞋袜，和社员一起劳动。近几年来，他每年所做的劳动工分，都超过了同等劳动力的水平。这里的干部说：“和社员一道参加劳动，脸上的灰尘，身上的脏东西，大伙都看得一清二楚，马上帮着擦洗，使干部永远干净。”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便于在生产中进行科学实验，经过刻苦钻研，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城西公社的干部懂得，农村干部要搞好工作，就必须熟悉生产，只有过了这一关，既会讲，又会做，才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因此他们几年来一直坚持和老农、技术员一起种试验田，进行各种农业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公社化初期，这个公社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所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低产田的数量太多，妨碍大面积高产。当时全社六千三百多亩田地中，粮食亩产量在五百斤以下的低产田就有三千多亩。为了突破这个生产薄弱环节，他们总结了过去几年来改造低产田的经验，分别从清沙土、青紫粘土等七八种不同土壤的低产田中，挑出几丘作为试验田，和老农、社员一起，积极进行改造低产田的试验。当时水塔大队第四生产队有两亩半水田，每年“立夏”插秧，“小满”退黄，肥料施得越多，稻苗死得越快，虽经多年改造，产量还是很低，群众都叫它做“顽固田”。有的社员说：“这丘田如果能改好，水塔队的田都会变成千斤田！”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就挑它作为试验田。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在这



丘“頑固田”中摸索到一套降低地下水位和改良重酸土壤的經驗。現在，廖錫龍同志已經初步摸熟了全社各種土壤的性能和改良這些土壤的不同措施。公社社長徐金火，通過試驗，選育出幾種適合於當地不同土壤性能的水稻良種。其他幾個公社幹部也在試驗中找到改造各種低產田的途徑。一九五九年秋收的時候，由公社幹部管理的七丘低產田，畝產量都超過了七百斤。這個喜訊傳開以後，全社很快就掀起了改造低產田的熱潮，什麼“死板田”、“蓑衣田”、“爛泥田”，都迅速開始改變面貌。到去年，全社三千多畝低產田中，已有百分之九十的面積，畝產量超過七百斤的水平。

這個公社提高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開辟新的肥源，增施肥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廖錫龍同志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就堅持做綠萍（水生綠肥）越冬越夏的試驗。經過四年的努力，終於在去年取得了成功的經驗，為當地晚稻找到了新的肥源，對全社水稻的增產有着重大的作用。

這個公社的各級幹部，由於勤學苦練，鑽研技術，許多同志都成為生產能手，成為縣的、或者專區的、省的農業勞動模範，有的同志還成為在某一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土專家”。如公社黨委書記廖錫龍，就被當地群眾譽為“土壤專家”；公社社長徐金火，被省農業科學院栽培育種研究所聘請為特約研究員。這樣，就使我們黨的基層組織，放在積極勞動的先進分子手裡。

幹部堅持參加勞動，又是最直接地接近

群眾、了解群眾思想情況、對群眾進行思想工作的一種最方便的方法。這裡有一個例子，很能夠說明這一點。沙崗大隊有一個社員叫吳鏡柱，思想落後，開起會來，說的蠻好聽，一到田里就說怪話。生產隊要治蟲，他就故意說，這是天意，蟲是天上放下來，人治不了；生產隊要拔稗草，他就故意說，農民的老祖宗是吃稗草的，稗草是谷娘，是消滅不了的；生產隊搞評工記分，他又說，天天像“三堂會審”，太麻煩。公社黨委副書記嚴傳興在這個大隊勞動，吳鏡柱的這些怪話，他很快就了解了。老嚴一方面用事實向社員說明，吳鏡柱的有些講法完全是迷信，根本沒有這回事；另一方面，又積極幫助吳鏡柱提高認識。吳鏡柱在舊社會也是個受過苦的人，三、四個兄弟為了逃避國民黨抓壯丁，東跑西散，最後把五、六畝田也賣掉了；解放後，他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生活才逐漸好起來。嚴傳興同志主動找他個別談話，啟發他回憶對比舊社會給他帶來的痛苦，新社會給他帶來的好處，同時又發動社員幫助他，終於使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轉變了過來。解決了吳鏡柱的思想問題，也教育了其他社員，提高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像這樣的事例，在這個公社是很多的。這個公社的幹部在集體勞動中，注意了解社員思想情況，幫助社員解決思想問題，因而就更好地團結了群眾，社員有話就向幹部說，有事就找幹部商量。有的社員說，“幹部和我們一起勞動，田頭漫談，日長月久，把我們的心思都摸透了。”



怎样教育和帮助干部坚持劳动

城西公社的干部，在参加集体劳动、领导生产的过程中，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但是，他们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解决了思想问题，坚持了参加生产劳动的好作风。

从一九五三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这里的干部就在党的不断教导之下，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同社员一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九五七年冬天，经过整党整风，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又实行了一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那个时候起，这里的党组织，就经常教育党员、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并且把劳动好坏作为评比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每次进行干部评比工作的时候，首先是检查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表扬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干部，树立榜样，号召大家学先进，同时，也适当批评劳动差的干部，帮助他们改正缺点。这对鼓励干部参加劳动起了很大作用。几年来，由于坚持了这种评比的制度，在干部中逐渐树立了热爱劳动的好风气，“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成了社会的舆论；劳动的好坏被群众看作是鉴别干部的重要标准，谁劳动好，谁就得到社员的拥护。许多干部反映，在城西公社当干部，劳动差，是很难为情的。

城西公社的干部在参加劳动生产过程中，主要解决了以下两个思想问题。

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城西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老干部，绝大部分当选为公社干部。一九五九年春天，一部分干部的思想波动起来了，产生了脱离生产好还是不脱离生产好的问题。有些干部说：“别的公社干部都是脱离生产的，我们为什么不向上级要求脱产呢？”“一个公社等于过去的的一个乡，乡里也有五、六个干部，我们不脱离生产，工作怎么搞得好呢？”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同志向大家解释说：“我们是本地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从小劳动惯了，还是不脱离生产好。”可是，有些同志思想还是不通，说：“你是省劳动模范，一脱离生产，怕当不成模范嘛！”有的甚至说：“我们是假干部，吃力不讨好。”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公社党委组织全体干部讨论：到底是“真干部”还是“假干部”？脱离生产好还是坚持参加生产好？不少同志认为党和群众这样信任我们，把城西公社的工作担子完全交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一千五百多户人家的生产、生活大事，怎么能说是假干部呢？通过回忆对比，多数干部认识到自己是穷苦人出身，在旧社会没有半点地位和权利，现在翻身当了干部，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那种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才是真干部、好干部。不少同志在提高认识以后，自觉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思想。他们说，解放军、土改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劳动，我们为什么反而不想劳动呢？不少干部还列举了自己家庭在办社以后年年增加收入的事实，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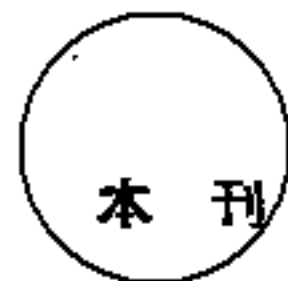


只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把集体经济办好，就会同社员一样地增加收入。有些党员、干部还说，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社员生活，即使需要自己吃点亏，这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来说，也算不了什么。经过讨论，绝大部分干部都说：“要知此中情，先为此中人，只有不脱离生产，多参加集体劳动，讲话群众愿意听，工作才好做，想想付付，还是不脱离生产好。”这时，个别干部思想还不通，于是，公社党委又把这个问题拿去同社员商量，让大家再听听群众的意见。社员说：“干部不脱离生产，领导生产更实际。”有的社员还说：“脱离生产，参加劳动少了，就容易脱离实际，你们的思想就可能变坏，还是和我们一起劳动好。”这时，上级党委也支持多数干部和社员的意见，赞成他们坚持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和社员同命运、共呼吸。这样，思想终于统一起来了，最后大家决定都不脱离生产。

一九六〇年春天，人民公社的各项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干部肩上的担子加重了，做好工作和参加生产发生了一定的矛盾。有些干部的思想又波动起来了，认为这个矛盾是解决不了的。有的还埋怨说：“我们又要做好工作，又要参加生产，辛苦死了。”这时候，有些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又少了，有的干部浮在上面，工作不深入了。群众反映：这些干部是“锄头圈”（指干部背着锄头到田里转一圈就走了）。公社党委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又组织干部讨论了廖锡龙同志的经

验。廖锡龙同志是县、省的劳动模范，又是县、省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为什么他参加社会活动比本社其他干部多，参加生产的时间也比本社的其他干部多呢？主要是因为他思想上重视这个问题，抓住一切空隙时间参加劳动，从外面开会回来，也是一路上检查生产，了解情况，一到家就立即下田干活。平时他把工作带到生产中去，到哪里去工作，就在哪里参加生产，边劳动，边了解情况，发现了问题及时解决，并且先在自己参加生产的地方做出样子，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指导全面工作。党委分配给他负责的社务工作，他常常是安排在中午或晚上休息的时间去办，尽量不妨碍参加劳动的时间。廖锡龙同志的模范行动，对公社的其他干部帮助很大，他们说：“阿龙公务多、会议多，劳动这样好，跟他学，工作与生产的矛盾不怕解决不了。”

同时，公社党委还研究和改进了工作方法，注意精简会议，有准备地开好会议，并且尽可能把会议搬到田头、地边去开，联系实际，就地解决，做到劳动、工作两不误。



本刊启事

本刊1963年第1—12期半年总目录，原应在第12期刊出，因篇幅限制，改在第24期上刊登。



他是庄稼人

周維敷 任洁民

在湖北省浠水县望城人民公社十月生产大队，社员们谈起公社党委书记兼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饶兴礼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老饶真是个庄稼人！”

一 闲不住的双手

一九五二年春天，饶兴礼串连了十二户贫苦农民，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湖北省第一批创办的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经成为望城人民公社一个拥有四百零四户社员的十月生产大队。在党的领导下，饶兴礼同社员一起长期奋斗，把十月生产大队办成了一个思想上先进、经济上富裕、组织上巩固的生产大队，成为湖北省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一面旗帜。

饶兴礼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几次见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从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并被选为中共浠水县委委员。去年一年，他曾经担任中共浠水县十月区区委书记的职务。饶兴礼当了干部以后，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还是个庄稼人。

饶兴礼调去当区委书记的时候，十月生产大队有的社员曾经惋惜地说：“老饶当了

区委书记，怕再难得跟他一起说说笑笑做活啦！”

后来，社员们放心了：“老饶忘不了我们。”

去年七月——正是大忙时节，社员们历来都要在这时候打几个夜工，抢割早稻，抢插二季稻。一天傍晚，区委会的会议刚散，区里通讯员给大家买来晚上的戏票。是好戏，外地刚到县城来的汉剧团的演出，大家都想去看。饶兴礼说：“我有点事，要到十月生产大队去，不看戏了。”大家不知道他有什么大事，硬拖他去看戏。他才说：“社员们打夜工割谷、插秧，我想去帮一下。”听他这一说，别人都难为情了，一个一个退了戏票，急急忙忙到各自“蹲点”的生产队去。

又有一回，也在夜里，饶兴礼正在区里开会，忽然下起倾盆大雨。他想到十月生产大队低处的谷田有被淹没的危险，便在散会以后冒雨赶到这个大队，几乎把整个大队转了一圈，然后又赶到第七生产队，带着二十几个社员跑到“脚盆底”（地名），顶着大雨疏通渠道。

饶兴礼就是这么一个人。社员们说他“不做活，手痒痒的不好过”。他起得早，睡得迟，一天到晚脚不停，手不闲。他走到哪里，拣起活来就干，而且专门干重活、脏活和难活。比如，往田里送粪，有挑粪的，也有撒粪的，他一定挑粪；起塘泥，有上泥的，



有挑泥的，他一定挑泥。這一帶地方有個習慣，由於白天太陽毒，耕整二季稻田大都在夜晚，兩個人使一頭牛，分上下兩班換着干。有些社員愛在上半夜做，做了好乘天涼睡覺；饒興禮當然知道下半夜做活苦，但是，他却總是搶着做下半夜的活。

如今的庄稼活複雜，不光是會動犁、耙、抄子就行。生產大隊的大半活兒，饒興禮碰着了能揀起來就干。這不簡單！這是用硬功夫一樣一樣學來的。他在水產隊學會了挖藕，在機務隊學會了開抽水機、開拖拉機。他原本不會挖藕，有時要跟水產隊的幹部、社員商量個急事，就覺得為難，非把人家找上岸來不可。饒興禮想，這哪行，像個“當官的”。於是，他下定決心，跟着社員下湖挖藕。挖藕是冬天干的活，一雙腳踩在爛泥里，褲腳卷到大腿以上，腳腿凍得又紅又腫。有人對饒興禮說：“你有事找社員商量，就在晚上去水產隊開個會，何必吃那麼大的苦呢？”饒興禮認真回答道：“社員們能吃這個苦，我為什麼吃不得？再說，同社員們一起做活，人多嘴多，可以談多少事情，又談得親熱。”

饒興禮職務多，工作忙，來十月生產大隊參觀訪問的人月月都有，但是，他却始終堅持參加勞動。他參加勞動的時間都是擠出來的。五月上旬，我們訪問饒興禮。這十天中，區里、公社都開了會，外面還有几處來參觀訪問的。區里上午散會，下午他就在十月生產大隊插秧，一邊勞動，一邊向大隊幹部講了區里會議的精神；晚上又到別處傳達。外面參觀訪問的人來了，他抽區里和公社開會的休息時間，給他們作報告，介紹情況。一天，太陽快落土的時候，他陪一個參觀團參觀完畢，看天還沒有黑，就下田幫社員扯

秧，扯了八十多個秧，才摸黑去開會。

二 又勞動，又領導

十一年來，饒興禮始終如一地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在暴風雨的夜里，他和社員一起守護秧苗；在烈日灼人的夏天，他和社員一起車水抗旱。饒興禮在勞動中，了解了人，也了解了生產情況。他既參加了生產勞動，又在勞動中領導了生產。

饒興禮對開會很有研究。他說，“上級開會，制訂方針政策，一個大會管年把，幾個月；下面具體事情多，要開會，天天有會開，那就不用勞動了。”他的辦法，一個是能在勞動中解決的問題，就不開會；一個是在勞動中了解情況，發現問題，醞釀辦法，然後開個短會解決問題。所以，饒興禮參加勞動時，愛到人多的地方去做活，愛到有困難的地方去做活，愛和社員一道進行技術革新試驗。有問題要解決的地方，多半有他在那裡勞動。有一次，他發現第五生產隊的插秧進度比別隊慢，他去了，不說要開會，先下田幫社員插秧，看見十七、八個人擠在一丘田里，做不出活來。他一邊插秧，一邊和五隊隊長商量解決辦法，建議隊長開個短會，把勞動力分了組。本來五隊還要三天才能插完秧，結果一天多就插完了。

前年抗旱的時候，機務隊的一些青年抽水機手，常常深更半夜一個人在湖邊上、野場里工作，天氣熱，蚊蟲咬，工作很辛苦。饒興禮親自在夜里去代替抽水機手抽水，或者給他們做伴。他在實際勞動中体会到抽水機手在夜間工作的辛苦。他建議大隊和機務隊給野外工作的抽水機手準備竹床、蚊香和夜餐。解決這些問題以後，抽水機手感到集



体的关怀和温暖，工作安心，精神振奋，提高了工作效率。

去年，抢插二季稻的时候，饶兴礼看到多数地方插秧进度比十月生产大队快一些，就有些焦急，对十月生产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有些埋怨情绪。当他回到十月生产大队，同社员们一起送肥、整田、插秧以后，他才发现社员们上工早、收工晚，不歇气地在干，插秧进度比别人慢一点，是因为社员想更多增产，下肥多、整田细，多用了工。这样，虽然进度慢一点，但是，没有误季节，而且质量好，对增产有利。这些事，不亲自下手干，看不清，瞎批评，就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十月生产大队的干部研究出许多评工记分的方法，不同的农活，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劳动。这些办法为多数社员所拥护。有一次，饶兴礼在第七生产队运肥，运肥是按每一车的数量计算工分的。他发现，有个别社员利用这个方法取巧，每逢要过秤的时候，他们将车装得满满的，不过秤的时候，装上大半车就跑。贫农社员、共青团员傅运金很不满意，故意对取巧的社员喊：“这一趟称我的，给我的车少装一些！”这事引起了饶兴礼的注意。其他贫农社员告诉他说：“有的人就是光顾自己，投机取巧的事还有哩！”饶兴礼在集体劳动中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熟悉了各种各样的人。在一次党支部大会上，他举出许多事例，说明改进经营管理要走阶级路线，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听过他讲话的人都說，饶兴礼是十月生产大队最熟悉情况、最能了解阶级动向的人。

十月生产大队在生产上进行了许多改革。饶兴礼领导生产改革的本事是从劳动中学来的。

饶兴礼在劳动中一面动手，一面动脑。有一年春天，他在一块田里劳动，被一个现象吸引住了：在同一块田里，种同样品种的“胜利油菜”，施同样多的肥料，耕作方法也一样，可是，靠塘边的油菜和不靠塘边的油菜，一边长得好，一边长得不好。是什么原因呢？从此，他就经常到油菜田劳动，注意观察、比较，后来找到了原因。原来“胜利油菜”喜欢肥土好墒，靠塘的一边，土质好，墒情好，长得就好；不靠塘的一边，土质坏，墒情差，就长得不好。当年冬播，第五生产队土质好、水源好，要求多种“胜利油菜”，他就支持；第八生产队土质不好，水源差，有的干部也要多种“胜利油菜”，他就建议他们还是多种原来的“油菜白”品种。因地制宜安排的结果，第二年，油菜都获得了丰收。

饶兴礼在劳动中把种好试验田当作重要任务。他在山冲里土质最坏的瓮坛冲做试验。这个冲，“天晴三天就旱，下雨三天就淹”。有人对他说：“老饶！你是全国劳动模范，何不在大路边选一块好田做试验！”饶兴礼说：“种试验田不是为了好看。”饶兴礼在种试验田的劳动中，找到了瓮坛冲产量不高的原因，把它改造成了丰产冲。现在，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千年落后瓮坛冲，一跃变为丰产冲”。社员们说：“我们的老饶，到底是个庄稼人，一点雨（语），一点湿（实），有他领导，不愁不丰产。”

三 “亲不亲，看劳动”

“社员看干部，亲不亲，看劳动”。这是饶兴礼在十月生产大队第六生产队“蹲点”一年，和社员同劳动得到的体会。



六隊社員孟會元的一席話，對饒興禮這個體會作了很好的解釋。他說：

“我們六隊合併到十月大隊來的時間晚些。開始，老饒到我們隊來的也不多。社員雖說知道他好，不過還不知心，還不能掏心挖肝和他見面。

“後來，老饒三天兩日往我們隊跑，一來就脫鞋下田做活，一邊做活，一邊談心。開始，大家跟他談話總是一本正經的，開口一個‘饒書記’，閉口一個‘饒書記’，生怕走了調。日子久了，覺得老饒跟自己家里人一樣，就漸漸同他親了。眾人也改了口，我們三、四十歲的人叫他‘老饒’，歲數再長一點的就叫他的名字，小青年叫他‘饒哥’，同他談話隨隨便便，心裏話往外倒。

“有一回事，大家最感動。那是前年的事。有一天，我們全隊社員都到五里路外的‘腳盆底’去插秧，我也去了。到天快黑時，大家才回來。我們孟家灣前有口塘，塘下有丘大田，我們回來一看，吃了一驚，沒有下雨，怎麼塘里水漲了，再一看，塘下那丘大田的水卻淺了。過後，大家才曉得是老饒做的事。原來前兩天下了雨，那丘田裝滿了水。我們忙着去插秧，沒來得及車水灌塘。恰好這天上午，老饒在外面開會回來，看到這一大田水，往下放，流到河里，太可惜了。他在隊里找人，一個勞動力也沒有找到，老饒轉身就到大隊機務隊，找到一位抽水機手，兩人把一部小抽水機抬來了。他留下那人擺弄機器，一個人又去扛抽水機的管子。一節管子怕有幾十斤，來回兩、三里路，他跑一次又一次，六、七節管子，一個人扛來了。兩個人把架子架好，接上管子，噹噹噹！抽起水來，把田里水起到塘里。老饒黑汗水流，幫我們做了一天

活，我們還不知道哩！老饒還幫助隊里解決了很多問題。有一回隊里缺秧，社員們急得只是埋怨隊長。老饒不做聲，跑東隊，串西隊，幫我們借秧，挑回一担又一担。

“老饒做活舍己，做得狠。割谷，他總搶着挑草頭，社員們休息了，他還要搶着挑一担。我們怕他累了，派人到路上去接，他總不肯讓肩。老饒這樣舍己干活，大家都看在眼里，潤在心裏，同他越來越親。開始我們怕他狠做，是為了照顧他，心裏想，當干部的，坐着開會開慣了，哪能像我們一樣做！現在，大家更怕他累着了，勸他休息。想法卻不一樣，老饒為大家辦事，這樣舍己，累壞了怎麼辦！

“人熟是個寶。老饒和大家一起干活，把我們的脾氣都摸着了。我在隊里負責看水、管秧。有一個時候，心裏不痛快，老饒一眼就看出來了。做活時，他和我在一起扯家常。我也把心裏話掏給他。我說：‘這管水的快活官我不想當了。’我為什麼說這話？因為有人說閑話，說我這份差事輕鬆。我這個人，苦活做得，吃點虧也不怕，就是聽不得冤枉話。老饒指點我，他說：‘為大家辦事，肚子要大點，好話壞話都要裝得下。’他還說，多數人說我好，叫我是‘水利局’，夸我是‘秧保管’。聽他這一說，像喝了糖茶似的，心裏甜滋滋。

“老饒把我當知心人，我哪能把他當外人，有些裝在肚里一兩年的話也倒出來了。以前，隊里有少數人做活耍滑，多要工分，他們有好多花樣，我看在眼里，記在心裏，但是，不想提，因為牽扯到好些人，都是兄弟叔伯的。現在，我才把真情實況一五一十地跟老饒讲了。我原來還不知道這事有好大，老饒說我反映了一個大問題。他說，原來大



队还以为劳动定额订得合理，照着办就行，不知道有这么多漏洞。”

孟会元谈了很多，千言万语都是说老饒跟社員是一家人。他有一句话可以作总结，他说：“老饒是庄稼人，泥里生，土里长，同社員一条根。”

四 “劳动是根本”

饒兴礼确实是泥里生、土里长的人。

这个在旧社会当雇工、种佃田的贫苦农民，就是靠自己的汗水活下来的。七岁的饒兴礼开始捏牛鞭放牛的时候，父亲就对他說：“穷人家，不做，就没有吃的。”他做活没有让大人劳神，十五、六岁就学会了庄稼人的十八般武艺。不过，这个勤劳的小伙子，当时却有力无处下啊！地主陈寿之的一块除了草以外什么也不长的荒地，被饒兴礼一家老小用汗水浇开。那年春天，眼看着烏綠綠的小麦、黃閃閃的油菜就要到手，地主却来夺佃了。腊月二十九，地主又来逼债，把牛牵走了。汗水变成了泪水，劳动果实喂饱了地主仇人。

土地改革以后，乡农会主席饒兴礼，带着自己的小兄弟，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扬眉吐气地劳动。他们起早贪黑，使出一身劲来干。这时候，党决定调饒兴礼到区里工作。一年以后，饒兴礼又回到了望城乡。他按照党的指示，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饒兴礼将自己的劳动和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

一天，合作社主任饒兴礼、会计郭卿祿同社員們一起挑塘泥。两人都是从区里回来的，差不多一年没有做重活了。社員們穿着

单褂挑泥巴，郭卿祿压得肩膀痛，不得不穿着棉袄挑。饒兴礼也觉得挑得吃力。社員們看見了，有人說：“怎么样，干这活儿，比在上面开会吃苦些吧！”众人听了发笑，饒兴礼心里却吃了一惊。他发現在劳动上同社員有了一段距离。他暗自对郭卿祿說：“劳动，这是对我们干部的考驗啊！过不了这一关，合作社就办不好。”

从这时起，饒兴礼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参加不参加劳动，不是一个人的小事，而是关系到党和群众关系的大事。脱离劳动就会脱离群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光动嘴巴不行，要拿起鋤头来干。

饒兴礼对十月生产大队的干部讲过一个“戴了紗帽歪了嘴”的故事。这是本区的新鋪公社天鵝大队一个干部的事情。这个干部原本也是穷苦人出身，工作很好。可是，当了模范，升了“官”，就慢慢地变了。阶级敌人恭維他，說：“天鵝大队办得好，住在天鵝大队，人的影子都长些。”又說：“你为大家操劳，把个大队办得这么好，你少做一点，哪个还說什么事！”这些甜言蜜語，他听得舒舒服服，真不劳动了。不劳动，什么“病”都可能生。阶级敌人送来的东西他伸手就接，同自己共过患难的貧农兄弟的要求他不聞不問，一心只图个人安逸。饒兴礼說：“我们不劳动，就会忘本，就会忘記过去的穷兄弟，就会在阶级斗争中站不稳脚跟。”

饒兴礼在劳动中和自己的阶级兄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觉得这些和自己一样做过雇工、种过佃田的乡亲们，今天的日子过得还不算好，自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在吃、穿、用、住上都不应该鬧特殊。貧农



社員万登安是饒兴礼在旧社会一起挑脚、卖工的患难朋友，又是屋脊連屋脊的老邻居。有些同志考虑到工作方便，曾經劝饒兴礼从山坳里搬到比較方便的地方去，另做新屋。这时，万登安生活还很困难，不能和饒兴礼一起搬家。饒兴礼想到了这一点，不願让万

登安一家孤零零地留在山坳里，就立刻打消了搬家的念头。万登安知道了这件事，感动地說：“老饒一心向着我們啊！”

在我們訪問饒兴礼的十天中，他的一句話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劳动是根本。”

十三年手不离鋤



張健 任山

在贛西边界的湘东河畔，有一个工作很出色的生产大队——萍乡市湘东人民公社新村生产大队。这个大队在解放初期，水稻平均亩产五百多斤，一九五七年以后，亩产稳定在一千斤左右；一九六二年战胜了四次洪水、两次害虫的侵襲，亩产仍达到一千零六十一斤。社員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集体經濟越办越巩固。新村大队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好？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干部艰苦奋斗，带头劳动，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带动群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湘东公社社长兼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彭光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彭光賢是一个朴实淳厚、平易近人的普通劳动者。他經常穿着对襟的粗布衣服，卷起褲腿，打着赤脚，双手长着厚厚的茧子。一九五〇年，彭光賢担任乡人民政府的生产委員时，去区里开会，总要带着粪桶，开完会，就順便把粪挑回来。一九五三年成立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里派了两个社員长期

住在萍乡市联络大粪的事。有一次，天剛蒙蒙亮，彭光賢就来找他們。他們惊奇地問：“社长，你不是来开劳模会的嗎？”彭光賢挑起粪桶說：“早晨沒有事，走，一块打粪去！”这两个社員听了非常感动，和他一道去打粪。挑完两担粪，彭光賢才回到会场吃早飯。時間过去十年了，現在，彭光賢虽然已經担任了省人民代表、中共萍乡市委委員、市人民代表、湘东公社社长等重要职务，但是人們还經常看到他和社員一起挑着大粪在萍乡市街道上走过。去年，新村大队組織一批人去排上开荒，因为缺少肥料，彭光賢带着十多个大队、生产队干部到萍乡市去挑大粪。以后几天，一百多个社員也陸續参加了挑粪的行列。从萍乡市到排上，有六十五华里；但是，社員看見社长挑着一百来斤的重担子，和大家有說有笑地走在前头，就不觉得苦了。这年春天，他們把二百多担大粪从萍乡市挑到了排上；秋天，这片貧瘠的土地，亩产稻谷五百多斤，比排上一般土地的



产量多了近一倍。

彭光賢能够一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由于他出身贫苦，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同时，党的不断教育，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深远意义。

多年以来，湘东人民公社党委在公社和大队干部中建立了评比制度，以干部参加劳动好、联系群众好作为评比的一项主要内容。同时，还经常组织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历次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这使彭光賢懂得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是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是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一起革命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他说：“原来我认为参加劳动，是自己的本分，经过党的教育，我才看得更高更远。”

有一年夏天，省里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负责同志来新村大队检查工作，和社员一起割禾。彭光賢看到他割禾的桩步、手势，很像行家，心里感到惊奇。这位同志告诉他，自己年轻时也是种田的，打过十年长工。并且语重心长地对彭光賢说：现在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作了主人；但是，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相比，还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永不脱离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彭光賢从这些话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彭光賢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和期望。他事事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去做，不讲特殊。他虽然兼职多，又是拿国家工资的脱产干部，每年出外参加社会活动的時間有一百二十天以上，还要处理公社、大队的工作；但是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想各种办法

挤时间参加劳动。每逢公社开会，他一早在队里劳动，吃过早饭才赶去，下午散会后，天没有断黑，又到田里干一阵；市委开会，本来头天上午可以搭火车去，而他往往是第二天起早，步行二十五华里赶去萍乡市按时出席会议；去省里开会，他总是搭晚车回来，在火车上过夜，第二天照常参加劳动。他在家的时候，早出工，晚休工，中午不休息，更是常事。社员说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新村大队由于田少人多，田间农活不紧，一个强劳动力每年也只能做二百五十个劳动日。可是，彭光賢自从一九五八年脱产以后，每年做的劳动日，总在一百五十个左右。

彭光賢从八岁起跟父亲学种田，有丰富的种田经验。当干部以后，他不仅积极参加集体劳动，而且还在生产中不断地进行科学试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一九五一年，他响应党提出的爱国丰产的号召，选择了七分田搞丰产试验。由于推广了各种农业新技术，平均亩产稻谷一千二百三十斤，比邻近一般田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多，获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但是，彭光賢并不满足小面积高产的成绩，他带领群众积极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寻找大面积高产的门路。他对每一项农业新技术，总是亲自动手，反复试验，不成功决不罢休。

新村这个地方，过去一向是清明浸种的。浸种晚，早稻插得晚，也收获晚，所以过去年年种间作稻，影响增产。彭光賢想：浸种的时间能不能适当提早呢？一九五二年春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介绍湖南醴陵县浦口镇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呈桂的水稻丰产经验，谈到了“春社”浸种，他就亲自到李呈桂那里取



“經”。李呈桂告訴他，这一带每年在“春社”前后，有五天到十天是晴天，气温、水温也适宜浸种、播种。彭光賢和互助組員商量，大家认为这里离浦口只有五十华里，中間沒有大山，气候条件大致相同，决定試驗“春社”浸种。从这年开始，他們就反复地进行着“春社”浸种的試驗。每年，到了浸种、播种季节，彭光賢总是把全副精力放在上面，人家說他是“廢寢忘餐，心不离秧”。他白天帮助生产队看种催芽，晚上又每隔两小时去檢查一次浸种的情况。种谷下了田，不分白天黑夜，他走遍每一块秧田。秧田水滿了，就亲自放水；缺水了，就和社員一起車水。这样，十二年来，除了一九五三年因为气候不正常烂了一些种谷外，其余十一年都沒有烂种、烂秧。經過长期試驗，他們才摸清了当地气候变化的規律。浸种時間适当提早，早稻插秧和收割的时间也相应地提早。从一九五四年开始，他們逐步推行間作改連作，現在已經全面实现了水稻連作化，这就为大面积高产創造了有利条件。

“一切經過試驗”，“做出样子給群众看”，彭光賢运用这种方法来領導生产。十多年来，他凭着这股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亲自带头，和群众一起总结和推广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措施，促进了水稻大面积平衡高产。因此他被省科学部門聘請为农业科学特約研究員。新村大队的社員說：“彭光賢領導我們搞生产，实实在在，不讲空話，不瞎指揮，有样子，看得見，叫人信服，照他的样做不会錯。”

彭光賢不但自己带头劳动，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的两个年紀較大的儿女和他

爱人邓春英都是模范社員。今年春天，有些年青妇女穿着鞋出工，到田塍上脫鞋，嘻嘻哈哈打鬧一陣，耽誤了生产時間。一天早上，彭光賢发现自己的二女儿彭菊英也穿鞋出工，馬上叫住她：“你穿着鞋怎么下田呢？”菊英毫不在乎地回答：“到田塍上再脫唄！”彭光賢严肃地說：“菊英呀，种田人哪有穿着鞋下田的！你祖宗三代是种田的，你是共青团員，处处要在群众中起好影响呵！”女儿接受了父亲的批評，以后总是赤脚下田。别的年輕妇女也慢慢改变了这种不好的习惯。許多父母教子女，丈夫教妻子，向彭光賢一家学习。

彭光賢和他的一家，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用勤劳的双手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群众中起了良好的影响。新村大队解放前不是农业区，离萍乡煤矿很近，大部分人靠推煤、卖苦力为生，沒有农业劳动习惯。然而，現在的新村大队，男女老少都安心在家搞农业生产。这是社会風气的一个很大的轉变。去年以来，全大队有三十多个中学生和大学生回乡参加劳动。他們以彭光賢为榜样，安心务农。黎連生从省水利电力学院回乡，开始父母有些想不通。黎連生說，参加农业劳动最光荣，彭光賢担任那样多职务，工作那样忙，都坚持劳动呀！去年夏收夏种时，他的脚背上生了一个疮毒，痛得很厉害，队长要他在家休养。他想起彭光賢在劳动生产上处处带头，克服了种种困难，就渾身有了力量，用布扎紧伤口，又下田了。如今在新村大队，不論农忙还是农闲，村无闲人，一片繁忙景象。外地来参观的人，不是从新村大队的地理环境，而是从广大社員参加集体劳动所表现的蓬勃干劲，感觉到这里是真正的农业区了。



昔阳县四級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偉大范例

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

山西省昔阳县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和县四級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领导生产，已經形成一种風尚。

正确的思想，指导正确的行动。积极参加劳动，基于对劳动的正确認識。昔阳县沾尚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李千周說得好：“咱們农村干部，最要紧的是劳动。干部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就是和群众一起革命。社員从地里回来半腿泥，干部坐在那里鞋底还是白白的，怎么能让社員信任！干部脱离了群众，还怎么执行党的政策，帶領群众革命！”昔阳县广大干部正是由于把参加劳动当成自己的本分，看作是保持革命者的本色的重要条件，所以，能够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长年坚持不懈。一九五九年以来，全县干部参加劳动一年比一年多，補貼工分一年比一年少。一九六二年，全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兩級干部，实做劳

动日平均每人增加到二百七十三个；補貼工平均每人减少到五十个，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八。一九六二年，全县四百零四个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平均每人实做二百二十个劳动日，最多的做到三百三十个。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挤零時間工作，用整工夫劳动，已經成为一种風气。干部見了面，常常互相問：“你們咋劳动？做多少工啦？”大寨公社大寨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委后补委員）、山西省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貴，在任何情况下都沒有放松过劳动。一九五八年以来，他每年都做三百个上下的劳动日。今年三月，有三个县、市組織干部到大寨生产大队参观了三天。陈永貴除了忙于接待工作外，还起早貪黑地完成了生产队包給他的生产任务。第三天，参观者走后，天已过午，下起雨来，陈永貴怕完不成包干任务，就跑到地里去劳动，和两个伙伴一直頂着雨干到天黑。在陈永貴的带动下，大寨生产大队的干部，普遍养成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习惯。去年，全大队本来規定給七个人以補貼，实际上只有三个人接受了補貼。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不仅早出晚归，挤出時間劳动，而且拣重活干，搶脏活做。大寨生产大队，一九六一年春季鋤麦田时，有二亩地包工后，有些社員嫌草多难鋤，陈永貴就带头去干。夏季追肥时，肥料不足，陈永貴主張挖厕所。部分社員怕脏怕热不願干，陈永貴就帶着几个党员去挖。社員們看到党支部书记这样做，也就跟着干起来了。大寨公社井沟生产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宋艾



良也是这样，挖茅鏟、担挑、鋤刨地边等髒活重活，他都是带头干。每年从他肩上担到地里的肥料，和从地里担回的庄稼，不下五万斤。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級干部，一面千方百计地多做劳动日，一面尽可能地少要補貼工。这种积极劳动、不計报酬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貴的。陈永貴說：“党教导我們，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員，是人民的长工，就是要比群众辛苦些。如果当了农村基层干部，就不参加劳动，那不成了人民的老爷！”一九六二年，陈永貴做了二百九十个劳动日，公社原来确定給他的補貼工是九十個，分配时，他主动提出减少到三十個，最后，經過群众討論决定，他才接受了四十五個。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是昔阳县規模較大的一个生产大队。一九六二年春天，社員大会討論决定，給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十五个干部補貼一千零八十个工，占預計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點四。到年終，由于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平均每人实做了三百一十七个劳动日。分配时，人人要求减少補貼，最后，实际補貼了六百个工，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零點七五。

县、公社两級领导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給基层干部作出了榜样。县委书记、常委和县长等领导干部下乡，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劳动，工作做到队、做到地，已經成为习惯。县委常委王富元，日常工作很忙，但是，他經常在同劳动中做工作。一九五九年以來，他每年平均参加四、五十天劳动。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是脫产干部

参加劳动的一面光辉旗帜。四十八岁的李千周，粪筐經常不离肩。他一出办公室就挎起粪筐，到了地里，把粪筐一摆，就和社員一起干起活来。从一九五九年担任沾尚公社党委书记以來，他已經挎烂了两只粪筐。他每年总要拾一百四、五十担粪，做一百四、五十个劳动日。社員們都亲切地称他是“集体的好长工”、“社員的貼心人”。基层干部反映：县、公社干部那么忙，下乡还挤时间劳动，咱不劳动像話嗎？

昔阳县規定：机关于部每人每年都要有六个月的時間深入基层。到基层以后，半天劳动，半天工作。一九六二年，县級机关下乡的干部，平均每人在生产队做了六十二个劳动日。全县的公社干部平均每人做了八十二个劳动日。沾尚公社的干部平均每人做了一百三十九个劳动日。

各系統的基层干部，也都是劳动好手。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的妇联主任焦明眼、治安主任李义小等，到县里住党校、到公社开会誤了工，不仅都能补上，而且超額完成队里規定的基本劳动日。焦明眼为了赶工，每天晚上把第二天吃的干粮蒸好，或者早晨就把中午飯做好，以免耽誤劳动時間。刀把口公社丁峪生产大队妇联主任邢根文，积极帶領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九六二年，她直接领导的第四生产队，二十五个妇女中，有二十个完成或超額完成了基本劳动日，七个妇联委員的实做工都超过了基本劳动日。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會計参加劳动的問題。有人說，會計工作太忙，就是要坐在房子里写



写算算，下地劳动办不到。昔阳县的经验却不是这样。原小寨生产大队会计（现任大队长）张卯土，社员称他是“劳动会计”。他当会计多年，一直坚持劳动。他带出来的会计，和他一样，也都是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分子。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会计兼第四生产队会计刘根元，去年的定工劳动是一百个，实做劳动日达到二百二十一个。巴州公社二十四大队会计，一九六二年一至十一月份，平均每人实做劳动日一百八十六个。

在干部的影响和教育下，干部的家屬和年轻一代也都热爱劳动，把参加农业生产当作一项光荣任务。一九六〇年以来，县和公社干部的家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赵福义的爱人、共产党员王秋林，今年四十六岁了，带了五个十一岁以下的孩子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由于劳动好，当选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刘官印的女儿刘拉良，初中毕业以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带头实干，被评为劳动模范。在一九五九年的全县大评比中，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屬，被评为夫妻劳动标兵、父子劳动模范的有五百四十对。

昔阳县的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热情，进一步发扬了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过去积极的，现在更积极了；过去落后的，现在转变了。沾尚公社的社员们，过去不习惯于清早下地劳动。李千周到了这个公社以后，启明星一出山，他就挎着粪筐到各村转，

带动和督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早下地；干部下地了，社员也就跟着出工了。沾尚生产大队社员张喜贵，过去不爱劳动，去年却做了二百八十多个劳动日。有人问他现在为什么劳动这样好，他回答说：“党支部书记还担茅粪、看羊，同社员一起干，咱再不好好劳动，面子上下不去，心里也过不去。”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社员程千成，前几年不好好劳动，老婆常常和他吵闹。近两年，程千成劳动积极了，每年收入三百多元，一九六二年做了三百二十多个劳动日。生活富裕了，家庭也和睦了。有的社员对他說：“千成越活越年轻啦！”他說：“干部們还没明没夜地劳动哩，咱不好好劳动，怎能对得起干部，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妇女們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的妇女，经常下地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很多妇女已经能够做担粪、掏茅、赶牲口等重活和技术活了。总之，劳动光荣，不劳动耻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舆论。群众选干部，先看劳动好不好。青年男女找对象，都挑劳动好的。

昔阳县的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对生产的领导。干部和社员在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社员把干部当作知心人，无话不说，无事不谈，这就使得干部在生产指挥上做到眼明心亮，扎实可靠。社员們說：“干部参加劳动，能听到，能看到，能說到，能做到，生产还能搞不好！”李千周白天很少呆在办公室，到生产队也很少要表



报。可是，全公社的生产进度如何，哪个队有什么問題，他往往知道得最早最具体。他了解的情况，大都是在同社員一起劳动中得来的。社員把自己的心里話告訴他，他帮助社員解决問題。有一次，李千周上山，碰到羊工張原小，他就帮着放起羊来。張原小毫无顾忌地向他反映，吉家峪生产大队远处的地不如村边的地耕得好。李千周經過进一步了解，发现这还不是个别現象。他便馬上采取措施，解决这个問題。几天以后，全公社的一些耕得不好的地都变了样。李千周說得好：“和群众同劳动、同商量，既能摸透人的脾气，又能摸透自然的脾气，这是领导好生产的两个重要条件。”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的干部，由于坚持和社員一同劳动，对全队哪块地的土质如何，哪块地省工或費工，哪种活重哪种活輕，都了如指掌。因此，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基本上做到了因地制宜，劳动定額百分之九十以上做到了准确合理。洪水公社洪水生产大队大队长李玉崗，在参加劳动中了解到，七队两道沟二十多亩好地的玉菱，一亩只安了一千三百多窝，补种也来不及了。他就和几个老农商量，采取了隔窝留双株的补救办法，一亩留了两千多株，使生产免遭損失。

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中洒下了自己的汗水，就更加爱惜集体劳动的成果，成为精打細算的好管家人。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的每一項开支，干部都同社員反复商量，再三研究，能緩办的不急办，能自制的不自制，旧的能用就不买新的，能用劳动力換的就不用錢买。因此，每年的生产費开支

从来沒有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管理費开支沒有超过百分之零点四。大寨公社大寨生产大队的干部們，在和社員同劳动中，深深懂得每一斤粮食都是一滴滴流到土里的汗珠换来的，因此，为队里办事，用粮用錢，总是精打細算，不浪費一斤粮，不乱花一文錢。一九五九年生产丰收，社員的生活富裕了，公积金增加了，有的社員要求修个戏台。干部們一計算，单就需要的劳动日來說，就可以整修二百多亩地，当年就能多收六千斤粮食。陈永貴給社員算了这笔賬，說服社員不要修戏台。社員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不修了。大队的办公室，直到現在还設在两孔旧窑洞里。

昔阳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所以形成一种社会風尚，主要原因是县委认真貫徹了党中央的指示，大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問題，从思想工作上和組織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反复深入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县委在全体干部中，广泛进行了党的政策教育、劳动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要求干部牢固地树立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在教育中，除了领导干部做出榜样，带头参加劳动外，还采取了层层树立标兵的办法，用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經驗教育广大干部。县委把李千周和陈永貴当作全县的旗帜，广泛宣传他們在参加劳动中领导生产的經驗，并且把陈永貴的事迹和經驗編印成教材，发給各級党的組織，組織干部学习。县里还举办了大寨公



社大寨生产大队干部模范事迹展览会，先后組織六千多人（次）到大寨生产大队参观訪問。县和公社召开基层干部會議，經常介紹先进人物的經驗，或者請他們作报告。干部們都拿陈永貴当“鏡子”，对照檢查自己，提高認識，改进作風。在这个基础上，全县广泛地开展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竞赛的运动，有效地激励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东冶头公社开展竞赛以后，全社三十五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九六二年实做劳动日都达到二百五十个以上。

县委还通过各种會議和开办訓練班，教育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真正的人民勤务員。使干部懂得，要工作好，首先必須劳动好，不参加劳动，就必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使自己逐漸失去階級本色。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同志，經常檢查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及时进行个别教育，并且把劳动好作为选拔和考核、鉴定干部的重要条件。几年来，共青团县委、县妇联、县人民武装部，遵循县委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减少補貼工的指示，通过本系統的會議和訓練工作，对所屬干部反复、深入地进行了革命傳統教育和劳动教育。这些系統的基层干部，除民兵干部根据省委規定給予少量補貼外，团委和妇联干部都沒有要補貼。白羊峪公社南横山生产大队团支部書記乔桃善，經過几年的教育，階級觉悟越来越高，劳动和工作更加积极，他白天参加劳动，黑夜帶領青年义务巡田。今年，他当了民校教

員，大队提出給他補貼十五个工，他坚决拒絕了，并說：“老一輩人給我們打下天下，我們才过上幸福生活。我們要努力学习老前輩的革命精神，前輩能流血牺牲，我們少要几个補貼算什么！”

自上而下改进领导作風和工作方法，严格控制會議表报，为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創造条件。昔阳县委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以来，會議次数大大减少。能下去传达的事情不召开會議传达，能分片召开的会不集中到县里开，能在农闲时开的会不在农忙时开。一九六二年，县委只召开过一次为时七天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會議。县里还严格控制了各系統的會議。公社党委召开两天以上的生产队干部會議，要經過县委批准。党、政、团各系統的會議，一九五九年开了二十四次，一九六二年只开过四次。几年来，表报也大大减少。县級机关表报，除县人民委员会統計科按上級規定統計外，其他单位未經县委批准，一律不得下发。直接发到农村的表报，一九五九年是一百四十五件，一九六二年减少到六十四件。各公社也作了相应的規定，不輕易召开會議，不乱发表报，不准生产大队随便耽誤生产队干部白天的時間，工作到队、到地。沽尚公社規定，公社干部早晨学习，上午劳动，下午办公；白天不打电话找生产队干部；除按时統計干部参加劳动的時間、作物种植面积和农、林、牧等产品的产量外，不經批准不得向生产队要数字。对生产队干部也作了必要的規定。执行这些規定后，公社干部說：“上下都按規定办事，工作



主动，不忙不乱。”生产队干部說：“减少了許多麻煩，能集中力量領導生产，干部說話腰杆硬了。”沾尚公社干部除秘书和統計員外，平均每人每月有二十天以上的時間深入到生产队帮助工作。

随着县、公社領導作風的轉变，生产大队干部的作風也有了很大的轉变。井沟生产大队，根据居住分散的特点，在六个生产队設了四个联络点，有事由党支部书记到各点商議，大大减少了會議誤工。大队五个主要干部，除党支部书记外，都兼任生产队的队长，加强了生产队領導，又减少了補貼工。日常工作，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建立了“五一”碰头制，每五天中用一个晚上研究一次工作。會計建立了“五一”办公制，五天中四天劳动，一天集中办公。这样，就使干部逐漸养成了珍惜劳动時間、注意安排工作的习惯。一九六二年，安坪生产大队干部实行了集体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后，参加劳动的时间，比过去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东关、南庄等生产大队推行了干部輪流值班制，解决了参加劳动和处理日常事务的矛盾。

認真贯彻执行各項制度，保证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昔阳县坚持实行了“定工劳动，定額補貼”的制度。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县委就根据队規模的大小，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劳动工和补

貼工作了規定，大多数队执行得較好。为了彻底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在一九六一年秋收分配结束后，县委又进一步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兩級干部明确提出了“定工劳动，定額補貼，多做不减，少做不补”的政策，并且采取了层层控制，合理分配（縮小補貼范围，集中使用補貼工，把有限的補貼工用于誤工最多的人），自报公議，一次定死的办法。具体要求：百戶以下的大队，補貼工不超过百分之二；一百戶至二百戶的大队，補貼工不超过百分之一点五；二百戶以上的大队，補貼工不超过百分之一。受補貼人員和補貼多少工，由社員大会或社員代表大会討論決定，报公社批准。对主动不要補貼的人，实行实誤实記。

为了使社員和干部在劳动中能够相互监督，还把生产大队干部在半年或一年內，基本固定到一个生产队，編入作业組，同社員一样分配活計，一样評工記分，在劳动数量和质量上同样接受檢查驗收，承担生产責任。为了使“定工劳动，定額補貼”制度切实兌現，还实行了檢查評比制度。規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实做劳动日，和社員一样按月进行公布，并上报公社，以公社为单位，每季进行一次評比，分別給予表揚奖励或批評。这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把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永远坚持下去

——鞍山地区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

中共鞍山市委委员会

辽宁省鞍山地区(包括鞍山市所属辽阳、海城两县和辽阳市)几年来组织农村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领导生产,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今春以来,由于学习了山西省昔阳县农村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干部参加劳动的自觉性更高了。由于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的干劲更足了,农村工作更扎实了。

今年鞍山地区农村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去年比较起来,出现了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抓得早,落得实。去年,在三月间才普遍抓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工作。今年,许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于年初就在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和总结去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干部的具体条件,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落实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计划,定出按月按季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动手早的海城县王石和辽阳县柳条寨等人民公社,在去年十二月间就把干部补贴工分指标落实到队到人。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许多社、

队干部一般都能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劳动计划,有的还一再突破和修订原来的劳动计划指标。

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更加普遍。去年干部参加劳动,海城县好些,辽阳县差些,鞍山市郊区和辽阳市郊区更差些。现在,不仅海城县农村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劲头很大,而且,辽阳县农村干部的劲头也比较大,鞍山市郊区和辽阳市郊区的干部也都普遍行动起来。过去,县级领导机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较少,公社一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不够普遍。今年,不但县委书记、县长和公社的党委书记、社长等领导干部和其他干部,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且公社的文书、会计、广播员,也都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不但农业部门的干部,而且农村供销社、信贷社、医务所等单位的干部,也都结合自己的业务,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并在劳动中听取群众意见,改进了工作。

三、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工作和劳动结合得更好了。今年干部参加生产,一般



都比較有計劃、有目的，到哪里去工作，就到哪里去劳动。許多地方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还有重点地到后进队和問題比較多的队去参加劳动，帮助解决困难問題。如海城县牛庄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大队第五生产队，距离公社和大队很远，生产和工作都比較差。今年由于公社和大队干部长期住在那里劳动，帮助建立领导核心，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从而使今年的各項生产一直领先，不仅大田生产搞得很好，而且开展了多种經營，社員的干劲越来越大。牛庄人民公社干部通过参加生产，了解情况，联系群众，还解决了生产上的一些关键問題。如去年春耕时，农活集中，劳动很紧张，由于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带动全体社員积极努力完成了春耕任务。去年秋收后，公社干部与生产队干部和群众经过研究，提早整地打耢子，今年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在清明前土地翻浆时打了耢。这样，既可防虫害、防旱和防涝，使土地得到休閑，又可避免农活过于集中。这个公社的干部在参加劳动中，还发现了各生产队都有大片的低产田，主要是盐碱地和一部分过远的插花地。他們不但加强了各生产队耕种低产田的领导，而且帮助他们出主意，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造了盐碱地一千一百亩，其中重碱地有二百亩。所有这些問題，都是干部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发现，并和群众在一起研究解决的。

四、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比以前完备了。今年县、社、大队三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人人有計劃，有指标，

而且人人有劳动手册，同社員一样評工記分，普遍实行月检查、季評比、年終总结，并張榜公布，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之一。为了便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了减少會議、表报和其他机关事务之外，辽阳县在公社一級干部中还普遍推行定期蹲点（即在一个队劳动和工作）、到其他队巡迴检查和回公社总结学习的制度。今年干部参加劳动，都是事先与生产队商量好，請他們分配活計，实行“事先排号，按时报到，跟班劳动，服从领导”的制度，真正做到了与社員同出、同归、同劳动、同記工、同商量，克服了过去某些干部参加劳动“打游击”的現象。

此外，今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普遍注意了农活的质量。他們多問、多学，对不熟练的农活宁可少干些，也一定要干好。老农看到干部作活不含糊，因而很滿意。社員欢迎干部去劳动，有的写大字报，表揚参加劳动好的干部。

通过参加劳动领导生产，使干部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許多干部对生产情况更熟悉了，生产知識更丰富了，有些不懂农活的干部也学会了一两手农活。有的还拜老农为师，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有的种了試驗田。由于許多干部在春耕播种、抗旱保墒和防治病虫害等工作中，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因此对今年春耕生产的领导就更加具体、更加踏实了。

同时，由于干部和群众在一起劳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把干部真



正当作自己的知心人，无话不说。从国内外大事，生产和生活，直到妇女养育子女、青年婚姻的问题等，都提出来和干部讨论。干部便针对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同社员群众谈时事，讲政策，论生产，彼此之间真是息息相关，亲密无间。群众有事找干部，干部有事找群众；老农成了干部的参谋，干部成了社员的“主心骨”，共同商量生产大计。社员赞扬干部是“好管家的”，“好打头的”，“好掌舵的”。许多基层干部反映：过去不参加劳动，就像有点“耳聩眼花”，现在一参加劳动，什么都听见了，什么都看见了，“情况明，问题看得清”。现在干部碰到一起，首先问劳动了多少天，在劳动中发现和解决了什么问题，交了多少朋友，互相畅谈劳动中的收获和感受。“劳动光荣”、“劳动是根本”，已经成为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经常讨论的重要内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鼓舞了群众劳动的积极性，群众称颂说：“干部下田间，一天顶两天，问题解决快，社员干得欢。”

今年鞍山地区农村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以能够比去年更进一步，主要是继续紧紧抓住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深入解决思想问题，不断地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是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过程，是新旧思想斗争的过程，是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的一次革命，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继续狠抓几年，才能使这项制度巩固下来。今后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求进一步提高自觉性，并使之经常化。因此，仍然必须继续

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思想障碍，一个是怕劳动多了影响工作。有些干部习惯坐机关、蹲办公室，或者用东跑跑、西转转的方法来领导生产，认为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面领导就会受影响；有的还强调社、队干部事务多，群众找的多，如果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许多事情就会没有人来办理。另一个是有些干部长期脱离生产，沾染了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甚至有少数干部认为，干部操心多，睡觉少，还要参加劳动，是吃亏了。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劳动习惯的知识分子干部来说，让他们放下架子，同群众一起劳动，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开始劳动，不少人反映腰酸、腿疼，有的就不想坚持劳动，有的甚至认为“十年寒窗白费了”。此外，有的认为“干部工作多，参加劳动的时间少，干部的工分补贴标准低了”。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搞不起来，搞起来也很难坚持下去。

因此，今年各地在发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候，进一步反复地组织干部学习了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并且总结本地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由劳动好、工作好的干部座谈体会，请他们作报告，或者组织干部前去参观访问，学习先进经验，以提高干部对参加生产劳动的偉大革命意义的认识。有的还用事实对比的方法来教育干部。如鞍山市郊区宁远屯人民公社新堡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张殿玉，从土地改革后就当干部，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



民的本色，群众非常拥护他。和这个大队相邻的一个大队，有一个干部虽然是雇农出身，但是由于平时不注意和社员一起劳动，逐渐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比较差的二台子生产大队的党员和干部，开会分析和对比了这两个典型人物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和不同结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可以减少补贴工分，增加生产队和社员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鼓舞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干部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可以更深切地了解群众、了解实际，更好地领导生产，办好集体经济；可以使干部在与群众共同劳动中不断地得到锻炼和提高，成为与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又红又专的好干部。从此以后，这个大队从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到生产队长、会计，都无例外地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在对干部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中，各级党委还强调因队、因人制宜地具体帮助，争取做到登门访问，进行个别教育，从各方面关怀干部，把思想工作做到家。许多公社党委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亲自到干部家里谈心，帮助安排工作，解决具体困难问题。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很好地解决了不同干部的不同具体思想问题，使干部深受感动。至于有的人提出关于干部补贴工分的规定标准低的问题，则要他们先不去算账，先把干部发动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事实上，只要把干部发动起来认真参加集体生产

劳动，并加强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是可以做到补贴工分不超过规定标准的，而且有许多社、队还可以低于规定的标准。

二、具体帮助干部制定工生产计划，定期检查评比。今年各地在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的基础上，普遍地发动干部讨论和制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计划，落实了定工生产任务。公社以上干部根据每个人的工作繁简和体质强弱，采取自报、公议和领导批准的办法，定出每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补贴办法，主要采取三种形式：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队长和会计，实行定工生产、定额补贴；生产队会计，实行固定补贴；大队的其他干部和生产队长，实行因公误工补工。在普遍制定干部定工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实行定期的检查、评比和奖励，以推动干部参加劳动的积极性。辽阳县级机关在四月底，曾对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进行了初步检查，依各单位与个人劳动好坏的次序列榜公布，立即掀起了干部下农村参加劳动的热潮。许多社、队干部，则“进屋先看榜，下队先劳动”，明比暗赛，谁都不愿意落后。经验证明，一年通过几次检查评比，促进干部参加劳动的积极性，是个好办法。特别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刚开始执行的地方，更需要检查评比，并且评比要认真地做。没有这种认真的检查评比工作，就不能定期总结经验，树立榜样，就容易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松懈下去。

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层层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推动干部参加劳动最实



际、最有效的方法。辽阳县今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以劲头比较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县委决心大，领导干部带头。县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干部，都分别在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参加劳动。社、队干部说：“县委书记都参加劳动，咱们还有啥说的。”鞍山市郊区各公社的干部去年参加劳动差，今年区委决定从区、社领导干部作起，一齐下队参加劳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把区、社、大队三级干部都带动起来了。

四、总结典型经验，加以宣传推广。去年总结推广了王石人民公社和柳条寨人民公社的经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年除了继续总结推广这两个公社的经验外，还准备帮助牛庄人民公社总结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经验。同时，还要不断地表扬劳动好、工作好的干部。如海城县温香人民公社大连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玉峰，今年已五十六岁，长期坚持干硬活，并采取田头会议的办法，做好了各项工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去年全大队干部都超额完成了定工生产任务，而且工作也做得很好。今年到四月底，他已经劳动了七十三天。三月份公社党委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会议时，着重介绍了陈玉峰的事迹和经验，收效很大。又如，该县西四人民公社，有许多人强调会计工作特殊，怕会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把账目搞乱了，公社干部也没有信心。后来发现该社太平庄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会计包春相，不但去年劳动好，工作也好，而且今年已经劳动了一百多天，管理的账目却清清楚楚。公社抓住这个典型

事例以后，到处宣传讲解，因而促进许多会计人员也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这样，会计人员的工作和劳动也结合得更好了，有的白天劳动，早晚记账，有的规定会计办公日。经验证明，分别总结不同的典型经验，树立样子，加以宣传推广，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各级农村干部的具体工作任务、工作方法以及工作条件不完全相同，他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可能、方法和问题也不完全一样。分别总结干部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的具体经验，分别树立样子，就更有教育意义。

此外，各地今年继续精简会议和报表，建立和健全机关工作制度等，也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创造了方便条件。

今年鞍山地区农村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虽然更加普遍，但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指示的精神，以及对照山西省昔阳县的经验来检查，还做得不够。全地区还有一些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大好，甚至有少数生产大队的干部定工生产任务和补贴工分计划还未落实。同时，在已经落实劳动计划和补贴工分的生产队中，有的补贴工分还较多。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此外，市、县两级的会议、报表还很多，向先进的单位要材料的、找谈话的也多。因此，市、县领导机关必须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市、县分管农业的干部也要切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这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切实地做好，长期地坚持下去。



地委书记余锡渠同志

伊 晓

中共汕头地委书记、汕头专署副专员余锡渠同志，一贯保持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最近，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党的组织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和干部，向余锡渠同志学习。下面记述的，是余锡渠同志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经常深入农村，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一些事迹。

余锡渠同志在解放以来的十多年中，一直担任领导职务。最初是澄海县的县长、县委书记，以后任粤东行署农业处副处长，汕头专署副专员，一九六一年底任地委书记。余锡渠同志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十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个普通劳动者的俭朴本色。澄海县刚解放，余锡渠同志奉命去接收县政府时，穿的是一身粗布衣服，打着赤脚。有的老乡就同他开玩笑说：“哪有赤脚板的县太爷呀！”余锡渠同志回答说：“我们又不是国民党当官的，要耍威风！共产党员打游击也好，当县长也好，还不都是为了领导群众闹革命！”从那时以来，余锡渠同志生活作风的俭朴，一如往日。身上穿的仍然是粗布衣衫，有的补了又补；脚上穿的是“水陆两用”鞋。他住的房子不大，陈设更是简单，除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橱，一只皮箱，

再无别的东西。他睡的是木板床，床上只有一张草席，一条薄被，一个用水布（土布做的浴巾）和衣服包成的枕头，一顶从土改时用到现在的单人蚊帐。他经常是工作在哪里，就吃在

哪里，就住在哪里，就在哪里赤脚下田。

余锡渠同志一直能够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直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生活在群众当中，很好地发挥了一个领导者在党的集体领导下应有的作用，是基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早在澄海县担任县长期间，余锡渠同志为了领导群众改变澄海县灾害频繁的自然面貌，曾不辞辛劳地做了许多艰苦踏实的工作。

澄海是个滨海县份，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只有六分耕地。这个县的地势很复杂。韩江进入澄海后，以扇形铺开，分作十七条支流入海，个别河床高过田地，部分内地又低于沿海。过去洪水、旱灾、台风和内涝，轮番为害，生产很不稳定。在旧社会里，一遇灾荒，许多农民就无法生活，有的只好流亡国外谋生。余锡渠同志是本地人，深知群众的这些苦楚。澄海一解放，他就领导群众兴修水利，为战胜自然灾害而斗争。

余锡渠同志是个农民出身的干部，不懂水利工程。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牢记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一面精心阅读水利方面的书籍，一面进行实地调查。每逢下雨，他就雨衣一披，骑着自行车，从县



城到海滨，从境内韩江上游到各支流的下游，观察地势哪里高，哪里低，哪里积水，哪里可以泄水，哪里怕旱，哪里可以引水灌溉。他还拜访了经历过种种灾害的老人，搜集水文资料，请教防洪御旱的经验。就这样经年累月，他把澄海县的水文地理的古怪性格摸熟了，治水的办法也就慢慢积累了起来。经过县委的集体研究，澄海县的第一个治水蓝图诞生了。接着这个蓝图，几年时间，澄海县兴建了许多排洪、灌溉、拒咸、防潮等工程。在兴修水利工程的时候，他又亲自到工地指挥，并和民工们一起劳动。这个原来灾害最多的县，终于成为全专区水利最好的县。

在专署，余锡渠同志分工负责农业技术改革和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无论部署工作，决定和解决问题，他总要事先去基层作调查研究。在担任地委书记和副专员后，他仍然做到一年以大部分时间，下到生产队，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有人曾经这样说：“要说余锡渠同志的办公室小嘛，可也大，那就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的汕头专区的整个农村。”一九五九年冬，余锡渠同志带着工作组，在澄海县上华公社冠山大队搞平整土地，他和基层干部、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由于余锡渠同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之中，和他们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因而他到哪里，干部和社员都把他当作家里人一样，乐意向他讲知心话。他也能很好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出主意，想办法，真正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一九六〇年夏种时节，他到澄海县盐鸿公社鸿沟大队检查生产。社员和他一见如

故，就“老李”（余锡渠同志作地下工作时的化名）长“老李”短地向他详谈了那里生产搞不好的原因。他随即和干部、社员一起认真商量解决的办法，提出了改进经营管理的具体措施。从此以后，这个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规，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全大队在立秋后六天，就胜利完成了插秧任务。这年晚造，鸿沟大队终于获得了丰收，“落后大队”的帽子就被摘掉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一级的强台风，在潮汕地区登陆，澄海县首当其冲，鸿沟大队成了重灾区。哪里最困难，余锡渠同志就到哪里去。当时，余锡渠同志刚从医院休养归来，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健康。当夜，他就从汕头冒着风雨，赶赴澄海县委，并在天亮前赶到了鸿沟大队。这个大队决堤七十处，庄稼全被海水浸渍。灾情是严重的。余锡渠同志当即和干部撑船去察看堤坝，又对海水已退的田禾逐块看过，了解被盐渍的程度。他根据群众对开展生产自救的迫切要求，提出一方面抓紧堵口、复堤，引淡水冲洗，抢救稻田；一方面“要用抗灾的劲头，绣花的功夫”，在海水浸渍过的田地上改种番薯。余锡渠同志亲自向社员作动员解释，并作试验示范，打消了群众对改种番薯的顾虑。加上认真地贯彻了党对重灾区的政策，建立了明确的生产责任制，因此，改种番薯很快形成了群众自觉的行动。由于种的时候，经过引淡水咸，种了以后，又不断浇水，番薯长得非常好，全大队不仅安稳地度过了春荒，还有大批番薯出售。鸿沟大队也因此成了汕头专区生产自救的一面旗帜。

余锡渠同志常说：“指挥员不能光凭一张嘴，应该哪里最危险，最需要，就到哪里去。”



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

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到澄海县外砂领导封锁韩江的工程。快要合壩的时候，已是下半夜，合壩口的一艘木船翻了。船上有十二个人。余锡渠同志看到这个情景，说了一声“下水救人”，连衣服也没脱，就带头纵身跳入江中，救起了落水的民工。一九五六年夏天，韩江洪水暴涨，潮安县庵埠的涵闸出现险情，眼看韩江东面澄海县的大片田地就要受淹。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跳进韩江激流中，摸索到了出现险情的原因，对症下药地采取了抢险措施，使涵闸转危为安。一九六〇年六月，强台风袭击汕头地区，余锡渠同志在韩江上协助指挥抢险防洪，在七天七夜中，每天只休息三、四小时。险象才过去，他从堤防上刚回到机关，揭阳县龙颈水库告急的电话来了。余锡渠同志在接到电话后两个小时，就赶到了现场。他站到开始塌陷的地方视察险情，研究对策，指挥抢险，干部和社员们都为他提心吊胆。他的镇定和勇敢，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社员固壩抢险的决心。在连续的紧张战斗中，他的胃病发作了，可是始终坚持，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指挥岗位。

余锡渠同志不仅自己克己奉公，同时还教育自己的妻子儿女不要有任何特殊感，要热爱农业劳动。解放以来的十多年中，虽然他工作的机关在城市，可是他一直让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农村，参加劳动。余锡渠同志在长期的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中，积劳成疾，患了肾脏炎、胃溃疡等慢性病。有的同志建议他把家属接到城市来住，这样可以在生活上对他有所照顾。可是余锡渠同志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农村劳动，能为国家生产财富，而在城市闲住，就变成

一个消费者，增加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他家人口多劳动力少，他就让小学还没毕业的大儿子，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了。他每次回家，总要帮助家里计划一下开支，绝不肯让生产队给他家庭有任何照顾。他经常谆谆嘱咐妻子儿女说：“你们是干部家属，社员和队干部很容易另眼看待，所以要更加谨慎。队里有困难，我们要走在前头，分东西却要退在后头。”他自己处处为他们树立这样的榜样。在一九五七年初，村里办高级社缺乏资金，他便把三百多元积蓄交给妻子投到社里。去年十二月，他因病回到家里，生产队关心地网了两条鱼送来，他坚决谢绝了。去年年初，村里通了电，为一百多户社员装了电灯，他家也装上了两盏。他回家后，即向队干部说：“我们村里有一千五百多户，等都有电灯了，再为我们家安吧。我们干部的生活不能超过一般群众啊！”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一家不仅以勤俭持家闻名，而且个个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他的妻子被评为“五好”社员，大儿子每月都出全勤，从不拈轻怕重，女儿从学校回来，也参加辅助劳动，干活总是踏踏实实，常受妇女队长的表扬。去年冬天，余锡渠同志鼓励自己的儿子带头参了军。十五岁的大女儿，就离开了学校，拿起他哥哥的锄头，参加农业劳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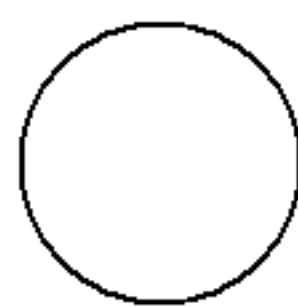
余锡渠同志这种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忘我的精神，在汕头地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影响。正如潮安县凤南公社山垵大队一个老赤卫队员陈书垣同志所说的：“十几年前离开这个山沟进城去的是这个‘老李’，十几年后回到这个山沟里来的，还是这个‘老李’，他对革命的耿耿忠心，一点也没有变啊！”



红旗

HONGQI

15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三次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七月五日,七月十日).....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 (6)

《人民日报》编者关于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

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按语..... (8)

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

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

首脑会议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10)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进行活的

思想教育..... 肖 华 (14)

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 高征绳 (24)

论演员的矛盾..... 舒 强 (33)

☆ 八月一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



(一) 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在七月五日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参加会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组成如下。

团长：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副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

团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潘自力。

(二) 中共中央责成中共代表团在同苏共代表团会谈中，遵循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一贯立场，根据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阐明我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维护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利益。

(三)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是答复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且指责我们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中共中央在复信中，也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阐述自己



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建議，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中苏两党在会談中充分交換意見，是有益处的。

令人十分遺憾的是，苏共中央沒有像中共中央一样，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对方的信件，让自己的党员、自己的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苏共中央六月十八日的声明、苏共中央全会六月二十一日決議以及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講話，把中共中央的建設性的意見，說成是什么“沒有根据的和誹謗性的”“攻击”，宣称“斷然拒絕”，并且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直接的、无理的攻击。接着，苏联政府又要求立即召回中国駐苏联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和研究生共五人，把两党的意識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中共中央不能不郑重指出，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是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的严重步骤。

鉴于中苏两党会談即将举行，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对我党的攻击，暂时不作答复，但是保留答复的权利。

(四) 尽管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采取了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中共中央为了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貫立場，仍将如期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談。

中共中央真誠地希望，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在兄弟党独立、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的基础上，中苏两党会談能够得到积极的成果，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能够得到加强。这也正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一致願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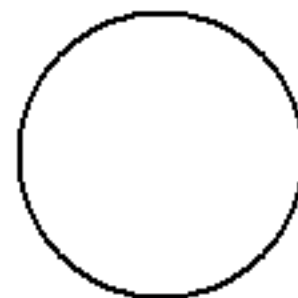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获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四日的声明。

中共中央不能同意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对中共中央七月一日声明的歪曲、指责和攻击。

鉴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将赴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对苏共中央的歪曲、指责和攻击给予必要的评论。

尽管苏共中央又一次发表了七月四日这样的声明，中共中央仍然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以最大的耐心，尽最大的努力，寻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中共中央希望，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有利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

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有关单位在北京集会欢迎被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的五位中国同志，是企图在中国人民中间煽起对苏联的不友好感情，使中苏两党会谈的局面尖锐化，并且得出结论说，中国“正在进行一个旨在严重恶化苏中关系而不考虑这种政策的危险后果的预谋的运动”。

中苏两党会谈正在举行，人们本来有理由期待有关中苏分歧的问题将会在会谈中得到心平气和的讨论。想不到，苏共中央竟然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起一次新的攻击，迫使我们不能不作出公开的答复。这种情况，只能使我们感到遗憾。

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共产党人应该是尊重事实的，讲道理的。在中苏会谈之前和会谈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恶化中苏关系，使会谈局面尖锐化的，究竟是誰呢？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是答复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苏共中央在自己的来信中，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且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既然苏共中央提出了这个确实很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当然有必要就这个问题系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尽管我们并不同意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所阐述的观点，我们仍然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信件，以便我们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苏共中央的观点。这是在处理兄弟党关系中所应该采取的正常态度。这样作，也有利于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有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但是，苏共中央非但不发表中共中央的复信，而且在自己的一系列决议、声明和领导人的讲话中，诬蔑中共中央的信件是对苏共的“诽谤性的和没有根据的攻击”。不让人们知道中共中央的复信到底说了些什么，而



一味攻击这封信是对苏共的“誹謗”，鬧得滿城風雨，难道这不正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誹謗嗎？

在中国报纸还没有发表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时候，苏联驻中国的机构和人员就在中国散发了这封信。在此以前，他们还曾散发苏共领导人和苏共中央机关报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不可能设想，苏联同志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同意这些文件的内容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一向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在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机构和人员散发本国政府和党的公开文件，是一种正常的、对等的活动，因而我们对于这种活动从来没有加以干预。但是，中国驻苏机构和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复信的正常行动，却被苏共中央认为是破坏苏联主权，干涉苏联内政。这种逻辑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的话，中国岂不是早已成了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了吗？

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机构和人员散发中共中央的复信为借口，要求中国召回有关人员，是毫无道理的。但是，中国方面以中苏团结为重，并没有对苏联驻华机构和人员采取相应措施。中国方面的克制态度，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有关单位在北京举行集会，欢迎被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的五位同志，说明事实真相，并且表示对加强中苏团结的愿望，这是中国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所应作的最低限度的事情，而且也是件好事情。我们不能理解，苏共中央为什么竟然对这样的集会也横加指责。难道苏共同志要求我们宣布这五位同志在中国也是不受欢迎的人吗？

中苏两党是平等的，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态度，是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的。对于中苏分歧，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我们这样说，我们也这样作，我们是言行一致的。目前，令人担心的倒是，苏共中央不仅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而且正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会和决议，通过连篇累牍的讲话和文章，掀起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人们不禁要问，苏共同志究竟准备把中苏分歧扩大到什么地步呢？

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我们在全世界的同志和朋友都在殷切地期待着中苏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中苏团结得到维护和加强。指望中苏会谈失败、中苏两党分裂的，只有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中苏团结太重要了。绝不能再作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同我们一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基础上，为逐步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而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发言人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

七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一次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其他全国性报纸和省市级以上的报纸，也将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还决定，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信虽然早在六月中旬广播了，那时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听到，又很可能有些反对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不愿意收听，现在我们再广播一次，希望上述两类人，特别是反对我们的人，耐心地听一听，以便这些人手中有材料，可以对我们的作出像样的批判。老实说，这些人过去对我们的一切批判，都是不像样子的，都是不能说服人的。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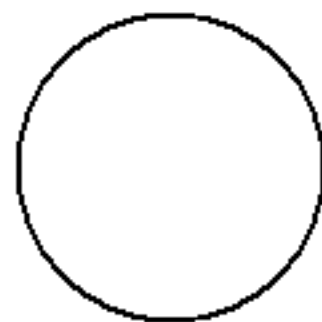
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烦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终于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是值得欢迎的。我们希望，苏共中央能够像中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的文件那样，继续发表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包括我们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所发表的七篇文章，以及七月一日声明、七月五日声明、七月十日声明和这一次声明，以便让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全部观点。

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其他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从十五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并且用个人署名文章和读者来信的形式，为苏共中央公开信吹嘘，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报纸，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报纸，也纷纷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这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凡是重要的，我们也将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并在必要时予以答复。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把要讲的话讲出来，是一个好现象，讲出来比不讲出来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重事实、讲道理的人。真理愈辩而愈明。如果尊重事实而不掩盖真相和歪曲事实，如果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苏之间的分歧总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异口同声，夸奖苏共中央公开信，诋毁中国共产党。这类言论很值得注意，我们将择其精彩者予以发表，让我们的党员和中国人民共同欣赏。



《人民日报》编者关于 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按语

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发言人已经指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

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企图用这样蛊惑人心的说法，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诽谤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人，是心劳日拙的，除了使他们的肮脏目的暴露无遗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

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十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曾经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他列举战后世界十大事件，论证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当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愈来愈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就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地说，我们不要打仗，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坚持不懈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揭露他们散布核恐怖的罪恶目的，是要吓唬各国人民，企图奴役全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如果帝国主义竟然发动核战争，强使人类遭受一次空前的灾难，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



要么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要么害怕牺牲，宣布投降。但是，有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人类就要全部死绝。实际上，这种论调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只能屈服。针对着这种投降主义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一定要把核战争强加给人类，以致可能使亿万人遭到牺牲，但是人类也绝不会毁灭。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毛泽东同志说：“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问题就是这样。

又例如，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苏共公开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苏共领导人清楚，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

苏共二十大以后，关于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三十年间所起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向苏共同志提出过批评。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到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同苏共同志谈过四次。当时，我们就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全面估价。我们认为，苏共领导人的错误是：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对斯大林作了全面的估价，婉转地批评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而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这种一贯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和“虚伪”的呢？

又例如，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事实是，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方面突然通知中国，决定在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一千三百多名，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这就给中国的经济、国防和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是非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首脑会议的声明

和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

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二十五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

这是三个核大国签订的条约。他们企图通过这个条约，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

在莫斯科签订的这个条约，是一个愚弄全世界人民的大骗局，是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的。

全世界人民要求真和平，这个条约所搞的却是假和平。

全世界人民要求普遍裁军，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这个条约却把停止核试验同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分开，并且使三个核大国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合法化，与裁军背道而驰。

全世界人民要求全面停止核试验，这个条约却把禁止地下核试验排除在外，这就特别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核武器。

全世界人民要求保卫世界和平，消除核战争威胁，这个条约却在实际上加强了核大国进行核讹诈的地位，增加了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和世界战争的危险。

这个大骗局如果不揭穿，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不可能设想中国政府会参与这个肮脏的骗局。中国政府认为，彻底揭穿这个骗局，是自己的不可推诿的神圣责任。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这个危害全世界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条约。



很明白，这个条约，对于美国的核备战和核讹诈政策是没有任何约束作用的。它丝毫也不妨碍美国进行核扩散、扩充核军备、进行核威胁。这个条约的中心目的，就是要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使全世界一切受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不能增强自己的防御力量，以便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和讹诈。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演说，道破了这个条约的实质。肯尼迪指出，这项条约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威胁的结束，不阻止而且允许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它不会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它不会减少核武器的储存，它不会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他还指出，这个条约不会妨碍美国在“援助”的名义下把核武器扩散给它的盟国和它控制下的国家。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可以借此阻止无核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试验和生产核武器。同时，肯尼迪还正式宣布，美国随时可以退出条约，恢复一切形式的核试验。这就充分证明，这个条约对美帝国主义有百利而无一害。

现在签订的这个条约，是美国和英国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的翻版。苏联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曾经指出，美英提出这个草案的目的，显然在于保证西方国家的片面军事优势，而损害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他指出，美国已经长期利用地下核试验来改善自己的核武器，如果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而同时禁止大气层的试验，那就意味着美国仍能改善自己的核武器，增加其能力和效率。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曾经指出，“美国目前制订的制造新型核武器的计划所依靠的正是地下试验”，“仅仅就停止一种试验——在大气层中的试验达成协议，是对和平事业帮倒忙。这就意味着对各国人民的欺骗。”

可是，现在苏联政府竟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抛弃了他们曾经坚持过的正确立场，接受了美英条约草案的翻版，心甘情愿地听任美帝国主义夺取军事优势。这就出卖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的人民的利益，出卖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

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联合战争力量，反



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各国人民。

苏联领导人为什么这样急于需要这个条约呢？难道这能证明是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的胜利吗？不，这绝不是和平共处政策的胜利。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异口同声，到处宣扬，他们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是走向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这是骗人的。美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核武器，这些武器分布在世界各地，严重地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安全。如果美国真的要在禁止核武器方面迈开第一步的话，它为什么不能解除对其他国家的核威胁呢？它为什么不能承担义务，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尊重世界人民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愿望呢？它为什么不能承担义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把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资料交给它的盟国呢？美国及其合伙者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只许美国对旁人进行核威胁、核讹诈，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不允许旁人采取措施来抵抗这种威胁和讹诈，保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呢？侵略者有权杀人，被侵略者无权自卫，这岂不是正如中国俗语所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核战争，反对世界战争。中国政府历来主张普遍裁军，坚决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为了逐步实现这个目的，政府和中国人民从不吝惜自己的努力。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早就提出并且一直主张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无核武器区。

中国政府认为，禁止核武器、防止核战争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问题，应该由世界上所有大小国家共同讨论和决定。由几个核国家来摆布一百多个无核国家的命运，是不能容忍的。

中国政府认为，在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允许采取欺骗世界人民的办法。应当毫不含糊地肯定，必须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

（一）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



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具体地说，就是：不使用核武器，不输出核武器，不输入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试验核武器，不储存核武器，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统统销毁，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研究、试验、生产核武器的机构统统解散。

(二) 为逐步履行上述义务，首先采取下列措施：

甲、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在内；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乙、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和沿太平洋地区的无核武器区，建立中欧无核武器区，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建立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每一个无核武器区都承担相应的义务。

丙、不得以任何形式输出和输入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

丁、停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

(三) 召开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以及为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采取上述四项措施的问题。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深信，核武器是能够禁止的，核战争是能够防止的，世界和平是能够维护的。我们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坚决斗争到底。



以毛澤东思想为指針，进行活的思想教育

肖 华

今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六周年。三十六年来，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它很好地执行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劳动、保卫社会秩序、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荣任务。它随时都在警惕地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随时准备粉碎任何敌人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一切斗争的考验都证明，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在纪念这个光荣节日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高举毛澤东思想红旗，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促进我军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够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本色，无限地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一贯地把政治工作当作军队的生命线，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九年，毛澤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就已经为我军的政治工作规定了基本路线。毛澤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又说过：“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①按照毛澤东同志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贯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自己的干部和战士，使他们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优秀的革命品质。这是我军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林彪同志创造性地运用毛澤东思想，指出政治思想因素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他指出，我军必须根据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在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中，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政治工作中，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思想工作中，把进行活的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要有效地进行活的思想教育，就要抓好两头，一头抓党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的传达贯彻，一头抓部队的思想动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澤东思想来回答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指导广大官兵的思想和行动。这也就是毛澤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必须不停止在现

^① 《论持久战》。《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0页。



有书本的字句上，要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在林彪同志的倡导下，我軍近几年大力地进行了这种活的思想教育，将部队的思想觉悟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軍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在过去經驗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进行活的思想教育，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澤东思想为指針，来回答和解决革命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思想問題和实际問題，也就是說，用毛澤东思想来武装全体官兵的头脑，使他們自觉地按照毛澤东同志的指示行动。

毛澤东同志是当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澤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潰、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发展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指針，是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反对現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澤东同志不但規定了我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規定了我軍建設的唯一正确的路綫，而且規定了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根本原則。我軍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的偉大胜利，我軍在建設新型人民军队中的巨大成就，都是在毛澤东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毛澤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無論是在我国人民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每当我们遇到重大問題的时候，都是从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那里找到方向，得到正确解决的。經驗一再证明，坚决按照毛澤东思想办事，我們的事业就会发展，就会胜利；反之，只要稍微离开了毛澤东思想，即使主观上想把工作做好，也会使我們的事业遭到挫折或失败。毛澤东思想，無論过去、現在和将来，都是我軍一切工作唯一正确的指針。

以毛澤东思想为指針来进行活的思想教育，采用理論联系实际的办法，来閱讀和研究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用毛澤东思想武装全体官兵的头脑，这是我軍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优良傳統。近几年来，我們根据軍委和林彪同志关于高举毛澤东思想紅旗，把毛澤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指示，继承和发揚了过去的优良傳統，在全軍官兵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澤东著作的新高潮。我們的口号是：“人人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毛澤东同志的著作，是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我国人民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的结晶，也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杰出的理論著作。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可以使我們紧紧結合革命斗争的实践，更好地領会和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学习毛澤东同志著作的同时，还要从毛澤东同志的偉大革命



实践中，学习他如何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习他的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灵活、最巧妙的斗争艺术；学习他永远紧紧地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和谦虚、刻苦的学习精神。

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办法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具体说来，就是国内外形势、党的政策、军队任务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就学什么；进行什么政治思想运动和政治教育就学什么；做什么工作就学什么。一句话，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学什么。在各种工作和教育中，在广大官兵思想意识的修养锻炼中，都从毛泽东著作中找武器，以问题为中心，选择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有关文章或有关的章节和段落，以及毛泽东同志解决有关问题的范例，进行学习。总之，是以毛泽东思想之“矢”，射部队实际之“的”，从实际斗争中学习毛泽东同志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学，内容少而精，紧紧结合实际，学了就能运用，在实际运用中又能进一步加深理解，广大官兵就越学越感到亲切，越学越感到有用，越学越爱学。正如旧社会身受剥削的工人和农民比一般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懂得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什么是阶级一样，执行着革命斗争任务的解放军官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所包含的极其博大、精深的理论，是能够理解的。那种认为工农兵群众文化水平低，不能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想法，不能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想法，显然是不对的。当然，凡是理论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在学校学习的干部，还应该要求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理论，更多地读一些书，更多地读一些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还应该选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这对于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很重要的。

广大官兵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他们的精神面貌就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政治觉悟就能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和无数雷锋式的好战士的成长，“南京路上好八连”和许多好八连式的模范集体的成长，就是最生动的例证。雷锋为什么能具有那样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正是由于他在短短的革命生涯中，能够始终把毛泽东著作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运用“问题——学习——实践——总结”的公式，废寝忘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学一点，做一点，学用一致，身体力行。“南京路上好八连”十多年来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不但没有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倒下去，而且巩固和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根本的原因，也是由于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采用了“一读、二议、三对照、四行动”的办法，活学活用了毛泽东著作，使毛泽东思想真正成为官兵行动的指南。西藏、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在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和极其困难的自然条件下，赢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也是由于他们在平时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高了全体官兵的政治水平和军事素养，并且紧紧结合执行作战任务和各项政策的实际，利用行军作战的空隙，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有关论



述，及时地统一了政策思想和作战思想。这一切都证明，凡是采取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的办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就能够收到显著的效果，就能够使毛泽东思想化为千百万群众的自觉行动，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二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进行活的思想教育，必须抓好两头。

抓两头这句话，通俗地概括了我军长期以来进行活的思想教育的经验。抓住了两头，思想教育就做活了，就可以把上面的指示和下面的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很好地结合起来，把领导和群众很好地结合起来。

抓两头，首先要抓好上头。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活的思想教育搞得好的单位，那里的领导，都是首先对党中央和军委的各项指示，进行深入的认真的学习研究，领会其精神实质；根据上级的规定，把这些指示不拖延地不走样地向下传达；并且根据本单位本部队当前的实际情况，采取具体措施，使这些指示落实。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是毛泽东思想在当前实际斗争和工作中的具体化，是行动中的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首先对这些指示进行认真研究，深刻领会，做工作才能有明确的方向，对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抓下头才能抓得准抓得好。只有把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传达贯彻到广大官兵中间去，才能够使广大官兵关心和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情，开阔他们的视野和胸怀，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使他们自觉地用大道理管小道理，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如果不首先抓好上头，以为进行活的思想教育只是单纯地抓下面的思想问题，在一些现象里打圈子，就事论事，言不及义，那末，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不可能做好思想工作，甚至还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在抓好上头的同时，也要抓好下头，切实掌握部队思想动态。近几年来，我军各级领导机关采取了组织工作组下连蹲点、搞试点，首长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和代理基层干部职务等等措施，加强了对部队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上头的东西，也就是说领导机关的东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归根到底，是来源于下头，来源于群众。对部队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了解得越清楚，对上头的东西也就体会得越深刻，也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概括了客观实际，是普遍性的东西，只有把它同各个单位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和思想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因此，思想工作，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干部和战士思想情况的基础上。这就是说，要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既善于抓住群众中的积极因素和先进思想，用典型指导一般，又善于抓住某些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的苗头，在它刚一萌芽的时候，就及时加以揭露和克服。特别是连队政治指导员和党员一定要成为本连干部和战士的知心朋友，对他们的思想情况要知道得最早、最清楚，反映得最快、最准



确,处理得最好、最及时。这就不仅要了解他们当前的思想动态,而且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和入伍后的思想变化过程,以及每个人的家庭和家乡的情况,了解他们的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分析思想变化的原因和问题的实质,使思想教育更加切合实际,有的放矢,收到良好的效果。

近几年来,我军思想教育工作中许多卓有成效的经验,都是和贯彻抓两头的方法分不开的。例如两忆(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教育运动,所以获得很大成效,就是因为一头抓住了当时党中央和军委关于加强阶级教育的指示,一头抓住了大部分战士生在苦中长在甜里,缺乏阶级斗争锻炼的情况,从而在过去诉苦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忆苦这种新的阶级教育形式。在忆苦教育过程中,又运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和论述作为武器,启发和引导广大官兵回忆和控诉自己与亲属所受旧社会剥削压迫之苦,并且把这些材料加以分析提高,从而在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再如学习雷锋和好八连的宣传教育活动,所以能够形成巨大的思想力量,在全军官兵和全国人民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正是由于我们依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必须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的指示,在群众中适时发现了体现这一思想的、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和要求的先进典型,使之成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上述指示的活教材、活榜样。

在思想工作中抓两头,完全符合于毛泽东同志关于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又指出,人类的认识运动是沿着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进行的。当着人们首先认识了許多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进一步加以概括,认识了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②我军用抓两头的方法进行活的思想教育,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在思想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我们一方面不断地把上头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交给广大群众,使之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化为推动部队工作前进的物质力量;一方面又不断地把广大群众的认识、经验、建议、要求、各种各样的办法,经过调查研究集中起来,总结提高,用来进一步指导官兵的思想行动。这样不断反复,部队的思想工作就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活跃,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也就会一步一步地提高。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8页。



三

以毛澤东思想为指针，进行活的思想教育，必須从阶级教育入手，以阶级教育为基础。

毛澤东同志从創建工农紅軍起，就十分強調阶级教育。在以后的长时期中，我軍在进行阶级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并且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方法。那就是发动群众进行訴苦运动，用自己的亲身經历来控訴旧社会給予劳动人民的苦难，以此作为提高阶级觉悟的入門，并且在一切政治思想教育中都貫串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近年来，我軍进行的“两忆三查”和控訴美、蔣罪行的教育运动等等，又进一步发展了这方面的經驗。广大官兵在經過这种阶级教育之后，都深深体会到：不懂得什么是剝削，就不会真正懂得革命，沒有阶级观点，就不能看清国内外形势，領会党的政策，就不能真正理解我軍的本质和优良傳統，就不会知道自己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反之，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道理，有了明确的阶级观点，就能在任何阶级斗争的風浪中，看得清，站得稳，頂得住。

为了使广大官兵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剝削制度，什么是产生阶级和剝削的根源，为了使广大官兵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場，学会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和处理各种問題，需要从多方面用多种方法进行阶级教育。但是，作为提高阶级觉悟的入門的最好的方法，在过去是訴苦，在今天是在忆苦。

忆苦教育是訴苦教育在新条件下的具体运用。一般采取官兵一起忆苦、軍民一起忆苦的方式，首先由身受旧社会之苦的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来“傳苦”、“引苦”，启发青年官兵回忆和控訴自己和親屬所受的旧社会之苦。过去的血海深仇一經回忆和控訴，就会大大激发部队的阶级感情，喚醒阶级自觉。用战士的話說，就是“苦水擦亮了眼睛”。訴了苦，再挖苦根，一直挖到私有制、剝削制度、反动統治阶级依靠政权这个刀把子鎮压人民，美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派的后台老板这条总根子，从根本上弄清苦从何来。从回忆过去之苦，对比今日之甜。談了甜，再思甜源，一直追溯到党领导和組織人民拿起枪杆子，夺取政权，保卫政权，走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集体富裕道路等等一切幸福的源泉，弄清今天的甜从何而来。在忆苦的基础上，經過两个社会、两种軍队、两个世界的对比，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是非清楚了，爱憎分明了，广大官兵就能够自觉地把个人和阶级、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阶级敌人、本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明确了在我們取得革命胜利以后，还要牢牢保卫胜利果实；自己解放了，过了好日子，还要关心、支持和援助尚未得到解放的国际阶级兄弟。“天下富人一般黑，天下穷人是一家。剝削阶级不消灭，手中武器不能放下。”这就是全軍官兵在忆苦教育之后共同的心里話。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对广大官兵进行忆苦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瘋狂扩



軍备战的同时，正在采取“和平战略”，以和平的烟幕掩盖其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并且力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现代修正主义也正在适应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的伪装之下，抹煞阶级界限，用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国内，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有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①。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前进，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容易忽视阶级和阶级斗争，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丧失警惕性的麻痹思想，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军青年官兵都是全国解放以后在新中国长大起来的。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不是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环境，而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环境。他们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他们父辈在旧社会所处的奴隶地位，而是新社会的主人。他们所过的生活，也已经不是他们父辈曾经过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而是有吃有穿、不断得到改善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少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实际锻炼。他们“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②。有些青年身在福中不知福，缺乏鉴别和抵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我们的青年一代，能够在和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学会阶级斗争，把老一辈的革命传统接受下来，并且一代一代传下去；怎样使我们的老同志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质，永不忘本，永不褪色，这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极其严重的任务。能不能很好地实现这个任务，是影响我们革命事业前途的一个根本问题。忆苦教育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一个成功方法。

除了通过忆苦控诉、回忆对比，用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育部队而外，还要善于运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现实材料来教育部队，并且在一切政治思想教育中贯穿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把阶级教育经常化。对于国内外的现实材料，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各地发动侵略的罪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各国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华叫嚣，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正在遭受着的苦难，正在进行着的斗争，国内阶级敌人妄想复辟的阴谋破坏活动，等等，要随时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加以阐明。还要帮助广大官兵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正确对待和处理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不断提高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

① 见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33页。



四

以毛澤东思想为指針进行活的思想教育，必須实行群众路綫，运用活教材、活方法。在这方面，我們体会得最为深刻的主要是这样几个問題。

一、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我們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我軍官兵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子弟和革命知識分子，也都是相信事实、相信真理的。他們的思想觉悟，虽然比較起来也有先进、中間和落后的分別，但是，他們都有强烈的革命責任心和荣誉感，好学上进，追求真理，这是他們思想中的主流。只要我們能够从他們原有的觉悟水平出发，相信他們，同他們一起摆事实，讲道理，把应该讓他們了解的情况讲清楚，把事情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理讲得合乎实际，并且能够以身作則，身体力行，不是讲空道理，那就能够把思想工作做到广大官兵的心坎上，就能够启发他們的自觉，提高他們的觉悟，使先进的更加先进，使处于中間和落后状态的同志，也能够逐步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就是对于某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和不良傾向，也应当仔細分析問題的性質和原因，首先肯定他們的优点和正确的方面，指出錯誤的方面、錯誤的性質、原因和改正的办法，使之心悅誠服，帮助他們逐步改正。一时說服不了，就耐心等待，繼續說服，并教育他們遵守紀律。毛澤东同志說：“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強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①只要切实貫徹毛澤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把工作做到家，道理总是能够說通的。如果不去进行艰苦的耐心的思想工作，只是簡單的强制压服，即使表面上解决了問題，也是口服心不服，而且容易伤害同志，不利于团結。在思想教育工作中，为了追求一时的所謂“效果”，不讲真实情况，甚至說假話，这是不能容許的。这样做，不但不能教育群众，反而会損害思想工作的威信。在了解和解决思想問題时，要发揚民主，让大家敞开心扉，把意見充分說出来，耐心傾听不同的意見，甚至反面的意見，让人把話說完，不要听得不順耳就頂回去。对于反映出来的意見，要做具体分析，区别那些是思想問題，那些是实际問題。既不能把由于实际困难而引起的思想不安当作思想錯誤，把合理的要求当作个人主义，也不能光是注意解决实际問題而忽視思想教育。对于干部和战士的实际困难，要滿腔热情地去关怀，在条件許可的範圍內尽力帮助解决。对那些不应当解决或暫時不可能解决的实际問題，也要恰当地进行解釋。

二、表揚先进，树立榜样。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領導方法和教育方法，是毛澤东同志所一貫提倡的方法。英雄模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6頁。



范、好人好事是活生生的榜样，是最能感染群众，最有说服力，也是群众最愿意学习的。进行活的思想教育，经常的大量工作，就是时刻注意去发现和表扬群众中的积极因素，各方面的好人好事，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选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典型，树立活的榜样，来教育部队。这样做，就可以鼓励广大官兵积极向先进学习，向先进看齐，发扬正气，抵制歪风，充分调动积极因素，不断克服缺点和错误。雷锋和好八连以及其他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和单位的成长，是学习董存瑞、黄继光等前辈英雄模范开的花、结的果。通过学习雷锋和好八连的光辉榜样，又必然而且已经产生出更多的模范人物和模范集体。

三、充分运用活教材、活方法。

人们认识一个问题，接受一个真理，往往是要反复地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不断地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实际感受，经过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因此，在思想教育中，要善于运用官兵的切身经验，运用他们自己在现实斗争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实，运用来自社会、来自人民的各种现实材料，采取各种生动活泼的方法，来进行教育。例如进行回忆对比，组织到先进单位、到厂矿、公社、革命老根据地参观访问，举办实物和图片展览，请老干部、请英雄人物到部队传授经验、现身说法，请地方干部、老工人、老农民、先进生产者来做报告，宣读和讨论有教育意义的家庭来信，以及看戏、看电影、唱革命歌曲、阅读革命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等，都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发动群众，人人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光靠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去做，是做不活也做不好的。只有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依靠党、团员为骨干，发动全军人人都来做，思想工作才会生动活泼。我军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军队的每一个成员，既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又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群众的思想问题，群众之间相互了解得最快、最清楚，用群众互相帮助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最容易收到良好的效果。一个单位，党员、团员、干部、战士，人人都做思想工作，几十双眼睛都来看，几十个脑子都来想，几十个嘴巴都来讲，把问题弄清楚，把道理讲透，就能够使好人好事及时得到表扬，不良倾向及时得到发现和纠正，蕴藏在群众中的丰富多采的活教材、活方法，也能够得到充分运用。这样，不但群众能够互相学习，共同提高，领导上也能够得到群众的帮助，受到教育。凡是认真地、经常地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单位，就必然会出现一个处处是课堂、人人是教员的局面，思想工作就会越做越细致，越做越深刻，越做越活跃。

五、思想教育和经常的思想教育工作相结合。

进行活的思想教育，基本形式不外两种：一种是一定时期的思想教育活动，一种是经常的思想教育工作。两种形式交替运用，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经验证明，搞运动，不仅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里是必要的，而且在今天也是不可少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军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总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随着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的



实践而不断有新的发展的。广大官兵的思想情况，也总是围绕这些天下大事的变化发展而活动，并且常常随之而形成为一个时期带有普遍性的思想活动的焦点，成为一个时期为了顺利推进工作必须集中力量加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在上级统一领导下组织群众性的思想教育运动，用鸣放辩论的方法，集中时间和力量，求得在较短时间内，打好思想战线上的“歼灭仗”，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如果遇到这种重大的问题，不采取运动的方法，而只是一般地上上课，就必然会贻误时机，使思想工作落后于形势，妨碍思想的迅速统一和工作的迅速推进，造成工作上的损失。但是思想教育运动只能解决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在运动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还需要继续巩固和提高；运动过后，随着情况的发展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干部战士必须了解的一些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也还需要通过上政治课进行循序渐进的教育。思想教育运动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效果，除了运动本身而外，也还有赖于平时政治教育所积累起来的思想基础，否则就谈不上形成运动中的骨干队伍，更谈不上运动中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的开展。因此，除了必须抓好一定时期的思想教育运动以外，还必须注意抓紧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上课是进行经常性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对连队来说，政治指导员要把上好战士的政治课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同时，还要注意做好每天读报、点名讲话、个别谈心等等工作，以不断丰富战士的政治知识，逐步提高战士的觉悟，并及时解决日常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思想教育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无论是思想教育运动，或是经常的思想教育，都必须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去做，把一般教育和个别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工作做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威力。

在广大官兵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圆满地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任务。我们的教育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紧密结合军队的任务，服从军队建设的需要，做到在平时保证练好杀敌本领，完成各项任务，在战时保证打胜仗。否则，我们的教育工作就脱离了实际。因此，我们在强调活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的时候，从来不忽视物质因素、技术因素的重要性，总是在努力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他们的政治热情引导到积极学习军事，钻研战术和技术，熟练手中武器上。正因为这样，我军在近几年开展创造四好连队*的运动中，涌现出了数千个四好连队，几十万个五好战士**，无数的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大大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官兵的头脑，又在这个基础上用先进的军事技术武装他们的手足，我们的军队就将永远无敌于天下。

* 四好连队，即做到了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的连队。三八作风是我军优良的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 五好战士，即做到了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的战士。



学习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論

高 征 绳

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論，是政治經濟学的科学发现，它在馬克思的經濟学說中占有重要地位。列宁指出，馬克思对社会总資本的再生产的分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新贡献。学习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論，对于我們的經濟理論工作和实际工作有着重大意义。

馬克思对资产阶級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再生产理論的批判

在政治經濟学學說史上，第一次試圖从理論上探討社会資本的再生产問題的，是十八世紀的重农主义者。馬克思对于他們在再生产理論上的研究成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重农主义的奠基人，法国經濟学家弗朗斯瓦·魁奈的《經濟表》，就是分析社会資本的再生产的一种天才嘗試。馬克思說，这个表是“在政治經濟学的幼稚时期出現的。一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学还无疑要感謝这个最天才的創作”^①。魁奈把社会分成为三个阶級：生产阶級（即农业經營者和农业工人）、占有者阶級（即土地所有者、僧侶、貴族、官吏及其从屬人員）和不生产阶級（即工商业者）。《經濟表》的任务在于說明，一个国家的全年总产品，是怎样在三个阶級之間流通，

从而使每年的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在魁奈的《經濟表》中，“无数个别的流通行为，被綜括成为它們的特征的社会的大量运动，成为几个大的机能上規定了的經濟的社会阶級間的流通”^②。

魁奈沒有能够提出科学的再生产理論，在他的《經濟表》中包含着許多重大的錯誤和矛盾。他把社会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級，是从以下的錯誤观点出发的：把农业劳动当作唯一的生产劳动，把地租当作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态。但是，魁奈在《經濟表》中，还是提出了若干关于研究再生产問題的有价值的見解。馬克思指出，魁奈要把資本的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仅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形态，把货币流通仅表现为資本流通的要素；同时，在再生产过程中，說明了社会各阶級收入的来源，資本和所得之間的交換，生产消費和个人消費之間的关系，并且把消費者和生产者之間的流通包括在資本的流通中；最后，把农业和工业这两大生

①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8頁。



产部门之间的流通，看成是再生产过程的因素，等等。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代表亚当·斯密，继重农主义之后，探讨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但是，“在再生产过程的说明上，从而，在积累的说明上，亚当·斯密和他的前辈学者比较，特别是与重农学派比较，就许多方面说，不但不曾有何等进步，且还退步了”^①。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的再生产理论，是由斯密创立的，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斯密信条”是斯密的再生产理论的基础。所谓“斯密信条”，就是把一切商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斯密之所以不可能提出关于再生产的正确理论，就在于他从“斯密信条”出发，来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斯密在分析再生产问题上的第一个错误，是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中抛弃不变资本。既然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而排斥了不变资本，那末，试问没有不变资本，再生产过程怎么能够进行呢？不用说扩大再生产不能进行，即使是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因此，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时，斯密只好避开他原来的观点，用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办法，把抛弃的不变资本偷偷地输入进来。斯密的所谓总收入，就是一国全年总产品，所谓纯收入，就是扣除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耗费以后余下来的部分。根据斯密的这种见解，把

不变资本包括在总收入中，把它同纯收入分开，这样，再生产过程就可以进行了，因为消费掉的不是总收入，而是纯收入。马克思指出了斯密的这个矛盾。既然不把不变资本包括在产品价值中，那末，又怎样能够把不变资本包括在收入中呢？显然，斯密在这里默认了社会总产品价值的三个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价值不仅有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而且还有不变资本。马克思指出，“斯密信条”的错误，是把年生产物价值和年价值生产物等同起来了。实际上，年价值生产物只分解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至于年生产物价值，则除了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以外，还包括不变资本。斯密之所以把两者等同起来，是由于他不懂得劳动二重性，不了解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区别，不了解在社会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抽象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另一方面，具体劳动保存和转移了旧的价值。

斯密的第二个错误，是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斯密把一切商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把它们当作消费基金，归到依靠这种所得为生的社会各阶级手中；并且认为一切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变为可变资本，从而把生产消费归结为个人消费。社会消费之所以分为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是因为并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用于个人消费，年产品中的固定资本的物质要素，并不为社会上任何一个阶级形成收入，它是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0页，注32。



于生产消费，而不是用于个人消费的。马克思指出，斯密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这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和生产消费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区别。斯密认为，第一种劳动者是提供那些决不能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第二种劳动者是提供能够成为纯收入的消费品。看来，斯密已经接近于承认，要阐明再生产问题，就必须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区别开来，但是，由于他不懂得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的原理，因而，混同了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

马克思指出，从斯密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中，可以看出，他在错误的混乱中，已经接近再生产理论的根本问题，如果再前进一步，就有可能解决再生产问题。但是，由于斯密的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偏见，使他不可能避免在考察再生产问题上的两大错误：从价值方面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抛弃了不变资本，从实物形态方面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混同了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

在斯密以后和马克思以前的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全都重复了斯密的错误，而没有把再生产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作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者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再生产理论，是全盘接受斯密的理论的。所以，马克思说：“李嘉图几乎是逐字再生产亚当·斯密的理论。”^①李嘉图接受了“斯密信条”的一切原理，他的错误同斯密一样，就是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抛弃了不变资本，认为全部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变

成为可变资本。这种见解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由此，再生产的全部问题都被错误地考察了。

李嘉图在再生产理论上的重大错误，还表现在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否认普遍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李嘉图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他认为，生产之后紧跟着消费，售卖者就是购买者，因为每一次卖都是买，反过来，每一次买都是卖，商品流通规定着买和卖的平衡，买和卖是不会脱节的，人们的需要是无止境的，生产是永远不会超过需要的。这样，李嘉图就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从而直接否认了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不了解，危机的可能性早已包含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全部商品资本和这全部商品资本依以成立的每一个商品，都须通过W—G—W过程，通过商品的形态变化。所以，包含在这个形态内的恐慌的一般可能性——买和卖的脱节——在资本也是商品并且不外是商品的限度内，已经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了。”^②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对于经济危机是毫无所知的，他对于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一五年以后的几次经济危机，是以歉收所引起的谷物昂贵、纸币贬值，以及其他政治原因等偶然现象来加以说明的。在李嘉图死后不久的一八二五年，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

① 《资本论》第2卷，第478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2页。



机就在李嘉图的故国的土地上爆发了，李嘉图以及他的后继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学说，在历史面前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从十八世纪魁奈的《经济表》开始，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几乎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试图解决再生产的理论问题。但是，他们却无能为力，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加混乱。只有到了马克思，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的理论问题才得到了真正的科学的解决。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创立了 科学的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在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并且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中建立起来的。列宁曾经说过：“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中，对个别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进行了考察，从再生产的角度揭发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作

了系统的、科学的阐明。在这里，他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全部，分析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从而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最一般的规律性。

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马克思第一次运用价值补偿和实物形态补偿的观点，来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由此，克服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中的理论错误和逻辑错误，为彻底解决再生产的理论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批判斯密的再生产理论的同时，马克思提出了关于正确分析再生产过程的两个基本原理：“（I）社会年生产物，包含二部类，第一类是生产资料，第二类是消费资料。二者必须分开来处理。（II）年生产物中那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部分的总价值，是照这样分割的：价值一部分，不过是生产生产资料时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从而，不过是在更新形态上再现的资本价值。第二部分，等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价值；或等于该生产领域内资本家所付的工资总额。最后，第三个价值部分，就构成这一个部类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包括地租）的源泉。”^② 这就是说，第一个原理，是从实物形态上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相应地把社会生产也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

^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② 《资本论》第2卷，第450页。



的生产，即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生产。第二个原理，是从价值上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从个别资本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可以只按照价值来分析产品的组成部分，而完全撇开产品的实物形态问题。因为在这里，可以假定市场上已经存在着再生产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可是，当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时，就不能只考虑产品的价值补偿问题，而必须同时考虑产品的实物形态补偿问题。因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既包含个人消费，也包含生产消费。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资料？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只有把社会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考察社会产品的不同的各个部分是怎样在再生产过程中得到补偿的，才能够科学地说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马克思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是首先从简单再生产开始的。

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剩余价值全部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第二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部分，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实现的。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一部分以自然形态重新投入生产，另一部分则通过本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得到实现。留下来的是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部分与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部分。

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部分都是消费资料，它需要交换成为生产资料，才能够在第二年重新投入生产。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部分，需要交换成为供给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所需的消费资料，才能够在第二年重新投入生产。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相互依存的。通过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同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进行交换，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就获得了消费资料，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则获得了生产资料。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在价值和实物形态上都得到了补偿，使社会生产得以在原有的规模上进行。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应当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用公式表示，即 $I(v+m) = IIc$ 。由此，派生出两个公式：第一部类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应当等于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之和，用公式表示，即 $I(c+v+m) = Ic + IIc$ ；第二部类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应当等于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用公式表示，即 $II(c+v+m) = I(v+m) + II(v+m)$ 。

在分析了简单再生产以后，马克思进而分析扩大再生产。

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不同，资本家只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另一部分则作为积累，用于生产消费，使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马克思指出，为了要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进行积累，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新的资本，用来追加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劳动力。按照马克思的扩大



再生产的公式表示，积累首先从第一部类开始，积累的剩余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第二部类的积累，必须同第一部类的积累相适应。马克思分别考察了两大部类的积累，对扩大再生产作了五年的推算，最后得出结论，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应当大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公式表示为， $I(v+m) > IIc$ 。由此，派生出两个公式，即：第一部类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应当大于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之和，公式表示为， $I(c+v+m) > Ic + IIc$ ；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应当大于第二部类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公式表示为， $I(v+m) + II(v+m) > II(c+v+m)$ 。

无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它们的实现过程，都是通过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通过市场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这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过程。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阐明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实现条件。这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它是以假定资本主义社会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产品是按比例进行分配为前提的。但是，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品并不是按比例进行分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平衡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比例经常遭受破坏，比例关系是通过危机来强制实现的。所以，马克思在阐明再生产理论的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不平衡性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他说：“商品生产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态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货币不仅当作流通手段且也当作货币资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且生出了一定的，为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易和再生产（不问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条件。不过，这各种条件，会激变为同样多的使再生产陷于变则进行的条件，激变为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的姿态内，均衡自身不过是一种偶然。”^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是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为不变的，没有把技术进步的因素估计在内。但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已经指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变资本会牺牲可变资本而增长起来。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把技术进步的因素纳入扩大再生产的考察中。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公式，对扩大再生产作了四年的推算。列宁得出结论说：“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②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这就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这就是列宁所论证的，在扩大再生

① 《资本论》第2卷，第6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页。



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生产资料的生产应当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但是，列宁又指出，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可以完全不依赖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他说：“……马克思写道：‘我们看到（第2卷第3篇），在不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从来不进入个人消费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但是归根到底（definitiv）它还是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并不是为了本身的需要而进行的，这仅仅是由于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由此可见，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①这就是说，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依赖于个人消费。这是因为第二部类对第一部类有着制约作用，如果消费资料的生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那末，生产资料的生产的优先增长也就得不到保证。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的重大意义

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重大意义时说道：“马克思的理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它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其次，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即人民的消费没有随着生产的巨大增长而相应地增长这一矛盾是怎样实现的。……其次，马克思的实现论所

提供的最有力的武器，不仅反对辩护论，而且也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庸俗的反动的批评。”^②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产品实现问题的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消费，而是生产剩余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归根到底是同消费相联系，并且是以消费为转移的。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随着资本的积累，财富在一极集中，贫困在另一极集中，无产阶级愈来愈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这样，就加深了生产能力无限的扩大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相对缩小的矛盾，从而影响到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发展，由于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停滞，又影响到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发展，于是，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遭到破坏。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加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

^① 《市场理论问题述评》。《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② 《再论实现论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71页。



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是对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結果，同時，是在同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和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十九世紀前半叶，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法國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前者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充當資本主義的辯護士，竭力粉飾資本主義的矛盾，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後者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雖然批評了資本主義，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但是，却企圖用落后的小商品生產方式來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再生产過程的深刻矛盾，指出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闡明了資本主義發展和滅亡的規律，從而粉碎了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關於再生产問題的謬論，同時，又反對了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的反動批評。

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是批判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強有力的理論武器。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真正原因，抹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宣揚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散布所謂“有調節的資本主義”、“無危機的資本主義”。適應壟斷資本的需要而產生的凱恩斯主義，是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最反動的一個流派。凱恩斯主義的首創者英國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在鐵的事實面前，

不得不承認經濟危機同資本主義有不解之緣，但是，他却詭稱，經濟危機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停滯現象，通過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直接干預，通過增加國家的財政開支，特別是軍事開支等措施，就可以消滅經濟危機。然而，事實證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危機是根本不可能消滅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今天，在凱恩斯主義廣泛流行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首腦美國，就已經連續不斷地爆發了幾次經濟危機。馬克思所創立的再生产理論，是一座科學堡壘，反動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想推翻這座科學堡壘是徒勞無益的。

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所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但是，從物質資料的再生产的角度看來，它同時反映了社會生產的共同性。因此，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的許多基本原理，不僅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而且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論述第一部類的產品在本部類的交換時指出，第一部類的產品的交換，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會像在資本主義社會那樣不斷地進行。馬克思說：“如果生產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那很明白，第Ⅰ部類這個生產物，將會同樣不斷地為再生产的目的，而再當作生產資料，被分配在該部類各生產部門之間；那就是，一部分直接留在它當作生產物所從出的生產部門，別一個部分就向別的生产部門移入，從而在第Ⅰ部類各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發生一



种不断的来回。”^①一八七五年，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一书中，在探討社会主义經濟时，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为再生产而进行的各种扣除的分析，就是从再生产理論的基本原理出发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的第三編第四节，批判杜林的社会制度（即“經濟公社”）时，就是根据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的基本原理，指出在杜林的所謂“經濟公社”里，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是完全錯誤的，而认为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定适用的。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經濟〉一书的評論》中，曾經指出，馬克思的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間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适用的。列宁說：“甚至在純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IV+m$ 和 IIc 的关系嗎？还有积累呢？”^②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一书中，对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的普遍意义，作了总括性的說明。斯大林說：“……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資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許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的这些基本原理，比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資料的生产与消費資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資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間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資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

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計劃国民經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③

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同資本主义的再生产一样，都是物质資料的再生产，但是，它們之間却有着根本的區別。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資本家追求高額利潤，社会生产处于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中，再生产过程經常被生产过剩的經濟危机所中断。社会主义經濟是建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計劃經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是有計劃按比例地发展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国民經济的計劃化和綜合平衡工作，有可能自觉地运用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論，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高速度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就是以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論为指导的。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是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实践中的創造性发展，它从理論上闡明了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許多基本原理，丰富了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认真地学习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的基本原理，就可以更好地貫徹执行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順利地向前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① 《資本論》第2卷，第526頁。

② 《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經濟〉一书的評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頁。

③ 《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頁。



論演員的矛盾

· 舒 強 ·

演員表演角色，但又不等于角色。演員的艺术創造有其特殊性。他既不像作家那样可以把他所要創造的人物形象写在稿紙上，也不像画家那样把他所要創造的人物画在画布上。演員要在舞台上当着成千的观众，在自己的身上創造出各种各样的角色来。由于这种特殊性，就给演員的工作带来許多不同于其他艺术創造的特殊的矛盾。

體驗与体现的矛盾

在生活中，人們的心理和形体是有机統一的整体，是密切联系着的內部与外部的两个方面。形体活动是心理活动的表现，心理活动則是形体活动的根据。当客观事物給人們的感官以作用时，就会引起人們的主观意識（思想和情感等）的活动——内心活动，同时也就影响他們的形体随之而产生相应的活动——形体活动。客观的事物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的，由于時間、地点和条件的不同，人們的心理活动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形体活动也随着心理活动而相应地变化，产生不同的动作、姿态、表情、声調、語气以及不同的速度和节奏等。

从理論上說，演員在舞台上表演角色，就要改变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邏輯，从心理到形体都要按照角色的生活邏輯，像角色那

样去活动，作到心理和形体活动都能符合于角色。可是，实际上，演員与角色之間，演員对角色的內部體驗与外部体现之間，常常存在着各种矛盾。演員常常搞不清楚角色应如何思想，对舞台上不断变化着的事件和人物行动应是何种态度、何种情緒，因而也就不知道在舞台上該作什么和怎样活动。有时，演員也了解角色的思想情感，但是，不知道角色該怎样說話和动作。有时是身体不听指揮，心里體驗到的东西形体上表現不出。有时演員也能从生活中摹仿些类似角色的形体动作和外形特征，但是对角色的精神生活則不了解，或了解得很肤淺、很一般，因而表演起来也就不能正确、深刻、动人。

演員对角色的生活沒有全面的了解，对角色的思想、情感沒有深刻的體驗，就不可能正确地創造出真实而动人的形象来。我国戏曲演員所表演的許多程式动作是十分优美的，那是許許多多前輩表演艺术家們不断創造的心血結晶。但是，假如演員对角色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沒有深刻的體驗，即使那些程式动作单独看来是美妙的，却不可能动人。戏曲的程式动作和傳統剧目的演出范本，只有为演員所創造性地掌握、將它們与剧中人的生活 and 內心的體驗相結合地运用时，才能具有生命和光彩。



演員对角色生活的體驗是十分重要的。可是，不应把內心的體驗強調到不恰当的程度，似乎只要內心里有了體驗，角色的形体动作便一定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实际上常常不是这样。演員在自己的生活中，只要內心有所活动，便自然会反映到形体动作上来。然而在舞台上他是表演角色，不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所以，即使对于角色的生活在內心里有了體驗，却并不一定能自然地流露出恰当的形体动作来。相反，常常演員的心里想得很多，甚至情感也很激动，却沒能在形体上体现出来，观众什么也沒看見，自然也就无法感动。

和对角色的內心體驗一样，演員应重視角色的形体动作的揣摩与創造。在舞台上，演員对角色的內心體驗，是通过外部体现才能使观众看得見和感觉到的。沒有外部体现——形体和語言动作，实际上便等于沒有內部體驗，也就等于沒有表演。演員表演就必須在舞台上动作。动作，是极其重要的。所謂體驗角色，即生活于角色生活的規定情境之中去，按角色的生活邏輯去思想和行动。演員的體驗和作家的體驗不一样。作家通过写作表现出他的體驗，而演員的體驗則必須能推动演員在舞台上动作。所以，演員表演，必須在动作中去體驗，在體驗中去从事形体和語言的动作。

角色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情感的活动，很难抓得住。在表演中产生活生生的情感活动是有困难的。即使能产生出角色所需要的情感，要固定它，要它在每次表演时都能即時地再現，尤其困难。可是，形体动作的調度和語言动作的語調、話勢和速度节奏等是

可以捉摸得到、看得見和听得出，可以相对地固定下来，服从我們意志指揮的。因此，演員必須掌握这样一种技巧，即善于把情感变成动作，用动作来表现情感，用动作来把內心體驗相对地固定下来。这样，假如演員在每次表演中，都能正确地把那些已經固定下来的形体动作和語言动作做得和說得准确、合理、可信，并具有真实感时，就可以借着那些动作所鋪成的軌道，重新进入角色的內心世界中去，重新恢复起他曾經體驗到的角色的情感。因为形体和心理是有机地密切联系着的，內心活动固然会激起形体动作，而形体动作也可以反射地引起內心的活动来。

演員表演的外部体现虽是如此重要，但也不应把形体动作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以为只要把形体动作揣摩好，就能創造出角色的形象，表现出角色的情感来。如果在排演中不深刻了解角色的生活，不體驗角色的精神活动，单纯从外形动作上去塑造角色、表演角色，是不可能正确地体现出角色的生活的。任何美妙的形体动作，假如沒有角色的生活和內心的根据，都沒有意义。內部體驗是外部体现的基础，沒有深刻的體驗，便不可能有动人的体现。沒有靈魂的形体，只能是沒有生命的傀儡，不可能是活生生的人。所以，一切外部体现必須从內部體驗出发，一切形体动作必須从角色的生活內容出发，从角色的內心、精神生活出发。单纯地从形体动作出发去創造角色，是錯誤的。在舞台上，演員的內心活动和形体动作應該是有機統一的整体。只重視心理活动而忽視形体动作固然是片面的，只重視形体动作而忽視心理活动也是片面的。



任何动作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和一般化的。例如等待。等待什么人，为什么等待，什么人在等待，在什么时间、地点、条件下等待，总是具体的。人物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同是等待，动作便不一样。这就要求对角色的生活做具体分析和具体了解，要有具体的体验。如果要求演员对每个角色的创造都有独特的外部体现，就必须首先对每个角色都有深刻的和具体的内心体验。愈要求创造出美妙、鲜明而动人的形体动作来，就愈需要深刻、细致而准确地体验角色的心灵生活。内心体验的深化和提高，是外部体现达到精致与动人的前提和根据，而内部的体验愈是细致、丰富和深入，就愈要求外部体现的准确、多采和鲜明。

理智和情感的矛盾

是任凭情感支配自己去表演，还是理智地把在排演中所设计好的动作表情准确地再现出来？这是演员工作中长期争论的问题。

表演当然应该有真挚而饱满的情感。在舞台上表演，要想每次都能流露出充沛的、为角色所需要的情感来，需要经过整个的排演、演出以至于长期的演技的基本训练和自我修养，需要从事一系列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和学习。可是演员却不能光凭着情感去工作。在排演中，演员首先要以理智作为指导，分析剧本，研究和了解角色的生活、规定情境、思想、情感和行为的逻辑，了解剧本和角色的贯串行动和最高任务。为了能充分和正确地了解这一切，演员还要常常去观察和体验类似角色的生活，收集和学习有关的文字材料。同时，演员为了在表演中把动作

做得真实，还要回忆类似的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具体安排和对方演员如何交流和适应；还必须以理智作为指导，去展开想像，以形象的思维对角色的规定情境和行动进行分析、推理和判断，并按角色的生活逻辑和顺序，合理地、真实而有效地完成角色在規定情境中的心理和形体的任务和动作，这样，才有可能产生出角色所应有的“自我感觉”，流露出应有的真实感和情感来。

演员的表演，假如没有理智的指导，结果将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以理智作指导来工作，不等于演员在工作中仅仅以概念的逻辑的思维去工作。演员表演如果缺少艺术的想像、形象的思维，不能在内心感觉到角色的规定情境的各种形象，就不能产生角色在各种规定情境中所应有的自我感觉，也就不能产生类似角色的情感来。为了更好地理解角色，演员在研究角色时，对角色进行阶级分析，为角色写生活小传，甚至写角色的家谱，这是有益的。这种分析工作，只有同对于角色在剧中的具体生活和行动的具体分析和了解结合起来，才能有助于表演。但是，演员即使做到了这一切，甚至连角色的潜台词都写出来了，而在表演的时候，却不是生活于角色的规定情境中，按角色的生活逻辑去有机地思想和行动，对舞台上正在进行着的事件和人物的行动漠不关心，却只是在舞台上理智地背诵潜台词，将所设计好的动作表情做出来，自然就不可能产生有机的交流和适应，表演就不真实。

单纯根据理性的分析进行表演所产生的这种缺点，使一些导演和演员产生了另外一种片面的看法。他们认为，充分地分析、研



究剧本和角色会妨碍表演，重要的是在舞台上能动作起来，因为动作可以影响情感。于是，在排演中便不去深刻地分析剧本和角色，就一味动作，以为这样就会引导演员进入角色的内心，产生角色的情感。这是不对的。

演员创造角色以及导演排戏的方式、方法和具体的步骤，完全可以各不相同，但工作的最终都必须做到使得演员不仅能从理智上正确地理解角色，还能在动作中、从情感上正确地感觉到角色。片面地从形体动作或情感上去把握角色，固然不可能正确和深刻地体验到角色，而片面地停止于纯理智和概念地分析和表演角色，也绝不能具体和生动地体验到角色。

在表演中，假如理智的工作离开了感性的生活基础和形象的思维活动，不仅将失去产生有机的动作和诱发生动的情感力量，还会妨碍情感的正常活动。但是，假如情感的活动一旦脱离了理智的指导，则将流于盲目的冲动，破坏表演艺术。演员表演如果任凭情感自由冲动，当角色伤心时，果真哭得死去活来，泣不成声，连台词也说不清、说不出时，戏也就没法看，甚至演不下去了。演戏毕竟不是生活，而是艺术。演员表演，能够情感充沛，是可贵的，但演员表演毕竟不是为了自己感动，而是要通过表演感动观众。演员要使观众听清楚台词，听懂台词深刻的含意，看清演员的动作及其所表现的思想 and 情感；同时，还要舞台形象美，使观众得到美的欣赏。假如过分理智而失去情感，枯燥无味的表演观众是不爱看的。但是演员又必须以理智来巧妙而恰当地控制情感，不能任凭情感自由泛滥。这种舞台上的控制不

是消极地为控制情感而控制情感，而是积极地以理智的工作引导情感完成一个接一个的角色心理和形体的任务和动作。只有使理智和情感有机地结合，才能使表演既具有真实感又动人心弦、引人入胜。

对于那些优秀的艺术家的表演来说，在他们的表演中，理智和情感总是结合得很好的。尽管从理论上可以将他们的表演分成一种是理智的，另一种是情感的，而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偏于理智或偏于情感的表演，可是，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任何一种“纯”的表演是不存在的。因为，理智和情感二者是有机联系、互相影响的心理状态，不可能在表演中形体动作十分真实、动人，而表演者的内心里却毫无情感的活动；也不可能内心里情感既非常充沛，形体动作又十分优美精致，层次分明，而表演者却完全失去了理智。所以，如果表演既是富于真实感和优美感的，那其中就必然既具有情感的成分，又具有理智的成分。就不可能是纯情感的或纯理智的。纯情感的表演可能真实，但不一定优美；而纯理智的表演在形式上可能优美，但不可能动人。

理智和情感在表演中都是不可忽视的。情感在表演中的作用虽然极其重要，它的出现非常可贵，但二者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情感，而是理智。演员应该通过理智来控制情感。

演员表演，应当以理智作为指导，有意识地努力生活于角色的规定情境之中，按照角色的生活逻辑去行动、思想，合理、贯串、真实而有效地去完成角色的心理的和形体的任务和动作，才能产生情感的活动，才能为



演員的理智和情感的活動相結合創造條件，并使這矛盾的兩方面通過一定時期的排演和演出過程，逐步達到和諧一致。

意識和下意識的矛盾

演員表演中的另一個矛盾，拿我們演員的話來說，就是意識和下意識的矛盾。

在生活中，人們的內心與形體的活動往往進行得很自然而有機。一些具體的心理和形體動作不是事先想好、練習好的，而是隨着主觀和客觀的變化，自然而然地、下意識地進行着。可是表演不一樣，在舞台上想什麼、做什麼，和怎樣做，以至於應該產生什麼樣的情感等等，都是事先經過反復地揣摩、研究和排練的。因而演員在舞台上表演角色，其內心和形體的動作往往是有意識地在表演着。但是，表演又要求演員把假的演成真的，把早已知道了的演成似乎是事先毫無所知的；要求舞台表演也如生活一樣，充滿着下意識的、有機的活動。於是，演員們便給自己提出一個奮鬥的目標：要努力在表演時作到“忘我”，或者說要“消滅第一自我”，把演員完全變成角色，做到在舞台上只有角色（“第二自我”），沒有演員自己，要求在舞台上的動作都是下意識的活動。

但是，在表演時，演員是不是要把自己完全忘掉呢？演員能不能把自己完全忘掉、變成角色呢？不可能，也不應該。演員在舞台上表演，可能在或多或少或長或短的瞬間里進入所謂“忘我”的、下意識的境界中去。但是，演過戲的人都知道，演員在表演中常常更多地不是“忘我”。假若演員真的把“我”給忘了，在舞台上一旦失去了自我感覺，失

去了演員的有意識活動，戲也就演不下去了。作為戲曲演員，如果忽然忘了聽胡琴的過門，戲如何唱得下去？而武打時如果忘了“我”，真的如劇中角色的情感所要求的那樣，一刀向對方的頭上砍去，戲又如何演得下去？所以，演員在舞台上表演，既必須如角色那樣去思想和行動，又必須不能失去他自己——他的意識活動。或者說，他不能忘記他是在演戲，不能不意識到那是藝術創造。所以，演員表演不僅難以作到完全“忘我”，也不應該完全“忘我”。完全忘了“我”就沒有了角色，也就沒有了表演的藝術創造。演員在舞台上所創造的形象，乃是演員與角色的矛盾的統一體。

在演員表演中，如果出現了符合角色生活內容的，感覺、思想、情感和形體動作等方面的下意識活動，是很可貴的。經歷了長期的排演與演出過程，演員在表演時，可能出現某些新的感受和動作，即所謂“角色的下意識活動”或“創作靈感”的東西。這種即興的表演，不但不破壞而且深化角色的形象和舞台上整體的藝術創造，使舞台氣氛更加生動、更富於真實感。這種可貴的瞬間的出現，看來偶然，其實是演員長期的意識的努力，創造性勞動的結果。只有從事分析和研究角色生活的規定情境，確定角色的心理和形體的任務和動作，展開想像，有意識地按角色的邏輯將動作做得合理、貫串、真實，才有可能在演員身上產生出類似角色的下意識活動來。為了要“忘我”——變成角色，就一定不能把“我”忘了。為了要產生下意識的活動，就必須多多地努力於有意識的活動。表演如果沒有下意識的活動，動作便缺少有機性，



就不生动。然而舞台上表演不是生活，不可能也不应该都是下意识的活动。舞台上失去了意识的活动也就停止了艺术创造。当然，假如演员的表演违反角色的生活逻辑，在舞台上不是生活于角色之中，而是演员自己有意意识地表演角色的情感或者表演角色的形象，像这样的意识活动，不仅不能诱导起下意识的活动，相反还会妨碍和损害下意识的活动。因为，这样的表演，那动作往往不是有机的而是刻板的，不是具有真实感的，而是虚假和造作的。在表演中，有意识的活动和下意识的活动都是重要的，但是二者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下意识的活动，而是有意识的活动。

整个表演艺术的创造过程，是演员有意意识地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内容和逻辑一点一点地减少、改变，使角色的成分一点一点地增多，逐步做到按照角色的逻辑真实而有机地去行动，最后达到化身为角色的境界。甚至可以一面生活于角色之中，感到角色生活的真实，同时又能感到艺术创造的成功喜悦，可以批判和欣赏自己的表演。所以，整个表演的过程，乃是演员的“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矛盾统一的过程，也是演员的意识与下意识活动的矛盾统一的过程。

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矛盾

演员表演，必须符合于生活的真实，然而又不能是现实生活的自然形态的再现。演员表演的任务是要在舞台上创造出内心与形体有机一致的人物形象，通过舞台形象的创造，正确地反映生活，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从而提高观众对生活的认识，鼓舞观众

去积极地改造现实。

演员要通过表演来完成揭示生活的任务。可是，演员不能直接地向观众讲解道理。演员的任务是创造出真实而生动的舞台形象来，发挥形象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效果。演员必须生活于角色，按角色的逻辑去生活。只是，角色应该如何生活、对人对事、思想和行动，在舞台上表演什么、不表演什么，如何表演等等，都是根据剧本和演出的最高的思想任务所设计和决定的。而这些又都是为了引导观众正确认识角色和剧中所反映的现实。演员的倾向性，党性，是通过对角色的解释而得到体现的，是通过舞台形象的创造而体现的。

演员在舞台上所表演的一切都有着向观众宣传的任务。然而演员不能直接强迫观众接受他的宣传，他必须创造出真实可信的舞台艺术形象来让观众信服、感动以至于得到艺术上的美的享受。观众到剧场去看戏，要看的是角色的生活、行动、思想和情感。观众是先受感动，再进而深思，从而自己对剧中的生活，角色的行为作出估价和结论来的。演出一出富有思想性的戏，演员表演角色愈真实动人，愈富于艺术的魅力，则说服观众的力量愈强，收到的政治效果愈大。相反，表演愈概念化、公式化，就不真实可信，枯燥无味，没有说服力，因而收到的政治效果也就愈差。演员在舞台上的一切表演，都是为了要给观众看的，事先必须考虑到在观众中将引起什么效果和反应。在舞台上演员必须忘记观众；可是，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时又必然会经常受到观众的反应——笑声、感叹声和议论声的影响，给演员的表演以赞赏、



鼓励或批評。这种演員与观众間的矛盾，統一在演員努力生活于角色的表演过程之中，演員愈要使观众信服、感动，就愈要努力生活于角色之中，愈要努力使得表演真实。相反，演員愈是离开了角色，以虛假的或过火的表演去强迫观众受感动，观众就愈感到不真实，就愈加不感动。

演員在舞台上表演，應該作到一切都使观众感到真实。演員必須在想像中把一切假的当成真的去对待，才能使自己 and 观众感到真实。然而，舞台上的一切都是演戏，不是真实的生活。舞台上的真实，是艺术創造的真实感。所以，舞台表演也是真与假的矛盾的統一，舞台艺术創造既要符合于生活的客观規律，又要按照艺术創造的規律去进行。

演員在舞台上的动作，不應該是日常生活自然形态的再現，而是从生活出发，經過艺术創造加工了的舞台艺术动作。舞台上的每一个具体的动作，都應該是表現剧本和演出的最高思想任务的有机組成部分。演員的舞台动作不仅要真实地表现出角色的性格、心理，而且要适应劇場的条件，使上千的观众都能看到和感觉到角色細致的精神活动。这就要求舞台上的动作在內容上應該比生活更丰富、更深刻、更集中、更典型；在形式上既富于生活的真实感，又提高形体动作和語言动作的表現力，使之更加富于造型性、节奏感，更鮮明，更美。在这方面，話剧演員必須向民族的傳統戏曲表演艺术学习，学习那种既能精致地表現生活的具体細节的真实，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的表現技巧。

演員在舞台上对角色生活的體驗和对实际生活的體驗，也是有所区别的。演員对角

色生活的體驗，不仅要體驗角色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情感，而且應該高于它。这是一种富于創造性的艺术的體驗，是导向剧本和角色的貫串行动和演出的最高思想任务的體驗。演員在舞台上表演，不仅要表现出角色如何生活着，还要揭示出他为什么会如此生活。他所體驗着的情感，就應該比剧中人的情感更提高和更深化，更富于概括性和表現力。从而使观众在看戏后也能对角色所体现的思想感情作出这样的評价。

演員在舞台上所創造的真实，不仅要表現生活中个别現象的具体的細节的真实，还必须揭示生活本质的典型的真实。不仅應該表现出当前的生活真实，还應該表现出人物必然的发展方向。

演員表演的舞台真实，应是高度的生活真实与高度的艺术真实的矛盾的統一体。

演員創作中的根本矛盾

在演員表演中存在着許多矛盾，归根結底，最根本的矛盾則是演員与角色之間的矛盾。

沒有演員就沒有角色；但是，如果舞台上出現的人物，其內心和形体活动都是演員自己的，也就沒有了角色。

角色的思想情感不能是演員的思想情感，演員應該按照角色的思想和情感去行动。但是，角色的思想情感又为演員的思想情感所支配。事实上，不管演員自己意識到沒有，他总是以他自己直接或間接的生活經驗、知識和情緒記憶等等，作为原料来塑造角色的舞台形象的。而角色应是何种思想和情感，又是通过演員的認識所决定。演員的世



界观必然在角色的表演中得到反映。

演員生活于角色，实质上乃是演員生活于他自己的直接的和間接的生活經驗之中，生活于他根据对生活的認識所想像、創造出的剧中生活的假定情境之中。假如演員对剧本所反映的現实在認識上有偏差和錯誤，他所創造的舞台形象就不可能正确和真实。假如演員沒有类似角色的生活經驗，或对角色缺乏理解和想像基础，認識不了角色，感觉不到角色，便难以正确地創造出角色的形象来。在舞台上，角色的一切情感都来自演員，是演員所直接体验到或間接观察到、了解到的类似角色的情感。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表演要“从自我出发”。所謂“从自我出发”，乃是从演員的生活經驗出发。但是，“从自我出发”只是表演工作的开始，而最終目的則必須做到“生活于角色之中去”。所謂“生活于角色之中去”，便是演員按照角色的要求把自我加以改变。这就要求演員首先能正确、深刻和全面地了解角色，體驗角色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这里就存在着演員的立場、观点和思想情感的改造問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演員要表演工农群众的英雄人物，就不能以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感去揣度、體驗他們的精神生活。那样表演起来，也許化装和服装还像工农，而人物的心灵却仍旧是小資產階級。所以，“从自我出发”，生活于工农群众之中去的問題，就不仅仅是要全面地了解角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在演員自我之中培养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的問題，是演員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情感的改造問題。這個問題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不可能正确地認識和體驗角色。

因此，演員要解决与角色的根本矛盾，必須加强生活实践，不断地深入生活，学习、研究、了解、观察和體驗生活，熟悉生活中的各种人物。要努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不断进行自我改造，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培养正确認識生活的能力。

但是，世界观問題解决了，也不等于全部解决了演員与角色的矛盾。作为表演艺术家的演員，还須要解决与其他艺术創造不同的、由于“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統一于演員一身而引起的許多矛盾；演員在表演中既是作者同时又是作品，既是操纵創造工具的人同时又是被操纵的工具；演員一面在进行着艺术創造，同时又必須变成另外一个人，过着角色的生活，等等。演員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特殊的、表演方法和技术上的矛盾，就不可能在其自身之中創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就不可能通过舞台形象的創造来正确反映和揭示生活。为此，演員不仅必須努力学习科学的表演方法，还必須刻苦钻研，勤懇鍛炼，熟练地掌握表演心理和形体的技术，努力学习民族的表演艺术傳統和外国的表演經驗，从中吸取丰富的、有益的經驗，作为提高表演艺术技巧，解决演員的矛盾的重要借鉴，努力加强舞台艺术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經驗，避免理論与实践相脫节。

演剧是集体的艺术創造工作。表演工作中还存在着演員个人与創造集体之間的矛盾。演員的表演艺术應該有獨創性，但又必須与集体的創造相协调。演員的獨創性与集体的創造之間的矛盾，应統一于全剧的貫串行动、演出的最高思想任务及全剧的演出風格之中。演員不仅應該从多方面提高文化艺



术修养，还应该积极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和集体主义的精神，善于正确解决个人与创造集体之间的矛盾。

• • •

演員表演的整个过程都充滿着矛盾。有人缺少生活，有人缺少正确認識生活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有人既有生活又有正确認識，可是缺少科学的表演方法和技术，有人各方面都不錯，可是台詞念不清，有人形体缺少訓練，肌肉容易緊張，有人表演太理智，有人表演太刻板……。不同的演員，有不同的矛盾。而在表演的每一个动作中，都存在着体验和体现、理智和情感、意識和下意識等矛盾。表演在进行着，各种不同的矛盾便不断地发生发展着，演員就要在导演和创造集体的帮助下及时发现矛盾，正确解决这些矛盾。

演員要善于在不同的工作阶段，区别什么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当演員对角色的生活缺少認識时，就要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和理解角色的生活，不能单靠练习說台詞去解决。当演員对角色的規定情境、思想、情感和动作的任务等都能深刻地了解，可就是台詞說不清，就要努力练习发音和吐詞。同一个角色，由于時間、地点、条件的变化，創造的情况有了变化，也就要产生不同的矛盾。在排演过程中是一种情况，一旦上了舞台，面临着观众則又是一回事。即使同一角色表演多次，常常同一个动作，前次有真实感，而下次表演时又感到很别扭。或者由于多次演出获得成功，演員产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在表演中不再体验角色的生活，而是炫耀那些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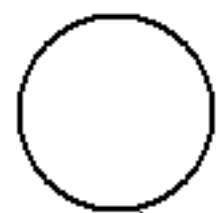
的动作形式，于是所有已經解决了的矛盾又会重新出現。而演这个戏的某一角色成功了，与角色的矛盾解决了，演另一剧中的一个新的角色，則可能由于某种矛盾沒能很好解决（例如对角色的認識有問題），就会遭到失敗。演員要表演各种剧中的各种不同的角色，也就必然的要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即使以演同一个角色而言，演員对角色的認識、了解和体验，也是逐步接近和深化的过程。演員的生活实践不断深入，生活經驗和知識不断丰富，演員对角色的認識和体验也将不断深化，而新的認識又給表演带来新的矛盾，就要求演員更进一步地提高表演技巧。演員的表演技巧愈提高，舞台艺术实践愈丰富，創造能力愈增强，将为演員与角色的矛盾的解决創造更有力的条件，也将給演員的創造提出更多新的課題（矛盾），要求角色的創造更深刻、更美好。所以，演員的整个表演过程，就是不断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也是演員的生活、思想和舞台艺术創造的技巧逐步提高的过程。

时代不停前进着，客观现实不断发展着，人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时刻变化着，偉大的奔騰澎湃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不断成长着，要求我們予以生动真实的反映，創造出震撼千百万人的心灵的艺术形象来教育鼓舞人民。这里也就产生了丰富偉大的生活斗争和比較貧弱的表現力之間的矛盾。但只要我們在毛澤东同志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努力，这些矛盾是会得到克服的。我們应当不懈地加强各方面的修养，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搞好艺术工作，永远追随着也推动着偉大的时代和生活前进！



红旗

16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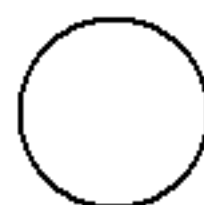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六期 ★

目 录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 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 斗争的声明	毛泽东 (1)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	(3)
——评苏联政府八月三日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考察战争问题不能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阶级斗争观点	卢之超 (15)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的加深 ...	庄 濤 (27)



☆ 八月十五日出版 ☆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 的斗争的声明

毛 泽 东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比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〇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議当地餐館、商店和其他公共場所实行种族隔离。

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車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爭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規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領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瀾壯闊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繼續高漲。美国黑人团体已經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統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險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繼續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付主張“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謂“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騙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經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識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謂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國內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間的內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說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問題。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統治集团。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絕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絕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們的各国反动派。他們是少数，我們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們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終。



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

——评苏联政府八月三日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八月三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攻击中国政府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为苏联同美国和英国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辩护。苏联政府当然有权利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很遗憾，我们在认真地研究了苏联政府的声明以后，不能不指出，这篇声明东拉西扯，文不对题，没有讲出什么道理，辩护得不大像个样子。

—

苏联声明的根本弱点是，它不敢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条约的签订，是苏联政府放弃自己的正确立场、接受美国“两届政府坚持不渝”的立场、对帝国主义作了无原则让步的结果。中国政府声明严正地指出，苏联领导人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背叛了自己，出卖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苏联声明对于背叛和出卖这几个字非常生气，硬说苏联的立场前后没有矛盾，因为“生活不是停滞不动的。科学和技术在蓬勃发展。昨天还不能接受的东西，今天可能就变得有利，甚至是非常有利。”它并且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们，在条约对谁有利的問題上，究竟是誰有资格作出判断呢——“是拥有核武器和进行核武器试验的人呢，还是其他一些只从文献上知道这种武器的人”？看起来，苏联领导人不仅要垄断核武器，而且要垄断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发言权。

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发言权，是垄断不了的。但是，既然苏联领导人认为自己是具有资格说话的，那么，让我们听一听他们过去是怎样说的吧。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美国第一次提出把地下核试验排除在外的停止核试验的建议。四月二十三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他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这是一个“不诚实的交易”。

一九六一年九月三日，美英发表联合声明，提出签订单独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协议。九



月九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此发表声明说：“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声明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他们力图损害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的利益，来为西方国家及其军事侵略集团的盟国保证单方面的军事优势”，“这是一个骗人的勾当。当然，苏联政府不能、也不会同意这种勾当。”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备忘录说：“把这种武器在地下和在宇宙中的试验性爆炸问题从所建议的协议中分出来，这再次表现了一种倾向：给美国和英国保持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束缚苏联的手脚，不使它采取提高自己国防能力的措施”，“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就等于是推动侵略者实现他们危及全人类的阴谋。”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美英提出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草案。八月二十九日，苏联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这个草案包含一个严重的危险。他说：“美国长期利用地下核试验来完善自己的核武器。……如果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而同时禁止大气层的试验，那就意味着美国仍能改善自己的核武器，增加其能力和效率，而把苏联的双手捆住，不使它加强自己的国防。”

苏联政府一直坚持拒绝部分停止核试验的立场，直到一九六三年六月九日，苏联政府还通知中国政府说，西方国家在停止核试验问题上的立场，目前不能为达成协议提供基础；谈判能否取得成就，完全取决于西方。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美国总统六月十日演说答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辑问时说：“至于苏联，那我们愿意今天就签订关于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协议。问题在西方。我们同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会晤，以便再一次试图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但这次会谈成功与否将取决于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带着什么样的行李到我国来。”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联领导人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上述立场，接受了美英条约草案的翻版，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

苏联领导人说情况变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变的？怎样变的？为什么在六月十五日还是不可以接受的东西，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就变得可以接受，而且变得非常有利呢？在这四十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你们为什么不讲一点道理呢？如果你们昨天讲的话，今天可以不算数，那么，你们今天讲的话，是不是到了明天也可以不算数呢？要么你们过去是言不由衷，要么你们现在是蓄意骗人。苏联领导人背叛苏联人民、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背叛全世界人民的行为，是怎样也抵赖不了的。

二

情况没有变。美帝国主义的方针没有变。变了的，是苏联领导人。



簽訂一个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条約，是美国几年来一貫追求的目的。

美国总统肯尼迪八月八日向美国参議院提出的咨文說：“这个条約是从艾森豪威尔 总统一九五九年提出的建議和参議院同年通过的決議产生的”，“那时以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足以改变它对我們安全的重要性”。

苏联声明說，三国条約的簽訂，是使人类摆脱核战争威胁的第一步。

我們看，不像。恰恰相反，我們认为，三国条約的簽訂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險。

关于核武器問題，你們不是只看得起有核武器的人說的話嗎？那么，讓我們听一听有核武器的人是怎样說的吧。

肯尼迪从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八日翻來复去地、毫不隱諱地說，三国条約：

不禁止美国进行地下核試驗，

不制止美国生产核武器，

不减少美国儲存核武器，

不妨碍美国向它的盟国扩散核武器，

不禁止美国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不禁止核军备竞赛，

不消除核战争的威胁，

不能确保世界和平。

腊斯克在这个条約正式签字的仪式上，还毫不留情地說，“我們不可能在现在担保这项条約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条約主要是苏联同美国簽訂的，如果肯尼迪和腊斯克說的对，苏联领导人为什么不予以駁斥呢？硬說这个条約是什么防止核战争的第一步，这是蓄意愚弄世界人民。

不仅如此，这个条約还大大有利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力量，大大不利于世界和平力量。

肯尼迪說，这个条約对美国的第一个好处是，“美国在地下試驗方面的經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而这个条約使得地下核試驗合法化；第二个好处是，“其他国家通过在大气层进行試驗能够比在地下进行試驗更便宜、更迅速地发展各种（核）武器”，而这个条約恰恰禁止了大气层核試驗。

这个条約，絕不像苏联领导人所說的，是一个防止战争、加强和平的条約，而是一个美帝国主义利用世界人民的和平願望推行战争阴谋的条約。这个条約的簽訂，絕不是美帝国主义明智起来的結果，而是苏联领导人公开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結果。



三

美帝国主义为什么希望得到这样一个条约呢？

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帝国主义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以来，它一直企图利用美国独家垄断的核武器，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奴役各国人民，称霸全世界。但是，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止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等等，取得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苏联掌握核武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把美帝国主义放在如果要毁灭别人自己也要遭到毁灭的地位。与此同时，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展开了日益强大的要求禁止核武器、反对核战争的斗争。所有这一切，使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日益失灵。

面对着这种不利的形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保持“大规模报复”手段的同时，着重采取所谓“灵活反应战略”，即一方面准备核战争，一方面准备常规战争；一方面继续发展战略核武器，作为进行核讹诈、核威胁的手段，一方面大力发展战术核武器，准备在必要时进行“有限核战争”。

为了推行这个反革命的战略，美国需要一个这样的停止核试验的条约：

把停止核试验同禁止核武器的总任务分割开来，用停止核试验来掩护美国的核备战；

把禁止地下核试验排除在外，便于美国改善战略核武器，发展战术核武器；

保证美国和它的盟国夺取和发展对苏联的核优势；

束缚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被侵略的国家，而不妨碍美国向它的盟国和受它控制的国家进行核扩散。

现在签订的三国条约，就是这样一个从头到尾适合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需要的条约。

四

三国条约把停止核试验同禁止核武器的总任务完全分割开来，这就造成一种和平的假象，麻痹世界人民，便利美帝国主义在条约的掩盖下继续制造、发展和扩散核武器，夺取核优势，准备核战争。

苏联声明完全忘记了苏联领导人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单独缔结停止核试验的条约是一种欺骗人民的勾当，反而大事吹嘘三国条约可以使人类摆脱由于放射性物质感染而产生的危险后果。他们企图利用各国人民要求避免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正当愿望，来骗取人们对三国条约的支持。

首先应当指出，大气层的污染，完全要由美国负责。美国第一个试验、制造和使用了原



子武器，瘋狂地扩充核軍备，进行了几百次核試驗，而且大多数試驗是在太平洋公海上进行的。在这个星球上进行的核試驗，大部分是美国进行的。根据对等的原則，美国早就應該停止試驗了。

目前，由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世界輿論的压力，由于已經取得了足够的技术資料，美国事实上已經停止了地下核試驗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核試驗。沒有三国条約，美国权衡利弊，倒还不敢輕于恢复这些形式的核試驗。有了三国条約，不仅沒有把这种状况固定下来，反而給了美国以随时恢复这些形式的核試驗的权利。三国条約临时签署后，肯尼迪馬上宣布，美国准备随时恢复大气层核試驗；他公开說，三国条約“并沒有保证世界永远不必担心由于大气层試驗而产生的放射性微粒和永远免于这种危險”。如果不是蓄意欺騙世界人民的話，怎么可以把这个条約說成是使人类摆脱放射性物质感染的护身符呢？

放射性物质固然是有害的，但是，核战争所造成的危害将要严重千百倍。苏联领导人赫魯曉夫过去曾經用下面这一段話，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有一个很恰当的諺語說，头已砍掉，哭头发干什么。帝国主义先生們一方面准备让人們在战火中死亡，同时却大談他們的健康。”現在，我們只要把这一段話原封不动地奉送給苏联领导人就够了，多余的語言是不必要的。

五

三国条約把禁止地下核試驗排除在外，这就使地下核試驗合法化，便利美国改善战略核武器、发展战术核武器、进行核讹詐、准备“有限核战争”。

根据美国自己公布的材料，美国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已經进行了七十多次地下核試驗，取得了丰富的經驗。美国建立了規模巨大、設備完善的地下試驗場。美国已經能够在地下进行数十万吨級的中等威力的核試驗。三国条約使美国可以自由地进行它认为必須进行的核試驗中的百分之八十左右。保留地下核試驗，对美国最为有利。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八月十三日說，美国决心保持它对苏联的核优势。如果各种核試驗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最終会使美国同苏联在技术上不相上下。由于美国在地下核試驗方面有經驗，保留地下核試驗而禁止其他形式的核試驗，可以延緩苏联的进展，保持美国的优势。三国条約正式签字还不过七天，美国就示威性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爆炸。

通过地下核試驗，美国可以繼續改善战略核武器。由于战略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越来越发展，生产和儲存越来越多，出現了核僵局，这种战略核武器已經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讹詐的工具。

美国目前梦寐以求的，是发展战术核武器。它准备在局部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付核大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特別是对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被压迫和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

如果让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得逞，让它在一个一个的局部战争中得手，改变了国际范围内的力量对比，那就肯定地会反过来增加全面核战争的危險。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警惕。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三国条约是一个便利美帝国主义继续进行核讹诈、核威胁和镇压各国人民革命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的条约。苏联领导人签订这个条约，是无视各国被压迫人民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切身利益，这才真正是“不负责任地玩弄千百万人的命运”。

六

三国条约根本不能阻止美国进行核扩散，它有利于加强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力量。

苏联声明装作不懂这一点，并且反过来质问我们：“这样说来，如果核武器在全世界散布，如果西德复仇主义者掌握这种武器的道路被打开，如果数以十计的国家竞相进行核爆炸，那么，这倒好像是符合和平的利益，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投降！”

好吧，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条约究竟怎样有利于防止核扩散，防止哪一种核扩散。

这个条约能够防止美帝国主义把它的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分子手里，扩散到美国的其他盟国和受它控制的国家手里吗？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美国政府不断强调这一点，苏联领导人心里也明白这一点。请看事实：

七月三十一日，哈里曼公开宣称，这个条约没有任何条文阻止美国向它的盟国提供核秘密，而且美国已经向法国作了这种试探。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一直在竭力推行的所谓“多边核力量”计划，就是一个向它的盟国，包括西德复仇主义者在内，进行核扩散的计划。三国条约的签订，丝毫也没有妨碍这个计划的推行。在三国条约临时签署之后，美国立即在华盛顿恢复了讨论关于建立“多边核力量”问题的会议。

在三国条约临时签署的当天，西国防部长哈塞尔就放心地说：三国条约并不全面禁止核试验，它既不影响建立一支“多边武装力量”，又不影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概念和西德整个武装力量。

八月十二日，腊斯克更进一步，露骨地宣称，这个条约并不妨碍美国以核武器武装它的盟国，因此，也不妨碍美国建议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的建立。

事实俱在，谁能够相信，有了一纸条约，美国就不会向它的盟国和受它控制的国家，特别是西德，扩散核武器和核秘密呢？苏联领导人企图利用欧洲人民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复活的



正当情緒，为自己的投降行为辯护，在铁的事实面前已經破产，并且終将彻底破产。

七

美帝国主义的所謂防止核扩散，完全不是为了束縛自己，而是为了束縛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企图通过巩固美英苏三国的核壟断地位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苏联领导人完全支持并且积极参加了这个阴谋。

苏联政府的声明說：“难道中国政府声明中所說的核壟断、即苏联掌握这种武器，在使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沒有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并有可能胜利地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方面，沒有起了自己的、可以說是决定性的作用嗎？”

我們不能同意这种說法。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自己的安全，首先依靠本国的国防力量，其次才是兄弟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苏联声明把社会主义各国都說成是依靠苏联的核武器活命，这是彻头彻尾的大国沙文主义論調，而且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政府对于苏联拥有核武器的重要意义，历来有充分的估計。但是，苏联拥有核武器，絕对不能成为阻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国防力量的理由。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指出：“在裁軍沒有实现之前，社会主义各国仍然必須使自己的国防力量保持应有的水平。”如果苏联政府真的遵循莫斯科声明，真的想要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保卫世界和平，那么，它就沒有任何理由竭力阻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

至于防止核扩散的問題，中国政府历来认为，絕不能附和美帝国主义的論調，要有阶级分析。核武器是否对和平有利，要看它掌握在誰的手里，掌握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是不利的，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里就是有利的。絕不能籠統地說，因为世界上多了一个核国家，核战争的危險就增加了一分。核武器起初是由美国一国壟断的，后来苏联也有了，核国家从一个变成两个，核战争的危險大了一些呢，还是小了一些呢？我們說，小了一些，而不是大了一些。

社会主义国家手里的核武器，永远是反对核讹詐、核战争的防御手段。在帝国主义拒絕禁止核武器的情况下，拥有核武器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多，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目前世界上正在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总是自己的力量大一些好，哪里有自己的力量小一些反而好的道理呢？

但是，苏联领导人在自己掌握了核武器以后，竟然附和美帝国主义的論調，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壟断核武器，这是完全背棄了莫斯科声明，完全背棄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苏联领导人对于美帝国主义向西德扩散核武器不闻不问，而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却极力阻挠。美帝国主义，在挖它的盟国墙脚的同时，还不能完全不照顾一点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苏联领导人，却一心一意想把自己的阶级兄弟整垮，连一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味道也没有。

以前，我们还以为苏联领导人真的害怕西德军国主义拥有核武器。现在，我们才明白，他们信任美帝国主义，他们认为，只要是在美国控制之下，西德军国主义即使拥有核武器，也是无所谓的。而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就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取消，他们也在所不惜。他们并不真正反对西德军国主义拥有核武器。他们更不关心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苏联领导人的真正目的，是想同美国妥协，求得苟安，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却垄断核武器，称王称霸。

八

苏联声明说，三国条约反对不得，谁要是反对三国条约，谁就是反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好大的帽子啊！

不错，由于苏联领导人认敌为友，同美帝国主义做成了一笔完全对美国有利的政治交易，苏联同美国的关系的确似乎显得和缓一些了。

但是，这种所谓和缓，是用什么代价取得的呢？这是用牺牲苏联人民利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代价取得的，这是用便利美帝国主义通过制造、发展和扩散核武器的途径来夺取核优势的代价取得的。

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以斗争得来的和缓，是真和缓；以投降换来的和缓，是假和缓。现在出现在美苏之间的所谓和缓，只是一时的表面现象，是假和缓。美帝国主义刚好可以利用这种所谓和缓，更加放肆地推行它的奴役世界人民的全球战略。战争的危险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这种作法，正像中国古语所说的，是图一时之苟安，贻百年之大患。

这种所谓和缓，能不能导致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呢？恰恰相反，以投降求和缓，只能使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要价越来越高，胃口越来越大，除非是进一步投降，只能使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困难。

很明显，这种和缓是同世界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九

社会主义国家不要核武器。核武器不能当饭吃。如果能够把核武器彻底销毁掉，再没有



人比我们更高兴的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站在争取禁止核武器的斗争的最前列。我们认为，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逐步实现禁止核武器的道路是有的。中国政府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的三条建议，提出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总目标，提出了逐步实现这个总目标的四项具体措施，提出了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合理倡议。中国的建议既是明确坚定的，又是切实可行的。

但是，苏联声明却攻击中国的态度是“要么全禁，要么不禁”，并且诬蔑我们丧失了现实感。

请问，全世界人民要求撤除外国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在内，是不现实的吗？

请问，许多国家要求建立无核武器区，是不现实的吗？

请问，禁止输出和输入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实现真正的禁止核扩散，是不现实的吗？

请问，停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是不现实的吗？

事实上，只有我们建议的这些具体措施，才是走向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例如，关于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像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和非洲无核武器区，只要核大国承担相应的义务，是马上可以建立起来的。这两个地区的各国人民，都热烈希望置身于核威胁之外，以便于很好地发展他们的国家。他们不会威胁核大国，核大国有什么理由不能承担义务，尊重他们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愿望呢？

苏联声明企图用“不现实”三字，把全世界千百万人民的殷切愿望轻轻地一笔勾销。很明显，在他们看来，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人民和国家是不值得一顾的，为世界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是不现实的。他们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们看来，只有同掌握核武器的帝国主义者坐地分赃，才是现实的。

苏联声明说，中国的建议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的确，我们现在提出的，是我们过去所一贯坚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建议的确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他们说，我们现在的建议，都是他们过去提出过的东西。他们这样讲，基本上也对。但是，有一个不同。他们现在不提了，有时提一下，也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欺骗人民。正是由于他们背叛了自己原来坚持过的正确立场，我们现在提出的建议就变成了新的东西。

苏联领导人把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放下了，我们有义务把它更高地举起来。

苏联声明说，我们不参加他们的骗局，就是同帝国主义“狂人”站在一起，同全世界人民对立。而他们，伙同帝国主义，欺骗世界人民，反而成了动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战士，成了世界人民的代表。

现在我们要问一问，谁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代表呢？

莫斯科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现



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誰都知道，代表这个帝国主义的，就是肯尼迪、腊斯克、哈里曼，等等。

請問，把这些帝国主义头子說成是“和平战士”，同他們称兄道弟、热烈拥抱的，是你們呢，还是我們呢？

十

三国条約的簽訂，再一次表明，苏联领导人但求保全自己，不顾旁人死活。他們口口声声說，只要他們能够存在和发展，世界人民就可以得救了。其实，他們是为了求得自己一时的苟安，而出卖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全世界被压迫和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为了爭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正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斗争。苏联领导人却同美帝国主义一条心，合伙行騙，要世界人民相信美帝国主义是“和平战士”，麻痹世界人民的斗争意志，破坏世界和平事业。但是，各国人民是不会同样地认敌为友的。严酷的切身经历会使他們逐步地認識到，只有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到底，才能使自己得救，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保障。

要知道，苏联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关系，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苏联的存在和发展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胜利也支持了苏联。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苏联已經不再需要旁人支持了。恰恰相反，唇亡齿寒。让美帝国主义放手去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兄弟国家，到头来，苏联自己也是保不住的。

目前时局的发展，值得引起各国人民的警惕。人們长期渴望禁止核武器，乍一听到部分停止核試驗，感到高兴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期待能够从此走到全面停止核試驗，走到全面禁止核武器。但是，三个核大国搞出来的一紙条約，毕竟是不能依靠的。为了逐步实现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目的，有必要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低限度也要参照中国政府的建議，首先迫使核大国承担义务，不使用核武器，不試驗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并且保证尊重无核武器区。只有取得了这些保证，才能够认为事态已經朝着和平前进了。我們相信，騙局終究是騙局，它是經不起时间考驗的。企图利用世界人民的和平願望进行投机，終究是要遭到失敗的。

十一

苏联领导人，勾結美帝国主义，企图捆绑中国的手脚，不自今日始。

远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当所謂停止核試驗条約还没有影子的时候，苏联政府就片面撕毀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簽訂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絕向中国提供



原子彈样品和生产原子彈的技术資料，作为苏联领导人九月到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会談的見面礼。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美英提出部分停止核試驗条約草案两天以前，苏联政府通知中国說，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建議簽訂一項協定，其中規定：第一，核大国將承担义务，不把核武器及其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轉交給无核国家；第二，沒有核武器的国家將承担义务，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对于腊斯克這項建議，苏联政府給了肯定的答复。

中国政府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三日，十月二十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备忘录，告訴苏联政府，他們向美国承担义务，不把核武器及其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轉交中国，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不要破坏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不生产核武器的义务。我們郑重表示，如果苏联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竟然同美国簽訂某种条約，来剝夺中国人民采取措施抵抗美帝国主义核威胁的权利，我們是不答应的。我們將发表声明，表明我們的立場。

我們原来希望，在我們作了这些誠懇的劝告以后，苏联领导人能够悬崖勒馬，不要把事情做絕。不幸的是，对于我們的劝告，他們連一个字也沒有听进去。他們終于同美国和英国簽訂了部分停止核試驗条約，企图借此施加压力，使中国承担义务。

事情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苏联政府起初想用不帮助中国的办法把中国压下去，来向美帝国主义討好，后来又企图用种种不能自圓其說的理由要中国放棄自己的严正立場。当这一切都失敗以后，它就明目張胆地伙同帝国主义强盜，一起来压中国。

鉴于以上种种，中国在发展自己的核力量来抵抗美国的核威胁方面，早就对苏联领导人沒有任何指望了。

十二

苏联声明說，早在一九四六年，苏联政府就提出了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建議，并且一直为禁止核武器而努力。因此，苏联政府在有关核武器的問題上是不可能錯誤的。但是，在我們看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現在背叛了过去的正确立場，所以他們的錯誤性质是更为严重的。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六年，苏联政府坚持全面禁止核武器，他們是正确的，我們坚决支持他們。一九五六年，苏联领导人在向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把停止核試驗和裁軍問題分开。在这以后，在有些問題上他們是錯誤的，在有些問題上他們是正确的，凡是正确的，我們也都是支持的。到了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們完全錯誤了，我們当然只能



坚决批评他们。

苏联声明指责中国不尊重苏维埃国家主权，诬蔑中国声明的作者神经发生了毛病，企图把苏联人民同苏联政府对立起来，并且煞有介事地问，中国政府“是否管得太多了”。我们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们，我们管得一点也不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根据他们自己过去提出的正确的标准，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指出他们现在背叛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是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如果说有谁的神经发生了毛病的话，那绝不是一贯坚持正确立场的中国人民，而是中途变节的苏联领导人。

如果苏联领导人认为，背叛苏联人民的利益，是属于苏维埃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他们尽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想用不得干涉内政为借口，来封住我们的嘴，那是办不到的。要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必须揭露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行为。不揭露这种背叛行为，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

苏联领导人还企图用三国条约的签订，来证明他们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所执行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正确的。拿耻辱来夸耀，这只能叫人笑掉了牙齿。三国条约的签订，能够证明什么呢？它只能证明，苏联领导人所执行的外交路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投降主义的路线。帝国主义当然是愿意同那些向他们投降的人共处的，但是，这绝不是和平共处，这是投降共处。

苏联领导人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我们希望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回到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世界人民团结的道路上来。

苏联政府在报纸上发表了中国政府七月三十一日的声明，这件事情做得不错，符合有来有往的原则。我们希望苏联领导人保持这种好的作法，继续发表我们这个声明。



考察战争问题不能背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

· 卢 之 超 ·

两种对立的观点

关于战争的性质，十九世纪初期德国资产阶级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曾经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中揭示了战争的本质。他在《战争论》一书中说，政治“是战争发展的母体”，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只能是某种政治活动引起的，“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包含在它们的胚胎中一样，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已隐形成。”因此，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工具。他还说明，当某种政治关系引起战争的时候，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那样，这种政治关系就告中断，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己特殊规律支配的形势，恰恰相反，“战争只是政治关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即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是“以剑代笔的政治”^①。

克劳塞维茨是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家，他对战争和政治的理解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他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理解战争和政治的问题。但是，他对战争史作了考察，得出从政治上阐明战争性质的结论，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列宁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

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讨每一战争的意义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②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③，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战争，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对抗一起出现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是战争的根源。各个不同阶级间的政治斗争，集中地反映了它们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斗争。在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尖锐化时，剥削阶级在采用一般的政治手段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们就用战争这种暴力手段来强制推行其剥削政策和侵略政策。列宁曾经说过：“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④很显然，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离开政治，不考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参看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②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84页。

③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第262页。

④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7页。



察战争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就无法正确理解任何战争现象。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断强调的，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战争现象所得出的正确的结论。

但是，近几年来，这个基本原理遭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粗暴攻击。他们认为，自从出现核武器这个新的军事技术以后，这个原理已经不适用了。最早提出这个论点的是铁托集团，他们说什么在原子时代，“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它将是一次“普遍的毁灭”^①，因此，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要打仗了，“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定义“有了很大的变化”，“再也不够了”^②，等等。他们根本不谈核武器是为谁所掌握、是为哪个阶级的政策服务的，他们根本不向世界人民揭露美帝国主义是进行核威胁、核讹诈、实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罪魁祸首，而只是笼统地、危言耸听地宣扬核武器的杀伤力，企图恐吓世界人民，阻止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要各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屈膝投降。

铁托集团的这种投降理论，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喝采，是并不奇怪的。令人十分惊异的是，那些反复声称同铁托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有原则分歧的人，却跟在铁托集团的后面，照搬他们的谬论，并且毫不知耻地说这一套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苏共领导人认为，“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他们的一些追随者索性连什么外衣也不披了，露骨地说什么核武器已经改变战争的性质，对于战争的正义性质和非正义性质的

定义要作其他考虑；说什么核武器的出现使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发生变化，甚至说什么在核武器面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被压迫民族的界限消失了，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阶级的对立、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的对立，而是核武器同整个人类的对立面了。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这是一个关系全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大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这种背离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

看一看事实

在出现了核武器的条件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考察战争的原理，是否仍然有效？帝国主义者是否像以铁托为代表的各国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不用战争作为它执行政策的手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些事实。

我们先拿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南方进行的战争来做例子吧。

帝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对这些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① 参看波波维奇 1957 年 2 月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的外交政策报告；铁托 1958 年 10 月 12 日在泽尼查的讲话、1959 年 12 月 12 日在塞勒格布的讲话等。

② 参看斯莫勒：《积极共处和社会主义》一文（1958 年 11 月 28 日南斯拉夫《人民军报》）；铁托 1960 年 9 月 22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美国就支持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越南，并逐渐排挤法国老殖民主义者，企图把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和侵略东南亚的军事基地。

美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的侵略遭到了越南人民、印度支那人民坚决的抵抗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在越南人民的有力打击下，特别是越南人民在奠边府战役给予帝国主义以决定性的打击，使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赢得任何东西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被迫同意达成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日内瓦协议。

越南战场上枪声的停止，并不是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的新殖民主义政治的结束，只是暂时改变了实行这种政治的方法。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就违反日内瓦协议，把越南南方以及柬埔寨、老挝划入东南亚军事集团的所谓“保护”地区之内。同时美帝国主义者利用法国老殖民主义者在奠边府的失败，把法国挤出越南南方，扶植吴庭艳傀儡政权，残酷地镇压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唆使吴庭艳集团拒绝越南民主共和国关于就选举问题进行协商以便按期实行越南全国统一的建议，反对根据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全国举行自由选举，阻挠越南全国的和平统一，并且力求颠覆和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妄图用这种种政治手段来实现它用战争所没有达到的目的。

美帝国主义者的这些背信弃义的罪行，吴庭艳集团对越南南方人民的压迫，激起了越南南方人民愈来愈大的反抗。在美帝国主义者看到使用一般的政治手段无法实现他们的目的、不能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反抗时，就转而重新采取战争手段，武装吴庭艳集团

发动越南南方的反革命战争，并且日益公开地直接参加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战争。美国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在西贡设立了军事司令部，把美国军队、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大规模地运进越南南方，在这一地区发动了“不宣而战”的所谓“特种战争”。

这种“特种战争”，毫无疑问，是美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政治的直接继续。美国妄图通过这种局部性的战争，扑灭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威懾”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争取自由独立的各国人民，并且取得这种对付人民游击战争的所谓“特种战争”的“经验”，用以镇压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他们甚至狂妄地宣称：“必须打赢”这场战争，“以证明苏共领导是正确的，中国领导是错误的”。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争夺殖民地而斗争，是它们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它们的这种斗争，虽然更多地是采取外交斗争、经济斗争等形式，但在一定条件下，在这种种手段不能解决矛盾时，也必然要在哪里或那里发展为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或战争。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进行的军事冲突，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刚果处于非洲的心脏地位，蕴藏着大量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刚果的加丹加省，就集中了资本主义世界铀矿蕴藏量的百分之六十，钴蕴藏量的百分之七十五），它对殖民主义者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新老殖民主义者一个逐鹿的场所。

刚果原来是比利时的殖民地，比利时在刚果的投资有四十亿美元左右；英法等老殖



民主义者在这里也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帝国主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战后才大规模侵入这里的。这个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侵入这里以后，立即和老殖民主义者展开了争夺战。美国首先夺取了铀矿等重要战略物资的控制权（美国掌握了在刚果的铀矿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它的第一个原子弹就是用刚果的铀矿制造的），并且把投资逐渐增加到六亿美元以上。一九六〇年夏刚果独立前后，美国一方面勾结英法比老殖民主义者反对刚果的民族独立，一方面又装着“反对殖民主义”、“同情民族独立”的姿态，用“经济援助”等欺骗办法，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分化和窒息刚果爱国力量，排挤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

在美英法比等新老殖民主义者相互勾结推翻了刚果统一的合法政府、杀害了卢蒙巴以后，它们之间相互争夺这块殖民地的矛盾就尖锐起来，日益采取了公开的形式。美国为了实行它鲸吞刚果、排挤老殖民主义的既定政策，利用“联合国军”的工具，不断扩张它在刚果的势力；而英法比等老殖民主义者则利用它羽翼下的冲伯集团，拼命抵抗美国的压力和进攻，力图维护自己的地盘。它们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了施加经济压力，实行暗杀活动，进行谈判等等手段。当这些手段还无法解决矛盾时，就采取军事行动。一九六一年九月和十二月，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同英法比等国操纵的冲伯集团及其外国雇佣军进行了两次火并。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一万名以上的“联合国军”在美国空军后勤的支援下同包括五百名白人雇佣军在内的冲伯集团的军队在加丹加又进行了战斗，仍然是企

图用军事手段来实现各自的目的。像在刚果发生的这样的军事行动，同样毫无疑问，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政策的继续。

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改变其性质的同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其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它对古巴的侵略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动过和可能还要发动的战争，完全是它敌视和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着这种威胁和侵略，当然应该采取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的政策，并且在必要时用革命的正义的自卫战争来执行这一政策。任何新武器的出现也不能改变这种立场。像朝鲜人民、古巴人民为反抗侵略而进行的革命的正义的自卫战争，难道能够说因为世界上有了核武器，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的政策的继续了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战争，各种各样的军事冲突，各种各样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危机，归根到底，都是由帝国主义的政治引起的。上面所说的三种类型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掠夺和镇压殖民地人民、争夺世界霸权、侵犯社会主义国家三个方面的反动政策的继续。

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反动政策和武力镇压、军事侵略的行动，势必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回击，从而产生各种革命的、民族解放的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例



如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安哥拉、越南和其他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古巴人民在吉隆滩歼灭美国雇佣军，等等。这些革命的正义的战争，有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政策继续，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决保卫革命成果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政策继续。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帝国主义的政治存在，就会有战争的土壤。我们一贯认为，在今天的条件下，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我们应当用一切力量来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世界战争。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加紧执行它的对内剥削镇压和对外侵略的政策的情况下，各种形式的人民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其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自卫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是谁也不能阻挡的。难道现实生活不正是证明这个论点的正确吗？

不能只谈战争的破坏性，而 闭口不谈战争的阶级性

苏共领导人在说到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时候，闭口不谈战争的阶级性，完全撇开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这个根本问题，认为“只说一点就够了”，“即一个强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他们及其追随者用大量的文章、讲演、声明和决议来反复宣扬核战争的后果将是人类的“普遍的毁灭”，将是“任何一种政治的终结”等等。且不说这种“人类毁灭”的谬论多么荒

诞，多么粗暴地违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的精神。这种从战争的规模、战争的破坏性来谈论和评判战争性质的观点，恰恰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一切帝国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用战争的恐怖、战争的破坏性、战争的灾难和惨祸等等宣传来代替对战争的阶级分析，掩盖战争的真正根源和阶级实质。例如考茨基在一九三二年说：“几乎再没有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会不清楚：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地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这个叛徒根本不提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灾难的祸首是谁，战争的阶级性质是什么，反而要求工人阶级停止阶级斗争，说防止战争比“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迫切得多”，因为“在现存的社会里，尽管居民中的大多数感到很窘迫，或者甚至陷入极度的绝望，他们终究还是能够生存下去”^①。

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无论战争所造成的屠杀、灾难、惨祸有多么大，都不能忘记对战争的阶级性质的分析，都不能忘记指出这种战争灾难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因为只有这种分析，才能找出避免和根除这种屠杀、灾难和惨祸的办法。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说：“现在，人类大多数都反对血腥的屠杀，但是他们不了解这种屠杀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关系。甚至资产阶级也看到这次战争的惨祸，但它不肯承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消灭战争……这个主

^①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柏林1932年德文版。



要思想一直使布尔什维克和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于那些想使和平降临人間而又要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的人們。”^①

核武器是一个大規模的杀人武器，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竟然发动核战争，将造成人类空前的伤亡、空前的灾难和空前的惨禍。正是因为这样，我們一贯反对核战争，一贯坚持不懈地动员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詐政策和核战争政策，并且一直认为制止核战争是可能的。但是，和各国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不同的是，我們认为制止这种战争的办法不是抹杀这种战争的阶级性质，而籠统地宣傳战争的破坏力和战争将造成的灾难；我們认为，核战争危险的存在正是帝国主义制度造成的，美帝国主义者如果发动核战争，正是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目前进行的統治、压迫、剝削和侵略这些反动政治的最极端、最殘暴的手段的直接繼續，核武器使帝国主义挑起的战争的殘暴和非正义的程度达到极点，使战争的阶级性质显得更加深刻，使美帝国主义者挑起的战争更加反动了。因此，在制止核战争这个問題上，更需要我們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坚持战争是政治的繼續的原理，不断地用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每一个事实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核战争危险的阶级根源，告訴全世界人民美帝国主义是核战争的罪魁祸首，动员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切不願看到核战争惨禍的人民团结起来，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扩充核軍备、准备核战争、进行核讹詐的美帝国主义身上。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核战争，防止核战争的灾难。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和行动同我們恰

恰相反，他們籠统地宣傳核战争的恐怖，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用战争是政治的繼續的观点来分析核战争，他們根本不提核战争的危險来自何处，根本不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且反而为美帝国主义掩飾，反对別人揭露帝国主义；反而联合美帝国主义，說社会主义国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希望核战争。他們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掩护帝国主义，帮助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欺騙世界各国人民。其結果只能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扩充核軍备，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进行核讹詐，从而增加世界核战争的危險。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理論上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基本原理，就必然在实际行动上叛卖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而投降美帝国主义。

应当怎样看待核武器的影响

以上的事实告訴我們，在核武器出現的条件下，并没有改变战争是政治的繼續这个原理，并没有使这个原理过时。但这当然不是說，核武器的出現对帝国主义政治、对当代世界政治关系沒有影响。由常规武器到核武器，在軍事技术的发展上，确实是一个质的飞跃。这种武器的出現，無論在軍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在“战争是政治的繼續”这个原理中，本来就包含着軍事技术同政治的关系問題。武器的好坏、技术的先进程度是軍事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武器的发展、軍事技术

^① 《在工业博物館群众大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28卷，第61頁。



的变化对战争(战略、战术、军队组织等等)有重大的影响,从而,对一定阶级所执行的政策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的问题是要正确说明这种影响。

美帝国主义者掌握原子弹以来,一贯把核武器作为它的政治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主要是以“原子垄断”、“原子优势”作为讹诈手段,大肆吹嘘原子弹的威力,制造原子弹无敌的神话,到处进行侵略活动。在美国失去原子垄断地位以后,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失败以后,又提出了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战争边缘”的政策,企图保持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核优势”,用核战争的威胁“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加强其反革命输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所谓“不发达地区”武装当地反动派,打局部战争,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鉴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核优势”丧失的危险,提出了一套更为狡猾、更为好战的反革命军事战略。美国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在一本为肯尼迪政府的军事战略定下基调的著作《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说明了这种战略。

泰勒在这本书中特别强调在准备核战争的同时,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常规武器、战术核武器和进行有限战争的重要性。他说,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掌握了核武器,以前美国实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不行了,因为这种战略或是“使用全部核力量,或是在挑战面前退却。在双方都能相互遏制核战争的时代里,我们这种僵化的军事力量,不能给我

们的政治战略提供多大的支持。”泰勒说,应该把“大规模报复战略”改变为“灵活反应战略”,这就是:用核武器做“盾牌”,而用有限战争做“灵活运用”的“宝剑”。他说,“这面盾牌将为我们提供保障,但不是一种灵活运用的工具。今后,我们不如说势必从所谓有限战争力量中去寻求我们军事战略的有力因素。”他又说,这种战略“应该清清楚楚地表明,美国准备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各种与形势相适应的武器和部队”进行战争,使“它必须能在任何情况下支持我们的国家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几年来,帝国主义的军事战略虽然几经挫败,几经修补,但它用核武器来加强战争准备、推行其帝国主义政治的根本方针,却始终没有改变。

美帝国主义大量试验、制造和储存核武器,积极宣传核战争的恐怖,加强制造核大战的紧张气氛,当然是实际准备进行核战争,但是,除此以外,它还有着更为现实更为直接的目的,这就是:

第一,在国内,实行以火箭—核武器为中心的扩军备战,促进军火生产这个“最有力”的经济部门的畸形发展,加紧压榨劳动人民,为垄断资本集团攫取惊人利润*。

- * 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八年,扩军备战的费用超过3500亿美元,平均每年超过430亿美元;肯尼迪上台后,1962—63年度直接军费达527亿美元,1963—64年度达560亿美元。这些军费开支,迅速地把劳动人民的血汗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透露,美国把国民收入10%以上的钱用于“防务”,美国全国每人每年在所谓“防务”方面的负担达283美元。与此同时,军火商却大发其财。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说,“防务合同是美国最大的行业”,“是一个花钱的机器”,“是对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政治的一个重要支柱”。



第二，在资本主义世界，通过核武器的垄断来加强美国的霸权地位，企图用所谓“多边核力量”、“盟国核力量”等计划来控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使它们依附美国并屈从于美国的全球侵略和战争计划。

第三，用核武器来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进行讹诈，发动各种类型的侵略战争，镇压这些地区人民的反抗，并阻止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地区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支援。

第四，配合美帝国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政策，用核讹诈来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妄图实现他们的各个击破的反动方针。

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这两个革命运动互相配合，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的生命线。狡猾的帝国主义者看到这种革命形势对他们的危险，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割断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血肉关系，以便他们能够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统治集团的所谓“灵活反应战略”，就是企图用有限战争来镇压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侵犯社会主义国家；用核讹诈来支持这种有限战争，用核武器作后盾，来阻止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支援。

美帝国主义在这样做的时候，极力利用了各国现代修正主义者。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肯尼迪同阿朱别依的谈话就曾经明

白地指出，“如果苏联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不企图“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应读作：不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苏美之间就“能使和平保持二十年”。美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李普曼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进一步地透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他说，肯尼迪“总统曾对赫鲁晓夫说过，既然在核时代我们必须共处，因此，可能引起武装暴动的战斗性行动必须放弃”^①。这几年来，苏共领导人对美国反动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肯尼迪的所谓“和平战略”，采取了迎合迎合再迎合、退让退让再退让的方针，到今年七月二十五日，终于同美英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背弃了他们曾经坚持过的正确立场，接受了美英条约草案的翻版，心甘情愿地听任美帝国主义夺取军事优势。这就出卖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的人民的利益，出卖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者不仅拿核武器作为战争的工具，而且直接拿它作为讹诈的工具来推行他们的反动政策。美帝国主义者不仅准备把核武器用于战争，而且已经在各种形式的常规战争中，乃至在“和平时期”的斗争中，都充分地把核武器用于其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目的。

这种情况，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曾不止一次地招认过。

肯尼迪曾说：“战争与其说是外交政策的目的，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具，也就是借以获得权力和势力的一种手段，提出某国的主

^① 《总统和冷战》。见1963年6月1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張和增進某國的利益的一種手段。”^①他又說：“我們的軍備……是為以外交方式解決爭端作後盾，……外交和防務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兩種截然分開的東西——在另一個東西行不通的地方就使用這一個東西——這兩個東西必須相互補充。”^②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一九五九年發表的題為《軍事技術的發展及其對美國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影響》的報告中承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時期內，美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明顯和始終一貫地發展和採取一種軍事戰略。在此時期內，這種戰略幾乎完全變成了一種核威懾戰略，這表明美國廣泛地依靠戰略核子力量以支持其外交政策。”

以上情況說明，在帝國主義方面來說，核武器為帝國主義所掌握，在政治上的直接影響是：更加瘋狂地與世界人民為敵，更加嚴重地威脅世界和平。帝國主義進行核備戰和核訛詐，只是更加暴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本性。

但是，帝國主義掌握核武器，用核武器來為它的反動政治服務，是否能夠改變世界政治發展的方向呢？是否能夠改變社會發展的規律和階級鬥爭的規律呢？例如，是否如現代修正主義者所說，裝上了核牙齒的帝國主義就已經不再是反動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了呢？帝國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規律是否不起作用了呢？

不。實際情形恰恰與各國現代修正主義者所說的完全相反，軍事技術的發展根本不可能對政治發生這樣的影響。核武器這個新的軍事技術的出現，在政治上給帝國主義帶來的影響，從根本上來說，不是加強了而是

削弱了它，促進着它的死亡。因為帝國主義者利用核武器推行其各種政策的一切措施，都在走向它本來願望的反面。

美帝國主義用擴軍備戰為壟斷資本攫取巨額利潤，越來越加深了國內的經濟危機和階級矛盾，引起國內人民對壟斷資本集團更加強烈的反對；它用“多邊核力量”等計劃加強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必然引起這些國家的反控制，更加促進帝國主義陣營的四分五裂；它用核戰爭對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進行威脅和訛詐，肆意地蹂躪全世界一切正義的、進步的事業，必然越來越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對，使它在全世界人民中遭到空前的孤立，成為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同時，核武器早已不是美帝國主義獨家所有，核武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壟斷，帝國主義者如果用核武器毀滅對方，實際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毀滅的地位；帝國主義者用核武器威脅其他國家，也必然使本國人民受到威脅，促使本國人民起來反對核備戰，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所以，帝國主義者利用核武器執行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結果，將如恩格斯所說的，“由於自身的辯證發展而趨於毀滅”。

恩格斯對軍事技術 和政治的關係的論述

各國現代修正主義者關於核武器出現後戰爭性質已經改變的謬論，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理論”的基礎上的，就是認為核武器出現

① 1958年8月14日在美國參議院的演說。

② 1961年3月28日向國會提出的國防預算特別咨文。



后，现代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经不再由政治决定，而是由军事技术决定的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替这种谬论辩护，竟然援引了恩格斯的话。他们说，恩格斯也谈到过军事技术对“统治和压迫的政治关系”的影响。^①

现代修正主义者引证恩格斯，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亵渎。恩格斯对军事技术和政治关系的论述，恰恰打击着现代修正主义叛徒的谬论。

恩格斯非常注意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愿的举动，而是要求有非常现实的先决条件来实现的，就是说需要一定的工具”^②。根据这种观点，他具体地研究了从十四世纪火药引入西欧以及火器的发展怎样革命地影响了军队组织及作战方法的变化。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论述了军事技术对政治的影响，对一定阶级的政策的影响。在火器发展的问题上，他就曾说过，“火器的引用，不但革命地影响了作战的本身，而且还影响了统治和压迫的政治关系。”^③

恩格斯指出，在火药传入西欧以后，在火器逐步发展起来的几个世纪里，正是欧洲封建贵族逐步走向反动和没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层产生和发展的时代。火药和火器，是在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又给予这个时代的政治关系以一定的影响。在我们上面援引的那句话后面，恩格斯接着说：“为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但是这两者都为城市市民所占有，所以一开始火器就是城市的武器以及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依靠于城市的、那种上升

的君主政治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现在抵不住市民的大炮了；市民的枪的子弹打破了武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与穿着护身甲的贵族骑士队一起同归于尽了。”^④

恩格斯就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从军事技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出发，来看待军事技术对“统治和压迫的政治关系”的影响的。这里是说，因为新兴的城市市民和新的生产力——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最先掌握了最新式的武器，因而使他们在同反动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更增加了力量，加速了他们在政治上打败敌人的过程。

在时间过去了四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之后，在阶级斗争方面，资产阶级走完了它进步的上升的道路，将要代替它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已经壮大起来，这时候，在军事技术方面，简单的火器已经为后膛枪、大炮、军舰所代替。资产阶级越来越依靠这些武器来维持它的反动统治。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情况时说：“军国主义支配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可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自已毁灭的萌芽。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一方面迫使它们每年在陆军、海军、大炮等等上面花更多的钱，所以愈益接近财政的破产；他方面迫使它们更多地采用全国征兵制，因而结果就教会全体人民使用

① 参看卡德尔：《社会主义与战争》；库西宁：《列宁思想的实现》；日本池山重朗：《现代意识形态》；等等。

②③④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1、172页。



武器，这样人民就获得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指挥长官，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当人民大众（城市和乡村的工人与农民）具有自己的意志之时，这样的时机就要来临。在这时候，君侯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的辩证发展而趋于毁灭。”^①

恩格斯在这里同样谈的是军事技术的发展对“政治关系”的影响。不同的是，新的武器现在是掌握在反动的资产阶级手里了。过时的生产方式是不能用任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军事技术的新发展来挽救它灭亡的命运，相反，新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只能促使它固有矛盾的加深，促使它更快地为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恩格斯正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他在这里并不把大炮军舰这些新的军事技术的产生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完结，看作是关于战争性质的改变或革命的不可能，而是把它看作将引起各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人民革命的加速到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规律、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规律只能服从于阶级斗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不能是相反。新旧社会制度更替的规律，革命阶级必将战胜反动阶级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新的武器掌握在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手里，就会帮助它进步政策的实现；掌握在反动阶级手里，一方面虽然暂时加强了它执行反动政治的手段，另一方面却从根本上使它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接近于灭亡。

恩格斯甚至在谈到军事技术对战争本身、对作战方法的影响时，也没有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没有离开这种战争所执行的阶级

政策来分析。他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详细地论证了这一点。他说：“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他指出，适应新的生产力、适应新的武器的作战方法，要求有军队的运动性和众多性这些特征。而这样的“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恩格斯并且在原则上考虑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军事技术和作战方法问题，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②

恩格斯所说的军事技术对于“统治和压迫的政治关系”的影响，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现代修正主义者竟然引证恩格斯的这句话，企图证明新的军事技术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本性，使它变得“明智”、“爱好和平”起来，因而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恩格斯充满革命辩证法的天才思想，竟这样被现代修正主义的庸人们歪曲成庸俗不堪的幻想！

揭破宣扬顺从和投降的奴才哲学

以上的分析说明，现代修正主义者考察战争问题的时候完全抛棄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所宣扬的一套，完全是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应声虫的哲学，是宣扬顺从和投降的奴才哲学。他们企图把这种哲学当作“创造性的马克思

① 《反杜林论》，第1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57、561、562页。



列宁主义”送给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其实，他们的这一套并不新鲜，在历史上，我们从老机会主义和革命叛徒那里，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哲学。

例如，十九世纪，当枪炮技术发生了重大改进的时候，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就曾说什么“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人’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人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①，等等。

在本世纪初出现毒气这个新的杀人工具的时候，臭名远扬的机会主义首领鲍威尔说：“通过革命战争来最终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思想，是我们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界线，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过去革命战争的历史意义，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武器的发展，现代的战争已经与十八世纪末叶时完全不同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毒气战争的时代，新的战争，即使是抱着最革命的目的，也不会使人类摆脱贫穷和奴役，而会使人类陷于最可怕的贫困和最可怕的野蛮状态。”^②如果我们把这段引文里的“毒气”二字换成“核武器”，把“布尔什维主义”换成“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创造性”的理论了么？

可以看出，现代修正主义的论调并不是什么“独创”。过去现在，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奴才走狗，他们都利用军事技术的变化，来歪曲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本政治关系，为反动阶级张目，反对革命。

一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就必然要沿着投降的斜坡，越滚越远。近来，有些人为了帝国主义服务而对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攻击，越来越不像样子了。他们一方面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揭露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运动是“好战”，是要通过“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一方面又根据这种捏造来为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革命活动寻找“理由”。他们竟然堕落到帝国主义反革命的辩护士的立场上，说什么正是由于中朝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使日本反动派“实际上禁止了日共”，使美帝国主义“麦卡锡主义也猖獗起来”，说什么正是由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使法国“反动势力得以破坏民主力量并建立了权威的统治”，说什么正是由于中国对印度侵略的反击，使得印度反动集团得以利用它“组织对进步势力，首先是印度共产党人的进攻”^③。

投降哲学竟然发展到这种程度。在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气味，革命者的气味，有的只是我们很早就从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闻到的帝国主义的气味，反革命的气味。伯恩斯坦、考茨基、鲍威尔等人甚至还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了这几句话，我们完全可以给它的作者立一个纪念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知道，一个把自己和一切都出卖了的叛徒，为了给自己的背叛辩护，会堕落到何等地步！

① 考茨基：《一本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1893年12月）。参看《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2页。

② 鲍威尔在所谓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马赛代表大会（1925年8月）上关于东方问题的发言。

③ 伊诺泽姆采夫：《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进程》。见1963年7月28日《真理报》。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的加深

庄 涛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于二十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日本的经济便以较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高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遭到惨败，美帝国主义单独占领了日本。一九五二年四月美国片面缔结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以后，使日本处于美帝国主义半占领的状态之下。在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实行占领和半占领的情况下，日本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的过程。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帝国主义和它们的报刊，曾宣扬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奇迹。《纽约时报》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吹嘘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什么“这一事实是自由世界经济基础健全的标志”。其实，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不过再一次证实了列宁提出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①这一重要论断。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基础健全的标志”，相反地，却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它固有的矛盾，也无法改变它走向腐朽没落的必然趋势。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日本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九五二年以后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扩大时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日本经济曾呈瓦解状态。一九四六年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只等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平均生产水平的百分之三十点七。这一下降的幅度，超过了英、法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经济恢复进度上，日本也是最晚达到战前水平的。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平均生产水平为一百，日本在一九五一年才超过这一水平。

战后，日本的生产由于下降幅度大，恢复的时间也需要长一些；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垄断资本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加紧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压榨，使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根据一九六〇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的《日本经济的成长》一书所载，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二年的日本年

^①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第321页。



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一。其間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由于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致使一九四九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仅达到百分之三点九以外，其他各年的增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日本发生了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因此，一九五四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骤降至百分之三点九。一九五五年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日本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的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間，日本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这一增长速度超过了包括西德在内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間的每年平均增长率的比较如下：

国 别	增长率(%)
日 本	9.1
西 德	7.5
意大利	5.7
法 国	4.0
美 国	3.3
英 国	2.5

到了一九六一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已比战前增加三倍半。日本的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意大利并接近法国；而在鋼产量方面，从一九六一年起日本已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西德。战前和战后日本的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三点六，一九四八年为百分之零点九，到一九六一年已上升到百分之四点六二。从发展的这一速度来看，日本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要走的更快一些。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虽然比较快，但也并不是没有波折、始终处于所谓“高速度”的过程中的。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十年間，日本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一九六二年日本经济又陷入严重恶化的境地。一九六二年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已急速地下降到百分之四点二，不到一九六一年经济增长率的三分之一。这一下降的幅度，超过战后历次经济危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爆发的日本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是在日本经济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时候产生的。当时日本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扩大尚未到来，日本经济还蕴藏着较大的发展潜力。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发生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引起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在美帝国主义被迫签订朝鲜停战协议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丧失了巨大的军需市场。但是，日本垄断资本接着便将注意力转向国内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扩大。因此，一九五五年以后，日本的工业又有了一些发展。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日本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是在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出现大量逆差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了平衡国际收支，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金融的政策，压缩生产、压缩进口，结果带来了新的危机。但是，当时日本在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潜力，因此接着产生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日本工业的新发展。

可是，最近这一次日本经济严重恶化的情况，却和前几次经济危机的情况很不相同。首先，经过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一年十年間的日本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和扩大以后，日本经济在这方面的发展潜力已大大缩



小。其次，随着战后日本企业设备的更新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生产能力同市场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严重。例如，尽管一九六一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已比战前增加了三倍半，但同年日本全国的实际消费水平，一般只比战前提高百分之五十左右。在国外市场方面，尽管一九六一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战前，但同年日本的出口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仅达到百分之三点六，而战前的一九三七年为百分之五点一。

日本这一次经济的严重恶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企业开工率缩小，生产下降。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日本制造业的开工率不断下降，一九六二年三月为百分之八十六点八，同年九月降至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到今年又将再降百分之五。其中纺织业的生产设备有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处于长期停车状态。开工率下降严重的产业之一的钢铁业，过剩的生产能力在一千一百万吨以上，约占日本粗钢年产能力的百分之二十九。去年七月，日本最大的八家钢铁公司采取紧急措施，封闭平炉三十七座。这是日本在一九二九年经济大危机时期也没有采取过的措施。一九六一年九月以来，许多生产部门的生产不断削减。今年一至三月和去年七至九月各主要部门一些主要产品缩减生产的比率如下(%)：

产 品	1962年7—9月	1963年1—3月
棉 纱	36.3	36.3
人造丝	36.3	36.3
毛 纺	48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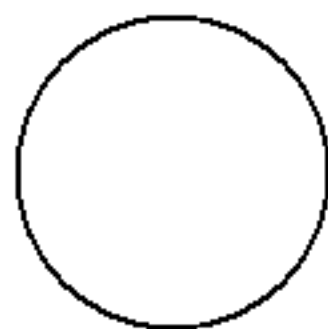
粗 钢	20	30
中型型钢	46.5	70
厚钢板	20	50
纸	15	15

第二，库存增加。尽管生产下降了，但库存货物的指数却在不断上升。据日本通商产业省统计，厂矿库存成品指数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一九六〇年达到一八二点一，一九六一年又增至二一九点一，一九六二年一月为二六九点一，八月再升至二九二点二，比一九六一年八月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五。

第三，企业利润率下降，股票价格下跌。在一九六二年度上半期（即一九六二年四月至九月），日本全部企业利润率比前期（即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降低百分之七点三。在这次生产过剩危机期间，股票的价格严重下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股票价格，已比一九六一年以来的最高月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三十。

第四，大量企业倒闭。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冲击下，日本中小企业因负债而倒闭的现象日趋严重。倒闭的部门从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扩大到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根据东京商工兴信所的调查，日本企业倒闭的现象，从一九六一年八月开始，逐月上升。一九六二年四月，负债额在一千万日元（约三万美元）以上而倒闭的中小企业，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负债总额比前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一一点五。这一调查还不包括负债在一千万日元以下的倒闭的中小企业。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今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前途将是暗淡的。



二

战后日本经济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是同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大力扶植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取代了德、意、日帝国主义的地位，成为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但是，美帝国主义在夺取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存在着很多弱点。它的兵力不足，而且与欧洲、亚洲、非洲的大陆远隔重洋，补给线很长。美帝国主义为了弥补它的弱点，早就蓄意在西方扶植西德军国主义，在东方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它奴役世界人民的两个主要帮凶。美帝国主义清楚地看到，没有它的从属的同盟者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合作，没有日本工业的配合，要实现它奴役亚洲人民的野心是困难的。美国统治集团也从不隐讳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当时美国的副总统尼克松说：日本“在亚洲是关键的战略要地”，是美国侵略“亚洲的紧要堡垒”。一九五九年四月，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赤裸裸地说，日本的工业力量是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

美帝国主义控制日本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日本垄断资本，对日本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美国现任副国务卿哈里曼，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向华盛顿美日协会会员讲话时，曾经这样露骨地说：“我可以对你们说，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对日本的出口是六亿美元，而去年是十七亿美元，几乎增加为三倍。这意味着，由于日本的繁荣，我

们也繁荣。”这里所谓“繁荣”，就是美日垄断资本从对日本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而日本劳动人民却受着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双重剥削。

美帝国主义的对日政策，正如日本共产党纲领所指出的：“美国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对飞跃地发展和巩固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战争，并且为了统治正在挣脱殖民主义锁链而站立起来的亚洲各民族，一贯采取了这样的政策：一面把日本作为它的军事基地而加以巩固，一面镇压日本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同时复活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使其成为属下的同盟者。”^①战后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执行扶植和控制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它不仅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着日本，把日本变成它的军事基地和政治附庸，而且在经济上也形成日本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和从属关系。

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是从多方面进行的。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过程，也就是加深它对日本控制的过程。

首先，美帝国主义为了保存日本垄断资本的巨大企业，数度修改根据一九四七年八月盟国远东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摧毁日本军需工业的决议”及其所制订的赔偿方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美国干脆宣布终止日本的一切赔偿。美帝国主义还在“解散财阀”的幌子下，按照自己的意图，将日本垄断资本进行改组，解散了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日本财阀，分散了冶金和电力部门中的国家垄断资

^① 《日本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225页。



本組織，控制了日本的經濟和金融管理机构，从而使日本經濟从屬於美国。

第二，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一年，美国以“占領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領地区經濟复兴基金”的名义，向日本提供的所謂援助共达二十一亿美元（一九六二年一月，日美两国已就此事簽訂协定，确定其中的四亿九千万美元为日本对美国的債務，分十五年还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为“美援对等基金”直接投入日本的电力、运输、鋼铁等重点企业，对促进战后日本經濟的恢复起了一定作用。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美国根据同日本簽訂的輸出剩余农产品协定而給予日本的所謂援助和貸款約二亿余美元。

第三，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一年，美帝国主义共給予日本的“軍事援助”十四亿美元。此外，从一九五〇年起至一九六二年八月，美国向日本支付的軍需用款約达六十九亿六千万美元，其中包括美国对日本的軍需采购、駐日美軍的一般开支等，日本把这笔款項叫做“特需”。“特需”并不是美国对日本的援助，而是美帝国主义通过这一加工訂貨的形式，把日本壟断資本綁在自己的战車上。一直到現在，“特需”依旧是日本統治集团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

第四，向日本輸出私人資本。根据日本大藏省的統計，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投入日本的外國資本共十九亿三千九百万美元，再加上去年十月份日本所借的外債和外国人取得的日本股票合計一亿零一百万美元，那么到去年十月末，在日本的外國資本累計已达二十亿美元以上，其中美国壟断資本及其控制的世界銀行掌握了百分之九

十。在截至一九六二年九月止的十九亿三千九百万美元外國資本中，外国人取得的股票部分占三亿五千五百万美元，貸款占十三亿八千万美元。在外国技术投資方面，到一九六二年九月止，日本共和外国訂立了一千八百三十六起技术合作合同，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同美国大公司締結的。美国在日本投資的絕對数虽不算很大，但是趋势是不断增长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增长速度更为猛烈。美国私人資本和技术投資的大量进入日本，对解决日本壟断資本本身的資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这也就使美国壟断資本深深地滲入和控制了日本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特别是日本在战后得到显著发展的鋼铁、电力、石油、机械、化学、电子等工业部門，几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受美国資本的控制和影响。这些生产部門，从原材料、技术、資金、設備到銷售市場都同美国壟断資本有着各种联系和依賴关系，如石油工业中，美国資本分別占东亚燃料工业等四大公司資本总額的百分之四十九到百分之五十五，而这四家公司加工的石油产量，占日本整个石油产量的一半以上。日本的化学工业主要控制在美国杜邦財团的手中。近年来，美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資比重加大，美日联合企业正在加紧建立，美国資本在这些企业中占有一半甚至更多的股份。这样，美国壟断資本不仅把日本企业变成它的加工厂，而且力图使它成为美国企业的女儿公司。

近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經濟的控制更为加强。这种控制突出地表现在美国压迫日本实施貿易和汇兌的“自由化”方面。

本来，美国利用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因丧



失殖民地而造成的缺乏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应基地的困难，已把日本的貿易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如一九六一年日本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和进口的百分之三十六都不得不仰賴于美国。美国同日本之間的貿易是极不平等的。由于美国实行对日傾銷和限制日貨进口政策，以及价格上的不平等，日本对美貿易长期入超。到一九六〇年底，日本对美貿易逆差累計已达六十七亿五千万美元，一九六一年一年的入超更高达十亿零二千八百万美元。对美貿易入超构成日本国际收支赤字的主要内容，这些赤字又主要需要依靠美国的貸款和“特需”收入等来弥补，这就又增加了日本在金融上对美国的依賴。

一九五九年以来，美国出現了严重的美元危机，并随即采取了减少进口等保护措施。日本对美出口的扩大遇到更多的困难。美国为了轉嫁危机，增加出口，就对日本施加压力，要它进一步开放市場，实行所謂貿易、汇兌“自由化”。本来，日本战后对貿易、外汇实行管制，是它取得經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日本工业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很强的情况下，貿易、汇兌“自由化”，无疑会使美国商品在日本市場上大量傾銷，从而給日本經濟带来不利的影响。可是，正在期望美国扶植的日本壟断資本，迫于美国的压力，又不能不在“自由化”問題上做出让步。一九六〇年初，日本已对进口商品的百分之三十七实行了“自由化”，但是美帝国主义还不滿足。在美国的压力下，从一九六二年十月起，日本又把进口“自由化”的比率放寬到百分之八十八。据日本駐美国使館調查，日本“自由化”比率每提高百分之十，美国即

可增加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日本自然受到相应的損失。貿易、汇兌“自由化”的威胁，迫使日本壟断資本要去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促成日本壟断資本加速設備更新，使固定資本投資更盲目地扩大，从而使日本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为加深。

今年二月七日，日本政府又被迫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組織的建議，將該組織的第八条規定适用于日本，即日本今后不再以国际支付上的理由，限制进口和外汇兌換，也即实施貿易和汇兌的百分之百的“自由化”。因此，日本还没有实行“自由化”的百分之十二的商品，也将很快实行“自由化”。这些商品，如重型电机等产品，本是日本国际竞争能力最弱的商品，如果全部实现“自由化”，将无法再在日本国内市場上同美国貨竞争。这样，日本将成为美国傾銷大量过剩产品的市場，这对日本壟断資本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然而，情况的发展正在逐漸走向美帝国主义的願望的反面。随着美国經濟地位的削弱和美国对日控制的加强，以及日本經濟危机的一次比一次深化，日本壟断資本在依附美国壟断資本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力求改变这种过分依賴美国、受制于美国的局面。现在，日本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复活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强，日本壟断資本正在加紧推行对外經濟擴張政策。据一九六二年七月末出版的日本《財政金融統計月报》刊載，截至去年三月末，日本对外的投資和貸款总额已达二十亿九千三百万美元，其中已执行的为十二亿九千三百万美元，未执行的为八亿美元。在已执行的十二亿九千三百万美元中，



对国际货币基金組織所出的資金为二亿六千四百万美元；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資为三亿九千七百万美元；采取延期付款形式的出口为六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些資金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去年以来，日本壟断資本加强了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渗透。

日本壟断資本还在磨拳擦掌地投入爭夺北美、欧洲等資本主义发达国家市場的斗爭。据日本經濟企划厅和大藏省发表的数字，去年日本的对美出口比一九六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对欧洲的出口比一九六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其中对英国的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九，对意大利的出口增加百分之八十五）。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去年十一月訪問西德、法、英、比、意、荷等西欧六国，以及今年三、四月英、法两国外交部长应邀訪問日本，并且分別締結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約和日法貿易新协定，也就是为了加强同西欧国家的联系，扩大相互之間的貿易。日本壟断巨头的組織經濟同友会，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曾經毫不隱諱地說，今后日本經濟的活路在于出口。由于这一斗爭直接侵犯到美国壟断資本的利益，所以在美国壟断資本及其从屬同盟者日本壟断資本之間，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日益表面化。

今天日本壟断資本依旧是美帝国主义的从屬的同盟者，还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但是，美日壟断資本之間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在本质上是不可調和的。今年二月，日本政府所以敢冒加深日本生产过剩危机的風險，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組織的第八条規定，一方面固然迫于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以退为进的考虑，即：用牺牲日本广大农民

和中小企业的利益的手段，来換取日本壟断資本进入資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場。日本大藏大臣田中角荣在二月七日发表談話說，日本政府准备趁这个机会，以强有力的办法促进其他国家廢除对日本貨的差别待遇。但是，事与願違，尽管美国压迫日本实行百分之百的“自由化”，但美国自己的門戶却不开放，依旧限制日本商品的进口，这特別表现在不久前美国限制日本四十种棉制品进口的事件上。在欧洲，目前也只有少数国家撤消了对日本援用“关税及貿易总协定”第三十五条（即对低工資国家商品不給予最惠国待遇）的規定。日本政府为了維護日本壟断資本的生命綫，不得不对美国壟断資本展开斗爭。今后，随着資本主义世界經濟的日益恶化，随着日本經濟状况的日益恶化，美日壟断資本之間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肯定将会有新的发展。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經濟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得到較为迅速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建筑在对日本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殘酷剝削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扶植下的日本壟断資本，依靠这种殘酷剝削，并且通过国家政权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搜刮，积累了大量的資金用于扩大固定資本投資和設備更新。

日本的工业，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以前，輕工业始終占压倒优势。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应付侵略战争的需要，大力发展



軍需生产，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就逐步提高，并逐渐在日本工业生产中占优势。到日本投降时，由于日本本土并未变为战场和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壟断資本的扶植，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依旧保留了一定的基础。当然，这一基础同美、英、西德等国家比起来，是十分薄弱的。同时，日本自一九三一年忙于发动侵略战争以来，絕大部分工业设备就没有更新过；原有的设备因长期紧张使用已十分破旧；战争还阻碍了日本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所以，当一九五一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时候，日本的技术和设备比美国落后了很多年。战后，日本壟断資本为了加强国内竞争，获取最大限度利潤，为了縮短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工业差距，为了重新参加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的斗争，迫切地要求日本工业生产机构的更新、充实和现代化。它的具体措施就是大量地更新和扩大固定資本，推行技术革新，建立新的工业部門，迅速地促进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一九五二年以来，日本民間设备投資总额逐年增长，其情况如下（单位：亿日元）：

1952年	7,348	1957年	14,208
1953年	7,766	1958年	14,711
1954年	7,738	1959年	21,669
1955年	7,784	1960年	30,000
1956年	11,703	1961年	39,713

日本壟断資本的固定資本投資，直接来自对日本工人阶级的剝削。在日本壟断資本

的残酷剝削下，日本工人的工資，一向是很低的。第二次大战后，日本由于大批侨民被遣送回国和大量军队复員，以及后来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劳动力过剩的状况更为严重。战后十余年来，日本一直保持着一支龐大的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的劳动大軍，給日本壟断資本提供了极为廉价的劳动力。战后日本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資，大体上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和西德的二分之一。因此，日本壟断資本一向能够获得比較高额的利潤。这也正是刺激日本壟断資本积极进行设备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九六〇年，日本制造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已达到百分之三百四十五。因此，日本壟断資本能够以比其他国家都高的积累率进行資本积累。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投資情况如下（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平均数）：

	投資率* (%)		投資 增长率 (%)	劳动生产率 上升率 (%)
	固定資 本投資 (%)	其中生产性 投資** (%)		
	日本	22.3		
西德	21.3	13.2	9.8	5.3
意大利	20.0	12.6	8.2	4.5
法国	16.9	11.6	4.9	3.7
美国	16.7	9.6	2.1	2.3
英国	14.6	10.1	4.5	1.6

- * 投資率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对投資的比率。
- ** 生产性投資是指固定資本投資中除去住宅建設和一般性政府投資后的投資。

上表說明，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日本每年的投資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二



十二点三，特别是生产性投资达到百分之十七点三。日本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高于其他国家，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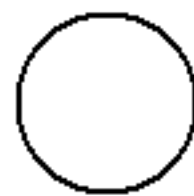
日本垄断资本还通过国家机构对日本劳动人民进行剥削，把从日本劳动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钱用来帮助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战后十余年来，日本垄断资本一直大量地掠夺日本国家资金。一九四七年一月，日本政府为了替日本垄断资本筹措资金，便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大量发行债券。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末，共发债券约一千一百亿日元，其中百分之六十四由日本银行承销，造成当时的日本通货膨胀。一九五三年以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每年随同年度财政预算提交国会讨论。十年来日本的“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总额达一百三十三亿美元以上。

日本政府的预算支出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在支出方面的中心内容是进行公共投资，即在垄断资本选定的工业地区，进行修建道路、港湾等建设，为垄断资本建立联合企业提供条件。据统计，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间，公共投资在日本国内总投资中占到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一九六一年以后，池田政府推行所谓“经济高度增长”十年计划，更大量地增加公共投资，计划在一九六一年以后的十年内平均每年的公共投资，由一九五九年的七千九百亿日元和一九六〇年的九千四百亿日元的水平，猛增至一万六千亿日元。据估计，日

本垄断资本每年的资本积累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来自国家的资金。

日本政府为日本垄断资本的发展服务，对日本广大人民实行了重税政策。以所得税为例，一九三五年，日本三口之家年收入不到六十三万日元（按现在价格换算）的不收所得税，一九五七年收入超过二十七万日元的却一律要征税。同战前相比，不仅征税的面扩大了，而且广大收入低微的纳税人在所得税总收入中所占的比率也逐年增大。由于实行重税政策，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就由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十二点九，上升到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十九点五，一九六〇年又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一九六一年更增至百分之二十三。日本政府对人民赤裸裸的掠夺和为垄断资本忠实服务的事实，又一次揭穿了资产阶级代言人关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谎言。

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日本垄断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大大加剧了日本贫富两极的分化。战后十余年来，日本垄断资本从日本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据一九六一年三月的估计，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利润率，建筑业为百分之八十七，食品业为百分之六十七，棉纺织业为百分之六十五，重型电机制造业为百分之六十二，工作母机制造业为百分之六十。如果把生产衰落的煤炭等部门的利润计入，则平均利润率为百分之四十四。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日本法人企业的财产就



从二万四千六百七十八亿日元，增至二十万五千六百零五亿日元。相反地，日本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双重压榨下，生活处境却十分困苦。日本工人不仅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中年和老年工人就业困难，而且在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的威胁面前，大多数在业工人的收入难以维持一家的生活。例如，一九六〇年四月，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产业工人每月收入不到两万日元，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生活。

日本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不能不反过来影响到日本经济的发展。战后十多年来，日本垄断资本加紧对日本人民的剥削和对固定资本进行大量的投资，是战后日本工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战后日本的国内市场的确是扩大了。因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和扩大，必然使机械工业的订货成倍地增长。机械工业订货的大量增加，必然同时促成钢铁、燃料、有色金属、电力等一系列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日本以生产资料为中心的国内市场的扩大。但是，这一国内市场的扩大是不稳定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无限制地为自身服务，归根到底是以消费为转移的。如果日本国内的消费市场和日本的外国市场不能相应地扩大，那么巨额的设备投资将成为日本生产过剩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垄断资本为寻求巨额设备投资的财源而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残酷剥削，事实上是在不断相对地缩小日本国内的消费市场，成为日本

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基础。

为了摆脱目前经济严重恶化的状况，日本垄断资本更加紧了对日本劳动人民的进攻。根据日本劳动省发表的统计，从去年一月到十月，日本各大企业解雇的工人有三万六千人，其中不包括八幡制铁公司的转包工中失业的二万工人和煤矿企业正在解雇的七万工人。对在业工人，日本垄断资本采取冻结工资、迟付工资、减少加班费等办法。根据日本劳动省的调查，截至去年九月末，资本家拖欠工人的工资总额达到十六亿日元。由于资本家不断加强工人劳动强度，去年以来，日本工伤事故大为增加。日本政府同时在农村中加紧推行为日本垄断资本服务的农业政策，即农业基本法。他们企图把日本广大的小农赶出农村，使日本农村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富农的手里。这样不仅为日本垄断资本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且也为本国垄断资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最近两年间，日本农村人口已经减少一百零六万人。日本广大的农民正在逐渐转化为无产阶级。

随着日本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大鱼吃小鱼的所谓建立日本新产业秩序的工作，正在更加激烈地进行着。今年日本政府向国会本届会议提出“加强国际竞争能力法案”，就是企图通过在金融、税收方面的各种措施，促进特定产业的各企业实行合并、生产专业化、输入新生产方式、处理过剩设备和淘汰所谓“非能率”的企业。这实际上是一个控制和排挤中小企业、进一



步加强日本壟断資本的生产和資本集中的方案。

日本人民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压榨，长期以来坚持着英勇的斗争。日本人民在政治上高举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旗帜，要求廢除日美“安全条約”，撤除美国在日本的一切軍事基地，收回被美国占領的日本領土——冲绳和小笠原群島，反对美国把日本变为核基地，反对复活日本軍国主义，等等。在經濟上，日本人民正在展开反对裁員、反对加强工人劳动强度，要求提高工資和反对貿易、汇兌“自由化”等保卫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权利的斗争。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日本共产党都始終英勇地站在战斗的最前列，起着先鋒和领导作用。日本劳动人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为今后爭取更大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 *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日本經濟是循着下述几个互相矛盾着的方面不断发展着的。第一，战后日本經濟增长的速度在世界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居于首位，但日本經濟的这一增长是在从高漲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漲的間歇状态中进行的，每一次工业的高漲都为下一次更深刻的危机准备着条件，而每一次危机都使日本进一步走上复活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更加反动、更加腐朽和垂死的道路。第二，一

方面，美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称霸亚洲和掠夺日本人民的目的，积极扶植日本壟断資本，使之成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帮凶和从屬的同盟者。另一方面，日本壟断資本現在仍然要依賴于美帝国主义，仍然不能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但是，随着近年来美国經濟地位的削弱和日本經濟地位的相对加强，随着美国加强对日本的控制和日本經濟危机的不断深入，日美壟断資本为爭夺市場而进行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日益表面化。第三，日本壟断資本为了消除日本同其他資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間的工业差距，重新进入列强瓜分世界市場、原料产地和投資場所的斗争，大規模地进行設備投資，更新和扩大固定資本，促成了日本工业力量的迅速增长。而日本工业力量的这一迅速增长，是在日本壟断資本对日本人民实行残酷剝削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一方面为日本頻繁的經濟危机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加深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同日本人民的日益深刻的对立。日本經濟这一发展过程說明：为帝国主义所吹嘘的所謂日本經濟发展的“奇迹”，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逃脱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規律，沒有也不可能改变資本主义制度日益衰落的趋势。这一发展过程同时也說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是日本人民的敌人。美日反动派和日本的修正主义分子，企图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壟断資本的罪恶行为进行粉飾，必然是徒劳的。

